北大文革武斗纪实

张从 樊能廷 俞小平　主编

2018 年 8 月

目　录

恶梦醒来是清晨（序）. 1
上篇. 6
北大校庆 120 年，回忆文革武斗 120 天. 6
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28
北大地球物理系部分校友忆武斗. 44
恐怖之夜，救人一命——武斗杂忆. 70
北大文革两派武斗起讫. 75
一个校外人员见证的北大武斗. 94
我所见证的北大 1968 年武斗. 102
检视北大文革 3·29、4·26 武斗. 117
北大“3• 29 武斗”印象. 130
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 133
北大武斗琐忆. 156
关于北大武斗的回忆片段. 164
戴柳条帽的日子. 170
忆北大文革中监听校内电话行动. 182
微信截屏话武斗. 189
况明星《文革武斗期间北大天桥的架设》. 204
荒唐的岁月,荒唐的经历. 209
下篇. 219
一段不愿回忆的经历. 219
一件棉衣的故事. 223

北大文革“刺聂”真相 225
我所见证的“刺杀”聂元梓事件 243
谁是杀害殷文杰的元凶——评胡宗式博客 246
北大武斗期间死亡事件真相探究 250
“人道的用刑”与三个学生的遭遇 262
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 274
浅谈北大武斗所用器具给学校造成的财产损失 281
北大文革中的抓捕行为 291
悼王解南同学 301
在地院避难的那些日子里 303
试析北大武斗的背景内因兼驳聂元梓的谎言 307
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 313
答宫香政同学质疑 319
跋： 记录历史，还原真相 323

恶梦醒来是清晨（序）
——北大武斗五十年祭

奚学瑶

二零一八，北大经历了百廿历史，岁交两个甲子，当是煌煌大庆。我辈北大学子，年逾古稀，有约或无约，于校庆之日相聚于母校家园故土。

未名湖微动涟漪，湖畔花草丰茂，杨柳依依，博雅塔依然刚强坚挺，“一塔湖图”显示着北大的风貌与风骨。越过百年讲堂和三角地，来到了学生宿舍区，始觉旧貌变新颜。一代莘莘北大学子，衣着光鲜，明眸亮丽，对现实与未来充满了自得与自信。是啊，他们是当今社会的骄子，他们是现在北大的主人！

新的学生宿舍楼群已非原来古朴的面容，它们更高大，也更漂亮了。它们已不认识我们，我们却记得它们的前身。我们的青春身影，曾在此处跃动穿行，有诗书的音响，也有歌舞的欢欣，有大书包里碗筷的叮当声，更有同学间争论与调侃的南腔北调音……然而，更加铭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是那个动荡的时段，这一百二十年中空前绝后的一百二十天！那个刀光剑影，血火交迸的武斗场景！

时光已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一片当年的古战场，已经了无旧痕。师弟师妹们在欢乐和幸福中生活，我的随同的小孙女也睁大憧憬未来的眼睛。不要再提那一段惨酷的历史了吧，对于他们，这一切都已恍如隔世。他们能理解吗，有必要去聆听它吗？“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还是谈笑一下拉倒吧！

可是，历史能拉倒吗？当年北大武斗惨剧总导演聂元梓，在一些人的簇拥下，仍在陆续出书，她在书中叫喊：“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人还在，心更未死！”“要推翻种种强加于我的不实之辞和罪名，冲掉泼在我身上的污泥浊水。”(《聂元梓回忆录·自序》)。一个曾经作恶多端的老妇人，如此顽固坚持自己的罪恶立场，而且，在她的带领下，还有一些她当年忠实的部下，跟着她一起喧嚷鼓噪，篡改或掩埋北大文革真实的历史，为文革翻案的黑红暗潮推波助澜。这使我们深深警悟到，作为北大文革的受害者，聂元梓的对立面，便不能做东郭先生，怜悯和宽容落水狗。对她这个刑满

释放的老人，一时孤苦伶仃，可以平和对待，给以人道温蔼。但是，对于过往的事实，则一点也不能含糊。历史事实，是文物，是舍利子，它们是日月精华的积淀，愈久愈有价值。“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知道事物的来龙去脉，明晰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血泪中取得历史教训；从血泪中透视社会的真谛；从血泪中坚定青年人对理想纯真的追求。因此，我们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无视道义担当，背叛自我，舍弃未来！

永生难忘的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晚上，我与同班同学、上海老乡成少安自沪返京，坐车从北京站返回北大，北大校园异于往常，一片昏黑肃杀。我们居住的三十二楼秩序混乱，气氛压抑。后来得知，当天凌晨，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突袭三十一楼和二十九楼，挑起了大规模武斗，致使一、二百名井冈山同学受伤。他们用武力驱赶井冈山兵团 03 和 01 纵队的男生，占据了具有战略地位的三十一楼和二十九楼，导致了这些同学无枝可栖，只得入住三十二楼。更令人愤怒的是，事后，武斗策动者聂元梓却以制止武斗者身份，陪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武斗现场视察，演出了贼喊捉贼的现代恶剧。井冈山同学出于义愤，群起将聂元梓抓伤。李钟奇一时昏乱，制造了一个所谓的凶手“用黑把匕首”刺杀聂元梓的错案，导致北京市革委会，下达了捉拿所谓的刺杀聂元梓凶手的一份严厉的“四点指示”。正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此时的井冈山兵团上上下下，满腔悲愤，申诉无门，经受着极大的政治和心理压力。第二天，中文系四年级的王涛同学从医院回来，向同学们讲述了那天毫无防备的朱殿庆同学，被公社武斗队员用长矛扎穿腹部的悲惨状况，说话中间，忍不住嚎啕大哭。男儿有泪不轻弹，闻之者无不为之动容！

井冈山兵团是个松散的群众团体，是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的集合体。在反聂抗暴的旗帜下，团、零、飘、井、红，五个组织联合而成，可谓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往往对一个问题的认识，争论不休，很难取得共识。下边各纵队、各战斗队的组织观念也很淡薄，故往往队自为战，人自为战。井冈山兵团总部执勤的都是一些学生，一些未经政治高压锤炼的年轻书生，坚贞良善而不够成熟老到。聂派在校内外失道寡助，文攻乏力，图穷匕首见，便妄图以武力一统天下。他们早就在暗地里编练武斗队，装

备武器，准备发动一场武斗以摧垮井冈山兵团。对此，一些井冈山群众、广播台工作人员，还有武警出身的井冈山保卫组长——法律系学生吴金岳，都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吴金岳多次向兵团总部提出警告。总部领导人对此不以为意，仍以善良之心度之，未做任何防备。导致吴金岳负气出走，挂印归乡，直到工宣队进校，才返回北大。

聂元梓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大左派，以她为首的北大校文革，自视为不可触动的所谓的“红色政权”。他们有恃无恐，忘乎所以，认为“反聂即反动”，“反聂即反中央文革”，“北大两派斗争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他们狂傲地以正统的当权派自居，以为可以对对立派为所欲为，无法无天。1967年 8 月，在阴狠的张春桥的指使下，上海工总司，武力摧垮了与工总司有不同意见的上柴联司。罪恶的先例，震动了全国，无疑也为聂元梓阵营中的鹰派树立了样板，图谋以武力摧垮反对派。只是此举毕竟触动了违反人性、人道的底线，公社内部有良知者并不赞同。他们或者公然提出反对，或者隐退 ，与此恶行切割。但是，公社之中的狂热者，下定了决心铤而走险。他们在聂元梓的批准下，终于发动了精心准备的“三 · 二九”大规模武斗，在北京高校开启了罪恶的先例，燕园里一片血雨腥风!

哪里有镇压，哪里便有反抗。聂元梓对井冈山的武力镇压，倒逼松散的井冈山兵团进行整合，教育了书生气十足的兵团头头们，为正义，求生存，促使井冈山兵团空前团结，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和聪明智慧，或飞架天桥于高空，或俯掘地道于深层，截听电话于无声之中，架接高压线于武斗战场之上……没想到，一个个文弱书生，竟然成了披坚执锐，顽强抗争的武士！这样的锤炼，大概已经达到毛泽东所说的革命接班人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要求了吧？这样的特殊学业，在北大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了吧?

北大 120 周年校庆，我们在和平喜气的校园里徜徉，目测当年两座高架桥的距离和高度，估摸截听地下电话线路的位置，心里确实钦佩师兄弟们的胆略和智慧。但是，细嚼往事，逐渐转为苦涩和苦痛，当年惨酷的场景，像蒙太奇一样，一幕幕浮现在脑海：樊立勤被抓，老虎钳夹断他的手指，膝盖被钉得粉碎，竹签子楔入了指甲……邓朴方被绑架关押数月而跳

楼致残；韩琴英被残酷殴打而流产；数百名同学被打伤打残……更有甚者，刘玮、殷文杰、温家驹三人丧失了年轻的生命。一百二十昼夜枪（矛）林弹（弓）雨的紧张和危险，被围困在六座楼里，遭受断粮、断水、断电的困厄，似可以轻轻带过；那些伤残者，亦因伤愈可以淡忘；但那些冤死的亡灵，在杀人者始终不肯忏悔认罪的情况下，他们怎能在地下安息？经过四十楼与四十四楼前面，我不禁想起被活活打死的刘玮，想起被捅了三十九枪的殷文杰，想起他们临死前的惨叫，不觉毛骨耸然，心头一阵阵发紧。这是魔鬼的行径，这是法西斯的罪恶，我们怎么诅咒它们都不过分！这里不是小说描述的魔窟渣滓洞、白公馆，这里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受害者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同窗学友！对于受害者最好的悼念，就是把杀害他们的恶行载入史册，让世人知道元凶是谁，知道罪恶的根由，懂得何谓人道、人性，何谓人权？懂得善恶，懂得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发动武斗，猖狂镇压群众，是聂元梓罪恶中的罪恶，是她问题的要害所在。正如 1973 年 7 月 17 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杨振宁、周培源时，曾把聂树为文革旗帜的毛泽东也认清了聂元梓。他向在座各位气硬力沉地说道:“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周培源高度概括，一语中的:“聂元梓当时猖狂镇压群众。”(《北京大学纪事》814 页和北大档案馆有关史料）北大聂派之所以在北京高校首发武斗，这绝不是偶然之举。它是政治斗争的延伸，是没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文革新贵，造反掌权，一时得志的疯狂；是封建个人崇拜，“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恶果；是慈禧老佛爷式集权独裁、迫害异己的必然趋归。专制的极端便是暴力，便趋同法西斯，趋同极左，这是历史的铁律。现在，老佛爷聂元梓及聂粉们居然以反极左的“右派”自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一本书，以大量的史实，从不同方面记载了五十年前北大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痛史。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将之深藏在记忆之中，不愿揭开这道伤疤。然而，武斗发难一方的少数人等，却在近几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或者模糊武斗的真相，把“三 · 二九”大规模武斗前的小摩擦指作武斗起始，然后各打五十大板。他们把“三 · 二九”武斗发生之后，

四十楼井冈山兵团第十纵队奋起反击的小规模战局，指作武斗发生的起源，从而逃避他们是武斗肇始者的历史罪责。其实，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只要他们如实讲述武斗始末与真相，说一声对不起，忏悔认错，也就罢了。遗憾的是，知情者至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道明事情真相，说一声对不起，更不要说忏悔认错，反而想洗白自己，抹黑他人，倒打一耙。严酷的现实，逼使我们编辑这一本集子，还历史一个真相，给世人一个公道！书中我们也收录了原公社派中有正义感的同学，他们比较客观地书写了他们亲身的所历所闻，让人们了解有关武斗中的真实情况。对他们，我们深表敬意。

历史告诉我们，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违背人道人性的暴力的行使者终将遭到历史的惩罚；不认罪不忏悔的罪人，终将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世人和后人的唾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历史告诉未来，让子子孙孙们知道，罪恶的文革覆辙不可重蹈，作为文革标志性人物、罪行累累的聂元梓聂老佛爷休想翻案，她逃脱不了历史的正义审判！

恶梦醒来是清晨。愿当年的血腥化为朝霞，愿泪水洗净雾霾。北大民主、自由的百灵鸟与彩霞齐飞，未名湖水共蓝天一色！我们的母校，我们的家园，永远温馨，永远安宁！我，一个年迈的老者，北大文革的亲历者，为北大后来的学子，深深祝福，祝福！

2018.7.23

上篇

北大校庆 120 年，回忆文革武斗 120 天

唐利

120 现今是北京大学喜庆的数字，它正在紧锣密鼓地迎接 120 周年校庆，学校早就专门设立了“120”办公室。北大还和另外两个 120 有关：它经历过 120 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这在正史中只是草草带过，而其间有 120 天残酷惨烈的武斗，更是鲜为人知。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一)

我 1963 年考入北大化学系，1966 年“文革”发生，到 1970 年分配，“文革”占了四年，荒废学业，跟着推波助澜，同时见证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节点人所共知，1966 年 6 月 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点燃了全国大乱的火种，文化大革命大浪潮铺天盖地席卷全国。

第二个节点是 1967 年 2 月 15 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成立。

这个日子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揭开了北大分为两派的序幕。从此北大“文革”从“万众一心”团结在聂元梓周围，矛头向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战，转入了派性内战，自相厮杀。此前，聂元梓向北师大和学部发起“外战”，结成北京高校的“天派”。

在北大之前，绝大多数其他院校、单位，早已经两派争斗得热闹。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把“敌人”搁在一边，“革命阵营”两派内斗自相残杀，这是大闺女坐轿——头一回。北大原本是聂元梓的一统天下，她俨然是（实际也是）毛和中央文革在北大的代表。北大分派是大势所趋，有聂元梓一面大旗，分派反倒比较落在后头。

1967 年 2 月 15 日，北大三个拥戴“校文革”的跨系统组织，“红旗兵团”、“东风兵团”、“红教工兵团”合成一体，取名“新北大公社”。后来知道，事出有因，是为给聂阿姨进入“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做铺垫。2 月 20 日，首都红代会成立，一司、二司、三司各出代表，她一个光杆司令，

“老娘的队伍才开张”，就如愿以偿当了“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组长。“红代会”总部设在北大俄文楼，好比“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曼哈顿区。

“新北大公社”成立，聂有了自己的嫡系部队、“聂卫军”，但另一部分人被边缘化，等于打入另册。比如我在的化学系三年级（编号 0363），一部分人组成“红三团红旗”战斗队，加入公社，我们其他同学本来一直是支持聂元梓的，却被拒之门外。“新北大公社”自外于平常人，谁能热脸贴冷屁股呢。别无选择，平常人只好另起炉灶，先批评后反对，聂元梓就这样把大批人推到她的对立面。

实际上，后来成立的以反聂为主旨的“井冈山兵团”中，大多数人曾经是她的拥护者，却有的被排挤，有的被排弃，有的被敌视，有的被打击了。凭着第一等“化友为敌”的本事，聂元梓不折不扣是北大群众分为两派的始作俑者。

第三个节点，1968 年 3 月 29 日武斗。

北大“文革”随后的派战愈演愈烈，弄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观点之争不是本文讨论的要点。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几百年后的旁观者、局外人的眼光，恐怕不过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上不了台面，进不了史学主流。恰是后来的一个事件，彻底改变了两派斗争的性质，改变了北大“文革”的走向。那就是由聂元梓一派发动的 3 · 29 武斗，延续了 120 天，从此两派的观点路线之争已经退居其次，占据首位的是总体的给不给井冈山活路的人权存否之战。套用毛的语句，“不给活路的政策，不是党的政策。”

“文化”大革命，既不文化又不革命，派斗变成武斗，人类史上也算是一大奇葩。现在动不动就“震惊世界”，“最高学府”武斗确是可以算一件“震惊世界”的事儿，将来一定逃不脱历史学家的法眼，会有人来分析它的历史逻辑，思索它的历史教训。

（二）

北大武斗是从 1968 年“3 · 29 武斗”开始的，延续了四个月，120 天，动手之早，时间之长，是北京高校之最，在全国也少见。

不过，零星摩擦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全校的武斗，一点迹象也没有。

对骂归对骂，互怼归互怼，口诛笔伐，吐沫对喷，日久月深，谁也不会思虑到人身安全之虞。

哪知道，一场突然袭击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聂元梓调来汉中分校武斗“有心得”的高云鹏，3 月 20 日，“新北大公社”成立了以高云鹏为首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几天后，令人无从应对的夜袭 31 楼就猝然而降。

68 年 3 月 28 日是星期四，我们等到双方广播台的大喇叭战结束，校园恢复宁静，照常熄灯睡觉，各自归寝，进入梦乡。彼时化学系的男生住在 31 楼，两派对立严重，宿舍已经自行调换，“合并同类项”，同派的住在一起。不同派的不来往，偶尔见面不是形同陌路，就是怒目而视。化学系“井冈山”编号“03 纵队”，是“井冈山”的主力，以化三年级的 0363 最为铁杆，深衔“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一些人痛恨。

凌晨一点整，动手了！突然“咚咚咚”急促的砸门声把我惊醒，心里砰砰狂跳，睡眼惺忪，打开一条门缝，楼道灯火通明，两头都竖起了床铺挡住去路，各有几个身穿黄棉衣、头戴柳条帽、手持扎枪的人在把守。中间则有人挨屋砸门，对，不是敲门，伴随着大声吆喝，破门而入。有人清楼了！我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把门锁上，和同宿舍的一起，拉床顶住门，穿上裤子衣服，越窗而逃。我们住的是一楼，不费力气，就跑出了 31 楼。

后来才知道，执行这次行动的是“新北大公社”一支特别能武斗，专门打硬仗的“钢一连”，而“新北大公社”化学系“红三团”的人，当晚已经撤了，只是有人负责在“井冈山”男生住的宿舍门上画记号、做“带路党”。

化学系四年级的同学住在二楼，不少人翻过窗子，扒着窗台，悬下身体，跳楼逃命。有同学逐个询问统计过，他们有 17 个人是这么干的，有人摔了轻伤，还有人落地后被公社埋伏的人追打，甚至扎成气胸。化学系五年级的老大哥住在三楼，面临毕业分配，只想图个太平，一般对“文革运动”兴趣不大，上百人举着手、排着队，在如狼似虎的扎枪威逼和铁棍殴打下，被清出 31 楼，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不许带，不啻忍受胯下之辱。

现在回想起来，3 · 29 的血洗夺楼可谓策划严密，完美无缺。大兵从天而降，闪电式的行动。周围多处都有埋伏的武斗兵勇，“井冈山”有人从

几处自发来救援，都被挡了回去。厉害了，我的社！31 楼半数以上是井冈山的同学，二百多人，都是铁杆，一举被击懵，打散，赶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举动，要缜密设计，严丝合缝，不能有一点闪失。谁是总教师爷？是个高人。这样关系北大运动全局的大行动，肯定需要聂元梓的点头首肯，至少的。

3·29 武斗”这个说法，其实并不确切，那算不上武斗，没有双方交火，只有单方挨打、无力还手，甚至连对手都没看清，就糊里糊涂被扫地出门。这是一次单方施暴，武力清剿。是的，尽管没有死人，少部分人受了伤，这仍然是一次暴行。“君子动口不动手”式的“文革”结束了，暴力相斗在北大成了主旋律。

(三)

我们跌跌撞撞、零零星星跑出来的人，彷徨四顾，不知何去何从，像无头的苍蝇，在 31 楼周围乱窜。那天特别黑，初春时节日短夜长，人只有到了非常近才看得清，一边跑一边喊：“你是谁？我是×××。”最后大批人群集中到了 31 楼南侧的空地，找到同班战友。惊魂稍定，交流刚才的经历，都是浮萍断梗，脑中一片茫然。

大家以为新北大公社只是要抄什么，等到里面没有动静了，我们几个人向 31 楼走近，打算回去。哪知一阵砖头狂砸过来，打到地上，弹起来溅到身上，都是剧痛。我们仓皇失措，赶紧后退，左侧的 38 楼又飞来一阵砖头。我班只有一个蔡小海，一根筋，非要过去问个究竟。他一向与“井冈山”观点不合，反对派斗，自许公允，结果被“新北大公社”抓了过去，蒙上眼睛，捆上双臂，带到一个地方，棒打一番，连头部都挨了一拳，才放掉。他以后每描述那次经历，都气愤不已，从此转向铁杆反聂。把人捆绑起来打，是“聂派”的专利。

其实当时被打懵的，不只是我们这些净身出户，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的小兵卒子。更找不着北的是“井冈山总部”的那些头头。据说他们，在一起紧急开会几个小时争吵不休，把持不定，拿不出个主意。是啊，哪见过这种阵势，谁承想会有如此狠手！本来，“井冈山兵团”就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吃了聂孙“新北大公社”这么一闷棍，如堕五里雾中，人殊意异，

散沙一盘，乌合之众，没有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全团服从总部之类的纪律。“反聂”两个字把大家连在一起，而程度、层次又各有不同，从胡纯和激进的“老井红”，到胡德平温和的“十一斗私批修学习班”。作为我们〇派在总部的代表陈醒迈，素常被戏称为“陈老机”，寓意“对敌斗争不坚决”、“老机会主义者”。

我们冻得瑟瑟发抖，在黑暗中团团转了好长时间。焦急中，总算传来总部指令，攻占 32 楼！我们赤手空拳蜂拥而去，像一伙暴徒，踹开门挨屋子找人。这个楼住的是中文系男生，“新北大公社”的人早已闻风而逃，整座楼立即被井冈山控制。化学系“03 纵队”队长齐菊生指挥分配房间，我们 0363 的住四楼，几个人随便打开一个房间，且住为佳。（中午，由后勤部门青年工人组成的“海燕”战斗队清理、占领了整幢 28 楼，那里有“井冈山总部”和广播台，是“井冈山”这个群众组织的心脏。）

这时天亮了，突然听到有人喊：看！老破鞋在楼下！“老破鞋”说的是聂元梓，其实她只是结过两次婚，而且都“不幸”，两次“被迫离婚”，自己并没有作风问题，井冈山的人是往她伤口撒盐。我从窗口一看，聂元梓正在被一大伙人围着，旁边还有一个军人，向西面 31 楼走去。气不打一出来，我们几个人飞快跑下楼，要去和她理论理论。

来到 31 楼南门外面，已经有了一个重重包围圈。我们在外面大骂聂破鞋发动武斗，场面乱成一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人从人群中挤出，向东南跑去，后面一阵喊声“抓住他！抓住他！有人刺聂元梓了！”大家都跑，我们没弄清怎么回事，本能地知道要保护这个人，挡住追赶的路。我们人多势众，他们只好看着那个人一溜烟消失了。

这就是有名的“刺杀聂元梓事件”。“凶手”是我们年级的樊能廷，“慨而慷”战斗队（我们叫它“老慷”）队长。大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我和他分到河北阜城县杨庙村，一条土炕上“同床”一年半。据当时传说他那天手里有一把红色木柄螺丝刀，挤进去举手比划了一下。没想捅出个大漏子，聂元梓头皮擦了一下，出了血。陪伴聂元梓“视察”的那个军人，来视察武斗现场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据说手上也挂出了一道痕。

不过这老兄几年前著文，说他与聂元梓对面，与“刺聂”案的聂元梓

后脑勺皮伤无关，诬他“刺杀”乃乌龙。现在这个事件又成为北大文革史中一个谜团。

公社广播台“抓凶手”的叫嚷，立刻不绝于耳，某地方贴出聂元梓后脑勺的大照片。什么头部重伤，鲜血淋淋，什么黑把匕首，早有预谋…。照片我看过，其实就是擦点皮，抹点红药水。不过李钟奇（当年批斗会上一拳把彭德怀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因此后来声名受损）这回竟没能英雄救美，让“凶手”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逃之夭夭，心中窝火自不必说，信誓旦旦，要把这个“手持黑把匕首”的家伙捉拿归案。

聂头皮被刮，受了惊吓，她不想高姿态，她要出这口气，口诛笔伐，我们也无可指责。可是当时的第一要务是制止武斗，如果她发一句话，“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撤出抢占到手的 31 楼，让井冈山的人归巢，北大的事态就不会扩大，武斗就会平息。可是，她把“被刺事件”说成是武斗的起因，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把挑动武斗的罪责栽诬给“井冈山”，如此倒打一耙，蒙骗上层，也蒙骗本派群众，“井冈山”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了。

“校文革”发出“通缉令”，着意把事态搞大，转移视线。当晚，谢富治、温玉成来北大，要停止武斗，交出凶手，慰问老聂。此后，李钟奇又来北大，老调重弹，还是交凶手，警告不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武斗必须在“校文革”领导下解决。

重压之下，以侯汉清为首的总部决定，铁了心，绝不屈枉无辜，所谓“凶手”就是不交。那天双方交换俘虏，“新北大公社”从 44 楼铁狱铜笼的黑牢扔出奄奄一息的樊立勤。樊立勤只是动口舌，语言上反聂，他被打断右臂和右腿，左膝盖骨被钉得粉碎，两个食指指骨被老虎钳夹断，手指甲钉竹签，完全是渣滓洞那里学的一套。这个樊能廷要是送上去，还不被生吞活撕了。井冈山总部发出两号动员令，一句话，全是政治迫害，冤哉枉也，不接受。

现在的人可能不会理解，当时“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是重罪，要遭灭顶之灾的，不知总部这些头头，在哪儿吃了豹子胆。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中，竟然信口雌黄，说北大武斗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描述说“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匕首扎在我

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都是血。对用匕首刺我的人，我从来没进行过追究…谢富治是他的后台。”一个当过多年干部的人，说话如此瞎话连篇，印在书上，只能让人更加看不起她。

井冈山惹不起谢富治，却不在乎李钟奇，嘲笑他“李排长”，还管不了我们。其实他是唯一接见过“井冈山”头头，说过“井冈山”是“革命组织”的“领导”。【笔者注：关于李钟奇“李排长”的传闻——红军长征到娄山关，时任国军骑兵排长的李钟奇反正或起义，加入红军。武斗期间，清华井冈山扣留他，说他按政法学院陈荣金所制定的“公安六条”，国军连长以上的，都作为“历史反革命”。李钟奇辩称：在娄山关我是国民党排长，不是连长，因此，不在历史反革命之列。自此，北京高校学生咸称李钟奇少将为“李排长”。】

（四）

回到 32 楼，我感觉自己像噩梦醒来，换了人间，眼前一切都那么陌生，那么不真实，那么让人惶恐。大家都在建筑工事，七手八脚，拆暖气，暖气片放在窗台上，准备公社进攻时往下砸。大锤子咣咣地砸墙，砖头哗哗地落下来，我们收集起来，堆到窗口，准备向“敌人”扔去。出现了一批能工巧匠，暖气管用来作扎抢。不知到哪里弄来的锯子、锉子、螺纹钢，洗脸房成了工作间、兵工厂，叮叮咚咚，人声嘈杂。暖气管截成一段段，装上了矛头，有的还有红穗穗。没有枪刺的，斜着一锉，出来个尖。七长八短，人手一支。我也有了自己的扎枪，其实就是一根斜锯口的暖气管，连一层棉袄也扎不透。但它是我的好伙伴，陪着我度过了武斗岁月。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没事就练练，甩着头转一圈，再往前一刺，“杀!”睡觉时也放在身边。从 31 楼被赶出来，我就失去了全部家当，现在扎枪代替了红宝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信仰、思想，没有了，不得不用以代替的，是以暴力对暴力。

我们从小受教育，爱护公物、遵纪守法，行为要中规中矩，这些观念顷刻间抛到九霄云外。国家财产随便毁坏，砸、劈、扔、摔，一点儿也不心疼，一点也不犹疑。情绪不能控制，怒气、怨气借此发泄，造反派的脾气。我们几百人丢了全部家当，就用别人的，想拿什么拿什么，翻箱倒柜，

比用自己的还顺手，不顺眼就扔，对这种报复心安理得。一夜之间，“乖乖孩”就变成了“恶汉”。不知谁发给我一件黄棉袄，旧的。当时这玩意很时兴，只要执行任务，我就穿着它，不管天气多热。它一直跟着我到农村插队，油哄哄的，不曾洗过。我甚至穿着它去上海，拜见（未曾谋面的）未来的丈母爹、丈母娘，让他们大惊失色，以为女儿搭上了个“破落户、小混混”，差点坏了我的终身大事。

此时，一楼的房间完全撤空，窗子用木条钉牢，用卸下的门，木床顶死，用铁丝绑牢。楼上，该砸的砸，该拆的拆，碎石砖块就地取材，堆在窗口。这个时候，群龙无首，群众的情绪和行动最容易被少数人左右，只要有人一呼，就有人响应。自行车三轮车汽车内胎也搞来了，两头钉在窗框上，或者绑在床腿上，成了大弹弓。我小时候只玩过小弹弓，现在玩大的，放上碎砖头，比谁射得远，看谁射得准。有人甚至让别人抱住后腰，两个人拉弹弓。很长时间，这是武斗主要方式。当然，真正射中目标几率极低，只是起到震慑作用，楼与楼之间几乎没有行人了。有一次，我班同学吕成信拉弓时砖头打到窗框弹了回来，还好躲得及时，只擦到脸上，留了一个伤疤，好悬！我从此再也不碰大弹弓了。

双方都如此，无所不用其极，我感叹：是什么力量把我们一夜之间变成了这样？为什么“文弱书生”竟会变为破坏分子、暴民？难道就是简单的人性恶吗？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从小受到的“仇恨教育”——站稳阶级立场啊，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啊，对坏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啊，长期的灌输，这些观念融化在了我们的血液中。当认准对方是“阶级敌人”的时候，就显出，或者力图显出狼性，再狠也不过分，有些人甚至越过了道德底线、失去人性，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

“3·29 武斗”事件，“井冈山”是无辜受害者，论道义应该占上风。但是，力大为王，暴力是胜者，正士皆逃遁，很多“井冈山”的同学，觉得校园已经无立脚之地，去危就安，开始了大逃亡。那几天如鸟兽散，海淀路，32 路汽车，拥挤着逃难的人群，大包小包，肩挑背扛，自行车驮。投靠亲戚的，回老家的，寄宿在同学处的…。完全没有出路的，住到地质学院的大教室。现在中国有高铁，当年井冈山有“地铁”，地院东方红是铁

哥们，那里是我们的大后方。“井冈山”几百个人住在那里，地院日供三餐，夜供一宿，敞开医院，救死扶伤。住地院的人，也可以帮助守楼的人做后勤供应、印发宣传材料。校内两派大分家，“井冈山”留校坚持守楼到底的只有三几百人——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

聂元梓的忘年交蒯大富，在他的回忆录《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中说：“清华武斗之前，北大 3 月 29 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基于后一条“那一派就垮了”的错误的信息，他决定效法北大聂元梓，他认为中央首长都批过 414，打起来对他有利，于是发动 4·23 武斗，想一举摧垮对立面。人大、民院等高校也燃起武斗烽烟，北大聂元梓拉开北京高校武斗大幕，再次夺得“榜样”地位。清华大学蒯大富率先在首都、中央眼皮底下，动用热兵器打派仗、杀人，迭踵北大聂元梓，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

聂元梓和踢天弄井的孙蓬一把“井冈山”的人赶出 31 楼，顺势夺占紧邻的 29 楼，是“校文革”一次重大战术成功。随后的日子，双方在迅速进行整合，瓜分地盘，短时间没有新的面对面冲突。“井冈山”以将近北大师生半数的人数，只取得了 28、30、32、35、36、37，这几座孤楼。而“新北大公社”迅速控制了周围 16～44 所有楼房，形成包围圈。“公社”又把守了五个校门，把持了所有食堂，不许对立派去吃饭，北大校园成为“公社”之天下，“井冈山”的劣势已成为定局，孤守一隅，风雨飘零。

有了这几座楼，座座是“孤岛”，“井冈山”必须占领 35 和 37 之间的 36 楼，才能结成岛链。经过各楼守楼战士多次呼吁，一直犹疑的总部决定拿下 36 楼这个“孤岛”。时间 4 月 25 日，化学系“03 纵队”充当“进驻部队”。

36 楼原来由几个系的女生混住，包括化学系女生。3·29 事件以后，“新北大公社”的女生，按照她们组织的部署，陆续迁出这座楼。到 4 月 25 日，楼里只剩下二三十名“井冈山”的女生。我们男生上了几年大学，从来没进来过。这一次，破题儿头一遭，一群脏了巴几、破衣烂衫的大老

爷们不请自到，而且是狂呼乱叫，冲进来的。没有任何抵抗，如入无人之境。女同学的闺房，有一种神秘感，那里的女生早已经跑光了，也算是“没有硝烟的战斗”。我推开一扇扇门检查，飘来淡淡的清香，看到别有情调的布置，果真跟我们这些“乱室英雄”的狗窝大不一样。我们七手八脚，拆暖气，砸床铺，搬砖头，建筑工事，准备迎战。

聂元梓手下那么多能人，对于 36 楼竟然没有先下手为强，锁住“井冈山”的命门，无疑是个重大失误。4·26 他们才来当“马后炮”，力图夺取要津，于是一场恶战临头。

我从四楼窗口向外望去，尘土狼烟，黄压压的一片片，从 34 楼、38 楼两个方向涌过来。戴头盔，身穿黄皮，手持扎枪，整齐划一，推进有序，喊声震天。前排的，举着床板掩护，要从窗户和门强攻进入，有人甚至架了梯子硬攻二楼。那场面，雄壮而恐怖，过去只有在电影的古代战争里看到。据说，孙蓬一、高云鹏亲自督战，势在必夺。

我感到热血涌頭，却毫无恐惧之感。早已红了眼，只有一个念头，打退他们！鱼死网破，背水一战，只在今朝。砖头像雨点一样投去，大暖气片从窗台推下，咣噹一声，我伸头一看，没砸着。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4·26，双方比拼的就是“勇气”。

这暖气片巨型重物只是吓吓人的，上方轰然掉下庞然大物会使攻楼者魂飞魄散。不过现在想想也后脊梁发凉。万一失手落到谁的头顶上，夺其性命如浮云朝露，那么，自己的后半生将永无宁日，在梦魇中度过！

36 楼一楼西半截顶不住公社的强攻，一度失守——对方强攻部队砸开西墙，冲进一个房间，破墙打洞向前推进。万般危急之中，我们年级的骆如铁情急智生，用大锤在二楼地板打了大洞，我们的人在上面用长枪扎，用砖头砸，用水泼，终于把入侵者赶出楼外，36 楼胜利守住！这是是北大武斗中最惨烈的一场，受伤者据说过百，而且基本是“公社”的。这对井冈山，是“团体”生死关键之战。井冈山广播台立即报道大好喜讯，战胜十倍之敌，“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爽人心脾！我们欢欣鼓舞，士气大振。

我猜想事后聂元梓、孙蓬一他们一定肠子都悔青了，谋无遗策，却没

有早下手把 36 楼拿下。否则北大文革的历史会完全改写——28 楼成为瓮中之鳖，“井冈山”头头们束手就擒，这个组织彻底摧毁…浮想联翩，我常常陷入宿命论：福善祸淫，人做天看。难道真的在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保佑着井冈山？天不灭我啊。谢天谢地谢祖宗。

井冈山总部不是省油的灯，固守 36 楼的 4·26 大捷冲昏了头脑，突发臆想，轻举妄动，竟然要主动招惹“新北大公社”！5 月 2 日，派我们“03 纵队”几十人，去 38 楼出击，抢什么木板床。楼里那么多床，竟然把木床当成了稀缺的东西！

这种无厘头瞎指挥的事，我很恼火。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想上战场玩命！唉，派性高于一切，不理解也得执行，上了贼船身不由己。临危受命，战前，纵队长齐菊生作动员，说，我们 20 岁的小伙子，除了没娶媳妇，什么没见过？这回要拼死一战，活出个样子！一针鸡血，群情激昂，杀声一片。我们几十个人，冲出 37 楼，手持七长八短的扎抢，缓步推进。远处，“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已经严阵以待。这样的面对面交锋，我很是恐惧，短短几秒，脑子里翻腾出无数想法，可能会受伤、被活捉，甚至死掉…但是咬着牙，决不能当怂蛋。咬着牙，心一横，跳河一闭眼，生死就在这一回。

我们的装束，五花八门，五颜六色，戴柳条帽的，狗皮帽的，自制帽的，各人有各人的高招，简直就是一群“丐帮”。出发前，有人给了我一个几块铁皮串起来的“护胸甲”，套在脖子上，人一挪动，铁片铮铮作响。铁皮的还是好的，还有用座椅靠背的三夹板做的，洋号喇叭破开做的，杂七杂八。而对面的，俨然“正规队伍”——矿工头盔，铁网面罩遮住真颜，铁皮盔甲外罩黄棉袄，武装上、气势上压我们一大节子。我俩眼睛盯前方，小步前移，突然右侧的腰一阵酸疼，一看从侧面杀出一支“公社”队伍，我看到的只是一张张面罩后面模糊的脸，找不到是哪位老兄刺着了我。被夹击了！在撤退的指令下，我们还没有和对方交上火，就溃不成军，靡旗乱辙，逃了回来，这一次损失惨重，许多人受伤。

我不敢去校医院，就回了老家天津。做个检查，那块受伤地方肉厚，无大碍，没伤内脏，只是扎一个洞，留个疤，也算是“文革”的纪念。酸

疼不止，情绪不佳。刚呆几天，传来通知，“公社”正在到处抓人，家不是安乐窝。不得消停，还是回到战友中安全。

到此为止，双方各有“捷报”，又各有昏招，毕竟是秀才扛枪，硬起头皮上战场啊。

4·26之后，两派分疆画界，森严壁垒，势成水火，武斗“割据”格局稳固形成，“井冈山兵团”成为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打不死、吃不掉的对头。

（六）

“新北大公社”完成了包围圈，时时处处是攻势，扳手上螺丝，一扣紧似一扣，不断挤压“井冈山”的生存空间，不给活路。“井冈山”则元气大伤，武斗前用“批判的武器”对聂派主动出击挑战的气势完全没了，在“新北大公社”强大的“武器的批判”下，只能偏安一隅，保命为主，一切为了生存、活命。“井冈山”这一方要生存、活命，“校文革、新北大公社”那一方不许“井冈山”生存、活命，成为贯穿北大武斗120昼夜的一根主线。

如果那一年五月也有校庆的话，该是整整70年了，也是大庆。可是“院系调整”后的校庆已然被聂元梓从“五四”改成了“六一”，连续两年都没有开课的北大，校园成了战场，学生成了暴民，建筑物到处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瓦砾遍地，流弹横飞，谁还记得有个校庆！“新北大公社”的人正在为收紧包围圈、“剿灭井冈山”而绞尽脑汁，“井冈山”的人则日夜警戒，为保“割据区”固若金汤而众志成城。

虽然六座楼连成了一串，“井冈山”有了与聂元梓“校文革”分庭抗礼的一隅地盘，楼与楼之间的来往却十分危险——“新北大公社”在周围楼群里布满了大弹弓，砖头不断从各个方向射来，没有死角，偌大的楼间空地布满了残砖碎瓦。“公社”武斗小分队还不时出来袭扰。“井冈山”地盘狭小、局促，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

“井冈山”楼与楼进口之间竖起两排木床，上面再罩上木床，形成封闭有盖的通道。来往通行，虽然不断听到砖头打在床板上的声音，却也安全无虞，我自廊中信步。

为了双保险， 36 和 37 楼之间，36 和 35 楼之间，35 和 30 楼之间挖了南北向的地道，由地质地理系同学勘察设计，住在两楼里同学用最原始的方法一锨一锹地挖土，抽屉、脸盆运土，三班倒挖成的。两头动工，中间会面，三米深，一人高，可并行交错，安有电灯，地湿漉漉，墙湿漉漉。挖出的土存在一楼宿舍，“公社”神不知鬼不觉。由于没有坑木支撑，武斗停止后不久，一场秋雨，灭顶之灾，地道塌陷掉了。【笔者注：毫无“深图远虑”的“豆腐渣”工程。】【奚学瑶注:32 楼与 35 楼之间百分之一百有地道。我是亲身经历者，绝不要怀疑，戚燕平、郭庆山夫妇可以作证。32 楼至 35 楼之间的地道，挖地道挖出了许多土，都堆到了楼的南边。工宣队进校后，图书館学系两女同学因争风吃醋，甲砍伤了乙，甲自己则从四楼跳下，落在这一堆土上而活命。还有，我在《青春非常之旅》的回忆录中，将挖地道的操作过程说得很详细。可参阅。现在参与当年挖这条地道的人大多健在，胡平生就是一个。这段地道是 07 纵独自操作，外系没参与，故外系的人一般不知道。戚燕平说：奚学瑶队长说得对！32 楼与 35 楼之间确有地道！郭庆山曾在去 37 楼应战时爬过。】

“井冈山总部”所在的 28 楼，处在“割据区”最北端，为了和西边相距 15 米的 30 楼之间来往方便，决定在四楼架设东西向的天桥。从“起脊”的 36 楼拆下屋顶的松木人字“风撑”做基本材料，在走廊里预制好长度为二十米的桥身。打掉了 28 楼 30 楼相对的四楼楼道窗户和窗台，用床板做好桥的面板。一桥飞架东西，井冈山的人欢天喜地，都去过过瘾。平稳若坦途，同时通行三到四人，比如今张家界玻璃桥刺激。还有人合影留念——这里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自行设计，土法上马，群策群力。由技术物理系组成七八个人的土工程师团队，64 级的况明星是总设计师，使出浑身解术，很有点“高科技”的味道。施工时“井冈山”倾巢出动，五十多人在现场安装。32 到 35 楼之间的便桥则简单得多，只是个铁索桥，铺点木板，荡悠悠的，要走得有当年大渡河十八勇士的胆量。当时的北京，还没时兴楼间天桥，北大“井冈山”做出了“创举”。

六座楼中，只有 37 楼靠马路，在院墙打开个豁口，木床搭成通道，一直伸向海淀路马路人行道，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出口。37 楼破开院墙的

豁口，被聂派给了个“官称”：狗洞。斜对面是 32 路汽车站，它的后面有一条南北胡同“军机处”，再里面东西向的胡同叫“老虎洞”，走进去是市场、商店，可以买生活用品。那时很多男生抽烟，隔几天就得去一次。0363 坚守的二十来个男生，调防住到 37 楼，任务就是三班倒，守卫这个“狗洞”，迎来送往，保护我们的人安全进入“老虎洞”或上汽车，还有就是迎接返回的战友。

在通道里值夜班的情形，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外面万籁俱寂，远处灯光稀疏，里面黑咕龙咚。很多战争片里，士兵们在大战间歇，漆黑的夜晚，在战壕里畅想未来，交谈胜利后的打算，有滋有味。我们经常三四个人站岗，当时谈的内容，不记得了。肯定不是未来的事，没人知道何时罢战息兵、“文革”何时结束、怎样结束、将来能干什么。大概是些过去事情的甜蜜回忆吧，不过任何甜蜜的事情，那时也没味道了。或者就是各想心事，块然独处，自嚥海淀特产“莲花白”酒。人人目睹政局昏乱，谁也看不清方向和出路。

“新北大公社”经常往这条马路投掷砖头、打弹弓，也曾砸坏公交车，那个车站不得已搬了家。车站后面有个饭馆，叫“长征食堂”，物美价廉，好吃不贵，几乎每个北大学生都光顾过，我们亲切称之“学七食堂”（北大有六个学生食堂）。历经“新北大公社”大弹弓的狂轰滥炸，它也停业打烊了。

我们这个出口处于南校门和西南校门之间，“公社”步我后尘，在 34 楼南面的院墙上，也开了个豁口。“公社”的人经常从两个方向来骚扰。一般离得远远的，两边互相叫骂，互扔砖头，并无当面比试。有过几次，他们哗啦啦来一大片，我们躲进通道，只看见扎枪沿着床铺之间的缝隙往里乱捅，因为空间很大，有 5 米之宽，伤不着我们。我们也从里面向外乱捅，“礼尚往来”，作为回敬。和我排在一班的李人杰，经常事后手舞足蹈，“我扎着了一个！亲眼看到的！”他因前额头发有一撮白，被叫“小白毛”，广东人，年纪小，个子又最矮。我们都知道他是瞎说，只怕他连对方毛皮也没碰到。不过当时真的是把扎伤对方的人当作一件光彩的事呢。

武斗期间，“新北大公社”打死三个无辜的人。先是 19 岁的地院附中

高三学生温家驹，4 月 19 日在图书馆看书，被抓到生物楼低温实验室，审讯打死。4 月 27 日，地球物理系 62 级学生殷文杰路过 44 楼，被公社一伙人围住，乱枪刺去，刺穿了股动脉，死时年仅 24 岁，据传，致命的一刃，是地球物理系一年级一个女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7 月 20 日，地质地理系 61 级学生刘玮回校办毕业手续，在海淀街上被抓，关到 40 楼，乱棒打死，24 岁。他们没有一个死于战场，都是赤手空拳被抓捕，活活打死的，惨无人道。

自从有人去学校食堂吃饭被抓、被打，那个地方不能去了。一开始我们去海淀买点东西，用电炉各自解决，煮稀饭、下面条是最经常的。后来各系各年级成立集体小灶，就在宿舍里，支起大锅，劈了桌子、椅子烧火。葱姜油酱，米面蔬菜，一应俱全，烟雾缭绕，香味扑鼻。我们年级坚守的几个女生，王文芝、张俭、游君玲、王起云、陈珍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担当煮妇厨娘，为将来当贤内助提前实习。男生是“君子远庖厨”，吃现成的。偶尔帮助买买菜，也可能被抓。校外地派单位，用车拉来粮食蔬菜，集中送，支援这个重灾区。我们这几百号人，实行着毛一直推崇的供给制，大锅饭，官兵一致，平等相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也其乐融融。“红色恐怖”中，“井冈山”的天是明朗的天。

1968年北大武斗期间28斋战时食堂

6 月 24 日，北京运输三场给困守在楼中的井冈山送菜，“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从东西两面包抄。在我方 37 楼门前，双方发生武斗。“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砸坏了汽车，打伤了司机。此后我们再也不敢擅自离开学校了。——避祸存身，“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七）

武斗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起居无时，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我们被卡在极小的活动空间，只能进行有限的活动，成了有自由的囚徒，晒晒太

阳，呼吸一下校外的清新空气都是奢望。除了值班，就呆在宿舍里，懒散懈怠，偶尔翻翻书，也看不下去。黄连树下弹琵琶，要寻求刺激，自我麻醉，更多的时间是打麻将、打牌、下棋。我中学就玩麻将，教别人，天天打得昏天黑地，脑袋麻木。“睡觉睡到自然醒，打牌打到手抽筋”，这辈子再也没有这么放纵颓废的生活。围棋象棋，有人下有人看。围棋都是初学，有人进步飞快，吕成信、徐秉玖，就下得好，杨惟立后来还拿到业余段位。赵凯元则是“悔棋大王”，不许他悔棋就跟你拍桌子瞪眼。抽烟，整天腾云吐雾。买来一盒，到处一撒，基本就没了，然后抽别人的。

聂元梓“校文革”的思路越来越明确，必欲置“井冈山”于死地，不让喘息。软硬两手，文攻武吓，组织上瓦解，思想上摧毁。我们也曾仰视星空，偏偏找不到北斗。

为加大围攻力度，“新北大公社”成立了黄树田为首的“东线指挥部”和技术物理系 63 级宫香政为首的“西线指挥部”，研制土枪、土炮、土手榴弹，派人外出搞枪支。7 月，孙蓬一到化学楼 101 召集会议，要求化学系“公社战士”为武斗“做出特殊贡献”。

另一方面，扣工资，扣助学金，抓人刑讯，心理战术，“挖山不止”。这个时候，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没有了，只剩下大喇叭。公社广播台连篇累牍，毫不掩饰地高喊“秋后算帐”，将来会无情打击。对抗聂元梓的人，将来都不会有好下场。甚至“工作做到家庭里”，用公函名义给家长去信，施加压力。“井冈山”的两员大将徐运朴、牛泰升被抓，一定是忍心害理，上了不少手段，老徐腿被打断，扛不住了，声明退出，“下山”。我们班也有人“下山”，据聂元梓向毛报功时说，下山人数已达一千人。谁要是“弃暗投明”了，还是不得安宁，要发表“下山声明”，参加“学习班”，反省忏悔，给其他井冈山人做榜样。在这点上，老聂玩政治玩到了家，花样翻新，“井冈山”一群涉世不深的学生根本不是对手。

武斗期间，我们班“井冈山”一派的黄关锦在上海卷入一个“反革命集团案”被抓，移交给“新北大公社”审讯。黄在关押期间，寻机逃脱，投奔到“井冈山”割据的楼。“井冈山”决定对其收留，隔离，放置。我是他的战斗队长，他长期在上海，我又写过几封信，通报北大运动情况，决

定私下见他。他告诉我“公社”的人对他动了刑，逼他交代我和吕成信的材料，他不得已也做了捏造的供词，具体内容不遑细问。我表面若无其事，心中如翻江倒海，确定自己是在“新北大公社”必整之列，惶惶不安，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在楼里，“井冈山”的同学锋镝余生，表面都很振奋，必胜的信心十足。可是我的内心，却很悲观，觉得“井冈山”气数已尽，只是在苟延残喘，最终要被“新北大公社”一窝端。到那一天，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迎接我的将是任人宰割、灭顶之灾。

曾几何时，我们这些人，意气风发，以为天下就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就是中国的主人，跟着毛泽东，横扫千军，打倒一切。一个武斗，一切虚幻都打碎了。现在成了笼中困兽，瓮中之鳖。失望，怀疑，迷茫，痛苦，万念俱灰，不过这些想法和感觉只能在脑中一闪念，绝不能深思，绝不能发展！太反动，太可怕了。当然，更不能和别人交流，那害人害己。深深的恐怖笼罩着。士不可以不弘毅，想想，捱着，或者说坚持，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原来好好地住在 31 楼，没想跟聂孙当权者搞什么过不去。可是人家让你消停吗？不让呀！拿着长矛攻你的楼，伤你的人，劫掠你的财物，逼迫你向他们屈服呀。逼着你不得不拿起武器，与之抗争，否则你就活不下去。我想，在聂元梓发动武斗，暴力镇压“井冈山”这一百二十天，多数坚守“井冈山”孤楼的同学，可能都存在与我相类似的想法。我们苦难深重，被逼操戈自卫，没什么不光彩的。正是我们在第一线顶住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残酷的武力打击，减轻了全校千万善良师生员工身上遭受邪恶势力的压迫。

有人以为文革是大民主，思想自由，殊不知那种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况味。被聂孙势力苦心极力地铲除、消灭，生死难料，人人自危，是多么恐怖！

在“割据区”的楼里，我们同一战壕的战友，打仗倾身互救，可是大家不谈政治，不谈运动，不谈文革的前景。北大向何处去，谁也不知道，上面的表态，根本不要指望。外面的形势，知道的也很少，零星有些传闻，

也不够“鸡血”，提不起精神。那一两年，社会上流行“鸡血疗法”，抽取活公鸡的鲜血，注入人体，有何等何等的“奇效”云云…

四五月份，“新北大公社”把技术物理系学生邓朴方、邓楠兄妹绑架，关了三四个月，逼他们交待邓小平的“罪行”，想给“井冈山”安上一个“黑后台”。邓朴方被逼无奈，跳楼，摔成高位截瘫，终身残疾。这件事是聂元梓的致命失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她再强调邓朴方跳楼时工宣队进校、她不在位，也没用，抓、关、打、审，都和她有关。聂元梓一辈子在识别政治风向上很下功夫，伤害“井冈山”群体，犹为小可，没咋追究；“有眼不识泰山”，迫害邓家大公子，惹下大祸，贻患于无形，到底栽了跟头。

（八）

作为武斗中的小花絮，双方在斗智上也各显神通。

“井冈山”的一个杰作就是“监听电话”。当时，全校电话系统完全由“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控制，“井冈山”在孤楼里打不成电话，监听一下总可以吧。此时尼克松“水门事件”监听电话的事还没发生，不懂得这里法律责任的厉害。有原在学校广播台工作过的井冈山人，熟悉地下线路铺设，指出在 28 楼和 30 楼之间某处的地下，有一个电缆接口。于是开挖，两个化学系 62 级的壮汉，每天吃饱了饭玩神秘失踪，像土拨鼠钻地一样去打洞刨土。找到电话接口，连到我们接收器上，两个人日夜监听记录，神不知鬼不觉。“公社”的调兵遣将，电话就报了信。有一次瞰瑕伺隙的偷袭，“公社”的人刚摸到阵地，“井冈山”早等候着呢，唰的一下，探照灯齐照，再一阵砖头，偷袭者无处藏身，抱头鼠窜。

不过，更使人惊心动魄的，是“新北大公社”巧施“反间计”，让井冈山上层有一次大震荡。——有一天传出爆炸新闻，动态组组长化学系 62 级的黄其昌是个内奸，潜伏已久，被“撕开了画皮”。黄英俊威武，为人谦和，说话慢条斯理，为井冈山立过功劳，我们常在一起聊天，他很有见地，我颇是尊重。谁想竟是“内鬼”，人心隔肚皮如此，这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被隔离在一个房间，有人送饭，不准出来放风，不许与任何人接触，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更有甚者，竟有人情绪不好时，闯进去“教训”他一通。

武斗结束大联合时，我才看见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面黄肌瘦，目光呆滞，魂不著体。“井冈山”的人不理他，“公社”的人也不理他，都拿他当挑动武斗的坏人批。直到“公社”的人自我反省，才爆出背后的惊天秘密。我听到的版本是这样的：公社抓了“井冈山”一个人，把眼蒙起来审讯，故意让他能够模模糊糊看见一点，安排一个长得极像黄其昌的人晃了几下。这位老兄释放后就上报总部，看见黄其昌在审讯现场。“井冈山”已是惊弓之鸟，鲁莽行事，犯低级错误，中了奸计，隔离了黄其昌，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事，是我觉得武斗期间最匪夷所思的一件。或许还有其他内情，但不可否认是一桩冤案，“井冈山”莫大的丑闻。几十年后，当年的总部头头、谦冲自牧的侯汉清当面向黄其昌诚挚道歉。

黄其昌的事使得武斗绝境中“井冈山”人心惶惶，甚至有流言，杯弓蛇影，怀疑另一位头头也可能是奸细。哎，真是：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九）

聂元梓围困个井冈山几个月了，久攻不下。“井冈山”风雨飘摇，却还在硬撑着，绝路求活。风传对方要用狠招，断水断电。小试了几次，酝酿着来彻底的断水断电。井冈山得到风声，就有人设计储水池来应对。在 36 楼弄空了一间宿舍，门窗用砖垒死，四面抹好水泥，只留一个小口，往屋里灌水储存。我还去参观，水管子正在突突突地送水。有人算过长乘宽乘高，这一屋子水够多少人用多少天。没想到，灌到半截，北侧的砖墙就爆裂了水哗哗地向外流。那位设计者，没有计算到砖墙能承受的水压。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小子破开墙，跳进去扑腾洗澡，痛快一番，爽则爽矣，眼看着水漏光了。

供电是更大的问题，懂行的同学作了调查，可以接海淀路上的高压线。一万一千伏高压，带电操作，本身就是高技术含量、高风险，还要土法上马，在夜间进行。更要命的，是“新北大公社”一定会倾尽全力，前来阻止、破坏，接电操作人员的死活他们才不管！

“井冈山”事先多次讨论，群策群力，制定方案，具体到每一个细节。关键操作交给技术物理系 17 纵队，我们 03 纵负责保卫。记得讨论时，有

人建议马路撒绿豆，打滑，公社进攻的人跑不动，看起来是突发奇想，有点像闹着玩，总部采纳了。当年国军中将陈明仁守四平时，就干了一件“撒豆成兵”，把车站大袋大袋的黄豆运到通往天桥的路上，等民主联军准备突破天桥时，突然迅速撕破麻袋，滚圆的黄豆散满桥面，民主联军前仰后翻，行动失败。我们那个灵感，不知是不是由此而来。

7 月 23 日晚，行动开始。我被派守在楼里执勤，没有亲到现场，那沉雄悲壮的精彩时刻都是后来别人给我讲述的——

晚上整十点行动开始，不像现在，还有个什么行动代号。全副武装的“井冈山”守楼学生首先推着一张张木床，冲出 37 楼那个出口，摆成两排，把马路东西两头封住，简直像演大戏！担任接电的技术物理系三勇士，关玉霖、顾仁虎和肖正贵，迅速出场登上梯子，分处三层位置，依次把一根带有环形夹子的绝缘杆往上传，关玉霖在最上。他把绝缘棒上探，让环形夹勾住一根电线，然后旋转手中的棒，把夹子固定紧，一个线头就接好了。三相电，接三个头，大功告成！也许这不过是个常规的电工操作，令人眩目的，是它发生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工作条件下。

“公社”武斗队早就知道消息，呼啦啦，从东西两翼包围，展开一场恶战。我们掌握着“制空权”，从楼上投掷砖头、打弹弓，来犯者太多了，队伍密密层层，几乎弹无虚发。他们快接近木床街垒时，又踏入“绿豆阵”，脚下打滑，人仰马翻。智守克强攻，奏效了！

“新北大公社”还使用了自制了燃烧弹，火光飞射。其实很简单，一个瓶子里装白磷，一个瓶子里装酒精或乙醚，扔出后，瓶子摔破，白磷自燃，点着了酒精、乙醚。

突然间，“井冈山”据守区域来电了，灯亮了，成功了！六座楼盘一片辉煌，欢呼声响彻云霄，大喇叭传来“井冈山”广播台播音员激动自豪的声音：“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那么敞亮，那么沁人肺腑。

这是北大武斗最高潮的一幕，大有可观，也是“井冈山”得意的神来之笔。公社社长卢平亲临现场指挥，挨了一砖头，这回不是“黑把匕首”擦点皮，而是真的流血了，卢平“光荣”地上医院了。

（十）

“7·23 接电”行动给井冈山带来的，不仅是新的士气，更意想不到的是竟然时来运转。就在随后几天，局势急转直下，北京市革委发文不许武斗，工人围校组织游行，宣传制止武斗，工宣队强行进驻清华平息武斗，最后，雷霆震怒的毛老人 7 月 28 日凌晨紧急召见五大领袖，严令停止武斗。一件件事态的新发展，像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到我们心里。

风云突变，高校全停战。校文革发表了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屈指一算，双方交手 120 昼夜。如解倒悬，我们终于从重围中走了出来，重见天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可以到未名湖享受湖光塔影，可以到海淀巷子里的小饭馆胡吃海塞，歌吟笑呼，大快朵颐。要是现在，心理医生，“心理辅导”该来了，那时谁听说过这种玩意儿。四个月的扭曲日子有没有带来心理创伤？看来我们有钢筋铁骨，很快适应了，投入了新的生活。

工宣队没有遇到清华那样的武装抵抗，北大和平解放。结束武装割据，拆除武斗工事，清理武斗现场，上交武斗工具。8 月 20 日，“新北大公社”上交武器，计有长矛扎枪 930 支，安全帽 518 顶，护身甲 336 副，铁棍 200 根。8 月 21 日，井冈山交出武器，长矛 749 支，铁棍 71 根，护身甲 208 副，柳条帽 432 顶，弹弓 8 个，小口径子弹 37 发。

松绑了，拔诸水火，喜不自胜。我们回到了阔别四个多月的 31 楼，逃离在外的同学也返校团圆。8 月 28 日 22 时，“新北大公社”解散各级组织。29 日下午 3 点，“井冈山”总部解散。屈指算来，“山上”只呆了一年，觉得阅尽人间事，大起大落，沧海桑田。

北京 59 所高校陆续都派进工宣队、军宣队。还是两年前遭到批判的刘少奇工作组那一套，只不过不是小分队了，而是人海战术；不是素质良好的领导干部了，而是毫无训练、匆促上阵的工人，以及本来不宜过多介入政治的军人；不是呆两个月，而是一住好几年。绕了一大圈，原地退步。工军宣队进驻北大是在 8 月 19 日。一机床、二机床、外文印刷厂、齿轮厂、财经印刷厂、63 军（4587 部队），6 个单位共 492 人。这是北大“文革”第四个节点，从此学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北大命运不再由北大人自己掌握。

工军宣队进驻北大，两派学生的派性远远没消除。有一次，我随“井

冈山”七十几人，步行游周口店云水洞、妙峰山，路上和“新北大公社”三十多人小分队不期而遇，我们仗着人多势众，挑头生事，对方也不是软柿子，辩论几句双方就开打，他们自然是落荒而逃，我这个从小没打过架的规矩学生从心里也产生了莫名的兴奋和激动。

【化学系 62 级赵承易补正：读完李橦笔记，有一点更正——云水洞这次活动我们年级也有男女生多人参加，不是在 3·29 之前，而是在 7·28 之后，八月份的一天。守了几个月楼，都想出去散散心，确实有七十多人参加。从永定门乘火车去房山。先去“北京猿人”洞，然后步行二三十公里去云水洞，下榻在北大地质地理系的“房山实习基地”。随身携带简易卧具。第一天在餐厅吃饭，碰见三十多公社的人员，我们中有年轻气盛的“海燕战斗队”小伙子，与对方话不投机，就在餐厅干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参与，“公社”的人吃亏了。该基地当时是某部队占为营房。第二天早饭后出发去云水洞，回来天已经完全黑了。不想部队不准我们进入，出来一个当官的，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支持聂元梓的（显然他们知道餐厅打斗之事），赵凯元带我们念语录“下定决心，不怕…”准备列队往里冲，此时基地里忽传出集合号。为避免冲突，我们就停下来。经交涉，把大家（寄宿用的）行李扔出来，在房山车站站台整整蹲了一夜。第三天凌晨返回。此事说明是在 7·23 之后。还有一个铁证：老耿带了两瓶 7·23“公社”投掷而没有炸响的燃烧弹，在云水洞里扯下一只袖子，打碎瓶子，点燃做火把，出来后，一群男男女女都熏黑了脸。在此做一点说明：3·29、4·26、6·24、7·22 及 7·23，没有一次行动是井冈山主动去打，而都是被迫在家防守或在家门口防守。只是 5·2 却确实头脑发热，伤了多人。】

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司徒文

一

北大为期 4 个月的武斗，发生在 1968 年春夏。

过去政治课讲，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我觉得文革中的武斗也有点这种意思。再说，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就使得“武斗”在当时已经“合法化”，可以说是中央文革放纵了这种祸国殃民的行为。从 1966 年 9 月开始，北京就有武斗发生，1967 年已经是全国各地狼烟四起。达到高潮。1968 年北京的高校也传染上了这种瘟疫，年前清华大学井冈山与井冈山“414”已经接上火，其他院校也时有发生。

当时的北大，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新北大公社，一派是井冈山兵团。前者是原先拥戴北大主政的聂元梓校文革的几个群众组织合并以后，在校文革支持下，于 1967 年 2 月成立的：而井冈山兵团是原先反对聂元梓校文革后来被打散重新集结，和从聂元梓校文革拥戴者里分化出来的一些人联合组成的群众组织，于同年 8 月成立的。原先，聂元梓校文革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势大气粗，对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采取了镇压、排斥的压伐政策，许多都是如今的新北大公社具体实施的，而井冈山兵团的组成人员，正是聂元梓校文革的“受害者”。所以，自从井冈山兵团一成立，两派就等于拉开了架势。要拼死拼活地大干一场。因此，矛盾不断激化，对立不断升级。但是平心而论，这两派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更不势均力敌。聂元梓校文革凭借中央文革的支持，利用新北大公社对井冈山兵团实行打压。井冈山兵团也不买对方的账，进行着顽强的抗争。出于复杂的原因，他们也有许多支持者。北大武斗开始前夕，几个高校群众组织的许多人，到北大来声援井冈山，不惜与新北大公社发生激烈的摩擦，就是明证。

1968 年 2 月底，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单独接见井冈山的代表，一是劝他们承认聂元梓，承认校文革是北大的权力机构，这是中央的意见；二是承认北大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为北大文革作出过很好的贡献，聂元梓校文革要承认它；三是北大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如何成立，双方协商

解决；四是解放军支左不支派。对此，井冈山提出“要革命委员会，不要校文革”，聂元梓校文革则向中央文革反映说李的讲话在北大引起了混乱，声称怀疑李的讲话是否存在。是否井冈山造谣。双方互不服气，攻击加剧。各自的高音喇叭，全都安放在楼顶，9 个一串，如同糖葫芦一般，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想朝哪个方向定向播音，就向哪个方向播音。公社的头头被骂的是聂元梓，井冈山的头头被骂的是牛辉林。骂声天天不绝于耳。这边的高音喇叭上挂了一串破鞋，叫嚷着“聂破鞋和她的徒子徒孙们”，那边则是“牛头山的蒋军弟兄们，不敢来进攻我们就不是牛种”。叫骂之声，西至颐和园，东至五道口，方圆十几里内都听得清清楚楚。于是，这一派的高音喇叭就成了另一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拥有高音喇叭的宿舍楼，就成了进攻的首要目标。刚开始时，是公社仗着人多势众，趁另一派不备，蜂拥进另一派的楼，进行破坏。而井冈山则叫来援军火速增援，再加以反攻报复。

这段时间，北京“地派”对北大井冈山的支持逐步升级，反对聂元梓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3 月 20 号，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后几天，“地派”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反对聂元梓，支持井冈山，并发生小规模冲突。谢富治、吴德、丁国钰 25 日赶到北大讲话，表态反对武斗，但是，北大的武斗还是不早不晚地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

3 月 29 日凌晨，38 楼的同学们正在熟睡，忽然寝室楼道里有人急喊：井冈山的人血洗了 31 楼，正准备攻占校医院，大家赶快起床，击退井冈山的进攻！我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地跟着人们一溜小跑，来到燕南园南边西头，站在这条路去往校医院的路口。不一会儿。就仿佛看见有人从东边向这里走，这时带队的就喊：快，扔石头，把他们打回去！我们就趁黑摸着不知道是早就准备好的还是另外有人当即运来的砖头块。向对方人群扔去。我扔了两下，觉得胳膊就不行了。而且对方也再没有人向这里走了。这边人们好像也有人撤走了，我就也悄悄地一个人溜回寝室。这就是我在北大参加的惟一一次武斗的经历。

当天晚上。同宿舍参加井冈山的一个同学也出去了，晚些时候才回来。

第二天人们议论昨天的武斗。就听他嘟囔了一句：还不知道谁血洗谁呢。

后来才知道，3 月 28 日是星期四。新北大公社早有预谋，要从 31 楼化学系井冈山的同学开刀。因为这里住着井冈山的主力与骨干 0363（化学系 63 级），31 楼还是个战略要地。公社的孙蓬一布置这一行动时说：化学系的同学要做出些牺牲！据后来了解，为了避免出现同班同学互相残杀，高云鹏这位武斗总指挥也避了点儿嫌：攻打 31 楼的武斗队人员是从 09 系招募的，怕他们不了解 31 楼的住宿详情。事前在有井冈山同学居住的房间都做好了记号。

29 日深夜 1 点整，公社武斗人员全副武装实行突袭，把 31 楼洗劫一空。遇到公社的同学也不亮明身份。只是往外撵。假如是井冈山的，就会被打伤。一些公社的同学不明真相，稀里糊涂往外走。被公社武斗人员撞见，没来得及说明身份，也被扎伤了。许多同学从睡梦中惊醒，怕挨打，迷迷瞪瞪急急忙忙向外逃，什么都没带。更有甚者，见来者不善。就从二楼甚至三楼往下跳，摔伤者甚多。加上被打伤的，共有 100 多人，个人物品、公共财产都蒙受了重大损失。

这里我把 3 个不同身份同学对“3 ·29”31 楼被洗劫的回忆摘录如下，可能更显得真切、公正。

首先，我们看看化学系公社派 62 级的一个姓田的同学的回忆：

3 月 28 日下午形势急剧恶化。两派的大喇叭鬼哭狼嚎：谁挑起武斗了，强烈抗议……看情况不妙。我把邮票和少量重要东西收拾了一下送到北大附中我二弟处，并要他第二天一早帮我“搬家”。回来后天已快黑了。我到 31 楼后面看了看地势，盘算了一下如果需要该如何逃出 31 楼……

吃完饭后许多同学感到大难即将来临，却又不知如何是好，静等灾难的到来。约 8 点，公社头头×××（类似情况以下都不指名）挨室告诉：井冈山要挑起大规模武斗，大家要有准备。我问：“该怎么准备？”他却答非所问，支吾了之。其实他心中大概早已有数。

我在大喇叭的狂吼中入睡。半夜时分突然一阵人声、铁器撞击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井冈山攻占 31 楼!”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头。我赶紧穿了衣服，开了灯，推了推上铺的××：“井冈山来了!”他毫无反应。我推开

窗户上了窗台，转过身来，用手抓住窗台，伸下脚踩住一、二楼之间的突出砖棱。接着我放开手，做自由落体，用手又抓了一下砖棱，略曲腿，落地。这是事先早已计划好的。落地时我只倒退了一步，毫发未伤。这时我才想到：××不能跟我这样下来，文革前他受过一次伤。同一宿舍还有×××。我希望避免同学之间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出了 31 楼，往哪里跑？我钻向学六食堂和浴室间的过道。“站住！长矛！”一声断喝。一群身穿黄棉袄、手持长矛的武斗队抓住了我。接着铁棍、扎枪也上来了。我的头被铁棍打破流血，身上也挨了几扎枪，所幸不重。有 4·11（1967 年 4 月 11 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到北大游行，反对聂元梓。与新北大公社发生冲突的）经验，我以为又是“地院东方红一小撮暴徒”来了。“你是哪里的？”“我是北大的！”言外之意：你们是干什么的！来了个看样子是个头头的：“我们是公社的，别怕！”我还是不信，一言不发。估计他们也想到如果我是井冈山的该往东边 28 楼方向跑：“大概打错了人，送 43 楼治伤。”我摸出身上带的学生证，里面夹着一张“二期学习班”的证件。“是自己人！”于是他下令赶快将我送往 44 楼。在此之前我还未“有幸”进过这里。44 楼早已有所准备，“野战医院”大夫、设备一应俱全。我是这次大武斗公社方面第一个伤员，又是被“自己人”误伤的。所以得到了很好的治疗。1969 年 1 月在呼和浩特遇到中文系的赵君、无线电系的陈君，他们正在讲：“公社 3·29 武斗第一个伤员是被自己人打的。”他们问我知道吗……

下面是外校一位大学生的记忆：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用扎枪、柳条帽、黄色军棉袄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首领为聂元梓的密友高云鹏），切断 31 斋男生宿舍的电源，向睡梦中的井冈山兵团一派的学生发起武装突袭，在这幢南北长条的四层楼内。由南向北，逐屋、逐层地驱赶对立派学生。当时，井冈山兵团一派没有武斗队组织、没有武斗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根本无法抵御这种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有组织的突袭。手无寸铁而分散的井冈山派学生只能匆忙逃命，穿着单衣逃命者比比皆是……他们损失了全部衣物、书籍、生活用品和财产，在寒夜中瑟瑟发抖。

3·29 那天晚上。被迫跳楼逃出被包围的 31 楼化学系 62 级学生人数就超过 17 人。其中五六个人受了伤，有的是赤手空拳穿着内衣跳到楼下，就被对方的长矛手扎穿胸部，造成严重的气胸。没有跳楼的也是在睡梦中被拿着棍棒的武斗人员轰起床，殴打着、驱赶着被迫离开自己的宿舍楼，除了贴身衣服，什么也不让带。

“3·29”武斗还波及到别的楼群，住在 35 楼的一个井冈山派的女同学回忆说：

当时我和小 X 已进入梦乡，突然被一阵突发的嘈杂声惊醒了。我们不敢开灯，悄悄地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只见井冈山男生住的 31 楼那边灯光乱闪人声鼎沸，有男生变了嗓音地嘶喊：“公社派的攻楼了！”接着我们就看到有些井冈山的男生只穿着汗衫裤衩从二楼和三楼的窗口跳下来，有的刚刚落地就被胳膊上绑白毛巾的人用铁棍狠狠地戳打。小 X 焦急地说：“这样跳下来，又被这样子暴打，人还能有救吗？”我当时除了惊恐愤怒，剩下的就是透骨的无奈，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天亮之后，校园里议论纷纷。听我们班井冈山的男生说，当天夜里他们住的 40 楼也同时被新北大公社的人突袭了。包围之后一部分人还冲进了楼里。井冈山的同学就组织起来往外冲，有的也从二楼三楼窗口往下跳。不少人冲出来时被对立派从楼上扔下的砖块砸破了脑袋。有的被对方用铁棍、长矛打伤。

这次武斗中受伤的同学不计其数，我们班的男生 Y 被公社派的人用铁矛刺成重伤，送进医院急救。医生说他身上总共被刺了 17 枪，幸而都不在要害部位，侥幸保住一条命。但有一枪扎在大腿的股动脉和静脉之间，造成动静脉瘘，那部位还长了两个瘤。后来又在北医三院做了 13 个钟头的大手术。怕他父母担心，不敢告诉实情。是我们班的男生 W 代替家长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从武斗开始。双方的大喇叭就没停歇，都说对方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武斗。罪该万死。新北大公社当然是贼喊捉贼。天刚亮，李钟奇等赶到北大，发表广播讲话，要求“立即停止武斗”，然后由聂元梓陪同，视察武斗现场，走到 31 楼前面时，围观的人群中突然跑出一个人来，用什么东西

刺向聂元梓的头部，等人们回过神儿来，“刺客”已经没影了。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立即抓住此事，发动猛烈宣传攻势：井冈山的暴徒用匕首行刺李钟奇、聂元梓，聂元梓受重伤，强烈谴责井冈山暴徒的血腥罪行，井冈山必须交出凶手！

事有凑巧，毕业后到河北阜城插队接受锻炼时，我们在杨庙一个村的有 10 人。当年的“刺客”就在其中，就是化学系三年级的×××。据他说，当时新北大公社挑起武斗，伤了那么多同学。反而反咬一口，诬蔑说是井冈山挑起事端，实在忍无可忍，怒不可遏，正好遇上聂元梓陪着李钟奇视察，他顺手拿起桌子上的电笔改锥，就冲聂元梓扎了上去，由于着急，聂也躲闪，只是划破了她的一点头皮。这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没有任何人指使，跟井冈山总部无任何关系。新北大公社那么说，纯属造谣。事后，他也觉得公社决不会放过他，早早就逃亡了。几十年后，我们一起插队的这位“刺客”的一位同班同学告诉我，实际上，说他逃亡，是向外放的烟幕弹，其实并没有走，而是井冈山的主要负责人侯汉清觉得这样疾恶如仇、“仗义执言”的人应该受到保护，把他掩护起来了。

果不其然，不光是新北大公社，连李钟奇副司令员也认为凶手刺杀聂元梓，应该抓起来。看来，这位“刺客”同学当时如果不及时“蒸发”，关押、酷刑是免不了的。弄不好，还会有生命之虞。原来，北京卫戍区要求双方各派 5 名代表，由校文革和解放军一起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事宜，井冈山认为如此不公，拒绝派人参加。当天晚上，谢富治、温玉成（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到北大开会，谢富治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一是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二是井冈山立即交出刺杀聂元梓、李钟奇的凶手；三是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的人员立即撤出，做自我批评；四是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谢富治还批评井冈山斗争聂元梓。校文革发出抓捕凶手的《通缉令》，《新北大》刊登《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罪该万死》的文章。4 月 4 日晚，李钟奇又来北大，限令井冈山兵团 3 天交出刺伤聂元梓的凶手。11 日，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校文革组成的“制止北大武斗监督小组”

负责人发表讲话。责令井冈山兵团交出凶手和后台，否则，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处理，井冈山不服气，不执行，聂元梓等则有恃无恐。继续对井冈山施压。北大武斗人员还把一个到北大阅览室翻阅期刊的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学生毒打致死，孙蓬一竟然对打死人者说："他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还安排假调查，瞒天过海。4 月 25 日，井冈山驱赶住在 36 楼的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占领了此楼。翌日，新北大公社又派出重兵攻打 36 楼，发生大规模武斗。孙蓬一亲自到武斗现场指挥。双方 200 余人受伤，大量公私财产损失。此后，聂、孙又下令攻占 25、27、17、18、19、20、21、22、23 和 24 等楼群，形成了对井冈山占领的 28、30、32、35、37 楼的包围，并逐步对他们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准备"五一"节前将其打垮。北大院墙南面是海淀路，马路南面，有一条有名的胡同，叫做军机处，就是多次在清宫戏里出现的那个名字。紧挨着军机处有一个饭馆，叫长征食堂。为了堵住这个出口，公社派的学生就占领了这个长征食堂，在里面架上了强力弹弓，对这几座楼实行封锁，并企图攻下这几座楼。

由此，北大武斗不但没有停止，还在逐步升级。

三

"3 · 29"武斗之后。像我这样的学生都盼着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能尽快制止武斗，还我们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但是，几天、十几天过去了，武斗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反而都在准备升级，心里十分不安。后来，听说中央文革要派一个级别较高的军人，来北大常驻，领衔制止武斗。我们左等右等，"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却等来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消息：此人深知北大情况复杂。不肯来北大蹚这片浑水。太让人失望了！我这时又想道。怎么考到这么个是非之地，不让念书不说，连基本的正常生活都不能维持！

对于参加武斗，我从内心是坚决反对的，但一开始参加是担心其他人说自己胆小怕死，不敢上战场。另外。也有点好奇。想看一看武斗场面到底是怎么样的。后来听说了"3 · 29"武斗发生的真相，就觉得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太不厚道了。这不是明明欺负人家吗？当然，当时也相

信了公社的宣传，认为无论如何，井冈山也不应该派刺客行刺，这不是流氓行径吗！“春秋无义战”，这就是当时我头脑里对北大武斗的评价。既非“义战”。就不参加，干吗要为派性充当炮灰？心里这么想，嘴上不能说。不然，会说你动摇军心。惹不起，躲得起，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这时候的 38 楼，空气也日渐紧张，把参加武斗保卫新北大公社、保卫校文革当做保卫“文化大革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无所谓，我们这一类人就觉得太缺乏安全感了。看着他们热衷于备战，我则决心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正好我一个要好的同学从北京市区家里来学校察看动静，见状，就邀请我去他家里住。开始我担心给他添麻烦，不同意，他执意让我去，盛情难却，只好背着被子，跟他去住了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后。我坚持要回学校，同学没拦住。下午我背着行李，乘公共汽车从海淀站下车，到了北大西南门，却见几个手持长矛扎枪的公社战士守卫着门口，盘查过往行人。只见一个北大同学，不知是那个系的，可能是井冈山的，背着一个破棉絮，可能是要进去，公社守门的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个同学苦苦哀求，差点儿掉眼泪了，守门的似乎铁石心肠，不为所动。我当时也不敢多嘴，只是向守门人说明我的身份，没有受到阻拦。校园里一派战前紧张气氛。我到 38 楼北面西头的门口一看，门口堆满了砖头，正要上楼，一个女同学恰好下来。她一边码着要搬的砖头。一边力劝我赶紧参加“战备”。说近日武斗还要升级，井冈山可能攻击 38 楼。所有公社战士都要投入紧张的备战之中，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接受考验的大好机会。听着她的这番话，我觉得既可笑又可悲，但我一声未吭，背着行李就离开了。我是决心不参加武斗。不为派性尤其是聂元梓、新北大公社当炮灰了。38 楼是不能回了，到哪去呢？出了校门，我为难了，再去同学那里，显然不合适，可眼下走投无路啊！想了一会儿，我决定先找家在学校附近的另一个同学商量一下，他家就在海淀镇前观园。他恰恰不在。我把被子寄放到那里，无可奈何，还是得回住过的哪个同学家，结果他家也是“铁将军把门”。怎么办？我想了一会儿，决定先到天安门广场转一圈，然后再说。

天安门广场游人不多，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我转了一会儿，没意思，

肚子也有些饿了，可没心思找地方吃饭。转悠到广场上的国旗旗杆下，就依着下面的水泥墩坐了下来。望着天安门广场上初上的华灯，万般滋味涌上心来：这叫什么事啊，大学上得我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我心里不停地琢磨。今晚和今后一段时间去哪里落脚。去找同学，最多住一晚上，解一解燃眉之急，以后呢？想来想去。忽然想起昌平县太平庄我们历史系在“文革”前的这个“半工半读基地”，哪里平时只有一个林业技术员和一个姓崔的大师傅，他们平时备感孤单寂寞，特别希望有人到他们那儿去住。我还记得，晚上 9 点多从西直门到南口有一趟客车，今晚就去！结果老天相助，我饿着肚子，壮着胆子，走了沟沟坎坎的乡间小道，于深夜平安到达太平庄。人们见我连夜从学校赶来，不胜惊讶。听说了学校的情况，又感慨不已。我就在这里躲避了两个多月的“战乱”。

四

7 月份，班里通知我必须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又背起行囊，重回北大。

这时，经过武斗的“洗礼”，北大校园已是另一番模样：千疮百孔，弹痕累累。尤其是宿舍楼，不少窗户或者没有了玻璃，或者干脆连几扇玻璃框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窗户框，井冈山占领区的宿舍楼更惨，很多窗户连木头框也没有了，远远望去，只能看见一个黑洞洞的大窟窿。甚至楼房的砖墙。也被这里掏几块砖，哪里掏几个洞。学校的不少地区。都成了“军事禁区”，一般人不得进入，不然安全、生命就没有保障。即使人们的必经之路，随时都有受伤甚至性命危险。我回去后仍然住在 38 楼，这里是新北大公社的地盘，但东头对面，就是 35 楼，斜对面 37 楼是井冈山的领地。双方在四楼的各自窗户上，都安装了特制的弹弓。这种弹弓，以底朝上的双层床腿为弹弓架，用 2～3 副自行车内胎做弹弓皮，半截砖头为弹弓子，拉弓时，必须两个人，后边的抱着前边人的腰。这样才能拉得起来。把砖头打出去。我曾经试了试，一个人根本拉不动。这种弹弓子的“杀伤力”可想而知。住在 38 楼的人打开水，必须经过 35 楼和 37 楼弹弓的射程覆盖的地区，所以人们哪怕多绕不少路，也不冒险。有一次，我想侥幸一回，因为双方处于好长时间的相持阶段，不但没有军事行动，连

弹弓也许久没人打了，就提了暖水瓶去锅炉房打水，需要从学六食堂东边过去。回来时，快走出对方射程范围时，“咚”地一声，一块砖头陡然射来，砸在学六食堂的东墙上。距离我只有半米之差，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现在想起来还后怕。无独有偶，后来我看到井冈山一位同学回忆这种弹弓的厉害，不寒而栗：

“1968 年 5 月的一天中午，我从 28 楼回 37 楼午餐，顺便就到 37 楼 2 楼西头朝北(38 楼方向)一间盥洗间去把安装的高音喇叭扶正一下(方向稍微有点歪了)。没想到仅几秒钟就被斜对面 38 楼的大弹弓的神弓手瞄准击中，一块半头砖直飞我的面前，慌忙之中我下意识地张开嘴，正是这一口救了我：我当时“吃的”砖头正中口腔上下牙之间，阻挡了冲力。但把上下各 2 个门牙齐根打断，嘴唇全部打烂，血肉模糊。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再高几公分，那这块半头砖就是致命的了，大弹弓的射程有 300～400 米远，37 楼到 38 楼不超过 100 米，飞来的半头砖威力不会比子弹头小。不过这断了的 4 个牙也影响我一辈子：导致其他牙齿一个接一个损坏，早早就戴上了全口假牙。”

新北大公社把井冈山牢牢包围在 28、30、32、35、36、37 这 6 座楼中。我曾瞅个机会远远观看了井冈山占领区的境况。让人不胜感慨。从各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新北大公社，早已经把井冈山占据的几座楼封锁成一个个孤岛。他们不能出楼，不然就会受到各种攻击。他们为了打通楼与楼之间的通道，采取了 3 种办法：一是地面上，楼与楼的通道，两边都用学生寝室里的双层床一张挨一张再用铁丝连接起来作为护墙，上面还用一张张单人床扣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结实而又安全的封闭空间。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通过，弹弓和长矛都对行人不会造成伤害，这是主要的通行办法；另一种，就是楼与楼在高空中东西向搭起两座天桥——28 楼与 30 楼之间，32 楼与 35 楼之间。28 楼是工字型楼。南端西头与 30 楼东头距离最近，井冈山在学校找的木料，就在 28 楼楼道里施工，用大铁铆钉做成桥梁架构，然后从 28 楼向西推，上面套上绳子甩到 30 楼东头向西拉，就这样，在两座楼的最高层四楼架起了一座燕园史无前例的特制的天桥。32 楼与 35 楼之间的天桥是电缆拉起来的软桥，晃晃悠悠的，胆小的人不敢上

去。井冈山人在天桥上面通行，能保证安全无虞。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广播站等许多重要机关都在 28 楼。所以井冈山拼死拼活也要保证 28 楼与其他楼的畅通。而 30 楼又是 36、37 楼通往 28 楼的咽喉。从 29 楼与 28 楼之间的地下向南仰望，井冈山那座天桥赫然在目，它让人感叹那个时期的大学生身临绝境中无奈求生的可悲，又让人感佩天桥策划制作及安装指挥者的胆略和精妙。三是挖地道。据说由地质地理系同学设计并监督实施，一人高，并排可走两人，其中还有电灯照明，昼夜均可通行。武斗结束后不久，一场大雨，把地道冲塌了。井冈山人都暗自庆幸。

后来又听说，由于公社头头的不人道，经常下令无规律地停电停水，井冈山的人们受罪受大了，到做饭的时候，刚做了一半。停电了，饭半生不熟，怎么办？如此受耍弄的事不少。水更成问题，没水，喝水、吃饭、洗手、洗脸，特别是厕所冲刷，都无法解决。赶上天气越来越热，人们的日子越发不好过。所以，井冈山人又想了个法：把不住人的宿舍整个用水泥抹了，变成一个个大水箱。水龙头永远开着，什么时候来水都能存下。结果水还没有存满，由于压力过大，从砖缝里往外渗，最终没有成功。听到这些，真让人哭笑不得。公社还对井冈山实行了断粮断菜，6 月 24 日，北京运输三场应井冈山总部之邀，给困守在几个楼的井冈山人员送肉送菜（井冈山人零星到海淀买菜，常常被公社武斗人员抓捕和毒打），公社武斗头头命令武斗人员两边夹击，井冈山预先也派出人员保护，东边是 03 化学系同学，西边是 02 系同学，双方发生武斗，东边的顶住了，西边的却溃退了。结果化学系 64 级头头姓王，被公社武斗人员打翻，扎了十多长矛。幸亏他里面戴着自制护甲，才没有危及生命，但是也受了重伤。公社武斗人员还砸坏了北京运输三场的汽车，打伤了 3 名司机。其中一名扎成重伤。井冈山人员吃着用同学的鲜血换来的蔬菜，不少人都难过地掉下眼泪。而那位受重伤的王姓同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文革后考上了研究生，还当了年级的支部书记。

由于公社不时地停电，让井冈山人员苦不堪言，井冈山决定自己解决问题，将 37 楼旁边校园南墙外面不远的高压线拉到自己占领的楼里去。公社得知这一信息，也决定届时从两面攻击，让井冈山接电的自我解救计划

流产。7 月 22 日晚上，我与许多同学从西南校门外面观看了这场接电与反接电的“战斗”。记不清是晚上几点了，井冈山的接电人员“全副武装”，出了从南墙推开的豁口，接电人员爬高压电杆时，下面则有几十名手持长矛的人员平地保护。这时候，早已埋伏在西南校门和东南校门的公社武斗人员，立即冲出来，三人一组，两边两个短枪手，中间一个长枪手，从海淀马路的东西两个方向，向接电的高压电杆处发起进攻。顿时，传来一片喊杀声。但是，公社武斗人员虽然人多势众，却一直没有能够进攻到接电的地方，中间相持时，看不清是谁还扔了燃烧瓶。“战斗”一直持续到拂晓，造成马路堵塞，32 路公共汽车停驶。这场武斗以井冈山接电成功而结束。事后，公社参加武斗的人员说，从马路上冲过去。快到井冈山地盘时，只觉得脚下一个劲儿打滑。不少人摔倒了，大家站立都很困难，这样战斗力大减，根本到不了他们跟前。后来才知道，井冈山深知寡不敌众，跟公社硬拼没有好果子吃，关键是接电也接不成，今晚的行动就会半途而废，所以他们采用了“撒豆计”，在接近他们领地的东西马路上撒了几十公斤绿豆、黄豆、红豆，公社武斗人员不知道，多数人员到了地方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没法投入战斗。他们的攻击和破坏行为才没有得逞。此后，连公社武斗人员也都佩服井冈山有关人员的聪明才智。对于接电成功，大家更是惊讶叹服，因为当天晚上的接电是 11 千伏高压带电作业，那个年代，专业的电工也不敢如此冒险操作。还有一点，可以算作武斗轶事：井冈山中一些胆大者，第二天早起，又去“战场”上把豆子扫回，还泡了豆芽，享用了一番，馋得其他“井冈山战士”直淌口水。

公社武斗人员凭恃自己一派权高势大，人多气粗，对井冈山的人能抓就抓，能打就打，能斗就斗，对没有参加公社的同学也视为异己分子，看着不顺眼，说打就打，毫无人性，甚至草菅人命。由于“3 · 29”武斗开始以后，新北大公社把全部学生食堂都控制起来，不但井冈山的同学不能去用餐，而且限制所有非新北大公社派的人用餐。有些没参加任何派的学生依然去学生饭厅去吃饭，没想到新北大派竟派了武斗队把守饭厅，见了非公社派的人就打，不让吃饭。无线电系 62 级的殷文杰同学就是其中最倒霉的一个，他见情况不好，扭头就跑。被公社的武斗队员们追上用长矛刺穿

股动脉，尽管他哀号求助多时，竟无一人上前。眼睁睁地看着流血过多而死。一天下午，我在 38 楼 4 楼的阳台上，亲眼看到公社的几个武斗人员，挟架着一个人。扔到西南门里的马路上，然后开始毒打，先是拳打脚踢，后来干脆用长矛扎，只见一枪下去，这个人身上的鲜血蹿出来一尺多高，有人说可能是扎到动脉上了。看到这个惨烈的场景，我的心不住地怦怦跳动，真是令人发指！后来这个人又不知被谁拉走了，生死不明。后来看到《北京大学纪事》上记载："1968 年 7 月 20 日，地质地理系 61 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 40 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打死。"我看到的那个场景可能就是这个被杀害的刘玮。

五

"7 · 22"和"7 · 23"公社对井冈山接电实施破坏未果，有些恼羞成怒，也许担心井冈山如此得以喘息，将来不断壮大，更不好收拾，于是，便决定提升武器档次。使武斗升级，彻底消灭井冈山。他们在校园北部开始试制土炸弹、土坦克等等。

7 月 27 日，我们在学校突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不明身份的 10 万人，有工人，有解放军，包围了武斗已经升级为枪炮级的清华大学，蒯大富武装抵抗，打死工人 5 名，打伤 700 多名。当天晚上，聂元梓、孙蓬一召集系文革主任、公社战斗团联席会议，针对清华的情况，商量对付强行进入高校的工人、解放军，决定：（一）拒之门外，让进校者派代表与校文革协商；（二）抵挡不住，则退入楼内，各自为战，做到人在楼在；（三）最后不行，聂元梓就带领人们到北大荒去等等。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多，只知道通知住在 38 楼的学生。不管是公社的，还是井冈山的，还是逍遥派，都要向楼里搬运砖头或其他能打伤人的重物，有的还弄了燃烧瓶，命令大家与攻楼者决一死战，与 38 楼共存亡。

这个时候，我却有些莫名其妙的兴奋，虽然不知道工人、解放军是谁派的，要干什么，但从他们被蒯大富抵抗仍然要顽强进人，就觉得这一定有来头。对于我们（反对武斗的人）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但，当务之急是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该怎么办，"共存亡"。决不干；躲避，又没处去，

只好见机行事了。让搬砖头备战，自己就虚于应付，消极怠工，得过且过。

井冈山人恐怕比我还高兴。几个月来，他们不仅基本的食宿难以维持，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新北大公社不仅对他们实行全方位的封锁，还采用各种形式“挖山不止”。井冈山广播站每天播放为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词谱成的歌曲：“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歌唱家低沉的嗓音，给蜗居在几座楼里不能随意出行的井冈山的同学们极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既感到无比的悲壮，也感到无比的压抑，还对未来感到茫然。

7 月 28 日，我们果然听到了好消息：进驻清华的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的。进入高校是为了制止武斗和结束派性混战的混乱局面。还说，毛主席等等在当日凌晨接见了首都高校五大红卫兵领袖，批评了他们。后来断断续续听到，毛主席说道：今天是找你们来制止大学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是实行军管；二是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成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是斗批走；四是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个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说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毛泽东这些软中有硬的话语，五大领袖当然不能“商量”、“讨论”，必

须认真迅速贯彻落实。不管想通想不通，按当时林彪的话来说，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聂元梓肯定就非常不理解，但是她也不得不执行。只是在执行中还要加上点自己的东西。当天，北大校文革发了一个《立即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斗工具，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新北大公社总部则发了一个支持《通告》的《声明》，要求井冈山交出“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和一切漏网分子”，还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翌日，公社还给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封信，欢迎他们进驻北大。但强调“在校文革领导下实行大联合”。8 月 5 日，公社又发出《关于彻底砸烂北大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第四号通告》，要求大家“向正在作垂死挣扎的反革命集团发动猛烈进攻”。

8 月 19 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63 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担任总指挥。20 日晚上，宣传队召集两派代表谈判会，达成有关协议：一是上交武器，拆除武斗工事：二是对宣传队不能两面三刀；三是宣传队接管全校广播台；四是着手解决释放被抓人员问题：五是停止互相攻击等等。此后两天内，公社、井冈山分别上交武斗工具。公社的是：扎枪、长矛 930 支，铁棍 200 根，安全帽 518 顶，护甲 336 件；井冈山的是：长矛 749 支，铁棍 71 根，护甲 208 件，柳条帽 432 顶，弹弓 8 个，小口径子弹 37 枚。

8 月 21 日晚上，宣传队第一次与聂元梓及校文革的全体常委作第一次接触，并向他们提出三个问题：为什么井冈山不承认校文革？校文革采取了什么态度？校文革支持武斗，要不要承担武斗造成的损失和责任？校文革作出四项决定：主动到井冈山住区帮助拆除武斗工事，把井冈山人员未领的工资送去并承认错误，聂元梓接受批判，给井冈山人员解决吃饭问题，以后政治、经济、生活上一律平等。28、29 日，公社、井冈山先后宣布解散，9 月 3 日，全校实现大联合。

为期四个月的武斗终于结束了，一年多派性互斗的混乱局面终于结束了，应该说，北大绝大部分像我这样的同学都衷心拥护。起码我们不会再为要不要违心地参加武斗而犯愁，也不会再为无家可归而担忧。其实，真

正愿意参加武斗、愿意为所谓“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流血牺牲的同学是极少数人。我就问过公社的几个武斗队员，他们都表示这是不得已、没办法。武斗来了，不参加不好意思，没有勇气，怕人家说自己是怕死的胆小鬼。现在想来，真是荒唐可悲！

武斗给国家资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就楼房来说，北大学生宿舍区的 17、19、20、29、30、32、34、35、36、37、40 等 11 栋楼房破坏十分严重，17、20、34、37、40 楼的楼顶瓦面全部被打碎。17、20、28、29、30、32、34、35、36、37、40 等 11 栋楼的门窗玻璃和扇框全部被打碎，28、30、35、36、37 等五栋楼的暖气和灯光设备被拆毁，里面的家具被损毁（其中 28 楼是为留学生置办的家具用具）。聂元梓的公社派还在武斗中损坏了“五四”操场的 20 万红机砖，井冈山在 30、35、36、37 楼下面 2 米深处挖了高 1.7 米、宽一米的地道，使楼房建筑基础受到严重损坏，为了搭天桥，把 35、36 楼的屋架风撑也给拆毁了。公社派从建筑材料中用了 4 吨镀锌管（内径半吋）做了长矛。井冈山没权，无法动用学校的现成物资，就把他们占住楼房里的暖气管截下来做长矛。学校的双层木床原来有 5300 张，武斗中毁坏了 3000 张，另外，还损坏四屉桌 600 张，大二屉桌 240 张，留学生用的大衣柜 200 个，椅子 270 把，书架 250 个，毛巾 500 条，棉衣 600 件。这棉衣自然是做了公社派的武斗服，那时候公社武斗人员每人一件黄军装棉袄，被井冈山嘲笑为“老佛爷”聂元梓赐给的“黄马褂”。

北大武斗的产生、发展与恶果，原因很多，但是，中央文革支持的聂元梓校文革无疑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毛泽东是洞察一切，他称北大校文革是“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打死人文革”。新北大公社的一般群众，也都是“受害者”。

几十年后，看到一份资料，说是北京高校清华北大武斗的状况，没人敢向毛泽东反映，还是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这时作为父亲的联络员，了解到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经过思考和权衡，派出工军宣队进驻高校，制止武斗，结束了到处武斗、全国内战的混乱局面。

北大地球物理系部分校友忆武斗

王书仁执笔，俞小平整理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 1967 年 8 月 17 日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两派矛盾不断激化，对立情绪不断升级。这两派并不势均力敌。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凭借“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江青、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的支持，利用拥护她的新北大公社，对井冈山兵团实行不断的打压。两派斗争从矛盾开始发展到井冈山兵团成立发展壮大过程约一年时间中，校内大字报及口头辩论处于文斗阶段，对校文革成立来执行的路线进行的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充分展示了“文攻”的斗争形式，两派甚至各自成立了各自的文艺团体，在文艺表演中“和平竞赛”，均表现出较高的文艺水平。但两派的指导思想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理论，武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的说法也不能不对两派产生影响；全国各地在江青“文攻武卫”号召下出现的风起云涌的武斗风潮，其激烈程度虽令人瞠目结舌，但也在逐渐影响着北京大专院校的两派斗争的发展。

1968 年 2 月底，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单独接见井冈山兵团的代表，并做了以下讲话：

一、井冈山兵团要承认聂元梓，承认校文革是北大的权力机构，这是中央的意见。

二、聂元梓要承认北大井冈山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为北大文革作出过很好的贡献，聂元梓校文革要承认它。

三、北大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如何成立，双方协商解决。

四、解放军支左不支派。

对此，井冈山兵团提出“要革命委员会，不要校文革”，而聂元梓的校文革则向中央文革告状，说李钟奇的讲话在北大引起了混乱，质疑李的讲话是否存在，声称是井冈山兵团造谣。

1968 年春节后，聂元梓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举办了两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人员都是新北大公社遴选的身体健壮的学生和后勤工

人，其中许多人就是原来北大田径队的和各种球类代表队的学生。他们集中住在 44 楼，在第二体育馆进行武斗训练，主要项目是用长矛刺杀。

新北大公社举办的“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成员结业后，一部分骨干组成了学生为主的“钢一连”和后勤工人为主的“革命工人兵团”，另一部分骨干回到各系，建立了各系的武斗队。

新北大公社的武斗头头是高云鹏、黄元庄、宫香政。钢一连的连长是王刚，在后来的历次武斗中，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之后，新北大公社的武斗准备基本完成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约 1968 年 3 月 20 日下午，井冈山兵团 16 纵队和 02 纵队的两个同学（其中一人还带着井冈山兵团的大红袖章）在校园里从未名湖方向回学生宿舍区，经过第二体育馆时，发现他们往常在二体的运动场地周围戒备森严。二人感觉有些情况异常，就停在二体门口向里面张望，被学习班成员发现，立刻涌出一伙人来抓他们，他俩赶快逃跑。从校医院往宿舍区加速奔跑才得以脱身。

3 月 27 日中午，我们正在午睡，听到井冈山广播台突然开始广播：“强烈抗议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在光天化日下绑架生物系的樊立勤同学和井冈山兵团的谢佐平同学。”该事件的经过是：当日午饭后，樊立勤和好友谢佐平在未名湖畔散步，预设埋伏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冲出来，把谢佐平和樊立勤绑架到二体，夜间又转到 44 楼关押，他们在 44 楼私设刑堂，对二人进行严刑逼供。他们往樊立勤的膝盖上钉铁钉，用竹签钉指甲，打断右臂和右腿。樊立勤遭受了酷刑，宁死不屈。

（二）3·29 武斗——校文革指挥新北大公社搞突然袭击

北大有组织的大武斗始于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高云鹏等人是大规模武斗的前台，聂元梓是后台；而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则是聂元梓的后台。

3 月 29 日，聂元梓、孙蓬一和新北大公社武斗总指挥高云鹏等人经过精心策划，发动了第一次大武斗。武斗的地点是学生宿舍楼 31 楼和 40 楼。

3 月 29 日凌晨，在 31 楼，手持长矛、扎枪、头戴柳条帽、身穿黄色

军棉袄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切断了 31 楼的电源，向睡梦中的井冈山兵团的化学系 03 纵队学生发动武装突袭，他们用长矛砸，用脚踹，强行破门。在夜深人静之时，公社武斗队发出的重重砸门声，“砰！砰砰!”惊醒了附近的宿舍楼内的同学。从睡梦中惊醒的 03 纵队学生毫无准备，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很多人不得不跳楼逃走。03 纵队的学生齐菊生、魏玉书和杨某分别冲出宿舍，在楼道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杨用一根扁担与手拿长矛的公社武斗队搏斗，一度占领了一段走廊，有效地阻击了公社武斗队，使得大多数同学得以跳楼逃脱，为井冈山兵团保留了一支最为重要的骨干力量。

我们地球物理系 16 纵队的宿舍在 39 楼，那天夜里，我们被公社武斗队在 31 楼砸门的巨大声响惊醒后，在第一时间赶来救援 03 纵队。刚一冲进 31 楼，就发现一楼楼道里一片漆黑。楼道中间的一个宿舍门前，公社武斗队用桌子凳子构筑了工事。宿舍门口处站满了人，有几个人拿着手电向我们照射，还不断地向我们扔石头。我们不明情况，不得不退出 31 楼，出了 31 楼就遇到“钢一连”从 44 楼方向向我们冲了过来。当我们面对手持长矛、整齐列队的“钢一连”时，我们惊呆了。我们从来没有在北大见到过这样正规的武斗队。显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为发动 3•29 武斗，打垮井冈山兵团的骨干力量 03 纵队，进行了周密部署。

在夜色下，经过武斗训练的“钢一连”，排着方队，手持长矛，头戴柳条帽，身穿黄军装，沿着 31 楼前的柏油路，有组织地稳步向前推进。他们的指挥员喊着口令：“一、二、一”，同时还吹着哨：“嘟、嘟、嘟”。钢一连沿着 31 楼南面的道路，向 28 楼方向发动了多次冲击，驱赶各楼赶来救援的井冈山同学，防止其他楼的井冈山同学进入 31 楼救援 03 纵队学生。当时我们没有长矛，无法抵抗公社武斗队的进攻。在败退时，我们遇到了海燕兵团的陈世宝，他是学三食堂的炊事员，经常练武，当时正好在 31 楼西边的学三食堂值夜班。当他被砸门声惊醒后，立刻赶来 31 楼，发现对方手持长矛，就回去取来自己练武用的长矛，企图组织零散赶来的井冈山同学进行抵抗。但是，井冈山同学看到公社武斗队的整齐队伍那么训练有素，他们完全丧失了进行抵抗的信心，一群乌合之众只能远远地用石头反击。

在“钢一连”的反复冲击下，井冈山的同学被“钢一连”从 31 楼，一次次驱赶到 28 楼，再也无法接近 31 楼。

在我们第一次冲进 31 楼时，我们 16642 班有两个同学，蔡旭河和卢晓波被公社武斗队从楼上投下的石头击伤。卢晓波的面部被砖头击中，流血受伤较重。

天亮时，井冈山兵团 16 纵队的纵队长钱仁浩说，总部让我们 16 纵去占领 31 楼和 28 楼之间的 30 楼。实际上，30 楼的公社派同学已经先行撤出，住进了 29 楼，因此我们毫不费力地占领了 30 楼。

当夜住在 28 楼的数学力学系的新北大公社“红一团”，在 3•29 武斗前没有回宿舍。在“钢一连”进攻 31 楼的同时，数力系的沈悍东率领“红一团”占领了 29 楼，把楼内的井冈山同学赶出去。

天亮后发现，在 31 楼和 29 楼，井冈山兵团共有 23 名赤手空拳的同学被公社武斗队抓去，关押到 44 楼新北大公社总部内。

3•29 武斗的另一个主要战场是 40 楼。40 楼一楼住的东语系学生，二楼俄语系，三、四楼西语系。当时井冈山兵团西语系的“五一纵队”实力较强，新北大公社总部为了阻止五一纵队前往 31 楼救援 03 纵队，就让住在 40 楼一楼的公社派东语系的“红九团”，预先在 40 楼的一、二楼之间的楼梯上构筑工事，用座椅堵塞楼梯，阻止“五一纵队”下楼。“五一纵队”在纵队长石磊和杨玉海的率领下，向下勇猛冲击。复转军人杨玉海双手举起一辆自行车作为盾牌，挡住“红九团”投来的密集石头，冲了下来。经过激烈战斗，“红九团”退缩到一楼的西侧楼道，无路可逃，大约有 30 多人被俘，被“红九团”关押在一楼的西侧的两个房间内。半个小时后，由于看守不严，逃走了 7～8 个人，余下 26～27 个人，在天亮时被押送到 28 楼井冈山总部。

3•29 武斗后，由于物理系住宿的 43 楼被公社武斗队占领，物理系 02 纵队不得不在井冈山总部委员谢纪康带领下迁到 35 楼，与海燕兵团住在一起。公社派占领了地球物理系的宿舍 39 楼，封锁了食堂，我们地球物理系 16 纵队只好住进了 28 楼。被公社从 31 楼赶出来的 03 纵队，住进了 37 楼。37 楼紧靠北大南校墙，面对校外的马路，37 楼斜对面是一个餐

馆叫做长征食堂。井冈山兵团在 37 楼前面的北大南墙上开了一个豁口，成为井冈山兵团的通往外界的唯一出口。后来新北大公社为了封锁这个出口，在 37 楼前发动了多次大规模武斗。

3 月 29 日早上 7 点钟左右，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派人来制止武斗。北京市革委会派来的领导人居然是聂元梓！她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与北京卫戍区的李钟奇一起来视察武斗现场 31 楼。愤怒的井冈山学生拥上去要打聂元梓，混乱中聂元梓头部疑似受了轻伤。公社广播台立刻叫喊发生了“刺杀聂元梓同志的反革命事件”，“捉拿刺杀聂元梓同志的凶手”。

北京卫戍区要求双方各派 5 名代表，由校文革和解放军一起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事宜，井冈山认为不公，拒绝派人参加。

3 月 29 日当天晚上，谢富治、温玉成（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到北大开会，谢富治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

二，井冈山立即交出刺杀聂元梓、李钟奇的凶手；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的人员立即撤出，做自我批评；

四，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要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

谢富治还批评了井冈山兵团。

在谢富治的支持下，聂元梓的校文革发出抓捕凶手的《通缉令》，《新北大》校刊刊登《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罪该万死》的文章。

4 月 4 日晚，李钟奇又来北大，限令井冈山兵团三天之内交出刺伤聂元梓的凶手。

4 月 11 日，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校文革组成的“制止北大武斗监督小组”负责人发表讲话。责令井冈山兵团交出凶手和后台，否则，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这样的处理，井冈山不服气、不执行，而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则有恃无恐，继续对井冈山施压。

北京市革委会和谢富治如此偏袒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使得北大武斗不但没有停止，而是在逐步升级。

北京卫戍区在 3•29 当天组织两派谈判，主要内容是交换战俘。谈判在哲学楼进行，当时井冈山要求释放樊立勤，可是新北大公社说：樊立勤不是你们井冈山的人，不能释放，还说他是反对江青的反革命。使得谈判陷入僵局，没有达成协议。后来，新北大公社广播台又广播说："樊立勤不是你们井冈山的人，你们一定要，我们也给。"这样，在井冈山的坚持下，新北大公社同意最后释放了樊立勤。双方也就达成协议，互相释放所有的被俘人员。

3•29，井冈山徒手的无组织学生被全副武装的新北大公社抓了二十多个，容易理解。相映成趣的是，全副武装的新北大公社，被赤手空拳的井冈山抓了成建制的三十多个，到今天还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交换战俘是在晚上进行的，樊立勤和谢佐平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抛到 44 楼的外面。这时樊立勤已经奄奄一息，全身都被水浸湿。谢佐平背着昏迷的樊立勤，艰难地行进，沿着 44 楼通往 28 楼的路，经过浴室和开水房之间的小道，又经过 31 楼后，才遇到了前来接应的井冈山同学。井冈山的同学把樊立勤送到了北医三院，樊立勤被安排住院抢救。我记得，第一天，广播员语调沉重的广播说："樊立勤同学现在仍然处于昏迷之中，心跳微弱，脉搏只有 40 下，心脏有时停跳，血压只有 90/40……"。樊立勤住院后的每天晚上，井冈山广播台在夜深人静时，都要报告樊立勤的最新情况。后来我们得悉，北大的老干部张侠帮了忙——北医三院的党委书记以前曾经和张侠一起工作过。

在北医三院的医生全力抢救下，一个月后樊立勤脱离危险期。但是在一年后，樊立勤的被铁钉钉碎的膝盖中留下的铁锈，引起骨髓发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由 8341 部队政委杨德中，亲自从卫生部的"牛棚"中请来被关押的骨科名医，为樊立勤的两条腿重新做了手术。这是后话。

面对校文革精心筹划的武斗，北京市革委会只讲制止武斗，不追查挑起武斗者，这极大地助长了聂元梓校文革的气焰。江青也为聂元梓帮腔，说什么"红旗飘中准有坏人。"为聂元梓挑起武斗制造根据。江青的助威使得聂元梓更加猖狂，使得井冈山的头头处于被动的地位。不敢主动反击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攻击。

井冈山兵团五一纵队的纵队长石磊离校回家，杨玉海宣布下山，大部分成员离校，五一纵队就这样溃散了。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进驻的 40 楼，成为公社武斗主力“西线指挥部”和“钢一连”的驻地，形成了“钢一连”从 40 楼，“红四团”从 34 楼，东西两面夹击井冈山 37 楼的态势。

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在攻占 31 楼和 29 楼以后，还占领了 28 楼周边的大部分宿舍楼，形成了对井冈山兵团总部所在地 28 楼的包围圈。只有 36 楼还没有被两派占领，这给井冈山留下了一条活路。后来为了争夺 36 楼，发生了最为惨烈的 4•26 武斗，那是井冈山的生死之战。36 楼如果被新北大公社占领，井冈山所占的 28、30、32、35 等楼就会被新北大公社完全包围，成为瓮中之鳖，无路可逃。

当时井冈山兵团总部也知道形势对我方很不利，但是却满足于 3•29 以后校内局势的暂时平静，对未来的武斗没有进行认真的准备。井冈山的学生每天还是过着悠闲的日子，我们 16 纵队的 65 级和 64 级部分同学，每天中午都到颐和园去游泳。后来发生的 4•26 武斗在下午 1 点钟开始时，许多井冈山的骨干力量却在颐和园昆明湖游泳。因此井冈山的许多守楼学生没有参加 4•26 的生死之战，那天井冈山的处境非常危险。

4 月 19 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把阅览室里翻阅期刊的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学生温家驹，抓到低温实验室毒打至死，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竟然对打死人的凶犯说：“他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有校文革顶着。”孙蓬一还安排假调查，企图瞒天过海。

（三）4•26 武斗——井冈山兵团的生死存亡之战

4 月 23 日后，校内刚刚缓和的形势骤然紧张。从 4 月 23 日开始，每天午饭后的半个小时内，小规模的摩擦不断，每次冲突规模很小，双方只有 3～5 人，冲突的时间也就是几分钟，然后就自然的结束了。局势一紧张，双方都认识到了 36 楼的重要性。当时，36 楼还没有被哪一派控制。36 楼的北面是 35 楼，由井冈山的海燕兵团和 02 纵队驻守，南面是 37 楼，由井冈山 03 纵队驻守，两边的井冈山队伍对公社武斗队极具威慑力，少量的公社武斗队员不敢接近 36 楼，36 楼的公社女生，按照他们组织的布置，陆续搬出了这座楼。4•25 夜间，只有二三十名井冈山女生在 36 楼。

4 月 26 日那天中午传来消息，校文革要集合全部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进攻 36 楼。28 楼内井冈山兵团的学生，一听说公社武斗队要抢占 36 楼，不等井冈山兵团总部招呼，立刻拿起长矛冲进 36 楼，构筑防御工事，夺得先机。在 35 楼内的海燕兵团和 37 楼的 03 纵队的监视下，公社武斗队眼睁睁的看着井冈山的这些散兵游勇，从 28 楼出发，一个个的进入 36 楼，未敢立刻动手进攻。

4 月 26 日下午 1 点多钟，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集结完毕。他们全副武装，头戴钢盔或柳条帽，身穿黄军装，手持橘红色长矛，排列成整齐的方队，向 36 楼进发，实行包围。

公社武斗队在进攻 36 楼前，驻北大的卫戍区军代表，在公社广播台讲话，明目张胆地污蔑井冈山挑起武斗，为公社武斗队撑腰打气。随后，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和新北大公社武斗总指挥高云鹏指挥武斗队从 38 楼和 40 楼方向，两翼攻击 36 楼。公社武斗队主力“钢一连”负责从 36 楼西侧进攻，他们撞开一楼窗户和短墙，冲进 36 楼一楼，逐个用电线杆撞垮隔墙，占领了 36 楼一楼西侧几个房间。

公社武斗队还开来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在车上加装了工事，立着两个双层床，上面架着梯子。这辆卡车从 38 楼这边倒车，靠到 36 楼二楼的窗口下，然后 38 楼内的公社武斗队用强力弹弓发射石弹，猛烈射击 36 楼二楼、三楼和四楼的窗口，不让井冈山同学露头抵抗。这时“钢一连”乘机架起梯子，直接往 36 楼二楼的窗口里面爬，企图强行冲入。

楼内仅有几十个井冈山学生，他们顽强坚守，情况危急。这时 16 纵队的刘志刚、李黄和其他同学一起，从 28 楼出发去增援 36 楼内的井冈山同学。他们在穿过 32 楼和 35 楼之间的过道后，在 36 楼东侧的空地上与从 34 楼冲出的 04 团遭遇并发生冲突。04 团的骨干是生物系 60 级毕业班为主的学生，听说校文革承诺，毕业时可以按照他们的表现，把他们分配到祖国的“天南海北”去，就是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所以他们在武斗中特别卖力。他们头戴头盔，身穿全套黄制服，手持长矛，排着整齐的队列冲了过来。在冲突中，刘志刚、李黄同学被长矛刺成重伤。16 纵同学部分退回 28 楼，部分同学从 36 楼一楼东侧冲进了 36 楼。

4•26 武斗从下午 1 点开始，到下午 3 点，36 楼的武斗到了最为惨烈的时刻。有的井冈山同学在 36 楼的倾斜楼顶上奔跑，揭起楼顶的瓦片飞掷下面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在 36 楼二楼西侧的井冈山同学，顽强地坚守二楼楼道西侧楼道上的窗口，不让公社武斗队员从下面爬上来。在 36 楼对面的 38 楼上的公社武斗队，用强力弹弓封锁 36 楼二楼楼道的窗口，掩护公社武斗队攻击二楼。弹弓力量非常大，射出的石弹打在窗户上，把整个窗户砸得粉碎，碎玻璃片横飞。坚守 36 楼二楼的一些同学冒着危险，与公社武斗队顽强搏斗，坚守着这个窗口。同时，二楼的其他同学在二楼的地板上用大锤砸洞，从洞口用长矛攻击下面占领一楼西侧的公社武斗队。在 38 楼、31 楼和学六食堂的前面，还有多个公社武斗队方队排列，在“钢一连”的后面呐喊助威，看上去全部公社武斗队足有上千人。后面呐喊助威的武斗队中有许多是滥竽充数的，如地球物理系的中年女教师资某某，她带着 1800 度的德国蔡司近视镜，也是头戴柳条帽，身穿黄棉衣，手拿长矛，站在武斗队中。地球物理系的中年女教师张某某，她也带着近视镜上阵助威。很多不愿意参加武斗教师和学生，也被强拉来助威。

井冈山在 36 楼的守势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这时有人看到从 36 楼西侧四楼的窗口，一个铁暖气片组架在窗台上就要推下来，窗前的井冈山同学大喊“下来啦!”在梯子往上爬的公社武斗队员，见状吓得全都从梯子上退下来。随后铁暖气片组飞落，砸在下面的卡车上，沉重的铁家伙把卡车上的工事砸得稀烂。看到这情景，公社武斗队员们一下子惊呆了，他们停止呐喊，呆呆地站着不动。10 分钟后又有一个铁暖气片组从楼上砸下来。公社武斗队胆怯了，他们乱了阵脚，开始后撤，攻入 36 楼一楼的公社武斗队从一楼西侧的窗口逃出楼去。这时，在颐和园游泳的井冈山同学回来了，他们立即从 37 楼出发增援 36 楼，最后击溃了公社武斗队。

坚守 36 楼是井冈山兵团的生死之战，在 1968 年 4 月 26 日这一天，我们用年轻的生命，守住了 36 楼。

在 4•26 武斗中，井冈山有 17 人受伤较重，经送医院治疗后，部分同学留在地质学院和农业大学养伤。5 月初，我在地质学院遇到了 17 纵队的张某，他的小臂下面被公社武斗队用长矛刺伤，手臂包着纱布。他说：

那天在 36 楼二楼楼道，他正在用大锤砸地板时，公社武斗队通过刚刚砸开的洞口，从下面刺了他一下。他受伤后被送往医院，就把这把大锤留给了继续坚守的同学，用它砸下暖气片、砸墙、砸石头，这把大锤立了大功。

4•26 武斗后的形势是：37 楼的南面是北大校园的南墙，墙的外面是海淀路，就是 32 路公共汽车行走的路线，现在叫 332 路。北大南墙外面的公路长约一公里，从中关村路口到小南校门的西边。37 楼的西边是 40 楼，驻守公社武斗队“钢一连”，37 楼的东面是 34 楼，驻守的公社武斗队主要是生物系的“红四团”。从 37 楼向北延伸，依次是井冈山控制的 36、35、32、30、28 等学生宿舍楼。形成一条线，蜿蜒伸入校内。这些楼中，28 楼与 30 楼东西并列，32 楼与 35 楼东西并列。4•26 武斗后，聂元梓校文革又下令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攻占 16、17、18、19、20、21、22、23 和 24 等宿舍楼，与 3•29 以来公社武斗队已经占据的 29、31、34、38、40、43、44 等宿舍楼，形成了对井冈山占据的 28、30、32、35、36、37 等六座楼的严密包围。

新北大公社通过新北大广播台的高音喇叭，宣读了“封锁 37 楼狗洞通令”，声称：不但要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还要抓捕井冈山中的坏人，他们反复播放江青讲话的录音，说“红旗飘里准有坏人!”。同时又对井冈山的六座楼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企图将井冈山兵团逼出北大。他们还派出武斗队，在海淀路上抓捕从 37 楼出入的井冈山兵团的学生，甚至放肆地打上门去，“惩治”支持井冈山的海淀镇居民。

在 4 月 26 日至 30 日的一段时间内，井冈山兵团真是被困住了。在这段时间里，井冈山的一部分同学护送受伤的同学到医院疗伤，并留在那里保卫受伤同学的安全，这造成井冈山兵团各楼内部力量空虚，无力对抗聂元梓的封锁。

37 楼位于北大南校门与小南门之间，马路对面是连片的居民院墙，无法穿行。行人必须经过与这两个校门相对的胡同才能进入海淀镇，去购买生活用品、粮食、蔬菜等。在 4•26 以后的几天中，井冈山兵团的学生挨饿了。海淀镇的居民同情井冈山，冒着危险给井冈山送过来一些食物，也要被公社武斗队殴打。4•26 武斗的失败使公社武斗队输红了眼，他们疯狂地

报复，到处设岗抓捕井冈山的同学。殷文杰接到父母的电报，想要离开学校回家去，他从学校订票处取回预订的火车票，经过 44 楼前，被人认出他是井冈山的成员，一伙凶手用长矛追着刺杀，身中 30 多长矛，刀刀见血，当场身亡。

4•26 武斗后，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凭借中央文革授予的权势，对井冈山兵团的人能抓就抓、能打就打、能斗就斗。对没有参加公社的同学也视为异己分子，看着不顺眼，说打就打，毫无人性。对井冈山兵团的教职工停发工资。聂元梓的校文革实行大逮捕，布置各系抓捕井冈山兵团的干部和教师，将他们关押入“牛棚”。

地球物理系的新北大公社“红十六团”召集武斗班子开会，参加的头头有：丁某某，宗某某，董某某，刘某某，郑某某，陈某某，王某某，讨论要抓捕那些人，提出要抓教师名单：王桂琴，彭秋和，尹宏等人，丁某某率领武斗队到 4 公寓抓了尹宏，王某某率领武斗队到清华西南门抓了彭秋和，还派杜某某和陶某某到王桂琴老家调查抓捕。

物理系的 02 团抓了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关押在物理大楼 4 楼的厕所内。邓朴方从楼上坠落而腰椎部受伤，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高位截瘫。武斗结束后，邓朴方和樊立勤住在一个病房内，从此他们成为朋友。

被校文革抓捕的井冈山学生关押在“下山学习班”里，由新北大公社的王茂湘和姜同光负责监押。

井冈山 16 纵队在 4 月 26 日武斗中，李黄当胸被扎一枪，在医院治疗脱离危险后，他被送到农业大学养伤。同学去看他，他当时虽然受重伤，精神却很好，还向同学详细解释了胸外伤、什么叫气胸等。看到李黄泰然自若的样子，实在令人佩服。我们知道，60 级的李黄和黄更生两位同学在 1968 年 8 月就要毕业。按照武斗期间聂元梓校文革制定的毕业分配原则，她的追随者可以被分配到“天南海北”大城市去，但是像李黄，井冈山的学生，后来就被分配到中苏边境黑龙江中的七里沁岛上的气象站工作。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李黄参加了基干民兵，成为基干民兵的排长。七里沁岛离珍宝岛不远，1969 年，珍宝岛保卫战打响后，李黄带领民兵奔赴珍宝岛参战。他机智勇敢，在战斗中缴获一挺轻机枪，立了三等功。至今已经

时隔三十多年，后来李黄在国家气象局工作表现很好，升任国家气象局副局长。聂元梓的迫害并没有打垮李黄，李黄是真正的北大人。

大武斗开始后的政治形势对井冈山一直不利。3•29 武斗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派来制止武斗的领导人居然是聂元梓，4•26 武斗时，北京卫戍区的军代表竟然颠倒是非，公然在新北大公社广播台广播谴责井冈山挑起武斗。4•26 武斗后的一个星期里，井冈山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形势。五一纵队溃散，井冈山兵团的各个纵队的学生大量离校回家，每天都有近百人离开学校。井冈山兵团从 5000 人，没有几天就减少到 3000 人，到 6.24 武斗时减少到 800 人左右，到 7•22 架高压线时，井冈山兵团集中大部分守楼人员到 37 楼，加上留守 36、35、32、30、28 楼的人员，井冈山兵团在各楼坚守的人员总数当在 300 人左右，而那时公社武斗队估计不少于 1000 人。井冈山各楼之间人员走动经常受到两边弹弓袭击，使许多人受伤。为了保障井冈山同学的安全，井冈山开始修建防护工事。

首先把宿舍的双层床立起来排列，在每两个楼房之间排列成通道，构成了连接 28、30、32、35、36、37 楼的地面安全人行通道，供井冈山兵团的人员日常在各个楼房之间通行。

然后井冈山开始挖掘连接各楼的地下通道。当时，36 楼和 37 楼之间的地道，由 03 纵队和 16 纵队分别从 37 楼和 36 楼对着挖，而 36 楼和 35 楼之间的地道由 02 纵队负责挖，同时井冈山兵团的其他楼房也开始了挖地道的作业。

挖地道的初期非常艰苦，主要是空气不流通。一个同学下去只要挖上一筐土，就会累得气喘吁吁，这时就要换人。大概在一个星期后，03 纵队和 16 纵队的地道相遇接通了，空气这才流通，人在地道中就感到舒服了。由于我们不断地核对方向，挖通时双方的地道相互对接得非常好，高低左右都合适，接通的地道有一人多高。这样，井冈山兵团就可以秘密地在任何一个楼内集中兵力，而不会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发现。

为了保证 28 楼和 30 楼的交通，总部决定修建连接 28 与 30 楼的天桥，另外还有连接 32 与 35 楼的天桥。拆用 36 楼部分楼内吊顶木料，完全用木头造成一座天桥。天桥是由技术物理系的况明星设计的，从 28 楼四

楼的西南端直通 30 楼的东端。在走廊里把木料拼接好，一头拉一头推地把跨距超过 15 米的天桥架设在两楼之间。这座天桥一时在北大校园成了一道风景线。接着，又在 32 楼和 35 楼之间修建了另一个天桥，一座电缆吊桥。

4•26 武斗后，在一片失望情绪的影响下，在井冈山控制区里，各楼的通道里总是有扛着大包小包的同学，三五成群地离开了武斗的北大。为了防护公社武斗队的强力弹弓的射击，我们拖出宿舍里的双层床立起来，排成一列，在这些楼之间，构成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只有两个人并行的宽度，当时要离开的同学很多，使得这个逃难的队伍显得很长。每天上午王书仁和申彪都在 36 楼门前值班，每天的早上 9 点前后都会发现“虎山行”姑娘（张贴反江青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战斗队“虎山行”的一位女生）反向行进，从最靠校外的 37 楼，经过 36 楼、35 楼到 28 楼的锅炉房去打开水，准备为 37 楼的井冈山同学做饭。她两只手拿着 6 个暖瓶，光脚踏着地上的碎石，两眼平视，飞快地走过安全通道。每当“虎山行”姑娘与这个长长的逃难队伍相遇时，她总是默默地让开路，让他们先过。由于路窄，她有时要到安全通道外面去等待。面对危难的形势，“虎山行”姑娘的淡定，使我们这些男同学都不由地敬佩她。

粉碎四人帮后，蔡华江从攀枝花来北京出差，住在我这里，我问起“虎山行”姑娘，蔡华江高兴地说：“现在她可好了！”。是呀，解放了，我们井冈山兵团的“虎山行”姑娘也解放了。那时，蔡华江在攀枝花公安局做局长的秘书。

4 月 26 日到 5 月 1 日那几天。公社武斗队为了封锁井冈山，在 37 楼的东侧和西侧，都安排武斗队值班，抓捕从 37 楼出入的井冈山兵团的学生，阻止他们出来买粮买菜，许多同学被抓被打。5 月 1 日那天，16 纵队和 03 纵队一起在 37 楼门口值班，保护从海淀镇买菜买粮的同学返回 37 楼。那天公社武斗队“红四团”非常猖狂，上午他们的武斗队，十几个人全副武装，在海淀路边列队站立，显示实力，使得井冈山同学不敢从 34 楼前面路过。“红四团”作为极大地激怒了 03 纵队。5 月 2 日上午 9 点钟，我（王书仁）正在 36 楼门前值班，遇到 03 纵的齐菊生从 36 楼经过回 37 楼去，他说：今天要教训一下“红四团”。我还问他要不要支援？他说：你

们不能去，要防止他们乘机袭击 36 楼。大约一个小时后，就看到 03 纵队的两个同学扶着受伤的小白到 28 楼去疗伤。我知道：03 纵队一个纵队，自己说干就干，在齐菊生回去之后，就向“红四团”发起进攻了。尽管井冈山 03 纵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但是“红四团”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再也不敢那样猖狂了。从此以后，出门买菜的同学安全多了。

在被围困的日子里，36 楼的 16 纵队的女管家们，勤劳的宁娜，勇敢的宋燕等，她们把采购的粮食、菜、肉，藏在海淀居民的院子里，找机会再来拿。宁娜和李薇薇记得，4•26 武斗后，总部决定 16 纵队和 11 纵队驻守 36 楼，这样 16 纵队长郑胜利率领 16 纵队，11 纵队长陈某率领 11 纵队同时进驻了 36 楼。

后来，新北大公社“红十六团”的丁某某说：“王桂琴率领‘红十六团’、张全国率领‘红六团’、谢纪康率领‘红二团’（均为各团的部分人员）从新北大公社造反加入井冈山兵团后，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也出现了分裂。聂元梓校文革决定，留在公社内的‘除隐患’战斗队的成员也跟随造反的一起加入井冈山，作为校文革埋伏在井冈山的内线。地球物理系‘红十六团’就有 13 人跟随‘除隐患’战斗队加入井冈山兵团。”642 班学生申彪就是“除隐患”战斗队成员，但是，他没有对井冈山兵团隐瞒他参加了聂元梓的“除隐患”战斗队。1968 年工宣队进驻学校，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学生的形势下，因为他在“除隐患”战斗队参加过整周总理的黑材料，有思想负担，在 68 年冬天，他在颐和园昆明湖冰面行走时冰破落湖而死。（注：当时工宣队宣布死亡时，认为失足落水可能性大，王书仁认为是自杀，不知是否系里最后结论有什么变化。）

（四）6.24 武斗——公社武斗队对井冈山的物资绞杀

公社对井冈山实行了断粮、断菜，6 月 24 日。北京运输三场应井冈山总部托运，给困守在几个楼的井冈山人员送菜。为了接应运菜的卡车，中午时分井冈山部分成员向 37 楼集中。我（王书仁）遇到了 11 纵队的孔易人，他说：他要和 03 纵队一起防守东线，当时他是井冈山广播台的警卫人员。井冈山的布置是：03 纵队在东线阻击“红四团”，02 纵队在西线阻击“钢一连”，他们同时从 37 楼前的大门出动。令人惊讶的是，运菜的汽

车刚一停下，我们的人员还没有完全出动，公社武斗队就冲到了大门的附近。03 纵队奋勇出击，一下子就把东边的“红四团”压了回去，而 02 纵队虽然人很多，但是没有经过实战，面对西边的“钢一连”堵在门前，不知所措，犹豫了一阵就退回 37 楼内，使得后面的几个纵队的队伍无法出击。在西线，井冈山事先在 37 楼大门西侧的围墙上打开了一个一人宽的豁口，16 纵队和 11 纵队准备从这里出击，与正面的 02 纵队一起阻击西边的“钢一连”，但是这个口子开得太窄，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当时这个洞口用一块床板挡着，我们 16 纵队和 11 纵队的排列是，第一个人是我，第二个是 11 纵队的纵队长陈某，而后是 16 纵队和 11 纵队的全体同学。当我拉开床板打开豁口时，就发现“钢一连”已经到达豁口。我感到十分意外，但是还是冲了出去。随后，豁口就被“钢一连”的大队人马封住了。当时的情况是，在东线，03 纵队已经冲出了很远，把“红四团”压到了 37 楼和 34 楼的交界处，而在西线，02 纵队却已溃败回 37 楼内，03 纵队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之中，这时，井冈山的总部委员陈醒迈赶忙敲锣，叫喊他的 03 纵队赶快返回。03 纵队的同学回头一看，形势不妙，赶忙向后撤。慌乱中，有两个同学脚踩在碎石头上，跌倒在地。我从西边豁口冲出来后，遇到的对手就是“红十六团”的田连章，他不向我进攻，只见他下蹲，在头上不停地舞动长矛，做出各种防守动作。我很清楚，我必须冲到公路上，才能从大门返回到 37 楼。我就向着田连章大踏步前进两步，他立刻就后退了两三步。他让开之后，我就向公路猛冲，这时“钢一连”的两个人并肩前来拦击我。当时心里有点急，我立刻双臂一较劲，紧握长矛，就向他们两个人直接撞了过去。一瞬间只感到左胸前一震，手也顿了一下，知道我被对手刺中了。我上身穿着铝胸甲，所以心里不慌。我也看到那两个人跌跌撞撞地后退了好几步后，也没有站稳。这两个人也都穿着铝胸甲，同样也不怕我的长矛扎。我继续冲到了公路上，为了躲避身后的追击，又看到大卡车的另一边没有人，我就绕过了停在公路中间的解放牌大卡车，到了大门的东边，与 03 纵队相遇了。这时，一个人喊道：快救老孔！我就跟着 03 纵队一起冲向东边，刚冲出十几步，就发现有人已经背着老孔回来了。随后，我们慌乱地撤进了寨门，通过寨门门洞时，“红四

团”也跟了过来，他们把长矛从门洞侧面的缝隙中扎了进来，往里面乱戳。这时，03 纵队的杨某正和我并肩站在一起，他瞪着眼睛，拿长矛与对方对拨了几下，进行反击。而我只觉得好累，默默地看着杨某拨动长矛。这时，运菜的大卡车仍然停在 37 楼大门洞前的公路的正中间，新北大公社“钢一连”开始砸运输公司的汽车，并且用长矛刺伤了车内的司机。过一会儿，37 楼上面的强力弹弓开始射击，公社武斗队被迫撤离。回到 36 楼后，同伴看到我的头部，太阳穴处被石头擦伤了，可我却不知道，手一摸，看到手上有血，才觉得挺疼。我的看见上衣左胸前面有一个口子，我就脱下上衣，想看一下是否受伤了。我上身穿的铝胸甲被长矛扎了一个坑，并向左划了一条道子，在左胸靠近肩膀的地方，留下一个小坑。我的胸部不疼也没有上药，过几天就忘了。

6.24 运菜武斗后，许多井冈山同学问道：为什么运菜的汽车在 37 楼的前面刚一停下，我们的武斗队还没有完全出去，聂元梓的武斗队就到眼前了，为什么他们比我们还快，引起大家的疑问，是不是有人走漏了消息？一些人立刻怀疑到 28 楼，28 楼内人员来自各个系，互相并不很熟悉。还有人问：是不是总部还有内奸？甚至怀疑总部委员靳枫毅，许多人建议：以后运菜这一类的事情，就不要惊动总部，只要通知 37 楼和 36 楼两个楼的驻楼人员并去执行，以免走漏消息。后来井冈山兵团从农业大学运粮，从人民大学运变压器等行动，都是由驻守 37 楼和 36 楼的 03 纵和 16 纵两个纵队执行，一切顺利，再也没有发生泄密的问题。

5 月 1 日前后，我（王书仁）在 36 楼前值班，04 纵队的“狐狸”向我要三极管，并告诉我：在 35 楼、28 楼下挖地道时都发现了电话电缆。由于北大全校的电讯系统都由校文革控制，武斗开始后，井冈山几个楼之间以及与外界的电话通讯全部被切断，而在公社占据的地区仍使用原来的电话通讯系统通讯。为了掌控公社武斗队的动态，井冈山有人从 30 楼挖一条秘密地道，楼东南角的电话电缆接头，监听电缆连接的每一台电话。监听室里每天 24 小时有专人值守，对通话进行监听和录音，如果发现新北大公社方面重要武斗动向，马上向总部报告。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工程，从动工到执行仅有几个人知道，而井冈山广播台的机务“狐狸”就是参加这

个秘密工程的人员之一，“狐狸”把这个秘密通知了一些他认为可靠的人。

监听电话使得井冈山兵团事先了解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几乎所有的计划，为以后保障井冈山的生存起到了重要作用。公社发现“作战机密”屡屡泄漏，还在内部抓过“内奸”，直到武斗结束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所有的指挥武斗行动的电话，均被井冈山秘密监听。

工宣队进校后，井冈山兵团总部把全部监听录音交给工宣队，这些录音是后来定性校文革是“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的铁证。

通过监听电话，有一天得到情报，半夜 2 点，公社武斗队要来破坏 37 楼前面的大门洞，同时还要破坏 36 楼和 37 楼之间的安全通道。我们将信将疑，03 纵队的耿天彭说一定准确（他知道监听电话之事）。当夜 2、3 点钟，耿、魏埋伏于大门走廊内，突见冲来许多大夏天穿军棉衣、手拿消防斧的歹徒，照着床板就砍，我们三人挺着长矛（绑在撑竿跳的杆上）就一顿乱刺。这时探照灯打开，楼上的同学一起用弹弓射击，连彝的小细胳臂都拉断了弹弓橡胶带。与此同时，“钢一连”也来破坏 36 楼和 37 楼之间的通道，16 纵队从 36 楼出击。我们出动得早了一点，惊动了“钢一连”，“钢一连”有点胆怯，不等交手就退回去了。

（五）7·22～7·23 武斗——接高压电，井冈山为生存而战

为了打破聂元梓校文革的断电封锁，井冈山兵团试图从马路边上的高压输电线接电，可以预知双方又要展开一场激烈的武斗了。分析、总结以前失利的原因，想出改进措施——首先是扩建 37 楼门前的通道，37 楼前的通道越修越寬。楼的南面是学校的南墙，墙外是林荫道和人行道，总共有十几米，然后是海淀路，即 32 路公共汽车通行的马路。早已在 37 楼外面的院墙上开了一个豁口，作为寨门。为了防护公社武斗队的强力弹弓，还修建了一个通道，所以 37 楼前面的大门洞实际上是一段有顶棚的走廊。这个寨门走廊，经过了两次加宽。4•26 武斗后出于防守的考虑，这个寨门的通道宽度只能通过一个人。5.2 武斗后，加宽到 3 米宽；6.24 武斗后，又计划加宽到 5 米宽。这一次施工，从准备木料到施工，前后进行了一个月的时间，修大门的木料就近选择了马路边上高大的杨树。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砍马路边的杨树，直径有一尺左右。从 37 楼前开始，一棵一棵地砍，

很快就砍到公社武斗队占据的 40 楼附近。这时就要全副武装戒备了，砍树时带着长矛，一边砍树一边监视 40 楼的动静。一天晚上，我和哲学系 11 纵队的陈战国，我们俩到 37 楼和 40 楼之间的地方去砍树，一个人砍一棵。这时 40 楼下来两个公社武斗队员，他们俩在黑暗中嘀咕了一会儿，没有采取行动就回去了。

7 月 3 日的夜间，为了准备接电后可能出现的复杂局势，运入大批粮食作为储备。当夜，农业大学用一辆大马车悄悄地把 7000 斤粮食，两麻袋花生米，两木桶葡萄酒运到 37 楼，只有 03 纵队和 16 纵队两支队伍出动接应。这辆大马车由三匹大马拉纤，马车走起来显得很轻松。大马车刚一停下，03 纵队和 16 纵队的同学们立刻出门接应，粮食一卸到地上，大马车就安全地离开了，公社武斗队一点也没有察觉。夜间听到清脆的马蹄声，再看到粮食，心情别提有多么愉快了。当然，如果公社武斗队知道了我们的运粮食计划，我们可以改变时间和计划，如果公社不知道，我们就按照计划执行。我们变得主动了许多，因为我们可以在他们毫不知情下监听他们的电话。

6 月份的一天，首钢工人把他们支援的变压器送到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学生帮助我们把它固定到一个大平板车上，然后井冈山 16 纵队全体秘密出动，在一个中午，用大平板车把变压器运到 37 楼。井冈山总部对那天的行动做了周密的部署，预先计划大平板车在午间一点半到达 37 楼，正是公社武斗人员松懈的午休时间。我们拉着大平板车从人民大学的北校门出发，穿过苏州街，直奔海淀镇，到了海淀南大街，走海淀商业街西侧的公路，到达 32 路公共汽车的海淀站，向右拐，走海淀路的上坡路。在经过北大西南校门时，我们确实有点紧张，拉车的人加快了脚步，暗中保护的人也向西南门靠近。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书包，书包里面装着石块和石灰包，车上还藏有长矛。我们的手都伸进了书包，用手紧紧地握着书包里的石头。我们用眼睛的余光看到西南门半开着，里面似乎有人值班，但是没有人露出头来，就知道公社武斗队都在睡午觉。我们加快了脚步，迅速通过 40 楼。大平板车一到达 37 楼前，就看到兄弟的 03 纵队，全副武装出来接应我们。看到 03 纵队精悍的队伍，我们的心情也由紧张，一下子变得

轻松。17 纵队的同学接手把变压器运进 37 楼三楼中间的房间，随后室内线路的安装就开始了。由于保密得好，公社武斗队没有发现这次行动。这个变压器有一个人那么高，底座有一米见方，很重。这个变压器可以把 11000 伏特的高压电转换成 220 伏特的民用“市电”电压。

新的 37 楼大门洞完工了，在大门的门洞中一站，就可以感到全身舒服，通风敞亮，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走廊。它是我们一个月来的辛苦工作的结果，从砍树到施工，是根据我们几个月来的武斗实战经验设计的。从此以后，37 楼的门洞走廊变成了井冈山同学休闲的场所，午间有人在这里下棋、谈心。晚饭后，有井冈山同学在这里切磋武艺。

架线的计划分为室内和室外施工，在 37 楼外马路上的一个高压线电线杆上架设一个横担，在上面安装三个瓷瓶，把室内变压器的三相电接头的三根电线连接固定到高压线电线杆的三个瓷瓶上，留出一米长的电线，每根电线的头部都接有一个钩子，钩子上有一个螺丝。接线时，把三个钩子分别钩到三根高压线上，把钩子上的螺丝拧紧，接线就成功了。

首先完成了室内工程，计划用一天架设室外高压线电线杆上的横担和瓷瓶，再用一天接线，因此架线工作将进行两天。接线的具体操作由 17 纵队的纵队长郑修聪和肖正贵负责，首钢公司的专业工人对他们俩预先进行了训练，首钢公司还提供了专业工具还提供了汽油发电机和汽油，保证井冈山广播台能够在公社对井冈山断电的情况下继续广播。

我们砍倒了 37 楼公路两边的大杨树，37 楼前面马路和人行道变成了一片开阔地。在 37 楼的二、三、四楼每个窗口架设强力弹弓，用几十具强力弹弓就可以完全控制封锁下面的公路。

7 月 20 日，井冈山兵团总部准备按计划开始架线工程。当夜，井冈山的大部分人员从地道秘密集中到 37 楼，这是坚守在井冈山楼群同学的第一次大聚会。经过两个月的训练，这时的井冈山同学已经是训练有素。总部进行了点名，大约有 200 多人，人数虽然不算多，但都是共患难的战友，突然集聚在一起，大家都非常兴奋，显得士气高昂。但是，在这个时候，井冈山的一把手侯汉清产生了疑虑。因为这次武斗会和以前的武斗一样，公社武斗队从两面夹攻，我们在中间两面作战。井冈山兵团就是在这样不

利的形势下，遭到了 5·2 和 6·24 两次失败。如果这次再失败，井冈山可能就无法坚持下去了，因此，他决定撤销了这次行动。

7 月 21 日晚上，井冈山兵团总部在 28 楼开会，讨论要不要执行准备了两个月的行动。会议最终决定于 7 月 22～23 日完成准备已久的接线工程。

7 月 22 日夜间再次行动。16 纵队的陈必陶返回学校，赶来参加这次行动。36 楼进行了战前的准备，全体 16 纵队人员仅留下章亚平，率领全体女同学留守 36 楼，其他人员全部去 37 楼前线。7 月 22 日零时，井冈山广播台的汽油发电机开始转动发电，在夜深人静的时候，37 楼外的公路上空荡荡没有一个人，这时井冈山广播台开始播放冲锋号的乐曲："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在夜空中激荡。大批井冈山同学从 37 楼前宽敞的大门洞里蜂拥而出，迅速地在公路中间筑起了东、西两道防线。两道防线距离 30 米，用双层床树立排列而成，每两个双层床中间间隔一米，并在这一米的空间中架设一个强力弹弓。在防线前面的公路上，铺设了钉板，再前面 20～30 米的距离上，又在公路上均匀地撒放了一袋绿豆。37 楼的楼上，在 30 多个面对公路的窗户中，每个窗口设置了一个强力弹弓，安排了一个弹弓手，这 30 多个弹弓手注视着下面马路上的开阔地。在夜色下，在海淀路上、37 楼下面和楼上的井冈山兵团的同学都在静静等待公社武斗队的必然到来的进攻。在东线是井冈山 03 纵队和海燕兵团；在西线是 05 纵队、16 纵队等纵队，井冈山所有的其他纵队都在西线。在东西两线阻击公社武斗队进攻的同时，井冈山的广播台人员负责线架工作。实际上一个月来，井冈山要准备接高压电，这对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已经不是秘密，他们已经获得在井冈山内部安置的密探的报告，他们也进行了准备。半个小时后，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开始整队，"钢一连"在西南门准备进攻西线，"红四团"在 34 楼豁口准备进攻东线。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进攻的重点在西线。西线的"钢一连"在公路上排列成一个人字队形，中间是连长王刚，他和"钢一连"的其他人不一样，下面穿着一条带有竖条纹的短裤，上身穿着统一的黄军装，头戴钢盔，手持橘红色的长矛。这时的王刚和以往有些不同，显得过于谨慎。只见他弯着腰，撅着屁股，弯着腿，伸着脖子，一步一高抬

腿，步子迈得很小很轻。整个“钢一连”都学着王刚的样子，他们的队伍很密集，但是显得很小心。西南门距离我们的西边防线仅有 60～70 米，20 分钟后他们距离我们还有 30 米的距离，我们耐心地等待着。这时，王刚发现脚下有什么不对劲，就蹲下用手摸了一下地上，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就一招手，整个“钢一连”就一步一步地倒退回去了。在夜色下，我们仍然在监视着他们。一会儿，井冈山兵团指挥部传出命令，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回去休息，准备明天的决战。我们看到在 37 楼门前的高压电线杆上，距离高压线约莫一米的下方，刚刚架设了一个横杆，在横担上有三个瓷瓶。

7 月 23 日上午传来消息，地质地理系 61 级刘玮同学，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上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到 40 楼严刑拷打，竟被用钢鞭铁棒活活打死。井冈山的同学被公社武斗队的血腥暴行激怒。当晚在夜色下，我们看到 05 纵队的队伍，整齐而肃穆，他们手中的长矛上都系着一条白色的布条，在微风下飘逸。“哀兵”们的脸上流露出准备与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决一死战的决心！

后来得知，7 月 23 日晚上 10 点钟，公社武斗队集合完毕，“钢一连”全副武装，躺在 40 楼的地板上休息，等待晚上的战斗。校医院为他们准备了 800 个针头、300 个注射器，准备抢救武斗的受伤者。

当夜井冈山提前了行动的时间，不到 11 点钟就吹响了冲锋号角，井冈山兵团各纵队再次在 37 楼前构筑了东西两道防线，37 楼上面窗口内的强力弹弓手也严阵以待。这一次多了一件新式武器，那就是燃烧瓶。井冈山从监听到的公社的电话得知，公社武斗队要用燃烧瓶攻击井冈山的防线，井冈山也制造了燃烧瓶，准备予以还击。

井冈山兵团的防线刚一布置完成，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就来攻击了，他们的主攻方向仍然是西线，这一次他们可是有备而来，在“钢一连”队伍的前面配备了消防水龙，“钢一连”先用消防水龙冲掉公路上的绿豆，然后就向井冈山的防线冲了过来。由于消防水龙高压水柱的冲击，他们一度冲到西线防线前面，并把地上的钉板捡起向井冈山防线扔过来。这时井冈山兵团的强力弹弓一齐发射，公路上的强力弹弓对着“钢一连”的队伍平射

过去，37 楼上面的强力弹弓更是猛烈地向下射击。“钢一连”被打得阵脚大乱，仓惶逃回。公社武斗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整顿，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这一次他们发射了燃烧瓶，企图烧毁井冈山的工事。公社武斗队制造的燃烧瓶使用的是医院的葡萄糖瓶，里面灌满乙醚，瓶口带有白磷，只要一摩擦就起火。公社武斗队射过来的第一个燃烧瓶在我们的队伍中爆裂，引起一团大火，罩在火中的人吓了一跳，走出来一看，仅仅是被火燎了一下，没有受伤，显然乙醚的燃烧温度不高。随后公社武斗队射过来的燃烧瓶愈来愈多，我们也就不害怕了。有的燃烧瓶没有爆燃，没有燃烧的乙醚就在地上漫流挥发，散发的浓厚的酒气，使得不少井冈山的同学感到昏迷，有人就赶快把这些同学拉到通风的地方。

晨光熹微，一辆 32 路公共汽车（现在的 332 路）经过北大南门和 37 楼，当时的 32 路车是一辆斯柯达大客车带一辆拖车。新北大公社的东线武斗队“红四团”强迫 32 路公交车停驶，摘下拖车当作装甲车推着前进，全副武装的公社武斗队在拖车的掩护下向 37 斋逼近。可能是因为用力不均，拖车突然就地转圈，藏在车后的公社武斗队一下暴露在井冈山大弹弓的近距离射程内。被一阵弹雨打得东躲西藏。此时，井冈山同学又把绿豆撒在马路上，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一个个滑得人仰马翻，狼狈不堪。井冈山同学乘胜出击，喊声震天，勇不可档，一鼓作气把公社装备精良的武斗队赶了回去。

新北大武斗队经过两次冲锋后，受伤的人太多了，再也组织不起像样的队伍了，他们转而占领了 37 楼对面的长征食堂，长征食堂是一座 30 米长的平房。他们依托长征食堂，架设强力弹弓，向 37 楼射击。他们企图用强力弹弓击毁高压线杆上的瓷瓶，破坏架好的电线。在一场强力弹弓的对攻战中，石弹、燃烧瓶横飞。在晨曦中，井冈山的架线工程完成，井冈山的六座楼房的电灯一下子全亮了起来。井冈山兵团的业余电工们带电作业架设 11 千伏高压线，这在北京市电业系统也是史无前例的。

这一次行动，井冈山兵团从总部委员到每个同学全体上阵，李大明告诉王书仁，7 · 23 那一夜，总部委员靳枫毅早早就站在强力弹弓前，开始做准备活动，看他认真的样子，想起 6 · 24 运菜卡车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

突袭后，有些人还怀疑他是公社派的奸细，心里真不是滋味。

7 月 23 日夜间，正当 37 楼前两派武斗队激战方酣时，井冈山广播台的两个机务，在 28 楼的楼顶，向楼下的供电线路扔了几根铝管，正好搭在两根动力线上，电线短路爆起一团火花，北大宿舍区的供电中断了。这下子井冈山控制区各楼灯火通明，而校文革控制区一片漆黑。

7 月 27 日，工宣队进驻清华。7 月 28 日毛主席召见北京高校红卫兵组织“五大领袖”。在毛泽东的强力干预下，武斗结束了。井冈山兵团在 37 楼出口搭了一座牌楼，两边的对联是毛泽东手书的一句题词：“井冈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井冈山学生纷纷在门楼前摄影留念。我也凑热闹拍了一张手持《毛主席语录》的照片，而且保留至今。现在看起来，那付神气样实在是愚蠢得可笑，但是当时确实是很认真的。

（六）37 楼前的怀旧

五十年后的今天，当年激烈武斗的现场，唯有 37 楼三楼的一个窗下还依稀可见砖墙上修补过的痕迹，那是为了接高压线拆的缺口。除了武斗时期在井冈山楼房内坚守过的几百个学生，没有人会知道为什么这面窗下被修补过。我面对 37 楼伫立良久，回想当年在这里的经历。不过三十多年，红卫兵的残忍，干部、教师和学生的惨死，武斗的疯狂，早已被岁月冲洗得干干净净。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师生，有谁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武斗和游荡的文革冤魂呢？我们这一代已经成为历史，有谁想得到，当年进出这个校门的竟是顶盔带甲、手持长矛的学子？再过几十年，这些匆匆忙忙进出的年轻人也会成为历史，被后人忘却，他们今天会想到这一点吗？

附录：

（一）地球物理系 16 纵队坚守 36 楼的同学名单：

60 级：李黄；63 级：李立平，林乃国，宋燕；64 级：王书仁、秦乃岗，吴庆生，徐奋洲，申彪（施祖封），陈必陶，徐继生，刘志刚，李大明，章亚平，刘某；65 级：梁清文，缪慧思，王大鹏，刘维贺，宁娜，李薇薇，王景来，张慧英，刘从义，刘晓宁，杨靖宇。

（二）1968 年 3 月 29 日—7 月 28 日期间，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与新北大

公社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下图显示的是武斗期间，两派群众组织在学生宿舍区的割据形势示意图。

武斗时期井冈山防守形势示意图

图注：

1.井冈山兵团据点，用蓝色方框表示，包括 28、30、32、35、36、37 楼。井冈山在新北大公社的包围之中，为了出入，在 37 楼南面的校园围墙上开了一个豁口，并砍伐了几十课大杨树，构筑了一个走廊。

2.新北大公社据点，用铁锈红方框表示，这些据点，形成了对井冈山兵团的包围。而 44 楼是新北大公社的总部，在这里关押井冈山被俘同学，

在 44 楼前刺死井冈山的无线电系同学殷文杰，对生物系同学樊立勤严刑逼供，使其终身残疾。井冈山同学把 44 楼称为白公馆、渣滓洞。

3.海淀路，也是 32 路公共汽车路线，由动物园至颐和园

4. 井冈山兵团在 28 楼和 30 楼之间、在 32 楼和 35 楼之间架设的天桥，天桥架设在两个楼房的第 4 层楼之间。

5.井冈山兵团，在楼和楼之间的地下挖掘的地下通道，即地道。

6.井冈山兵团在 37 楼南面，北大南墙打开一个豁口，然后用大杨树的树干，架设通道，作为通向校外的出口。

7. 井冈山兵团在 30 楼的楼房东南墙角下，发现了校文革的电话电缆线，井冈山广播台的机务人员，安装了监听器，监听新北大公社的电话，获取了大量情报。而新北大公社一直不知道，他们一度还在自己内部抓内奸，以防泄密。监听室设在 30 楼一层东南角的房间。

8. 井冈山兵团用双层床搭建安全通道，抵御新北大公社的强力弹弓袭击，这些通道连接井冈山占据的各座楼房。

9.三角地，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地方，尽管它很小。北大学生在这里活动，发生了许多历史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

10.各场重大武斗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三）北大主要武斗的时间和地点：

1）3•29 武斗，1968 年 3 月 29 日，午夜 12 点以后，爆发于 31 楼，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手持长矛，冲进 31 楼，抓捕了 20 多名井冈山兵团同学，驱赶了住在该楼的化学系、数力系井冈山学生。还乘势夺占 29 楼。

2）4•26 武斗，4 月 26 日，中午 1 时许，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发动了攻楼，井冈山无组织的学生抢先进入 36 楼，大约领先 15 分钟，这场战事是北大发生的最为惨烈的一次搏杀，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伤者甚众。

3）5•2 武斗，5 月 2 日上午，新北大井冈山 03 纵队，主动出击，痛击 34 楼出战的新北大公社“红四团”，大挫其凶焰。

4）6•24 武斗，6 月 24 日午后，北京市汽车运输三场为井冈山兵团运菜，汽车停在 37 楼南面，井冈山卸车人员遭到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两面夹击，运菜的汽车司机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用长矛刺伤。

5) 7•22-7•23 架电线武斗，井冈山兵团为了打破新北大公社的断电，在 7 月 22 日夜间和 7 月 23 日夜间，在 37 楼前的人行道电线杆上架设高压线，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从东、西两个方向夹攻，井冈山顽强防守，架线成功，打破了新北大公社的长达 4 个月的断电封锁。

（编者注：本文原文包含未经整理的原始资料，原作者王书仁健康状况不佳，原井冈山 16 纵队负责人、地球物理系教师王桂琴委托俞小平对原文作了整理，文中的小标题为整理者所加。本文经原地球物理系 64 级校友秦乃岗审阅修订，樊能廷进一步修订图文。）

恐怖之夜，救人一命——武斗杂忆

田健行

一、最后一课

1968 年新年前后北大两派争斗表面趋缓，可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悄悄降临。

这时我们搞了一些“复课闹革命”。主要是上了几堂物化课。当时还要开德语课。可是公社的只有我一个学德语，要么参加井冈山的课，要么不上。我选择了不上。此时派性竟顽固至此，实在荒唐。

这时公社开了个“二期学习班”，我也参加了，意在听一些故事。当时讲了不少王关戚的事，又多牵扯到抗战时期山东之事，矛头暗指康生。当时康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历史证明他也不是好东西。但聂元梓和他不对劲，不过是狗咬狗。可以这样讲：聂元梓是条文革疯狗，咬了谁谁倒霉。康生、•谢富治挨了咬，•生前显赫一时，死后却被扔出八宝山。

后来这个“二期学习班”变成准备武斗班，我就不参加了。到了 3 月形势又紧张了起来。3 月 25 日下午我们在化学南楼做了个实验：蔗糖水解。做完约有 5 点。出来一看形势大变：大喇叭死命嚎叫，大字标到处都是：打倒杨余傅。这堂实验课是我受正规教育的最后一课。我永远忘不了这一课.我上了 18 年学，却只有这堂课能将时间、地点、内容记得如此清楚：我的学业竟是如此结束的！

二、3•28 下午

3 月 28 日下午形势急剧恶化。两派的大喇叭鬼哭狼嚎:•谁挑起武斗了，强烈抗议……看情况不妙，我把邮票和少量重要东西收拾了一下送到北大附中我二弟处，并要他第二天一早帮我“搬家”。回来后天已快黑了。我到 31 楼后面看了看地势，盘算了一下如果需要逃出 31 楼该如何从窗口……

吃完饭后许多同学感到大难即将来临，却又不知如何是好，静等灾难的到来。约 8 点，公社头头×××（类似情况以下都不指名）挨室告诉：井冈山要挑起大规模武斗，大家要有准备。我问：“该怎么准备？”他却答非所问，支吾了之。其实他心中大概早已有数。

三、恐怖之夜

我在大喇叭的狂吼中入睡。半夜时分突然一阵人声、铁器撞击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井冈山攻占 31 楼！”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头。我赶紧穿了衣服，•开了灯，推了推上铺的朱焘：“井冈山来了！”他毫无反应。我推开窗户上了窗台，转过身来，用手抓住窗台，伸下脚踩住一、二楼之间的突出砖棱。接着我放开手，做自由落体，用手又抓了一下砖棱，略曲腿，落地。这是事先早已计划好的。落地时我只倒退了一步，毫发未伤。这时我才想到：朱焘不能跟我这样下来，文革前他受过一次伤。同一宿舍还有曹履诚，我希望避免同学之间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

出了 31 楼，往哪里跑？我钻向学六食堂和浴室间的过道。“站住！•长矛！”一声断喝。一群身穿黄棉袄、手持长矛的武斗队抓住了我。接着铁棍、扎枪也上来了。我的头被铁棍打破流血，身上也挨了几扎枪，所幸不重。

有 4.11 经验，我以为又是“地院东方红一小撮暴徒”来了。“你是哪里的？”“我是北大的！”言外之意：你们是干什么的！来了个看样子是个头头的：“我们是公社的，别怕！”我还是不信，一言不发。估计他们也想到如果我是井冈山的该往东边 28 楼方向跑：“大概打错了人，•送 43 楼治伤。•”

我摸出身上带的学生证，里面夹着一张“二期学习班”的证件。“是自己人！”

他下令赶快将我送往 44 楼。在此之前我还未“有幸”进过这里。43 楼早已有所准备，“野战医院”大夫、•设备一应俱全。•我是这次大武斗公社方面第一个伤员，又是被“自己人”误伤的，所以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1969 年 1 月在呼和浩特遇到中文系的赵君、无线电系的陈君，他们正在讲：“公社 3•29 武斗第一个伤员是被自己人打的。”他们问我知道吗？……

四、救人一命

处置完伤，我该休息一下了，可是又怎能睡得着呢？此时天已微亮，北大校园乱成一团。两派的大喇叭死命嚎叫。于是我出了病房在楼内到处

看看。我走到一间屋前，只见屋门敞开，窗户上蒙着黑布，里面亮着个蓝灯泡，地上躺着个被打得昏迷不醒的人。这时过来个人，告诉我这是樊立勤。一句话就够了。怪不得井冈山前几天嚷嚷樊立勤被公社绑架了，果然如此，不知为什么我这时竟想到父母惨遭毒打时的情景……

正在此时只听得楼下一阵人声和棍棒声。

“打死樊立勤！”有人狂吼。我见事不好，随手抓起楼道里放着预备武斗用的一根粗约 4cm、长约两米的铁管，往小黑屋门前一堵。一群人冲了上来，被我手持铁管挡住。有人说：公社的***被井冈山抓住打得快死了。打死樊立勤为***报仇！（自己的人还没死就要打死对方的人“报仇”，什么逻辑！）

我说：“樊立勤就真是反革命，该枪毙，也要由法院判。不能随便打死人。”他们想硬冲又有所顾忌：一则与这几位相比，我可算身高体壮、棍粗力大，二则能进到这里肯定是公社的“自己人”。再加上包了一头纱布，肯定刚从“战场”下来的，像个亡命徒。他们也不敢乱来。谁知道我是被公社武斗队打伤的“逃兵”！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这时来了一个头头说：“不能打死樊立勤，要和井冈山交换俘虏。”（只有战争才会产生俘虏，两派争斗是战争？）

那伙人这才罢休。我看没事了，也就扔掉铁棍走开。

这件事我“保密”30 年。当时樊立勤反江青、聂元梓，“罪大恶极”，救了他也该罪大恶极，我当然不敢声张。后来又去和谁说！要问我当时怎么想的？

樊立勤是北京人，又比我低一级，称之为师弟亦不为过。一个并无背景的普通学生敢和“大人物”唱对台戏，•尽管见解不尽相同，也让我佩服。我不能让我父母遭到的惨祸在我眼前重演。这也是他的缘分，如果我不想出跳楼逃跑的馊主意，如果我不让武斗队抓到打伤，如果我不在 43 楼内到处看看，如果不是恰好有那么一根铁管凑手，如果我的动作稍有迟缓放过哪怕一个人到身后，他必死于乱棍之下。

我干了一件一辈子不后悔的事。30 年来想到当年闹派性之事我时时感到内疚，但有此经历我的心理也得到一些平衡。

5 月 2 日晚我和邱守鹏提到此事说：田某当年对井冈山的朋友们多有得罪，但有这件事也可将功折罪了。我已年过半百，但如此使粗动武就这么一次——“该出手时就出手”！

后来双方交换“俘虏”之后，井冈山的大喇叭讲樊立勤如何英勇不屈，造反精神如何强，•听了后我偷着乐：•你们可不知道“公社”中有人暗中相救呢！

3•29 之夜我的奇特经历使我认识了聂元梓之辈的真实面目：武斗蓄谋已久、残暴已极！我为什么不造反上山？公社有我几个好朋友，我不能背叛、出卖他们。我素重义气，那时感情上还不可能转过这个弯来。而且我又早已无家可归，“造反”？我上哪去住？只好老实待着吧。

五、奇迹出现

大学后期，特别是文革开始后，我得了相当严重的痔疮，有时里面穿着绒裤，血要透到外面。这是一个相当讨厌、不易治好的病。3•29 以后我几乎再也没有犯这个病。69 年春天我才注意到这一变化：当时尽管生活条件发生巨大改变，这个毛病不知怎么消失了。后来我看医书讲到在背部某个穴位如何处理可以治这个病。我这才明白是 3•29 之夜被刺伤时恰好刺中特殊部位，治好了我的痔疮，因祸得福。

六、穷途末路

百年校庆，•我们特意看望了当年的课堂化学楼 101 教室。我想起当年最后一次到这里见到的一幕丑剧。•离校前不久，1968 年 7 月初我最后一次到这里：听孙蓬一讲话。孙蓬一讲了一通武斗“形势”后丧心病狂地提出：“化学系要为武斗作出特殊贡献”。对此人们无不嗤之以鼻。不管见解如何，绝大多数人良知尚在，不会给他制造他想要的东西。那玩艺儿可不是几个狂徒靠胳膊粗、力气大能制造出来的，那是知识型的。

六、后记

百年校庆我们重聚一堂，自有许多故事要讲。当我们来到 31 楼后面时，有同学提起我 3•29“跳楼”之事，我大略地讲了怎么下来的。其实不管哪边的，此前谁也不知道我那天的奇遇。那个荒唐年代稀奇古怪的事就是多。田某一介书生竟如此胆大妄为，也只有在那时。这种文章是不可能

发表的，仅立此存照，大家看过一笑。但愿今后世上不会再有这种奇闻逸事的。

北大文革两派武斗起讫

樊能廷

文化大革命中，北大两派对立，口水战、大字报战、标语战、广播战，后来就操戈“武斗”了。提起北大“两派武斗”，作为过来人，我至今以为不确。势均力敌叫作武斗，哪怕双拳不敌四手，也算武斗。我作为井冈山兵团成员，从头到尾，满眼看见的，回回都是井冈山兵团挨打，既无招架之功，绝乏还手之能，这算哪门子“武斗”呀?

我按照《北京大学纪事》（2008 版）的时间顺序，把它用到“武斗”一词的记载和我的手头既有的言及北大两派武斗的资料捋一下，有助于对这场武斗的概貌有所了解。

《北京大学纪事》1966 年 6 月～1968 年 8 月出现“武斗”一词的记载和笔者的说明

1966 年 12 月 27 日，上海康平路——

留沪继续造反的孙蓬一与华东师大的一些人组织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进驻上海市委，参与了上海第一次大武斗——康平路事件。

笔者说明：这是北大校文革要员孙蓬一率众到上海武斗打开造反局面。

1967 年 4 月 8 日，民族文化宫——

“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和“新北大公社”在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

笔者说明：这是校文革的外战。双方的手都伸得够长，争权夺利，互不相让。

1967 年 4 月 12 日，北大——

晚，谢富治、傅崇碧派代表到北大，通过广播传达经中央文革批准的《紧急通知》。《通知》说：“地质、师大、清华等学校的同学同北大的争论，要在‘红代会’上解决，不能发动人到北大去。11 日夜间和 12 日下午的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希望现在去新北大的同学，一律回自己的学校”。

笔者说明：这是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遭天地两派围攻。

1967 年 7 月 28 日，北大——

《新北大》刊登江青接见河南代表团的讲话。江青说：“我们不能太天

真烂漫。当一小撮人挑起武斗，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革命小将们，你们要吃亏的。”

1967 年 8 月 15 日，温州——

原“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清在温州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

笔者说明：“北大井冈山兵团”于 8 月 17 日成立。《纪事》所说“原井冈山公社”是 1967 年初被聂元梓校文革摧毁掉的一个小战斗组。王建新在温州殒命疆场，不可能参加 8 月 17 日成立的“北大井冈山兵团”了。

1967 年 8 月 19 日，汉中分校——

高云鹏在汉中 653 分校参与汉中地区造反派组织的活动，支持抄砸当地公安处，插手武斗。今日发生炸毁（汉中运输公司）大楼的“八一九”事件，造成 29 人死亡，30 余人受伤。

笔者说明：近年有人为高云鹏辩，说此条记载不实，他只是被审查，但并没有因此被判刑。

1967 年 12 月 14 日，北大——

“新北大公社”总部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通告》。《通告》称：“你们胆敢把武斗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将进行自卫性还击”。

1968 年 3 月 25 日，北大——

“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聚集北大，进行反聂、孙游行，并发生武斗。

笔者说明：这场武斗是否持械，没有写明。姑且认为是推推搡搡、杂以拳脚吧。

1968 年 3 月 26 日，北大——

“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西、南校门闯进北大，与“新北大公社”发生武斗。

笔者说明：还是记录不详，但不管这场武斗是否械斗或者拳脚斗殴，也肯定与北大井冈山无关。

1968 年 3 月 28 日，北大——

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高云鹏等策划，聂元梓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双方发生武斗。高云鹏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笔者说明：《纪事》有误——28日晚间，在临湖轩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决策会议上，千锤打锣、一锤定音，聂元梓拍板，发起武斗。艾群在《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一文中说，艾群亲自从司法机关的讯问笔录查得聂元梓发令：“打，你们要打，就打吧！”《纪事》记载高云鹏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应该是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顺利攻占31斋以后，而不是在北大尚未发生武斗的3月28日。

1968年3月29日，北大——

凌晨1时，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双方100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严重损失。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赶到武斗现场，发表广播讲话，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要求两派各派五名代表“由校文革、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李钟奇说：“我今天到现场制止武斗时，有人拿匕首刺伤了聂元梓”，要求全校动员“把凶手抓起来”。

“井冈山兵团”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当日上午11时，李钟奇作第二次广播讲话，再次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双方退出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他并宣布：为制止武斗，组织调查组调查。

晚，两派代表开会。谢富治、温玉成（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参加。谢富治讲话说：“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并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二）井冈山等组织立即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四）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会上，谢富治批评“井冈山兵团”斗争聂元梓，说：“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

当日，校文革发出抓捕凶杀犯的《通缉令》。

笔者说明：笔者是住在 31 斋 119 室的化学系 63 级学生，夤夜被武装齐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从楼内赶出去，仅以身免。对于北大“三二九”事件，在网刊《昨天》第 62 期《北大“刺聂”真相》的署名文章中有详尽叙述。经过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策划，夜阑人静时，猝然而发，偷袭手无寸铁的对立派学生，胜之不武！再说，此事件定性为“武斗”也不准确。拥聂武装力量，突袭 31 斋赤手空拳的无辜学生青年，进行非人道的屠戮、戕害和施暴，攻占楼宇，这能叫做“武斗”吗？当晚，国务院副总理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北大，批评两派之间发生的武斗行为。谢富治说：“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谢富治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说：“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二、井冈山等组织立即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四、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兵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这就是北大文革中著名的、完全偏袒聂元梓校文革的“谢副总理四点指示”，简称“四点指示”。井冈山兵团被打惨了，谢富治明打明地护着聂元梓校文革，井冈山兵团有冤无处诉。

1968 年 3 月 30 日，北大——

《新北大》刊登《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罪该万死》的文章。

笔者说明：这是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贼喊捉贼”的惯技。

1968 年 4 月 1 日，北大——

驻校解放军代表传达温玉成两点指示：（一）两派广播台坚决停止播发有关引起双方群众对立情绪内容的稿件；（二）严格禁止制造和向校内运送武斗工具。违者，以挑动武斗论处。

1968 年 4 月 5 日，北大——

“井冈山兵团”发表《第二号动员令》，说“聂元梓到武斗现场”，“被两派革命群众包围，被人刺伤”。

1968 年 4 月 11 日，北大——

北京市革委会、市公安局军管会、校文革组成的“制止北大武斗监督

检查小组”负责人作《关于揪出反革命凶杀犯及其后台的广播动员》讲话，说“井冈山兵团”至今不交出凶手和后台，“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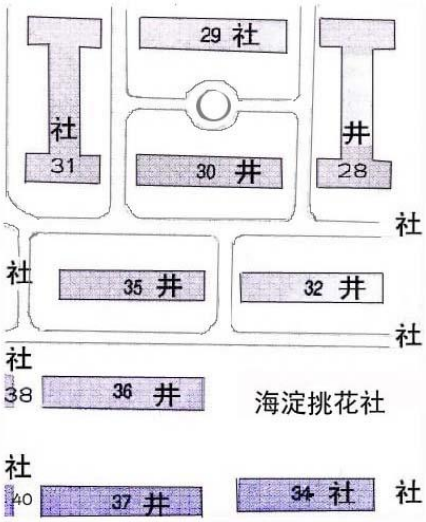
1968 年 4 月 19 日，生物小楼——

“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

笔者说明：温家驹是外面的中学生（地院附中），竟被没人性的公社武斗队活活打死，至今真相不见天日。校文革负责人孙蓬一居然大包大揽，以为人命关天的罪行能够一手遮天、含混过去。纵容杀人，丧尽天良，仅此一条，判他十年徒刑，并不为过。

1968 年 4 月 25 日，北大 36 楼——

“井冈山兵团”总部派武斗人员驱赶住在 36 楼的“新北大公社”的成员，占据了 36 楼。



北大1968年120昼夜武斗分界图

笔者说明：笔者和化学系“三·二九”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赶出 31 斋的同学们一起，无家可归、无亲可投，留守 37 斋。没有参加、也不知道“四二五”夺占 36 斋女生宿舍楼的行动。后来听说，大白天的，没有发生暴力行为，几个对立派女生们是给吓跑的。井冈山兵团从“三·二九”挨打，到“七二八”为止，总部始终没有组织武斗队。自发留守各楼的同学，一片散漫。谁要是锯了暖气管，磨出个尖儿，拿在手上，大概就成为《纪事》所说的“武斗人员”啦。理胜的网络文章，直呼井冈山兵团“丐帮”，很传神。

1968 年 4 月 26 日，北大 36 楼——

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36楼，双方发生第二次大武斗。孙蓬一、高云鹏亲到现场指挥。这次武斗造成双方二百余人受伤，损失大量公私财产。此后，聂、孙又下令攻占了25、27、17、18、19、20、21、22、23和24等楼群，形成了对占据28、37、36等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了以黄树田为总指挥的“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以宫香政为总指挥的“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其打垮。

（上图：北大两派所占各楼示意图。图中“社”指新北大公社，“井”指井冈山兵团。

笔者说明：井冈山兵团“四二五”夺占两派混住的36斋女生宿舍楼，把孤悬的37斋与35斋连成一线。“四二六”发生的战事，是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想从井冈山兵团手中攻取36斋，再度拦腰切断“割据区”，井冈山兵团固守36斋，从头到尾，完全是守势。新北大公社从平地仰攻，虽有孙蓬一、高云鹏亲临现场指挥、鼓劲，终于被孤立无援的“丐帮”守楼人员依仗地利，危楼砹硪、居高临下，用砖头、石块奋力击退。笔者说“孤立无援”，是说井冈山兵团头一天刚刚拿下36斋，与北边35斋、南边37斋，还没来得及用木床架设地面上的安全通道（古称“砦栅”）。次日36斋被新北大公社顶盔掼甲黄军袄的强兵，铁桶般团团围困，水泄不通。35和37南北两座楼的“丐帮”想帮忙，绝对没有能力杀透重围进入36斋去增援。这一仗，我们化学系37斋守楼人员，干瞪眼看着，无以援手，只能隔空呐喊助威。

1968年4月27日，44楼附近——

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时年24岁。

笔者说明：手无寸铁的路人殷文杰身上被长矛捅了39个血窟窿。昔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后来也说：“文革中杀害三名无辜青年，是我所在的组织‘新北大公社’最丑陋的一面。”

1968年6月24日，海淀路——

北京运输三场给困守在28楼的“井冈山兵团”人员送菜，高云鹏令武斗队员从东西两面包抄，双方发生一场武斗，砸坏了汽车，打伤了三场司

机。

笔者说明：战事发生在海淀路上。位于三义庙的北京汽车运输三场，给困守一隅的“井冈山兵团”人员送菜。不是送到《纪事》所述 28 斋，而是送到 37 斋南面（北大南墙）虎皮墙豁口外边的马路边。“井冈山兵团”组织守楼人员尽快卸车，把粮食蔬菜从马路边的卡车上，弄进 37 斋。本来是解决留守人员吃饭问题，没想到，餬口吃饭都不许，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霸气十足，两面包抄，打上门来。“井冈山兵团”把食物急忙搬运进楼，又被新北大公社打伤了七八个人。拖累北京汽车运输三场的司机和汽车，倒了血霉。这件事，惹恼了住在附近的海淀镇居民，等到“七二二”接电之战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暗夜中，老百姓们向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投掷砖头、瓦块，为井冈山兵团打助拳。这一天，我们年级做饭的两个女同学，为运粮受伤的同学伤心落泪。笔者小诗感叹：遭逢文革国贼猖，零落无依忿残戕。三十七斋山寨里，文芝张俭作厨娘。

《文革博物馆通讯》402 期，北大化学系 1962 级学生张曼平《我所见证的 1968 年北大武斗》中对此事回忆说：“由于楼友购粮菜经常被歹徒抢，总部就决定为大家集体运一次肉品和蔬菜，为防意外派些人员保护，这天是 1968 年 6 月 24 日。03 纵有 10 人参加，我年级有耿，顺和我，化二王（与许同为‘秋收起义’成员）等，当卡车开过来正卸菜之际，众多公社兵分别从中关村门及 40 楼门沿马路冲出，03 纵和海燕纵队把东边的公社武斗人员顶回去了，不想防范西面的 02 纵却溃败了，两面夹击把我们包围在中间，只好夺路而逃，眼看着王被十几个人扎倒，他的柳条帽被一家伙用长矛扎住挑在肩上，就像挑着一颗人头！卡车司机也被扎成重伤（他们还有人性吗？）。王头和腿上身中 17 枪，万幸的是他护甲下面加了一副挡板，保护肚子免遭十几矛，他受伤后发起高烧，我每天喂他炼乳，管家则给他做些流食（他们人少，平常和我们一起吃饭）。当天大家吃着抢运回的食品做成的土豆炖肉，都流下眼泪。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来回炉北大化学系并考上研究生，成为年级的党支书。”

1968 年 7 月 20 日，北大 40 楼——

地质地理系 61 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 40 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打死。时年 24 岁。

笔者说明：刘玮是天津人，结结实实的小伙子。毕业了，从天津来北大办离校手

续。穿着圆领汗衫、西装短裤，在海淀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绑架，活活打死。笔者在37斋楼里听到的说法是，用胶皮裹着的铁棍，四个人轮番打，打到死为止。救了吗？什么样的仇恨？谁给杀人狂们这么大的胆子？笔者刚好有一张刘玮的一寸照片，英气勃勃，贴在这里，祭奠他四十八年前的冤魂。（左图：刘玮遗像。）

1968年7月22日，海淀路——

校文革决定对“井冈山兵团”占据的楼房断电、断水后，“井冈山兵团”即计划从37楼南墙外的高压电线上带电作业往楼内架接电源。为着接电与反接电，两派于今天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用长矛相互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群众伤残，并造成马路堵塞，332路公共汽车停驶。

笔者说明：此夜，战事发生在海淀路，新北大公社进攻，井冈山兵团防守、保护11千伏带电作业，为“割据区”接电。《纪事》没搞明白，是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单方面“扔了许多自制燃烧瓶”。井冈山兵团在木床“砦栅”之外，向地面上撒了豆子，还真滑倒一些公社勇士，减缓其攻势。《文革博物馆通讯》402期，张曼平《我所见证的1968年北大武斗》中回忆：“7月中旬，井冈山控制的6个楼：28、30、32、35、36、37楼被公社指使电工班强行断电，楼内失去照明，广播台也失声。更要命的是这时守楼的井冈山人只有靠电炉做饭，没有电意味着我们只能断炊。所以总部决定从地院借来变压器，从37楼外马路路灯杆上的11千伏高压线接高压电变成220伏通入37楼内。这个行动被公社探知，动用武斗队到接电现场破坏我们的行动，所以我方作了保护措施，安排人保卫接电的电工。连连征战，看到许多同学受伤，心态十分厌倦，在楼道等着出发前，彭对我说，打完这仗回家吧，我说好吧。他随手抄起两本《资本论》放入护甲下，‘让马克思保佑我吧’就跑到马路上。外校同学理胜写的北大武斗纪实基本准确。只是那辆带拖车的32路车是被化三小白毛拦下的，他用一手电蒙上红布，像李玉和一样晃动，司机看到摘下拖车调头而去，这样我们才能在马路上架起两道木床墙，后来这拖车便成了公社的坦克，不幸的是推过来被倒了的木床打住眼，坦克兵都惨了。那天他们还用了燃烧弹，很吓人。我们受伤不多，不过我

却挂了最重一次彩：右眉骨中了一矛，血流不少，管家不在，风为我包扎的，多谢。当电灯重明时，大家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1968 年 7 月 28 日，人民大会堂——

凌晨 3 时半至 8 时半，毛主席召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聂元梓、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质学院）等五人。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

当日，校文革发了一个《立即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斗工具，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

笔者说明：1968 年 7 月 28 日是星期日。**困守在临街的 37 斋，重重武力包围之中，只知寒暑不知日，农历应该是“大暑”吧。当然不知道“校文革发了一个假装善人的《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

1968 年 7 月 29 日，北大——

“新北大公社”写了《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封信》，表示欢迎宣传队到北大来，帮助、监督他们落实“七三”布告，“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上交一切武斗工具，无条件地制止一切武斗”。

1968 年 8 月 20 日，北大——

晚 8 点至凌晨零点 30 分，驻北大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召开两派代表谈判会，达成了第一号协议：（一）上交武器，拆除武斗工事；（二）对宣传队不应耍两面三刀；（三）宣传队接管全校广播台；（四）解决释放被抓人员问题；（五）互相停止攻击等。

同日，“新北大公社”开始向宣传队上缴武斗工具。

1968 年 8 月 21 日，北大——

晨，“井冈山兵团”交出武器。晚，宣传队有关人员与聂元梓及校文革的全体常委（包括分裂出去的）作第一次接触。宣传队向聂元梓、校文革提出三个质询的问题，要求解答。如：为什么“井冈山”不承认校文革，校文革采取了什么态度？校文革支持武斗，提供武斗方便，要不要承担武斗所造成的损失的责任等。接着校文革做出四项决定：（一）主动到“井冈山”住区帮助拆除武斗工事；（二）把未领的工资给“井冈山”人送去并检查错误；（三）聂元梓接受批判；（四）给“井冈山”人解决吃饭问题；以

后政治、经济、生活上一律平等。

笔者说明：由《北京大学纪事》以上记载可知，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之前，北大校内两派没有真正称得上“武斗”的冲突。

一些亲历者的回忆

一、外校学生沈致襄说

（见本书中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一个校外人员见证的北大武斗）

1968 年 3 月 28 号后半夜，拿到“老佛爷”手谕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睡梦中的井冈山一派的师生发起突然袭击，甚至连女宿舍楼都未能幸免。很多人仅穿着内衣裤逃出宿舍，个人多年的积蓄丧失殆尽。“新北大公社”战士每占领一座楼，立刻将书籍财物瓜分一空。“井冈山兵团”师生被迫奋起还击，保住了 28、36 等 6 座宿舍楼，打退了武斗队的轮番进攻，使聂元梓把“井冈山兵团”赶出校园的阴谋未能得逞。在这之前，北京高校两派还只是在观点立场上互相攻击，顶多是辩论激烈时相互推打几下，从未出现过动用刀枪的大规模武斗。北大 3·28 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从此以后，各大学武斗迅速升级，清华、北外、京工、人大等校都出现了以武力把对立派赶出校区的现象，同窗之谊竟成为兵戎相见的生死仇敌。武斗中杀死对方学生的事件已不再是新闻了。武斗杀人，北大又一次走在北京高校的前面。井冈山一派占据的六座楼只有 37 斋（文革后改称楼）紧靠马路，校园围墙已被 3.28 晚上夺路而逃的学生推倒，是唯一进出校园的通道。然而，各楼之间的通行被新北大武斗队封锁，他们用整条自行车内胎做的大弹弓袭击行人，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井冈山派把学生宿舍的双层床排列起来，形成一条封闭走廊，方保证了楼间的行人安全。

“老佛爷”聂元梓一心要置反对派于死地而后快，一计不成，又企图以停水断电将“井冈山兵团”逼出北大。3·29 以后，绝大多数井冈山一派的师生因无家可归而离开北大，只有那些决心与聂元梓拼个鱼死网破的中坚份子留了下来。他们无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战。为了生存，他们试图从马路边高压电网接电入 37 楼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武斗。“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一色儿的矿工头盔，铁网面罩，薄钢板盔甲，两米长的无缝

钢管扎枪，列队出战时，威风不减当年古罗马武士。反观井冈山队伍，头带白柳条帽，甚至棉帽子外面套个硬纸盒，手持七长八短的水管做的扎枪，盔甲则是用布缝在一起的几层洋铁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如当年丐邦聚会，连他们自己看了都觉好笑。然而，就这么几百人，被数千人封锁围困，停水断电，绝粮断炊，居然寸土未失，坚守达四个月之久，直到 8 月 19 日工军宣队进校。

二、北大中文系 1964 级学生薄亚达说

（载《文革博物馆通讯》594 期薄亚达《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北大终于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的武斗。

经聂元梓、孙蓬一拍板决定，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于 2 时左右，派遣了数百名武斗人员，手拿长矛，头戴柳条帽，突然包围并占领了两派共同居住的 31 楼学生宿舍，将“井冈山”成员全部撵出楼内。他们用长矛刺伤了许多“井冈山”学生，并迫使一些人从二、三楼窗口跳下。事态发生后，井冈山兵团总部仓皇应战，因未有准备，而造成了更多人受伤。武斗坚持了 4 个多小时，双方约有 100 多人受伤。最后，公社一方攻占了 31 楼，武斗指挥者得意地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三、北大历史系 1963 级学生戈辰说

（《北大“文革”与文革风云回忆反思——兼评蒯大富回忆》）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做了充分准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住在 31 斋的井冈山兵团“零派”“03 纵队”的学生发起突然袭击，逐层、逐屋地驱赶殴打井冈山派学生，占领了 31 斋。这是北大长达四个月武斗的开始。

四、清华大学工化系 1963 级学生蒯大富说

“北大 3 月 29 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

五、北大化学系 1962 级学生耿天彭说

（《亲历北京大学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发动武斗——1968.3·29 被逼跳楼的那一幕》）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大校文革发动有

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把睡梦中的住在 31 斋的化学系井冈山派同学全部驱逐出楼，以此开始了 3·29～7·27 长达 4 个月的北大武斗。

六、北大技术物理系 1963 级学生顾仁虎说

（《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

1968 年 3 月 29 日到 7 月 28 日，北大校园内发生了它百年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大规模武斗。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我一直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至今，时间已过去三十五年，我虽不能保证我的回忆丝毫无误，但自信基本符合原貌。

3 月 28 日晚，我正好在我们这一派（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的总部 28 楼值班，一起值班的还有同班的程汉良，他在不久前被吸收进总部领导班子。值班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安全保卫，就是把好门；二是如果发生什么特殊情况、立即通知和召集总部成员。上半夜很平静，原本吵吵闹闹的两派的高音喇叭已停止广播，整个校园都已沉入梦乡。北京的三月末，还留着冬天的尾巴。我披着值班御寒用的棉大衣，正迷迷糊糊打瞌睡。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我习惯性地扫了一眼时钟，已是 29 日凌晨 1 时 15 分。这么晚有什么事？我从二楼下去，只见楼道里跑来两三个只穿衬衣裤的男生，头上、手上在流血，带着哭嗓对我们说，新北大公社的一伙人冲进 31 楼，个个手持棍棒，正在毒打井冈山的战士，他们是跳窗逃出来的。我闻听如五雷轰顶，一时竟不敢相信眼前这血淋淋的现实。这时，程汉良从总部房里出来，他已知道发生的事情，让我和他出去看看情况。我们出 28 楼，往西来到 30 楼南面的马路上，只见从 31 楼西面跑步过来一支队伍。在路灯光线下，可以看出个个身穿黄色军棉袄，臂上系条白毛巾，手里拿着棍子，把 31 楼团团围住。在这支队伍里，还有我们系同年级核物理专业新北大公社的人。从 31 楼内，传出乒乒乓乓的打击声、哭骂声。这时，我们已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一只罪恶的手，已揭开一场血淋淋武斗的序幕。

七、李竟然说

（《北大文革武斗纪实》）

1968 年 3 月 26 日，地质学院红卫兵几百人手持木棍，从北大东、西、南校门闯进，再一次与聂元梓所统领的红卫兵发生武斗。此时，由于聂元梓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还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江青得知后，即在第二天召开的首都 10 万人大会上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护她。"

这样，聂元梓便拥有了一天喘息的机会。于是，她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谋划着一个更大的计划。3 月 28 日，经"校文革"文攻武卫指挥部高云鹏策划，聂元梓最后敲定：新北大公社即日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 31 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赶走。事后，高云鹏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29 日凌晨 1 时，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致使双方受伤一百多人。

八、北大历史系 1964 级学生司徒文说

（《文史精华》2009 年第 7 期《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3 月 29 日凌晨，38 楼的同学们正在熟睡，忽然寝室楼道里有人急喊：井冈山的人血洗了 31 楼，正准备攻占校医院，大家赶快起床，击退井冈山的进攻！我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地跟着人们一溜小跑，来到燕南园南边西头，站在这条路去往校医院的路口。不一会儿，就仿佛看见有人从东边向这里走，这时带队的就喊：快，扔石头，把他们打回去！我们就趁黑摸着不知道是早就准备好的还是另外有人当即运来的砖头块，向对方人群扔去。我扔了两下，觉得胳膊就不行了，而且对方也再没有人向这里走了。这边人们好像也有人撤走了，我就也悄悄地一个人溜回寝室。这就是我在北大参加的惟一一次武斗的经历。

当天晚上，同宿舍参加井冈山的一个同学也出去了，晚些时候才回来。第二天人们议论昨天的武斗，就听他嘟囔了一句：还不知道谁血洗谁呢。

后来才知道，3 月 28 日是星期日。新北大公社早有预谋，要从 31 楼化学系井冈山的同学开刀。因为这里住着井冈山的主力与骨干 0363（化学系 63 级），31 楼还是个战略要地。公社的孙蓬一布置这一行动时说：化学系的同学要做出些牺牲！据后来了解，为了避免出现同班同学互相残杀，

高云鹏这位武斗总指挥也避了点儿嫌：攻打 31 楼的武斗队人员是从 09 系招募的，怕他们不了解 31 楼的住宿详情，事前在有井冈山同学居住的房间都做好了记号。

29 日深夜 1 点整，公社武斗人员全副武装实行突袭，把 31 楼洗劫一空，遇到公社的同学也不亮明身份，只是往外撵。假如是井冈山的，就会被打伤。一些公社的同学不明真相，稀里糊涂往外走，被公社武斗人员撞见，没来得及说明身份，也被扎伤了。许多同学从睡梦中惊醒，怕挨打，迷迷瞪瞪急急忙忙向外逃，什么都没带。更有甚者，见来者不善，就从二楼甚至三楼往下跳，摔伤者甚多。加上被打伤的，共有 100 多人，个人物品、公共财产都蒙受了重大损失。

九、北大化学系 1962 级学生田建行说

《武斗杂忆》

我在大喇叭的狂吼中入睡。半夜时分突然一阵人声、铁器撞击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井冈山攻占 31 楼！”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头。我赶紧穿了衣服，开了灯，推了推上铺的朱焘：“井冈山来了！”他毫无反应。我推开窗户上了窗台，转过身来，用手抓住窗台，伸下脚踩住一、二楼之间的突出砖棱。接着我放开手，做自由落体，用手又抓了一下砖棱，略屈腿，落地。这是事先早已计划好的。落地时我只倒退了一步，毫发未伤。这时我才想到：朱焘不能跟我这样下来，文革前他受过一次伤。同一宿舍还有曹履诚，我希望避免同学之间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出了 31 楼，往哪里跑？我钻向学六食堂和浴室间的过道。“站住！长矛！”一声断喝。一群身穿黄棉袄、手持长矛的武斗队抓住了我。接着铁棍、扎枪也上来了。我的头被铁棍打破流血，身上也挨了几扎枪，所幸不重。有 4 · 11 经验，我以为又是“地院东方红一小撮暴徒”来了。“你是哪里的？”“我是北大的！”言外之意：你们是干什么的！来了个看样子是个头头的：“我们是公社的，别怕！”我还是不信，一言不发。估计他们也想到如果我是井冈山的该往东边 28 楼方向跑：“大概打错了人，送 43 楼治伤。”我摸出身上带的学生证，里面夹着一张“二期学习班”的证件。“是自己人！”于是他下令赶快将我送往 43 楼。在此之前我还未“有幸”进过这里。43 楼早已有所

准备，“野战医院”、大夫、设备一应俱全。我是这次大武斗公社方面第一个伤员，又是被“自己人”误伤的，所以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1969 年 1 月在呼和浩特遇到中文系的赵昌平、无线电系的陈文华时他们正在讲：“公社 3·29 武斗第一个伤员是被自己人打的。”他们问我知道吗？……

十、北大化学系 1963 级学生李橦说

（《北大文革武斗回忆》）

聂元梓和她的主要助手孙蓬一动用了一切组织的、宣传的、财政的力量，想把井冈山面置于死地，摧毁砸烂，可就是不能随心所愿。到了 68 年初，武斗的烽火已经燃遍全国，北京是皇城根下，表面还算平静，只有些零星摩擦。聂孙在文革中炮轰校党委带了头，炮轰邓小平带了头，这一次又要带头，酝酿大动作，开启北京高校武斗的先河。他们成立了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由爱将高云鹏任总指挥……来个先下手为强，打散、赶走、压垮对立派，毕其功于一役。方法是不宣而战，调动重兵，秘密偷袭，学习日本皇军轰炸珍珠港。目标锁定 31 楼，这里住着井冈山的铁杆和骨干化学系纵队。

68 年 3 月 28 日是星期日，校园里两派的大喇叭已经响了一天，互相指责夹杂着谩骂，方圆几里都不堪其扰。总算安静了。我和井冈山的战友们可没像当年美国大兵那样狂欢，照常聊聊天，洗洗睡，进入了梦乡，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策划的行动，动手的时间定在凌晨一点。突然“咚咚咚”急促的砸门声把我惊醒，心蹦蹦乱跳，打开一条门缝，楼道灯火通明，两头各竖起了床铺挡住去路，有几个身穿黄衣服，头戴柳条帽，手持红缨枪的人在把守，还有几个在挨户砸门。是新北大公社的人，他们攻楼了！我知道大事不好，赶紧把门锁上，和同室一起，拉床顶住门，穿上裤子衣服，夺窗而逃。我们住的是一楼，不费力气，就跑出了 31 楼。

后来才知道，执行这次行动的是新北大公社西语系战士，编号红九团。化学系的红三团那天晚上早已经“悄悄的出楼打枪的不要”了，只有少数内应，负责在井冈山同学宿舍作记号，以供挨门逐户清理。一般人会以为学英语的都是喝过洋奶，清秀文雅，红九团的战士可不这样，不大写文章，

特别骁勇善战，专门打硬仗，有个“钢一连”，一群亡命徒，是校文革的铁拳头，小规模抡胳膊动腿的事总是冲锋在前……

十一、刘之忻说

（《真实的北大文革，北大开武斗杀人之风》）

在北大，聂元梓的独断专横一直令诸多师生敢怒不敢言，反抗集团日益壮大，最终成立了“井冈山兵团”，与“新北大公社”形成对立局势。两派之间一直有着明争暗斗，而重重矛盾的积累终于在 1968 年 3 月 28 日爆发了出来。28 日后半夜，“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突袭“井冈山兵团”，试图将后者彻底赶出北大。后者几百人被前者几千人包围在 28 楼、36 楼等六座宿舍楼里，“停水断电，绝粮断炊”，前后持续时间长达四个月，直至 7 月底 8341 军宣队进校。而武斗所使用的武器也是花样百出，有自行车内胎做的大弹弓、两米长的无缝钢管扎枪、甚至还有硬纸皮做的白柳条帽。

也就是这场武斗，第一次开了杀人之风。

十二、北大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说

孙蓬一检查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许多错误，例如，对待孔繁、杨克明处理中的错误；对“井”、“红”处理中的错误；对待井冈山兵团的错误等等。对北大的武斗，他在检查中这样说：

我们不是团结两派群众共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阶级敌人，而是站在一派一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三月二十八日，如果我们顾全大局不去攻占三十一楼，北大这场大规模武斗是不至于发生的。4•26 武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也正是我这种错误指导思想所造成的恶果，我负有直接责任。是我从一派利益出发，图报复，不顾大局，决定去夺 36 楼的。结果使阶级弟兄互相残杀，许多同志无辜地流血受伤！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殷文杰同志的被刺死！4.27 殷文杰同志的死和我 4•26 的错误有密切关系。正因为我的错误决定，造成双方很多人受伤，当时，公社方面伤的较多，这就更使报复的情绪增加，导致了这样一起惨痛事件的发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直接犯下这一错误的同志，当然应牢记这一血的教训，不过，主要责任在我而不在他们。刘玮同志的被打死，我也是负有责任的。我请求给

我以应得的处分！

十三、北大物理系 1960 级学生胡宗式说

（网刊《记忆》114 期《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

殷文杰是北大无线电系 62 级学生，北大井冈山兵团 15 纵“过大江战斗队”成员，1968 年 4 月 27 日遇刺身亡。他的死完全是无辜的，是非常不幸的。

从 1968 年 3 月 29 日开始，北大校内的两派开始武斗……27 日上午 10 点左右，殷文杰从他住的 42 楼出来（当时一些楼仍然是两派混住）从南向北走。当他经过新北大公社总部所在的 44 楼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他是‘过大江’的！”（“过大江战斗队”是对立派比较有名的战斗队）新北大公社钢一连的杨恭谦和高玉堂（当时我不认识他们，名字是后来知道的），此时正拿着长矛在 44 楼门口，听到喊声，他们便拿着长矛跑上去拦住殷文杰，殷文杰转身向后跑。”“这时一人（可能是杨恭谦）上来用长矛刺殷文杰，接着另一人也上去刺。……殷文杰身上被刺了许多枪后倒在地上，这时凶手停止刺杀并喊了一声：“滚蛋！”殷文杰挣扎着爬起来，奔到 44 楼北面小树林里又倒下。……取回诊断书（上面写着 39 处伤口）。……文革中杀害三名无辜青年，是我所在的组织“新北大公社”最丑陋的一面。

十四、北大化学系 1963 级学生樊能廷说

（《最后一弹弓》）

1968 年 7 月 28 日，星期天，近午时分，笔者在 37 斋 4 层，一间敞亮的屋子。37 斋邻南墙，朝南一面的窗户，没有遭弹弓袭击之虞，而且视野开阔，东西向的海淀路尽在眼底，东头是死胡同里的玻璃仪器化学试剂商店和土灰色的中关村楼群，西边远处是青山，海淀镇以西都是碧绿的水稻田。笔者看见，北大公社武斗队两个人，在 34 斋（公社武斗队占据）马路对过的民居墙上贴大标语，标语文字是“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聂元梓同志”，标语是每一张纸上只写一个字。我叫来一个守楼同学一起看，一起纳闷毛主席单独赐见聂元梓，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回主何吉凶？

贴标语的两个人，大暑节气，烈日炎炎，穿着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制式黄色军棉袄，头顶柳条帽，一人腋下夹着还没上墙的标语纸，拎着浆糊桶，离墙三五步远。另一位用棕刷向墙上刷浆糊，面南背北，离民居的北墙极近。

恰巧，这间屋子的南窗，窗框上设置着一副大弹弓，我俩一时兴起，操起一块红砖碎块，尺寸约可 5 厘米乘 7 厘米乘 7 厘米，放入皮兜。我双手抱拢皮兜，另一人搂着我的腰，一起向后退，拉开了弹弓。弹弓的皮筋，是各四股乳胶管（共为八股），一个壮汉气力不足以开满弓。射击的目标正是在墙上刷浆糊的那位。撒手发射之后，眼见那位，右手捂着柳条帽，像电影慢镜头似的，瘫倒到地面上。能够断定，他不会是邻楼 34 斋新北大公社弹弓误伤的。那么，就应该是我们这一弹命中了。怎么那么准？这种大弹弓，主要起“火力压制”和袭扰的作用，直接命中的几率极小。从 37 斋 4 层到他的位置，差可百米之遥，一击而中，神了。会不会是打到墙上，弹射，击中了他？时至今日，很想诚意地跟他道一声“对不起”。人家在宣传全世界的革命领袖和北大的革命领袖“亲切”晤面，和和平平的，我们这一弹弓，神差鬼使地打中了他。

后来听传言，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政委卢平在这一天受了伤。如果我们弹弓一发，击中的是卢平，倒是真的有几分感佩他，身为新北大公社顶级头目，亲冒砮石，到井冈山 37 斋弹弓射程覆盖的险地贴标语，不愧为武斗“表率”。

北大文革武斗，始于聂元梓在临湖轩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决策会议上的拍板定夺——“打，你们要打，就打吧！”

北大文革武斗，终于 1968 年 7 月 28 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召见”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

北大文革，聂元梓-校文革是“红色政权”，代表体制。井冈山兵团是异见者，代表批评意见。聂元梓-校文革容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批评。它们信奉的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从压制批评、不许说三道四开始，对于井冈山兵团说不服就压服，压不服就打服，直至肉体消灭。这就是北大文革武斗的主线。

北大官方修史 2008 版《北京大学纪事》充分说明，北大文革武斗，自始至终，每一起事件，都是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强加在井冈山兵团头上的。

北大武斗结束，聂元梓校文革的霸王风月随之结束。文革历程开始新的篇章，雾重路不彰，往后，违反人性的事情，多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继续和发扬光大。

文革发生 50 周年之际，谨以小文祭奠文革，祭奠北大文革武斗。

（原载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昨天》第 76 期【生逢乱世】，本书略有删节）

一个校外人员见证的北大武斗

理胜

写完这个题目后，我必须马上声明，我不是北大人，与北大也没有任何工作或个人关系。北京大学刚刚庆祝过百年校庆，如日中天，光彩辉煌，我不是不想沾这个光，而是实在没这个缘份，我没在北大读过一天书，听过一堂课。唯一在北大受过教育的机会是在 1967 年五月底，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时，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看过用金纸复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现在很多以作为北大同人而自豪的专家学者，当时也曾为这张大字报实实在在地骄傲过好几年。当然，这张大字报也曾制造了大批冤案，把一大批北大师生迫害的家破人亡。文革前的北大，可以说是学派林立，名家荟萃。文革开始后，竟被称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多少名闻中外的学者教授不是被“抓王八”的北大学生毒打至死，就是宁死不受辱，以死抗争。也许我久居海外，孤陋寡闻，除了季羡林老先生一篇“北大的监狱”外，我没看见过一篇关于文革期间北大的文章。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号称有五千之众，北大的酷刑逼供，至死人命的冤假错案，十有八九出自他们之手，这些“响当当，硬梆梆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我要写的，是 1968 年我被抓进北大的见闻。读者也许会奇怪，北大不是专政部门，我“一不是响马与贼寇，二不是歹人把城偷”，于北大无怨无仇，怎么会被抓进北大？这还要从北大的文革历史谈起。1966 年 6 月 1 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正式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作者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夜之间成为全国尽人皆知的文革英雄。压对了宝的聂老太欣喜若狂，企图趁热打铁，借北大这块中外闻名的金字招牌为自己树碑立传，名扬千古。这位“通天人物”趁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请毛为北大提词。毛泽东不忘聂元梓立的文革头功，亲笔手书“新北大”。领到了“圣谕”后，聂老太骄横有加，一心想在北大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在铲平山头林立的群众组织后，成立了“新北大公社”，自任一把手，夺了北大党委和校长的权，一统北大天下，人称北大的“老佛爷”，“太上皇”。这位“老佛爷”一心想做慈僖太后第二，在北大一手遮天，

专制独裁，引起不少师生的不满，以致反对势力日益壮大，最终成立了对立派“井冈山兵团”。

聂元梓当然不能容忍向她在北大绝对权威的挑战的行为，动则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威胁对方。要不就搬出江青和中央文革压人。然而，越来越多的人经过观察和思考，认清了聂元梓的野心和水平，这种威胁和恐吓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但是反对派师生绝对没想到，一个欲置他们于死地的罪恶阴谋正在策划之中。据当时“新北大公社”散发的宣传材料声称，“北大公社”成员大都是“根正苗红，三辈贫农”出身的“天生无产阶级左派”，而“井冈山兵团”多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知识份子家庭，革命阶级就是要用武力镇压反革命余孽。实际情况是，很多有正义感的工农子弟由于不满聂元梓的道行逆施而加入“井冈山兵团”。

1968 年 3 月 28 号后半夜，拿到“老佛爷”手谕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睡梦中的井冈山一派的师生发起突然袭击，甚至连女宿舍楼都未能幸免。很多人仅穿着内衣裤逃出宿舍，个人多年的积蓄丧失殆尽。“新北大公社”战士每占领一座楼，立刻将书籍财物瓜分一空。“井冈山兵团”师生被迫奋起还击，保住了 28、36 等 6 座宿舍楼，打退了武斗队的轮番进攻，使聂元梓把“井冈山兵团”赶出校园的阴谋未能得逞。在这之前，北京高校两派还只是在观点立场上互相攻击，顶多是辩论激烈时相互推打几下，从未出现过动用刀枪的大规模武斗。北大 3·28 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从此以后，各大学武斗迅速升级，清华，北外，京工，人大等校都出现了以武力把对立派赶出校区的现象，同窗之谊竟成为兵戎相见的生死仇敌。武斗中杀死对方学生的事件已不再是新闻了。武斗杀人，北大又一次走在北京高校的前面。井冈山一派占据的六座楼只有 37 斋（文革后改称楼）紧靠马路，校园围墙已被 3.28 晚上夺路而逃的学生推倒，是唯一进出校园的通道。然而，各楼之间的通行新北大武斗队封锁，他们用整条自行车内胎做的大弹弓袭击行人，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岗山派把学生宿舍的双层床排列起来，形成一条封闭走廊，方保证了楼间的行人安全。“老佛爷”聂元梓一心要置反对派于死地而后快，一计不成，又企图以停水断电将“井冈山兵团”逼出北大。3·28 以后，绝大多数井冈山一派的

师生因无家可归而离开北大，只有那些决心与聂元梓拼个鱼死网破的中坚份子留了下来。他们无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战。为了生存，他们试图从马路边高压电网接电入 37 楼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武斗。“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一色儿的矿工头盔，铁网面罩，薄钢板盔甲，两米长的无缝钢管扎枪，列队出战时，威风不减当年古罗马武士。反观井冈山队伍，头带白柳条帽，甚至棉帽子外面套个硬纸盒，手持七长八短的水管做的扎枪，盔甲则是用布缝在一起的几层洋铁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如当年丐邦聚会，连他们自己看了都觉好笑。然而，就这么几百人，被数千人封锁围困，停水断电，绝粮断炊，居然寸土未失，坚守达四个月之久，直到七月底 8341 军宣队进校。中国兵法中哀兵必胜的用兵之道，在北大武斗中再次得到验证。至于军宣队秉承上谕支持聂老太，继续迫害井冈山派则是后话。一位我认识的学生，长得象电影〈停战以后〉里香河县长班长儒，外号老班。坚守 37 楼四个月始终乐观自信，但后来竟被军宣队逼疯，跳楼而死。还有一个学生被迫害得无路可走而自杀。他躺在上层床上，把电灯里的两根电线绑在两只手腕上去拉电灯开关。没想到电流通过他的身体时，肌肉突然收缩，身体从床上摔了下来，拉断电线，才免于一死。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 32 路公共汽车经过北大南大门和 37 斋，当时的 32 路是一辆ＳＫＯＤＡ大客车带一辆拖车。“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强迫 32 路车停驶，摘下拖车推着前进，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在拖车的掩护下向 37 斋逼近。可能是因为用力不均，拖车突然就地转圈，藏在车后的武斗队一下暴露在对方的大弹弓射程内。被一阵弹雨打得东躲西藏。此时，守楼学生把黄豆撒在马路上，武斗队一个个滑得人仰马翻，狼狈不堪。“丐邦”们乘胜出击，喊声震天，勇不可档，一鼓作气把“老佛爷”装备精良的“御林军”赶了回去。两个物理系学生趁机把路边一万一千伏高压线与楼内早已准备好的变压器及配电设备联接起来，恢复了供电。这以后，“新北大公社”多次组织武力强攻井冈山派驻守的地盘，均无功而还。最后，他们采取了封锁 37 楼出口的策略。企图以断绝粮食给养，困死饿死对立派楼里的师生。他们日夜监视 37 楼出口，不许一人进出，抓捕所有出楼人员。我就是这时被抓进北大的。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原来住 30 楼，3·28 夜晚，在睡梦中被同寝室新北大派

用扎枪赶了出去，连外衣都没来的及穿。这以后他只好住到为了不被赶出校园，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权而加入保卫 37 楼的行列。因为我所在的大学两派也在武斗，我在校无事可做，就到处收拣别人丢弃的武斗用品，如漆柳条帽的油漆，做面罩的铁网，破自行车内胎送到 36 楼装备“丐邦”。有一天，我一大早就把收集到的物品送到北大，然后就和熟人聊天儿。没多久，“新北大广播台”的高音喇叭就宣读了“封锁 37 楼狗洞通令”，理由是要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樊能廷”。

文革时期，无论是定罪名，还是两派互相攻击，上纲上线的夸张程度，比起李白诗中的“白发三千丈”也毫不逊色。在垃圾堆上烧两封信能说成“企图烧毁大楼”，打架流了鼻血叫“血洗”，改锥是“凶器”。樊能廷是南京人，化学系 63 级学生，天生的乐天派，一开口则笑语连珠，令人捧腹。3 · 28 武斗开始后，他被从 30 楼里赶出来，也住在 37 楼。一日聂元梓以校领导身份到 37 楼训话，樊能廷正在维修通电线路，听说老佛爷驾到，拿着改锥就跑去看热闹。当时聂元梓被人团团围住，樊能廷也凑上去起哄。一边嚷嚷，一边无意地挥舞手中的改锥。看到明晃晃的改锥，聂老太的保镖脑子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立刻绷紧了，认定是阶级敌人要行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立刻发出通令，“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樊能廷”。当时樊就住在 37 楼，仍然与平时一样，乐呵呵地说笑话。但我知道，他心里未必像他表面那么平静。有一个叫刘伟的北大地质地理系 61 级学生，身强力壮，是个运动员。一次在校外马路上被新北大派捉去，严刑拷打，竟被用钢鞭铁棒活活打死。他的同学为他办了一个遗物展览。我看的时候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樊能廷当然知道，如果他一但落到这帮杀人狂手里，是很难活着出来的。“新北大公社”中“红五类”的心黑手恨，早在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时就已名扬北京高校。他们批斗时不仅‘触及灵魂’，而且‘触及皮肉’，甚至‘制造冤魂’。那些老教授临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几个月前还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的莘莘学子，用钢鞭木棒把他们往死里打时竟毫不手软。虽然我与樊能廷仅有一面之交，但出于对他命运的担忧，三十多年来一直记得他的名字和他当“刺客”的经历。37 楼位于北大南校门和海淀校门之间，马路对面是居民的院墙，无法穿行。行人必须经过这两

个校门前才能离开。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 37 楼出口，向海淀方向走去。当我走近 32 路车海淀站时，一辆公共汽车正好进站。两个彪形大汉以为我要上车，从路旁一下冲到车门口。然而，我却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他俩看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就不再假装过路行人，公开尾随而来。走到海淀校门对面的时候，二人突然扑向我，一人抓我一条胳膊，把我倒剪双臂一手卡着我的脖子，好像“走资派”挨斗时坐飞机的姿势，押进全国第一流学府－北大校园。过马路时，一个胖大和尚般的武斗队员（我敢肯定他是学生食堂的大师傅），哆嗦着一身肥肉跑来接应，以防有人来把我抢走。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井冈山的人早知道我会被抓，但我是外校人，不会把我怎么样。此时他们都在窗前观察我如何被抓，以便总结出反封锁的策略和办法，哪里会跑来救我。

我被押进海淀校门后，来到 40 楼前的一片空地，两名“捕头”把我交给一个戴头盔面罩，手持长枪的武士。此人两腿叉开，面孔上扬，极力想摆出一付威风神气的派头好给我个下马威。可惜的是他手中的长矛说明他只是个打前阵的马前卒。我告诉他我是外校来找人的，他厉声问我是否知道封锁 36 楼的通令，我说进了楼才听见，我还要回去吃午饭，他看我不象什么重要人物，就把我交给一个职工模样的中年妇女去审讯。她要我详细说明去 36 楼找谁，看见什么人。她还打电话到我所在大学核实我的身份。确认我不是井冈山派的人后，才让我走，但警告我不得再来。我环视周围，大约有几百人在待命行动。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武斗是早有计划准备的行动。院里人虽多，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工作周到细致。虽然各路人马进进出出，但并不混乱。北大素以文科见长，没想到还培养出精通兵法的将帅之才，只可惜用的不是地方。有一天晚上，我从 37 楼出来，骑车朝中关村方向驶去。路过 34 楼时，有人向我扔砖头。我气不过，调转车头返回 34 楼下的小门和他们论理。他们没想到我会如此大胆，一下竟没有反应过来。当看清我只有一个人时，这四五个人一齐扑了过来，拳打脚踢。有一个人还脱下农村那种手工衲底的老山杠子鞋，披头盖脸地打来。我一面用自行车招架抵挡，一面高喊，你们不问问什么人就动手，还讲不讲理，叫你们的头头来说话。其中一人听我话中有话，叫他们停手，询问我是什

么人。我说是来找同学的，并反问他，你在外校有没有同学同乡，如果你去外校找人，被人不问青红皂白打一顿，你什么感觉。他有些不好意思，说现在正在武斗，一个个都火气挺大的。别人挨了砖头跑还来不及呢，你到返回来了。天又黑，我们还以为你是井冈山派来偷袭捣乱的。看来，只要气候环境变化，最高学府里平时文质彬彬的大学生，也会变成蛮不讲理的打砸抢暴徒，而且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们的行为辩护。3·28 以后，有些没参加任何派的学生依然去学生饭厅去吃饭，没想到新北大派竟派了武斗队把守饭厅，见了非公社派的人就打，不让吃饭。有两个学生看见情况不好，扭头就跑。被武士们追上用扎枪刺穿股动脉，尽管他们哀号求助多时，竟无一人上前，眼睁睁地看着流血过多而死。大学同窗，竟然操戈相见并下毒手杀人，北大是“始作俑者”。从此以后，井冈山派被剥夺了去食堂吃饭的权力，他们只好在楼内架起炉灶，用打烂的桌椅床架烧火，煮些干切面充饥。自从 37 楼出口被封锁后，粮食运不进来，只能饥一顿饱一顿的将就。那天被抓之前，我看见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小姑娘提着一个大旅行袋走进 37 楼，打开后里面是满满一袋干切面。原来是一个学生的妹妹专程从广州赶来帮助姐姐渡难关。

8341 部队进驻北大“支左”后，总算解了井冈山派的围。学生在 37 楼出口搭了一座牌楼，两边的对联是毛泽东手书的两句话：井冈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武斗期间曾在校内住过的井冈山派学生纷纷在门楼前摄影留念。我也凑热闹拍了一张手持语录的照片，而且保留至今。现在看起来，那付神气样实在是愚的可笑，但当时确实是很认真的。前两年回国探亲，去颐和园回来路上经过北大，我特意在海淀下车，走到中关村。从海淀校门到南校门中间的宫廷园林般的的石砌围墙都已变成商店铺面，当年的“狗洞”早已踪迹全无了。唯有 37 楼三楼一个窗下还依稀可见用砖修补过的痕迹，那是为了接变压器拆的缺口。除了武斗时在 37 楼住过的几十个学生，没有人会知道为什么这面窗下有修补过的痕迹。回想当年在这里的经历，我面对 37 楼伫立良久。不过三十多年，北大红卫兵的残忍，老教授的惨死，武斗的疯狂早已被岁月冲洗得干干净净。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师生，有谁知道这里曾发生过的武斗和北大的文革冤魂呢。我们这一代已

经成为历史了，又有谁想得到当年进出这个校门的竟是顶盔带甲，手持长枪的武斗队。再过三十年，这些匆匆忙忙进出的年轻人也会成为历史，被后人忘却的，他们今天会想到这一点吗。

1998 年有篇文章说，北京大学的威望是“五四”运动建立起来的，象有某种遗传基因似的，七十年来，北大始终走在学生运动的前面。还有一位北大名人断言，如果中国所有的女人都是娼妓，所有的男人都是嫖客，剩下的一对罗米欧与朱莉叶十有八九在北大。前一篇文章说，在社会进步的潮流中，北大始终走在前面。后一篇文章暗示，当社会堕落时，北大永远落在后面。这么一说，北大简直成了一方圣土了。成了宁国府门前那两个石狮子。其实鲁迅先生对此早有评价。他说：“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内的一部份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文革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丑恶，最黑暗的时代。（当然，对某些人来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这场运动中，北大不仅没落后，反而处处走在前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动北京高校第一次开杀戒的武斗，第一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以及“两个校，一张报，几个小丑嗷嗷叫”的样板经验。（引自 1976 年“四 · 五”运动天安门广场诗抄）。我知道，文革是北大一块难以启齿的疮疤，是北大历史上违莫如深的禁区，一直为北大同人所回避。不少当年新北大公社的武斗干将，因保“老佛爷”有功而留校工作，他们当然不愿揭自己的疮疤。然而，历史是绕不过去的，后人有权知道北大文革史实。我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引玉之砖，希望知内情的北大同人写出更多文革回忆录，留给后人。我写这篇文章，并非与北大有怨有仇，也不是嫉妒北大的名声和北大同人的运气。我只是希望北大在文革中的这一段历史不要被遗忘。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一听到逆耳之言，就指言者因个人恩怨或嫉妒所为，因为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己度人，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有一次，我对某些国内精英的言行提出异意，他们竟说是因为我追过其中的女性被拒绝而在报复。岂不知那时我已在美国了，而且当年我交女朋友时，他们

这辈尚在呀呀学语，排成队抓根绳子被托儿所阿姨牵着学走路。有了这段经历，我对这批好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小人格外提防，因而不得不事先作如下声明以堵住他们造谣的路子。我个人与北大没有任何关系，但我祖上在北大史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我的祖父是北大前身，清朝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被尊为现代北大创始人的蔡元培、马寅初任北京大校长时，每次校庆都要恭请我们家老爷子在前排就座，并称他为老前辈。我想北大同人中，能有此资历殊荣者，恐怕屈指可数。我给北大脸上抹黑事小，若因诽谤祖先之嫌而背上不孝子孙的罪名，不仅坏了我一生的忠孝，下次回国时也没脸到香山万安公墓给老太爷扫墓了。

我所见证的北大 1968 年武斗

张曼平

最近，在华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馆”和其他媒体上看到一些关于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1968 年发生的一些武斗事件的描述。

这些描述有不少是正确的，但是有部分由于作者是圈外的人，并非北大师生，以在此期间经常到北大而写出来的一些见闻，难免比较片面（如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 109 期理胜的文章：《忆北大文革旧事》）。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的邓小平》一书中也写到她姐姐邓楠和哥哥邓朴方作为当时在北大的学生所见到的武斗，他们当然有亲身经历，邓朴方还深受其害：武斗后期被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非法监禁审讯，不堪折磨而从被监禁的物理大楼四楼跳楼摔成重伤，终身致残，邓楠则亲眼见到北大的武斗缘起，目睹武斗的残酷，但是毛毛本人当时未生活在北大，仅仅听到哥哥姐姐说起北大的武斗，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也有部分对北大武斗的回忆，那是作为被关起来挨批斗的“牛鬼蛇神”角度的观察。再有就是聂元梓恬不知耻地在所谓口述《回忆录》中涉及的北大武斗，她居然把自己装扮成正义的化身，是北大武斗的制止者、受害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北大 1968 年的武斗是北京市高校武斗的起始点，对于北京高校的文革有重大影响，所以把北大的武斗起因，经过等事实正确地记录下来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这段历史的人是一种责任，也对文革历史研究、对后代的教育非常必要。而迄今很少见到当时在北大经历武斗学生的回忆，本文试图把自己当年所见所闻的一部分写出来。作为井冈山的普通成员，我只了解极小一部分事实，本文意图是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我是北京大学 1962 级的学生，预定是 1968 年毕业（六年制）。从 1966 年 6 月第一张大字报发表到后来的北大反工作组，校文革成立，群众组织分为两派，到 68 年 3 月底爆发武斗，8 月份工宣队进校，一直到 1968 年底分配离校，几乎完整地亲历了北大文革的前期。在武斗发生的前后，我正在井冈山广播台做机务工作。我把我所了解的北大武斗的情况

写出来，一则是对事实的补充（很多比我更知情的人，比如武斗的具体策划者和指挥者高云鹏之流，比如北大当时校文革的负责人聂元梓，但是他们忌讳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任何场合下都不敢涉及其真相）；二则是对某些被歪曲的事实的澄清；三则是把这段荒唐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作为对今后的历史教训。

1.北大两派群众组织的形成

1966 年 5 月 25 日聂元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后，除了一些干部、教师因为参加过国际饭店四清（见文革博物馆通讯 395 期：杨勋：《我经历的北大文革》）对聂元梓的历史有所了解外，学生大部分是听毛主席和中央的，支持聂元梓。1966 年底仅有极少数的学生组织（如“老井冈山”、“红联军”、“红旗飘”等）反对聂元梓和其御用组织“新北大公社”，但是随着聂元梓的独断专横、无知跋扈越来越暴露之后，越来越多的学生组织打起了反聂大旗。如 1967 年初由一批原来聂元梓的拥护者觉悟后成立的“北京公社”、由新北大公社分裂出来的《新北大公社造反兵团》。1967 年中，这五派群众组织经过协商联合起来，组成《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亦即井、红、飘、零、团五派大联合。五派中反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观点激进程度顺次而降。这里的团派是指《新北大公社造反兵团》，零派是指《北京公社》，因《北京公社》的发起者是系级号 0363 即化学系 1963 级的一些同学，在《北京公社》的大旗上大大地写了一个“0”字，所以被称为零派，又往往被对方叫做“臭鸡蛋”派，零派是五派中人数最多的。五派大联合后，总人数达到五六千人，并请出了原副校长、著名科学家周培源教授任总勤务员，以和聂元梓抗衡；实际的负责人是零派的图书馆系研究生侯汉清，他的观点不太激进，而且为人忠厚，可被五派共同接受。反对聂元梓的力量这样统一后对聂元梓的一统天下形成很大的威胁。在井冈山成立后许多《新北大公社》的骨干成员也看清了聂的面目纷纷“起义”参加了井冈山，如原来的公社派的喉舌《新北大广播台》一次就有 8 名成员（四名最好的播音员、两名编辑、两名机务）造反组成《号角》战斗队集体加入井冈山广播台。顺便说一句，北大的国学大师，前副校长季羡林先生也是持有井冈山派观点的，在他的《牛棚杂忆》中有

清楚的表白。

2.两派的对立和对峙

在 1968 年 3 月 29 日前，这种两派对峙的局面持续了近一年，双方的辩论、文斗在升温，在大字报、广播中互相攻击加剧，两派各自都认为自己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但是两派仍在一个食堂吃饭，在原来宿舍睡觉，相安无事。白天双方互相贴大字报，晚间就由双方的广播台对阵打口仗。经常是新北大公社广播台播出一篇精心炮制的文章之后半个小时内，井冈山广播台编辑立即写出针对性的文章播出还击，批驳聂元梓们，在北大静寂的夜空中突然响起嘹亮的“号角”声音，十分鼓舞士气。

双方广播台的高音喇叭，最初都是架设在路灯的电线杆子上或者路边大树上的，两派喇叭混合架设，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偶尔会有一些小动作，是把对方喇叭的两根音频传输塑料电线在一些树丛里或者其他隐蔽处用一根大头针插进去短路掉，这样不但使这个喇叭不响，整条线路也成了哑巴，扩音机也因超载而无法正常工作。这种短路非常隐蔽，用普通肉眼巡查线路的方法即使走到面前，都难查出故障所在，只好把整段几百米电线一起换掉拿回去检查。为了防止这种破坏，后来，就把高音喇叭安放在各派学生居住的宿舍窗外，由同学兼作线路和喇叭保护人了。

这种相对和平的状态持续到 1968 年 3 月，后来局势就变得紧张起来了。最先感到紧张的是喉舌广播台。新北大公社广播台是继承了原北京大学广播台机房和设备，位于大饭厅舞台后台上，从大饭厅北面进出，他们使用原来北大广播台分布全燕园的线路网络。而井冈山广播台是在五派大联合后，67 年在工字形状的学生宿舍 28 楼 4 楼西北尽头（工字的最西北段）459～462 四个房间临时设立的，编辑、播音、机务都在这四个房间里工作。而当时 28 楼是两派合住的，谁都可以轻易走进机房和播音室。由于井冈山广播台播出的稿件语言十分尖刻，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聂元梓之流的行径，对井冈山的成员鼓舞很大，自然遭到新北大公社的仇恨。所以 3 月份一再传出公社计划武力攻打井冈山广播台的消息，为了广播台的安全，我们把 28 楼 459～462 四个房间外的四楼楼道砌了道墙隔离起来，在把 362 房间和 462 房间门口的走廊地板打个洞，架起梯子，这样出入广播台

必须由三楼爬梯子。把主要的高音喇叭也架设在 28 楼楼顶平台上，朝向四周，从机房到楼顶也是同样打一个洞，只有通过这个洞口爬梯子才能接近喇叭。这样易守难攻，加大了自卫力度。但是除了广播台外，其他的宿舍楼依然维持原状。

我因为常常值机，所以在 28 楼三楼找了一个宿舍暂住，除了棉被外其他物品依然放在我们原来的宿舍 31 楼 215 室。

3.1968 年 3•29 凌晨发生的有预谋的血腥事件

1968 年的 3 月 28 日晚，和往常一样，结束了晚上的播音，我在 28 楼休息了。睡到半夜过后被嘈杂的声音闹醒：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攻打 31 楼了！我赶紧跑到 31 楼，看到楼外尽是我们年级受伤的和衣衫不全的井冈山派同学，由于我不在事发现场，这里权且引用一些住在 31 楼，在 3•29 子夜被迫跳楼或被驱赶下楼离开宿舍的同学的真切回忆——一辈子都难以忘却的回忆。正是这个晚上的事件，改变了北大文革的历史，把中国最高学府的“文化革命”变成了武斗，也在北京市高校开了武斗的先河。

◇当晚住在 213 室的铭同学：

213 室平时住鹏、利、石和我 4 人。何时、是什么原因又搬进一张双层床，公社的堂住了进去？我回忆不起来了。但 213 的气氛堂住着也不舒服，他很少来住，“3•29”前他早把细软拿走，更是不来了。那段时间彭住在我们 213 室。我记得在“3•29”前的一段时间，我们怕夜袭，有些防备：睡前用床把门顶上，窗内暖气片处还栓着一条绳子，另外还备有一些石灰包等等。但是，临近“3•29”却松懈下来了。“3•29”当夜，床并未顶门，暖气处的绳子也不知去向。门是到公社的人长矛捣门时临时推过桌子顶上去的。他们几个动作很快，一个接一个从窗户跳了下去，我是最后一个跳的。临跑之前，我在背心裤衩外，还穿上了棉袄棉裤。213 的窗外，正是 31 斋工字楼的北面阴面角落，离垃圾道不远，比较背静，不被人注意。所以，我们 5 人得以安全逃脱。但我跳楼时墩了一下，胸里边隐隐作痛了一段时间。

3•29 天明之后，上午，我进城去北池子向我舅舅（在市公安局工作）通报情况。看到北大墙外 32 路汽车沿途，海淀、中关村一带，全是逃难的

学生，手提着、肩扛着、自行车驮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那景象真好似逃避一场战争或瘟疫，惨不忍睹！

◇当晚住在 213 室的鹏同学：

213 室我，彭，石跳下楼后基本安全无恙。铭和利似乎受点轻伤，好像是胸挫伤。另外，门是用床和书桌顶到对面墙顶住的。门的两层胶合板已被长矛捅穿。彭原住 216，那晚幸亏住到 213，若 3•28 夜在 216 住就惨了。

◇当晚住在 213 室的彭同学：

1968 年 3•29，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悍然发动武斗。突然袭击从 31 斋 2 楼开始，把睡梦中的井冈山派学生全部驱逐。我们化学系四年级 1 班和 2 班共计 17 名井冈山派的同学被逼跳楼逃生。

31 斋是工字形的，南端为工字的一横，其东半横为化学系四年级 2 班男生宿舍，西半横是 1 班男生宿舍。武斗就是从这工字形的一横两半的宿舍开始的。公社的人从 31 楼南门进入，一队直奔东半横我们班的 212、213、214、216 几个宿舍。重点是 213 和 214 室。214 室住化学系四年级二班（6203－2）的 4 个井冈山同学：易、立、才、廉，213 室住（62032）的 5 个井冈山同学：鹏、铭、利、石和我。

3•28 深夜大家都睡了，我还在装我的七管超外差晶体管收音机，到接近 12 点才睡。刚睡着一会，就被楼道的轰轰的铁器碰击（是长矛碰击）的声音吵醒了。一个个的什么东西哗哗地从气窗扔进来，事后才知道是石灰包。我从气窗往外一望，满楼道都是人！头戴柳条帽、身穿清一色黄色军棉袄，个个手持长矛，杆子橘红色的。接着我们的门被推开，铭他们两个住下铺的赶紧推桌子把门抵住。桌子推去又被推开，推去又被推开，反复几次，门总算顶住了——公社武斗队员也不敢冒然进屋。最后我们合力把门顶紧。5 人相继从窗子往北跳下二楼。北侧寂无人，我们得以安全脱险。我随即去到 28 楼井冈山广播台，向总部报告事态……。

62032 班住 214 室的 4 人、住 213 室的 4 个人全部跳楼，住 218 室贤等同学也跳楼逃生。住 212 室的兴、中、住 216 室的大、启和兴都是被长矛队一路棒打赶下楼的。

化学系四年级 1 班（62031）、2 班（62032）跳楼的同学共计 17 名。62031 的明手腕摔断，钧跳下之后被公社武斗队用长矛刺成气胸；62032，住 217 室的贤腰摔坏，213 室的石跳下去只穿着背心裤衩。我们的衣物、被褥、书籍，所有物品丧失净尽。

跳楼的时候我穿着一条单裤。上身还“空心”穿了我的灰色无领绒衣。脚上没有穿袜子，套上了我在大串联的时候在云南买的翻毛皮鞋，算是最齐全的了。裤子屁股兜里还有几元钱，是刚交过 4 月份伙食费剩下的。记得后来受伤在地院和林学院治疗的时候，和利在五道口买过油饼吃。

当晚住在 212 室的中同学：

说起那天晚上的经历还真是惊心动魄。我来说说我这个没敢跳楼的人的经历吧！对方攻打房门之际，我看了看窗外的情况，只见窗下面靠楼门那边有一两个人拿着长长的棍子样的东西（想来是长矛）站着，心想别跳下去以后再被人用长矛扎几下，那可就玩完了。还没拿定主意，对方就攻打进来了，只好听命令走出房门，向 31 斋北门走去，一路上被人用棍子打了不知道多少下，出了北门以为会被押送到对方的据点去，就自动向西方走去，没走几步突然发现没有人押送，大喜，就自己跑了。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右手食指被打破了，还在滴血。那个伤口后来没有完全治愈，至今该食指的指甲仍然是畸形的。

理胜先生当年在北京求学，没有在北大生活和上学，他还被北大聂元梓的武斗队抓捕审讯，他对北大文革中武斗的观察，有些是十分深刻的，如认为：“井冈山兵团一派没有武斗队组织、没有武斗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根本无法抵御这种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有组织的突袭。手无寸铁而分散的井冈山派学生只能匆忙逃命，穿着单衣逃命者比比皆是”。但是由于他未曾亲历的局限，描述的事实有些不周全之处，仅仅据上面引述的亲历者回忆，3•29 那天晚上，被迫跳楼逃出被包围的 31 楼化学系 62 级学生人数就超过 17 人，其中五六个人受了伤，有的是赤手空拳穿着内衣跳到楼下就被对方的长矛手扎穿胸部，造成严重的气胸。没有逃楼的也是在睡梦中被被拿着棍棒的武斗人员轰起床，殴打着、驱赶着被迫离开自己的宿舍楼，除了贴身衣服，什么也不让带。据后来了解，为了避免出现同班

同学相残，高云鹏这位钦点武斗总指挥“先生”也避了点嫌：攻打 31 楼的武斗队人员是从 09 系招募的，怕他们不知情。事前在有井冈山同学居住的房间都做好记号，所以有理胜先生文中的现象：“有趣的是，住 31 斋的“新北大公社”一派学生，居然没有一位胡里糊涂地出逃，大都在热被窝中安卧。”足见这次血腥事件的是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的预谋，而不是一次突发的冲突。

理胜先生说北大有组织的武斗始于 1968 年 3 月 29 日晨，这一点本人不敢苟同：理胜先生后面讲道那是一次突袭，更接近事实。我认为 3 月 29 日凌晨北大发生的根本不是武斗，而是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对井冈山有预谋武装镇压。因为大凡武斗，必然是双方都作了充分准备，双方持有武器，而 1968 年 3•29 的北大根本不是这样。照聂元梓自己招认的情况和其他一些资料，新北大公社和聂元梓的校文革确实在 3•29 前任命了“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高云鹏，开了好几次武斗准备会议，策划对有井冈山学生的一些楼进行武装突袭，井冈山总部所在的 28 楼由于戒备较严，不好下手，他们就选取了井冈山派的学生较多，而且毫无戒备的 31 楼作为突破点，规定了时间：3•29 凌晨 1 时；通过校文革控制的学校后勤制造了大批武器：钢管制作的长矛；统一了服装——一律的黄色军棉袄，柳条帽，为便于识别；在武斗之前，由专人在 31 楼的定点目标房间门上皆做好记号，所以非井冈山同学所住房间连他们的门都没有被敲到。

我原来住在 31 楼 215 室，除了我还有 2 个新北大公社成员，因为我基本不在 31 楼住，所以 215 房间当天晚上没有被查抄。但是我放在抽屉里的 20 元生活费和一些其他东西还是丢掉了：3•29 后不久，我请无线电系的一个逍遥派亲戚到 31 楼 215 室帮我找一下钱还在不在，如在帮我拿回来好交饭费。结果可想而知：分文不剩。我相信不是同屋的同学拿走的，在把对立派全部赶出 31 楼后，新北大公社对 31 楼进行了大洗劫，个别心存不良者发“校难财”，大肆掠夺同学留在房间的钱财，据说有的人在 3•29 后手臂上下带了五六块手表；有人大肆搜查被赶走的同学遗留的文字和日记当作黑材料整人。相反，井冈山的所有人，包括总部的成员对 3•29 的偷袭毫无预料，手里连根木棍都没有，所以造成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如

果井冈山存心武斗，有武斗的物资、精神和组织准备，绝对不会出现 3•29 发生的这种武装偷袭并且轻易得手的事件。

对于 3•29 事件，聂元梓在她臭名昭著的口述自传（聂元梓自己也绝对写不来自传：虽然贵为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但是她的文化水平也就是初小三年级）里满口胡言：但是，“3•25”大武斗之后，形势恶化了。校内的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发生，由校外来人武斗转变成校内武斗，“井冈山”在校内强占宿舍楼，建立武斗据点，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东西从楼里扔下来。“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当然不能忍受，因此就经常发生磨擦，引起冲突和流血事件。形势非常严峻。面对这种局面，当时，我们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是组织学生不要自发还击，把因牛辉林指挥强占宿舍楼、乱扔学生的行李衣物引起的小打小斗压制下去，不要由小打扩展成大打，尽量避免发生大规模武斗，一方面又叫王茂湘做“井冈山”方面的工作，对对方的群众进行说服劝告，不要站错了队，不要被挑动打武斗，动员“井冈山”的群众“下山”，退出“井冈山”，瓦解“井冈山”，釜底抽薪。王茂湘的“挖山”工作很有成绩，被称为“王铁嘴”，因为他讲话占理，别人都说不过他。他的做群众工作的才能是很出色的。（可是，后来对王茂湘的处理却是非常荒谬非常错误的，因为他在“文革”中的言行，就压制他，又开除他的党籍，不给他评定教授职称等等。这是我久久不能释怀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作对付校内武斗的准备。新北大公社采取的是有组织地对付“井冈山”武斗的办法。总得有人具体负责呀，不得不让什么人出面处理校内武斗的情况，所以他们找了高云鹏担任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处理武斗事件。为什么找高云鹏？因为高云鹏做事稳重，有思想水平。在高云鹏的领导下，他不会主动地去打武斗，不会乱来。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同意动手流血。假如不是高云鹏这个人当时负责“文攻武卫”，那北大的两派武斗会打到什么程度，是无法预料的，只会比现实更严重。高云鹏不仅不会主动地搞武斗，而且很有主见，从来不听任何人的盲目冲动的意见。我亲眼见到，好多学生围着高云鹏，非常冲动地要求打武斗，高云鹏都不受他们的情绪影响，不许他们动手。

聂元梓说 3．25 后井冈山开始武斗，完全是颠倒黑白，3•29 晚以前根本没有任何武斗，在 3•29 凌晨 1 时发生的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据说明北大武斗始自新北大公社的武装镇压。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找了高云鹏担任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主任，换个说法就是武斗总指挥。高云鹏上任伊始马上积极策划武斗，借助校文革掌握了全部北大的后勤资源之便，他可以在几天之内就调动起一支上千的专业武斗大军，给以专业的武器和服装配备，并且经过周密策划，发动了 3•29 武装镇压。聂元梓面对 3•29 大批井冈山人被打伤，被驱赶的事实不顾，还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她也是反对武斗的，她在制止武斗中被被樊能廷同学用匕首刺伤云云。实际上是 0363 的樊能廷在 3•29 早上被武力赶出 31 楼宿舍，丢失全部个人财物后出于愤怒用手里的一把电工改锥试图捅聂元梓一下，聂元梓就四处嚷嚷说有凶手刺杀她，还到谢富治那里告状，要捉拿“凶手”。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聂元梓也不能弱智到分不出匕首和改锥、凶器和工具差别的地步吧。

4、被迫自卫

3•29 武装镇压发生后，新北大公社不仅驱逐了 31 楼全部井冈山派的同学，还在 17、18、19、20、21、22、23、24、25、27、38、40、42、44 楼等采取同样措施，并迅速控制北大全部五个校门，有武装人员把守，检查进出人员。在这种形势下井冈山兵团只好也拿起武器——铁管和长矛进行自卫，在偌大的北大校园内把相邻的 28 楼、30 楼、32 楼、35 楼、36 楼、37 楼五个能够连成片的楼占了下来作为基地，一是给没有回家的井冈山同学有个住处，二是也表示井冈山没有被压垮，还在北大校园存在。所以应该说在 3•29 白天之后北大的武斗才开始。

这六个楼的形势是这样的:28 楼是最靠近北大中心三角地的一个工字形宿舍楼，和 3·29 事件发生的 31 楼遥遥相对，形状完全相同，井冈山兵团的总部、广播台等都在这个楼。32 楼是南邻 28 楼的宿舍楼，30 楼在 28 楼西南面，35 楼再往南去是 36 楼和 37 楼。这几个楼中，只有 37 楼是靠着动物园到颐和园的 32 路公共汽车行驶的海淀大街的，仅有一道石头虎皮墙相隔。为了打通和外界联系的通道，井冈山把这道墙拆开一个豁口，

作为外出的通道。新北大公社为了阻断我们在各个宿舍楼之间的交通，在他们控制的楼上架设了许多大弹弓，大弹弓用双层床翻过来，在床腿上绑上四根医用乳胶管和皮子，用半头砖作子弹，射程可达二、三百米。只要看见井冈山人离开楼进入视线他们便开射，不少人因此受伤。所以井冈山总部又决定在各个宿舍楼之间的通道用双层床做成走廊，这样才免遭大弹弓的袭击。

由于 3•29 以后，新北大公社把全部学生食堂都控制起来，不但井冈山的同学不能去用餐，而且限制所有非新北大公社派的人用餐。3•29 以后，有些没参加任何派的学生依然去学生饭厅去吃饭，没想到新北大派竟派了武斗队把守饭厅，见了非公社派的人就打，不让吃饭。无线电系 62 级的殷文杰同学路过新北大公社总部 44 楼，被喝叫捉拿，他看见情况不好，扭头就跑。被公社的武士们追上用长矛刺穿股动脉，尽管他哀号求助多时，竟无一人上前，眼睁睁地看着流血过多而死（致命的一刀，是地球物理系 65 级一个梁姓女生杀的）。面对大学同学，那些凶手竟然操戈相见并下毒手杀人，北大是“始作俑者”。从此以后，井冈山派不可能再去食堂吃饭，他们只好在宿舍楼内架起炉灶，用打烂的桌椅床架烧火，煮些挂面充饥，或者使用电炉简单地开伙做饭，后来才在保护之下从 37 楼的小通道出去到海淀街上去买些米面蔬菜副食。我当时虽然在广播台，但是广播台并没有人做饭，还是个人回到自己原来的班级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化学系 62 级被从 31 楼驱赶出来后，驻扎在 37 楼，所以我每天要到 37 楼吃饭。

1968 年 5 月的一天中午，我从 28 楼回 37 楼午餐，顺便就到 37 搂 2 楼西头朝北（38 楼方向）一间盥洗间去把安装的高音喇叭去扶正一下（方向稍微有点歪了）。没想到仅几秒钟就被斜对面 38 楼的大弹弓的神弓手瞄准击中，一块半头砖直飞我的头上，慌忙之中我咬了一下，正是这一口救了我：我当时“吃的”砖头正中口腔上下牙之间，把上下各 2 个门牙齐根打断，嘴唇全部打烂，血肉模糊。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再高几公分，那这块半头砖就世界取我性命了。大弹弓的射程有 300～400 米远，37 楼到 38 楼不超过 100 米，飞来的半头砖威力不会比子弹头小。不过这断了的四个牙也影响我一辈子：那几个牙损坏导致其他牙齿一个接一个损

坏，早早就戴上了全口假牙。

当然现在无法追究谁是这位神弓手了，连迫害邓朴方跳楼的人现在也无处查找，往樊立勤膝盖钉钉子的人也被赦免。但事总是人干的，不说并不等于没人知道，我倒是无意追查谁人干了那些对不起良心的事，只是希望他们能对自己的后代喻之以理，教育他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别干这种缺德事了，这才是我们反省文革的目的。

5、相持阶段

在 3•29 发生之后的四个月中，两派一直处于相持阶段，其间发生过几次较大的武斗，这里是一些同学回忆当时的一些情况：

◇饺子宴

被赶出 31 楼后，0362 的同学们移住 32 楼，无衣无食靠募捐卖废品度日，（周培源的外孙女也送来 20 元），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包饺子苦中作乐，男女同学一起包了两千个左右的饺子，在楼前用一大铁锅煮的。当时大家都未离校，很热闹。没有生活费，各想各的办法，书与我瞄上了一口大铜钟，吃过午饭各提一大锤，向它砸去，当当当几十锤后边上敲下一小块，我班二女生自告奋勇拿到海淀废品收购站，老板一句“这是哪来的”吓得二位扔下就跑回了。

◇4•26

会下围棋的都知道，一块棋做活的条件是有俩眼，而井冈山别说眼了，连一口气都没有，经过大家再三要求，总部终于下决心进驻 36 楼。36 楼保卫战，演出了北大武斗最惨烈一幕。那天廉与铭和我同在一楼，我说你们都是独生子，我家弟兄五个，有事我顶着。我们在西头拒守，那些王八蛋竟从宿舍窗户打进楼来，用大锤把房间一个个打通，十分危急，当时地质地理系刘玮与我并肩抗敌，他还有闲情用矛挑着鞋向墙那边逗闷子。此时我被一家伙用砖头（从挎包掏出的）击中右颊，淌下鲜血，被几个人架到 30 楼。保住了 36 楼，从此有了单关逃出的棋局，“牛猴”（井冈山以牛辉林、侯汉清为头）们才能抗衡数月。

◇5•2

那天不是运菜，而是干了一荒唐事，36 楼保卫战的胜利，使总部得意

忘形，竟下令让驻扎 37 楼的 03 纵抢拦在 38 楼间的木床！结果遭到夹击，很多人负伤，其实我伤不重，重的是华，他刚从外边回来，只穿衬衣，被一矛刺向心窝（太狠了），医生处理时我在边上，看到一只棉签全都从伤口中插入。我惊呆了，万幸的是斜着刺入的。捡了一条命。联想华后来被整，他太不幸了，毕业后我们常见面，很乐观，95 年后失去联系，听说后到天津。我和彭的护甲是把一大铜号喇叭口一分为二制成的。

◇深挖洞高架桥

28 楼、30 楼、32 楼、35 楼、36 楼、37 楼之间人员走动经常受到两边弹弓袭击，使许多人受伤，37 楼首先决定挖地道，用脸盆，抽屉运土，自行车轮当吊车，大家三班倒，毫无怨言。最难的是挖过地基三合土时，一点点用凿子凿。37 楼通后，其他楼也仿效了。为了保证 28 楼和 30 楼的交通，总部决定修一个天桥：拆用 36 楼部分吊顶木料，完全用木头做成一道天桥，天桥由技术物理系设计的，从 28 楼四楼的西南端直通 30 楼的东端。因为地面完全被新北大公社控制，所以天桥的架设全在空中完成：在走廊里把木头拼接好，一头拉一头推地把重达两吨的天桥架设完毕。这道天桥一时在北大校园成了道风景线。架设时，我参加了，总部赏每人一碗热汤面。一桥飞架东西，鼓舞了大家士气。

◇监听电话

由于北大全校的电讯系统都由新北大公社把持，井冈山几个楼间以及和外界的通讯全部被切断。所以在公社把守的地区仍使用原来的电话通讯系统指挥战斗。为了了解对方武斗的动态，以最大限度保护自己，依照原来在学校电话总机工作的井冈山人提供的信息，我们秘密决定从 30 楼挖一条地道通向电话电缆接头，然后连接监听电缆每天 24 小时专人值守登记记录每个通话，如得到新北大公社方面重要武斗动向马上向总部报告。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工程，从动工到执行仅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监听工程还真的起了大作用，好几次由公社挑起的武斗行动都因为事先得知，做好了准备而减少了损失，也有多次井冈山人员外出被发现，他们调遣武斗人员抓捕的电话被监听后及时通知该井冈山人员返回避免被抓。公社发现“作战机密”屡屡泄漏，还在内部抓“内奸”，直到武斗结束他们也没有想到他

们所有的指挥武斗行动均被监听。

◇6·24

由于楼友购粮菜经常被歹徒抢，总部就决定为大家集体运一次肉品和蔬菜，为防意外派些人员保护，这天是 1968 年 6 月 24 日。03 纵有 10 人参加，我年级有耿、顺和我，化二的王（与许同为“秋收起义”）等，当卡车开过来正卸菜之际，众多公社武斗队分别从 34 楼的院墙豁口及北大西南门门沿马路冲出，03 纵和海燕纵队把东边的公社武斗人员顶回去了，不料防御西面的 02 纵却溃败了，两面夹击把我们包围在中间，只好夺路而逃，眼看着王被十几个人扎倒，他的柳条帽被一家伙用长矛扎住挑在肩上，就像挑着一颗人头！卡车司机也被扎成重伤（他们还有人性吗）。王头和腿上身中 17 枪，万幸的是他甲下面加了一护裆板，保护肚子免遭十几矛，他受伤后发起高烧，我每天喂他炼乳，管家则给他做些流食（他们人少，平常和我们一起吃饭）。当天大家吃着抢运回的食品做成的土豆炖肉，都流下眼泪。王大难不死有后福，后来回炉北大化学系并考上研究生，成为年级的党支书。

◇半夜突袭

井冈山通往外界的一口气就是 37 楼南面院墙豁口，为防弹弓架了木床直通马路边，那一天得到情报半夜公社兵要来破坏，我将信将疑，耿说一定准确（他知道监听电话之事），半夜 2、3 点钟，我与耿、魏埋伏于大门外床榻走廊内，突见冲来许多穿军棉衣、手拿消防斧的歹徒，照着床板就砍，我三人挺长矛（绑在撑竿跳的杆上）就一顿乱刺。这时聚光灯打开了，守在楼上同学一起打弹弓，连彝的小细胳臂都拉断了弹弓橡胶带。书就是在门外走廊中被后边长矛刺中的，不是逃跑时扎了屁股。

◇还乡团

化学系四年级楼里人虽不多，但住北京的同学经常不断有人来探望，我们戏称为还乡团，也有不少女生，记得有庄、云等，一次我们陪刺杀聂元梓的“凶手”到颐和园散心——在一片桃园，帮园林工人用纸袋包桃，回来见到云在楼内，她说，以后你们少出去，新北大公社到处抓人，听了很感动。

◇集体灶

吃了四个月集体灶，印象最深的有三次：管家告假由风掌权，一天早上她提了两颗猪头回来，弟兄们用长矛烫毛，她给做了一大盆，美餐几顿，纷纷称赞代表手头松。二是郑世均蒸的水晶包，很有水平，我给当小工，大铁锅下烧了一张床。三是 7•22 架线后，我们把撒在马路上当绊子的的绿豆、红豆、黄豆连马粪一起扫回，分门别类，发绿豆芽，泡黄豆，熬红豆粥，别的年级同学看到十分羡慕。

◇7•22、7•23 接电

7 月中，井冈山控制的六座楼：28 楼、30 楼、32 楼、35 楼、36 楼、37 楼被公社指使电工班强行断电，楼内失去照明，广播台也失声。更要命的是这时守楼的井冈山人只有靠电炉做饭，没有电意味着我们只能断炊。所以总部决定从地院借来变压器，安装在 37 楼内，再从 37 楼外马路路灯杆上的 11 千伏高压线接高压电进楼，经过变压器转变成 220 伏。这个行动也被公社探知，动用武斗队到接电现场破坏我们的行动。我方作了保护措施，安排人保卫接电的电工。连连征战，看到许多同学受伤，心态十分厌倦，在楼道等着出发前，彭对我说，打完这仗回家吧，我说好吧。他随手抄起两本资本论放入护甲下，“让马克思保佑我吧”，就跑到马路上。外校同学理胜写的北大武斗纪实基本准确。只是那辆带拖车的 32 路车是被 0363 小白毛拦下的，他用一个手电蒙上红布，像李玉和一样晃动，司机看到，摘下拖车调头而去，这样我们才能在马路上架起两道木床墙。后来这拖车便成了公社的坦克，不幸的是推过来被倒了的木床打住眼，坦克兵都惨了。那天他们还用了燃烧弹，很吓人。我们受伤不多，不过我却挂了最重一次彩：右眉骨中了一矛，血流不少，管家不在，风为我包扎的，多谢。当电灯重明时，大家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6、工宣队进校，历时 120 天的武斗结束

68 年 7 月 27 日，工宣队为制止清华大学武斗开进清华，遭蒯大富的井冈山的武装抵抗，工宣队员多有伤亡，事态严重，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次日工宣队也开进北大，解除了两派的武装，至此，历时 4 个月的北大武斗结束。

荒唐的文革，荒唐的北大武斗，这种荒唐事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是第一次，我相信也会是最后一次。

检视北大文革 3·29、4·26 武斗

樊能廷

笔者检视北大官方修史《北京大学纪事 1966.6-1968.9》(以下简称《纪事》) 关于“武斗”这个词语的条目，钩稽成为《北大文革两派武斗起讫》，刊发于网刊《昨天》76 期，2016 年 9 月 30 日。《北大文革两派武斗起讫》只是对于引用的《纪事》条目，结合相关的北大实际发生的事情做了简略的笔者说明。

关于北大文革武斗的文章，笔者见到过的，至今没有就各个具体战例，做详明的阐述、分析、讨论。笔者现在不揣浅陋，就目前所知的情况，试做一点努力。

先限定一下：就 3·29 和 4·26 两场“武斗”讨论。之所以分析、讨论这两个战例，因为 3·29 和 4·26 共同的“战役意图”都是“夺楼”；战斗的发起方，都是聂元梓-校文革辖下武装齐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亦称“长矛队”。

据《纪事》1968 年 3 月 28、29 日记述：3 月 28 日，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高云鹏等策划，聂元梓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 31 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3 月 29 日，凌晨 1 时，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双方 100 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严重损失。

“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是“聂元梓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 31 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

3·29 一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顺利达到战役目标，顺利占领 31 斋学生宿舍，“井冈山兵团”成员被全部、干净、彻底赶走。

自古兵行诡道，《孙子·计篇》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京剧现代样板戏《沙家浜》有一段唱词，“飞兵奇袭沙家浜。将尖刀直插进敌人心脏，打他一个冷不防。管叫他全线溃乱迷方向，好一似汤浇蚁穴，火燎蜂房”。3·29 事件结果，充分证实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夜袭“作战”符合用兵之道，颇有点儿“飞兵奇袭沙家浜”的味道。以偷袭见胜，抽丁拔楔，难怪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总指挥高云鹏得意忘形，兴奋地鼓舞唱凯：“这

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现在回顾，此役有些未曾披露的“方面”，仔细分析，会加深 3·29 事件的认识。

一、31 斋的地理和人文条件

北京大学的燕园校区，学生宿舍分布在西南区域，以燕南园南墙为北界，以“五四路”为东界，临着颐和园路的虎皮墙为西界，临着海淀路的虎皮墙为南界，这是介绍学生宿舍区的四至。学生宿舍区有两个通达校外的校门，一个是南校门，如今还在用，一个是西南校门，如今废弃了。

学生宿舍区的南北方向大路，是“五四路”；东西方向的大路，则是 28 斋楼北、向西通往校医院的那条柏油路。这条路基本上不走汽车，几乎是专走行人和自行车的“非机动车道”。31 斋扼守这条路的咽喉要冲。

化学系 03 纵队是北大井冈山派的主力队伍，其中 0363 又是“铁杆”井冈山居多；他们人多势众，都住在 31 斋。所以，31 斋被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视作井冈山的“堡垒”。31 斋两派混合居住，井冈山从上到下，没有武斗组织、没有武斗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堡垒”里的“主力队伍”、“铁杆”实际上无异于一群待宰的羔羊。

按照这些条件，“射人先射马”，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选择第一轮打击目标是 31 斋的井冈山人，就很容易理解了。

二、战役准备阶段

聂孙校文革的武斗力量是新北大公社长矛队。

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成立，早于 3 月 22 日成立的校文革“武卫指挥部”，是在“第二体育馆”成立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发轫于威名赫赫的“钢一连”，以“钢一连”为骨干力量，由新北大公社各战斗团提供兵员，这么组成的。“钢一连”连长王刚是臭名昭著的派性打手——校友郑斯宁说：“王刚大概是北大打人之最。我亲眼见过他打杨作森和魏秀芬等，用皮带。王刚、邵棠夫妇很臭。1970 年毕业以来，从来没敢露过面。失联。”校友俞小平说：“记得我们年级（63 级）核物理班的马彤军是‘钢一连’副连长，带领‘钢一连’在丰台火车站设伏抓捕肖振贵、俎栋林等五人。”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以钢管和钢筋焊制、磨削的长矛为武器，这个特征很明显，

所以又被称为“长矛队”。校文革有工厂、有工人，成批地制造长矛、铁棒，成建制地发放长矛、铁棒。

3·29 之前，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挑选一部分身强力壮派性足的工人和男同学，进驻第二体育馆（简称“二体”），举办“第二期学习班”，就是持戈试马、编练武斗队，向学员们煽动仇恨和灌输派性斗争思维。在 68 年 3 月 20 日前后，一天，井冈山兵团 16 纵队的秦乃刚同学和 02 纵队的张宏同学（邓楠的爱人）从未名湖方向回北大学生宿舍区，经过第二体育馆时，二体周围戒备森严。二人感觉有些情况异常，就停在二体门口，向里面张望，被“第二期学习班”成员发现，立刻涌出一伙手持长矛的人来抓他们，佩戴“井冈山”红袖标的他俩，快快地逃跑了。

3·29 事件，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战役目标，是夺占化学系男生居住的 31 斋宿舍楼。战役的决定，在于 3 月 28 日夜间临湖轩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战斗团团长会议，

事涉机密，与会人员级别高。在这个会议上，孙蓬一竭力主战。个别团长“非攻”，与孙意见不合，发生争论。最后，由聂元梓拍板——“打！你们要打，就打吧！”。

三、新北大公社长矛队 3·29 作战的实施

1968 年 3 月 28 日子夜，万籁沉寂，戎装静候两个小时的新北大公社长矛队，由集结地向 31 斋进发。集结地是哪里？——就是发放浆糊和大字报纸的杂品库，地址在校医院的西边。笔者记忆中，那一片没有楼房，散乱分布菜窖、冰窖、杂品库、火车票代办点……，等等平房，都在那一片。袁世凯的孙子袁家正，一个弥勒佛似的大胖子，就是卖火车票的。

就 31 斋而言，东语系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作为攻击部队，并不熟悉地形。31 斋里头有“带路党”——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的——他们也是化学系学生，熟悉各个房间住宿学生的情况，所以，才有可能在井冈山学生宿舍的门上做记号，便于东语系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攻打的时候，准确地识别井冈山学生的房间。新北大公社红三团被分配在楼外防守。

1968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农历 3 月初一，繁密的星空，未见新月。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副总指挥宫香政率队，由隐蔽集结基地“束马衔枚”来

到 31 斋的几百名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把住东南北三个“对开”楼门。在“带路党”的指引下，按照部署，迅速有序地分兵各楼层。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红三团”，被布置在 31 斋楼外警戒。

各楼层各屋的井冈山学生，毫无防备，被砸门的巨响从睡梦中惊醒，手无寸铁、无法进行有效抵抗。井冈山的所有人，包括总部成员，对于偷袭毫无预料，手里连根木棍都没有，形成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如果井冈山动心武斗，稍有武备，绝对不会出现 3·29 这种被长矛、石灰包武装偷袭、对方轻易得手的局面。

大部分井冈山学生不战而逃，被“净身出户”。包括笔者在内的数百名井冈山学生，在 3·29 事件发生时，被发动夜袭的“长矛队”赶出 31 斋（楼）。

宫香政率队，势如破竹，又用武力驱赶 29 斋的井冈山学生，夺得 29 斋。

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夜袭夺取的 31 斋和 29 斋两座楼，由宫香政负责守备。

如果 31 斋原来是单一井冈山派居住，“堡垒从内部攻破”，那么，3·29 事件，31 斋可以称作“失陷”。3·29 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攻占两派混合居住的 31 斋，31 斋只能称作“沦陷”。两种情况，具有很大的区别。

四、指证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 3·29 的不义

2016 年 12 月 9 日中午，在同班老同学“永远的 03633 群”微信聊天过程中，聊到 3·29 事件，大家认识到，应该笔之以书，存史求真。说干就干，迅速征集到同道签名的“亲历”，按照姓名汉语拼音顺序，辑录如下：①《我亲历的北大 3·29 武斗事件》：陈子明，男，是化学系 63 级三班学生，井冈山兵团成员，3·29 武斗前住在 31 斋 121 室。1968 年 3 月 29 日，我因宿舍人少，住到对门的 122 室。凌晨，被铁器碰击声惊醒，起床开门，发现一班的同学也起来了。中门北边已被床堵死；知不好，从东窗户跳出。因手表没带出，又从南门回来；哪知，跑近南门时，被一身穿黄色棉军衣、左臂缠白毛巾、手持扎枪的人追赶。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见我又

跑回 31 斋，才停下脚步。回 122 室后，抓起手表，二次跳窗逃走。于当日下午返回老家天津，直到工宣队进校，才返校。陈子明 2016 年 12 月 9 日。②《北大 3·29 事件的亲历》：樊能廷，男，北大化学系 03633 班学生，井冈山兵团成员，北大文革武斗前，住 31 斋 119 室。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我们宿舍楼遭到新北大公社长矛队突袭，我们赤手空拳。我从一楼盥洗室跳窗逃出楼。从此北大形成武力割据局面，我住 37 斋学生宿舍楼，直到工宣队进校。樊能廷 2016 年 12 月 9 日于北京。③《北大 3·29 事件的一些回忆》：我 1963 年考入北大化学系，是 0363（3）班学生，住 31 斋一楼朝东的宿舍。1966 年文革开始，班上同学分成两派，我加入了井冈山兵团。1968 年 3 月 29 日晨，31 斋突然受到北大另一派组织新北大公社的袭击，慌忙中跑出宿舍，什么都没有带。在 32 斋住了几天就转到 37 斋去住了。因为另一派的封锁，同学自己做饭。后来北京亲友来校接我走，是从 37 斋地道中出去的。3·29 事件前，双方仅为口水仗，以后互不见面。工宣队进校后，才返回北大。韩长绵 2016 年 12 月 10 日。④《1968 年 3 月 28 日夜》：我在睡梦中被楼道里铁棍砸门的声音警醒，有人大叫“公社的长矛队来了，快逃！”当时我住 31 斋一楼窗朝西的宿舍，匆匆披上衣服，从窗户跳了出去。逃出来才发现 31 斋各门已被新北大公社的长矛队把住，正从里往外赶人，被赶出来同学都很气愤。当时大家还没意识到，这一刻就是北大武斗的开始，即 3·29 事件。北大 03633 华国藩 2016 年 12 月 9 日于杭州。——我记得我住走廊西侧的屋子，从窗户跳出去的。想起我姐夫送我的一件大衣，又从窗户爬进去取出大衣。——补记。⑤《我叫李乾宽》：是北京大学 03633 班学生，住 31 斋 117 宿舍。文化大革命之大串联开始后，我基本上都在四川、贵州搞串联，很少参加北大的运动。但观点倾向反聂元梓的井冈山派。1968 年 3 月 29 日我不在北京，而是在贵阳。当我于四月中旬返京回校时，31 斋已被新北大公社武装占领。我的宿舍也被他们占领了。经交涉回到我宿舍时，我的个人物品全部被洗劫一空：包括被褥、衣物、书籍及其他。经交涉，公社的同学只给我弄了一套被褥，其他东西已无法寻找。我只好找到 43 斋一楼去居住：那里没被武装占领。直到工宣队进校。李乾宽 2016 年 12 月 10 日于贵阳。⑥《北大三二九事件亲历》：王智钧，北大

化学系六五级四班学生。北大三二九事件前，同同班同学赵万舜住三十一斋二二七房间。三二九凌晨，我俩被一阵咚咚敲门声吵醒，开门后，拥进来几个我们不认识的外系同学，他们气势汹汹地喝道：你们是井冈山的，不能在这儿住了。不由分说，就把我们赶出三十一号楼，什么东西也没让我们带。之后，我住在北航高中老同学那里，然后回老家。工宣队进校后才返校。王智钧 2016 年 12 月 11 日于北京。⑦《北大 3•29 事件亲历》：严文凯，男，北京大学化学系 03641 班学生，井冈山兵团成员，北京大学文革武斗前，住在 31 斋一楼最北侧宿舍，宿舍窗户朝北。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我正在宿舍睡觉，31 斋突然遭到新北大公社长矛队袭击，井冈山兵团成员纷纷被赶出各自宿舍，我只得从窗户跳出，逃离 31 斋。从此北大形成武力对峙，我也住到 28 斋，直到工宣队进校。原宿舍内我的所有物品，包括被褥、衣物、书籍、文具，全部损失一空。我们班浦家齐同学，上海人，已于 2015 年于上海过世，当时也是井冈山兵团成员，一贯主张文革必须坚持“非暴力”，坚决反对武斗，当日与新北大公社长矛队理论，抗议搬离宿舍，被长矛扎成“气胸”。严文凯 2017 年 2 月 7 日于北京。⑧《3•29 聂派挑起的 31 楼武斗，我是亲历者》：我是无线电系 64 级，本应住 39 斋，但那一段和赵学文住一起，31 楼东门进正面右手第一间。那晚我拉二胡、学习玩扬琴至深夜。睡梦中，一阵敲门声，我惊起开门，見黑夜中一群手持梭标的人，正在封门！梭标捣地板“咚咚”响！我觉得不对劲，趋前询一壮汉“你是哪一派的？”那小子恨恨地“哼”一声！我立即缩回，搗醒学文，“快起，公社人打进来了”。我和学文赶紧收拾东西，二胡、扬琴太大，不好带，我只背了黄书包。这时楼上传来“啊啊”的惨叫声，一会儿有人狠擂我们房间门，我和学文从西边窗户跃出，顺着学三食堂蹓至澡堂屋檐下，观察一下，突然起动向 30 楼方向冲去。后面有人喊“站住”，見我们还跑，便向我投梭标！“刷”一声，梭标从我耳边飞过，很幸运我跑脱了。到 30 楼，发现学文不知哪去了！我估计，对方有一个很懂“战争”的指挥，选择 31 斋作为武斗的首选地点，是很英明的：1）31 斋是 0363 基地；2）31 斋位置极重要，占领了 31 斋，就控制了学三食堂、澡堂、校医院，切断井冈山西边退路，28、30、32、35、36、37 根据地便成孤岛！杨金发，

2017 年 9 月 11 日。⑨《我所经历的北京大学 3·29 事件》：姚建明，男，北京大学 63 级化学系学生。文革期间，井冈山兵团成员。3·29 事件前，住北京大学 31 斋 121 室。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从睡梦中突然听到楼道北端及楼上传来金属打斗声。往外看，楼道一片漆黑，但隐约能见拿着长矛的人影在打斗。我手无寸铁，只能弃屋逃出。从此所有上学生活用品全部损失。不久便南下上海躲避武斗，直到武斗结束返校。姚建明 2016 年 12 月 9 日。⑩《北大 3·29 事件的亲身经历》：朱开定，男，北大化学系 03633 班的学生，文革时期是北大井冈山兵团成员，68 年 3 月武斗前一直住在北大学生宿舍 31 斋一楼。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我们住的 31 斋楼遭到新北大公社武斗长矛队突袭，我们在睡梦中被长矛敲击声警醒，毫无防备。我和同宿舍的井冈山兵团的同学一起跳窗逃出。从此北大形成武力割据的局面，我无法再回 31 斋宿舍，后来住 37 斋学生宿舍楼，直到工宣队进校。朱开定 2016 年 12 月 9 日于仪征。

3·29 事件，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副总指挥宫香政率队，突袭、血洗并且占领 31 斋，顺势拿下 29 斋。0165 力学班郑斯宁说：“我是（年龄学历）小字辈，数力系 65 级。更主要的是，我当年参加井冈山只是出于正义感。3·29 凌晨被新北大公社郭玉堂等赶出 29 楼后，就逃离北大，直到武斗结束才返校。”

我们这些 3·29 事件第一现场的受害当事人，至今愿意站出来，指证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发动 3·29 武斗的不义。

五、新北大公社长矛队 3·29 洗劫 31 斋并且纵火，打砸抢烧杀

新北大公社长矛队发动武斗，夺占 31 斋，打伤井冈山学生逾百人，制造了北大文革中著名的 3·29 事件。不仅于此，他们还在 31 斋尽情洗劫，实施纵火。

化学系 62 级李可忠原来住在 31 斋 215 室，除了他还有两个新北大公社成员住，李可忠基本不在 31 斋，所以那个房间 3·29 没有被查抄。但是他放在抽屉里的 20 元生活费和一些其他东西都丢掉了。

在把井冈山学生全部赶出 31 斋后，这几百名井冈山学生在一夜之间，全被抄家。这是北大文革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抄家。抄家当然顺带

“查抄”，“查抄”就是为了在鸡蛋里查出骨头来。3·29 是北大“文革”中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查抄”，那么“查抄”到什么文字罪证？——没有！事后只知道，新北大公社长矛队在 31 斋进行大洗劫，他们有人在 3·29 以后，手臂上上下下带了五、六块手表。

《燕园风云录·三》17 页，蔡华江的回忆文章指出，3·29 天刚蒙蒙亮，他跑进 31 斋。从 31 斋的南门进入一楼，只见楼道里一片狼藉，到处是水，还有衣物、书籍和其他物品乱七八糟的摔在楼道里，有的浸泡在水中。一楼很多宿舍的门敞开着，空无一人，里面也是乱七八糟，情景和楼道差不多。

为什么“到处是水”？因为新北大公社长矛队占领 31 斋后，有人纵火！120 房间和 101 房间烧得一塌糊涂。——为了灭火，就要泼水，所以“到处是水”。占了楼，殴打、杀伤、驱赶人家的人，劫掠了人家的财物，还要放火。纵火之人，是何肺肝！

31 斋 120 房间在 3·29 事件中，只有一个人居住。笔者听说他作为“不知情”的新北大公社成员，越窗而逃，被井冈山“俘虏”，弄到 28 斋，还挨了打。在 3·29 事件中，31 斋整座楼被新北大公社长矛队包围，而且“分层”、逐屋“巷战”。这位同学，穿着跟长矛队同样黄色的军棉袄，怎么在跳出窗外后，被井冈山“俘虏”？既是跳窗，就是说没有“开门迎客”，长矛队“客人”是破门而入的，为什么破门而入的“客人”要在这间屋子放火？——情节扑朔迷离，令人困惑。

3·29，兵燹、劫掠、戕害，打砸抢烧杀，无不表现一些人“阶级斗争”中的无恶不作！网刊《记忆》2017 年第 193 期，第 38 页，宫香政文章《答魏明、梁珊、陈子明、林爻先生》自称：在北大武斗期间，我只参加了“3·28 至 3·29”武斗的研究和指挥，3·29 之后我一直驻守 31 楼，所以其余两派的冲突我均没有参与，连两派交换“俘虏”的事，我都没参与。

谎言掩盖不了真相，历史的判决，没有放过制造 3·29 武斗的元凶大憝宫香政，没有抹杀北大 3·29 事件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的罪责。

六、新北大公社虐待“俘虏”

3·29 事件中，31 斋井冈山学生被新北大公社长矛队野蛮突袭，夺门而逃、越窗而逃、跳楼而逃，不一而足。保得全身的，都算幸运。化学系 65 级学生刘文建不走运，他赤手空拳逃出 31 斋后，跑错了方向——逃向东方就会得到平安，而他一时懵懂，逃向西方——新北大公社占据的校医院方向，误入虎穴龙潭，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拿获，打得头破血流，关押在黑牢。双方交换“俘虏”，他被释放，带伤归队。浙江诸暨人，03631 班蔡小海，出身好，自恃一向与本派“井冈山”观点不甚相合，反对派斗，自诩公允，非要向新北大公社长矛队问个究竟。施施然被“新北大公社”捉了去，蒙住双眼，捆上双臂，带到一个所在，棒打一顿，头部也挨了一拳，这才放掉。蔡小海挨了打，却说不清在何处挨的打。他气愤不已，从此转向铁杆反聂。03641 班学生浦家齐，一贯主张文革必须坚持“非暴力”，坚决反对武斗。3•29 事件中与凶狠强横的新北大公社长矛队论理，抗议被驱离宿舍，被长矛扎成气胸。

哲学系 62 级周国平[1]也当过“俘虏”，他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中记述：

我们上街都从 37 斋（学校南院墙）这个缺口进出，不过仍须小心，因为外面的街面受到“新北大公社”弹弓的火力封锁。更有一层危险，便是他们用望远镜监视着这块街面，发现有人从缺口走出，无论向西还是向东，都会经过他们所控制的某一个校门，他们就会冲出来抓人。

我对打派仗的态度十分淡漠，几近于中立，便自信他们会对我手下留情。因此，有一回，我确实要进城办事，就大大方方地从缺口走出，朝东边的公共汽车站走去。

然而，在靠近车站时，忽然有一个人骑自行车挡住了我的路，接着一伙人冲过来把我抓住了。他们脱下我的外衣，蒙在我的脸上，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我能感觉出这是一个房间，一些人在我旁边说话，其中有几个女生。开始审讯了，问我地道在哪里之类，我嘲笑说，你们不能攻占这

[1]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哲学研究者，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著名学者之一。

两座楼，知道地道在哪里就没有意义。你们能攻占，到时候就自然知道了，何必要问。其实，我没有下过地道，还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完全是出于气愤，偏偏这样说的。当然，招来的是一顿狠打，把我颠来倒去，拳打脚踢。挨打时，我听见那几个女生在清脆地笑，真令我对女性要刮目相看。审讯时间倒不长，我被带到另一个地方，除下蒙在脸上的衣服，我发现眼前站着几个我班的对立派同学，其中有李主庆。李是调干学生，比我年长得多，一向像兄长般对我友好。他说要和我聊聊，我回答说，我不想以俘虏的身份聊，要聊以后再聊。话音刚落，那两个押我来的外系学生怒不可遏，举手就要揍我，被李劝阻了。李依然对我友好，带着沉默的我穿过校园，把我送出了校门。

刚回到楼里，我班一个在井冈山总部任职的同学立刻跑来慰问我了。原来，总部对新北大公社的电话实施监听，听到了抓我的那伙人与我班“新北大”人之间的通话，已经了解全部经过。他免不了要对我的英勇表现夸奖一番，并且告诉我，因为我班那些人的求情，我才免遭更多的折磨。

七、话题转到 4·26

《纪事》1968 年 4 月 25、26 日条目记述：4 月 25 日，井冈山兵团总部派武斗人员驱赶住在 36 楼的“新北大公社”的成员，占据了 36 楼。4 月 26 日，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 36 楼，双方发生第二次大武斗。孙蓬一、高云鹏亲到现场指挥。这次武斗造成双方二百余人受伤，损失大量公私财产。此后，聂、孙又下令攻占了 25、27、17、18、19、20、21、22、23 和 24 等楼群，形成了对占据 28、37、36 等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了以黄树田为总指挥的“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以宫香政为总指挥的“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其打垮。

笔者在《北大文革两派武斗起讫》中陈述，井冈山兵团“4·25”吓跑几个对立派学生，夺占两派混住的 36 斋女生宿舍楼，把孤悬的 37 斋与 35 斋连成一线。“4·26”午后发生的战事，是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想从井冈山兵团手中攻取 36 斋，再度拦腰切断井冈山兵团“割据区”。这一天，

井冈山固守 36 斋楼房，从头到尾，完全是守势。新北大公社长矛队从平地仰攻，虽有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校文革武斗总指挥高云鹏两位哲学系“师尊”亲临现场指挥、鼓劲，终于被孤立无援的“丐帮”守楼人员依仗地利，危楼砥砺、居高临下，用瓦片、砖头、石块奋力击退。

笔者说“孤立无援”，是说井冈山兵团头一天刚刚拿下 36 斋，与北边 35 斋、南边 37 斋，还没来得及用木床架设地面上的安全通道（古称“砦栅”）。次日 36 斋被新北大公社顶盔掼甲黄军袄的强兵，铁桶般团团围困，水泄不通。35 和 37 南北两座楼的井冈山“丐帮”想帮忙，但是没有能力杀透重围进入 36 斋去增援。

36 斋攻防战，此役，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一方志在夺楼，动用了卡车、云梯，云梯架在卡车上；还在武斗队后方布列男女教师员工，穿上武斗队的服装、手执长矛，充数以壮大陈师的阵容。地球物理系中年女教师资民筠，带着 1800 度的德国蔡司近视镜，头戴柳条帽，身穿黄棉衣，自愿手执长矛，站在公社武斗队列中。还有地球物理系中年女教师张元箴，她也带着近视镜执戈上阵助威。此外还有不愿意参加武斗，被拉来助威的教师和学生。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一方的众多大弹弓对着 36 斋密集发弹轰击，矢石交加，压力巨大。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卡车倒车到 36 斋西墙的窗口下方，武斗队“战士”头顶着桌子，持矛攀梯冲锋仰攻。守楼人员情急，先后从高处对准云梯推下当作礌石的暖气片组，砸断云梯，梯子砸瘪卡车驾驶楼子，虽然没伤着人，声势訇然，把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吓破了胆，纷纷曳戈而逃。

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数十人，抬着电线杆，当作攻城“擂木”，喊着号子，合力撞塌 36 斋西墙，攻入一层。然后由西向东，逐屋轰塌“二四墙”前进，总共推进四个屋子。二层楼的井冈山守楼人员，用大铁锤在地板上砸出洞，居高临下，从地板洞中用长矛向下猛戳，扎伤了几个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被迫逐屋后退，最后扔下电线杆，完全退出 36 斋。

八、对于“3·29”和“4·26”两役的反思、分析

3·29，一击得手，公社一方毫发无伤，大获全胜。4·26，公社一方损伤巨大，鸣金退兵，铩羽而归。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长矛队，两次

都是主动发起攻楼、夺楼，为什么战况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有什么玄理?

对付两手攥空拳的和平学子，“披坚执锐”的新北大公社长矛队确实是“能打仗、打胜仗”的“威武之师”。然而，一旦那些和平学子操戈反抗，新北大公社长矛队就成了熊包蛋。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局面，变化就是如此奇妙。往古代说，秦王扫六合、一统宇内，把民间的铁器收缴，铸成咸阳十二铜人，黔首手无寸铁。霖雨连日，大泽乡“戍卒”陈胜、吴广斩木揭竿而起，天下响应，两年零三个月，暴秦灭亡。

3·29 李钟奇一天之内来北大两趟，不是查明真相、追查祸首，而是偏袒聂孙文革一方，为虎作伥。谢富治 3·29 晚间来到北大，带来四点指示，使得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发动的武斗“名正言顺”、气焰更加嚣张。

3·29 事件中井冈山伤逾百人。血的教训，给井冈山人擦亮了眼睛：指望“公道自上来”，是不行的。井冈山人要想尊严地活下去，只有拿起武器，针锋相对，武装自卫——不求公道来自青天，拚却自身热血求生。

长矛毕竟是冷兵器，制作工艺简单，在 20 世纪 60 年代，算不得什么“高精尖”武器。28 斋的井冈山，搞来了一台电焊机，长矛的制作，立即开张——用 3·29 事件中付出血的代价、赤手空拳夺来的长矛作范，用停止供暖的暖气管作为金属材料资源，很快“量产”出一支支“非制式”长矛。持矛之士，称呼为“丐帮”。

3·29 事件后，井冈山从无到有、生产了足够、适用的长矛，3·29 那种任人屠宰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学校形成两派武力割据局面，拿起刀枪的井冈山男儿，据守六座学生宿舍楼，座座都是金城汤池，从外部攻打，难如登天。

往后，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冲昏头脑地规划围剿对立派，“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其打垮”的雄图伟略，完全地破产。如今燕园怀古，反思起来，五十年情事久阔，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以为依靠暴力、绑架、酷刑、逼供和残杀就能把全校数千名批评者的抗争扼杀掉，他们赖以维护统治的诸般武

器和无所不用其极的邪恶、残酷手段，恰恰说明这个政权的本性——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

说到底，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真实。多行不义必自毙——文革结束后，操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校文革主任聂元梓、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不等，给他们的政治生涯划上句号。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东线总指挥黄元庄开除党籍，定为坏分子，交给群众监督。校文革“常委”李清昆和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西线总指挥宫香政被划为“三种人”，开除出党。

（原载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昨天》第 86 期《史林一叶》）

北大“3•29 武斗”印象

散淡天涯

1968 年 3 月的北京，正当春寒料峭，文革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在文革“发源地”北大的校园里，同窗共读的同学分裂为两大派。一派是聂元梓麾下人多势众的“新北大公社”，另一派是人数相对较少的由几个反对派组织联合组成的“井冈山兵团”。几乎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分裂成了两派，我们班 8 名女生，仅有我和小 X 是井冈山一派的。校园里的不安和骚动日益明显，双方陷入无休止的辩论、争吵、围攻甚至人身攻击，小范围的纠纷也不断发生。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两派同学真的就能仇恨到同室操戈，你死我活的程度。

1968 年 3 月 28 日，武斗前夕，大约傍晚时分，井冈山五一纵队在 40 斋召开会议，主持者通报了一些两派斗争的情况，说已经发生了井冈山兵团人员被抓走的事件，告诫大家以后不要到未名湖散步了。尤其强调说“新北大公社那边准备了铁棍、长矛等武斗工具，分发了白毛巾准备绑在胳膊上作标志”，看来一场死战已经在所难免。要求我们当晚就将自己宿舍里的公社派同学赶出去。组织了一些男生寻找铁棍制作武斗工具，还派人去摘掉公社派的高音喇叭。

我和小 X 都觉得不可能发生你死我活那样的武斗，因为观点再对立，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敌人”，毕竟都是朝夕相处的同窗啊！不要说武斗了，就是赶走他们也是万万不可的。这叫我们十分为难。不料我和小 X 回到 35 楼宿舍时，公社派的女生已经离开了。由此可知新北大公社那边也做了相关部署。我和小 X 面面相觑：“难道——真的要打？”我们开始担心了，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也证明了我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就在当天夜里，亦即 3 月 29 日凌晨，武斗发生了。

当时我和小 X 已进入梦乡，突然被一阵突发的嘈杂声惊醒了。我们不敢开灯，悄悄地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只见井冈山男生住的 31 斋那边灯光乱闪人声鼎沸，有男生变了嗓音地嘶喊：“公社派的攻楼了！”接着我们就看到有些井冈山的男生只穿着汗衫裤衩从二楼和三楼的窗口跳下来，有的刚刚落地就被胳膊上绑白毛巾的人用铁棍狠狠地戳打。小 X 焦急地说：

“这样跳下来，又被这样子暴打，人还能有救吗？”我当时除了惊恐愤怒，剩下的就是透骨的无奈，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天亮之后，校园里议论纷纷。听我们班井冈山的男生说，当天夜里他们住的 40 斋也同时被新北大公社的人突袭了，包围之后一部分人还冲进了楼里。井冈山的同学就组织起来往外冲，有的也从二楼三楼窗口往下跳。不少人冲出来时被对立派从楼上扔下的砖块砸破了脑袋，有的被对方用铁棍、长矛打伤。

这次武斗中受伤的同学不计其数，我们班的男生 Y 被公社派的人用铁矛刺成重伤，送进医院急救。医生说他身上总共被刺了 17 枪，幸而都不在要害部位，侥幸保住一条命。但有一枪扎在大腿的股动脉和静脉之间，造成动静脉瘘，那部位还长了两个瘤。后来又在北医三院做了 13 个钟头的大手术。怕他父母担心，不敢告诉实情，是我们班的男生 W 代替家长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3、29 武斗”发生之后，北大两派形成了割据阵势。许多同学目睹了血腥情状离开了学校，也有一些家长来校带走了自己的孩子。我和小 X 离家远，巴望这种局面早点结束，所以又留下来坚持了一段时间。我们住的 35 斋，南、北、西三个门都被堵死，西半部的楼道用床和桌子筑成了一道直顶天花板的“防御工事”，我们班女生原先住的两个房间都被封死了，我和小 X 被安排到最高的五楼住下，每人领了一张出入证。一楼东半边住的都是男生，他们负责门口的站岗值勤和夜间的值班、保卫。校园里大部分宿舍楼和活动区域区域，还有学校的东南门、东门、东北门、西校门都被新北大公社控制了，我们仅能从西南门进出。我们所处的位置，犹如海上的一座孤岛，连去食堂的路都被封锁了。

不久，校园里出现了一种“新式武器”，那是一种强力弹弓，将架子床反扣过来，在两个朝天的床腿上绑一条自行车的内胎做弹弓，拉开弹弓射出的弹子是半截砖，射程能有几十米，只要有人走出楼，就有大块的砖头飞射而来。为了安全防护，楼与楼之间用架子床和床板搭起了狭窄的通道。

武斗打打停停，一直延续到 8 月份 8341 部队和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

想宣传队进校。

那个时候的北大已经完全不是一所高等学府，整个校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每天上演的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闹剧。许多满怀报国之情的热血青年都迷失了方向、迷失了本性，陷入了人生最可怕的妄想和疯狂。

如今想起来，真的恍如恶梦一场。

这张照片拍于武斗结束不久，站在井冈山兵团当年唯一的出入口。是一位不认识的同学帮我拍了，印好，又给我送来的。我甚至没有问问他的名字，留下深深遗憾。

（编者注：本文作者是西语系女生，已于前几年在海南去世，此文是她生前的遗作，在此沉痛悼念她。）

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

俞小平

我是北京大学校友，1963 年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自 1966 年 6 月至 1970 年 3 月，我在北大全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就像我的同学们一样，在北大文革中见识、参与了很多重要事件。文革在中国史以致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不下于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等震惊世界的大事。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以致世界最重要的大事之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然基本缺席于中国现代史。不要说我们的下一代、下二代年轻人对文革缺乏基本常识性的了解，就连我们这些当年的参与者，年轻时期的记忆在我们的脑海里也是渐行渐远了。以致有人说，中国根本就没有靠得住的现代史。如今由于一些公众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文革史了解的匮乏，竟然开始呼唤文革了。因此我赞成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写下自己所经历的文革事件，共同构筑文革的真相。具体到北大，无论你是新北大公社的，或者是井冈山兵团的，还是两派以外的“逍遥派”，都来写下自己经历的北大文革，共同构筑北大文革的真相和北大文革史。

由于事隔多年，旧存资料已经基本遗失殆尽，只能凭记忆回想，如有事实上的错误，请大家指出，本人感激不尽。特别要说明，本人是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成员，叙事观点可能带有派性，而这正是我想要避免的。

在 1967 年 8 月 17 日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井冈山兵团成员不承认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因此在 1968 年的北大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北大支持聂元梓一派势力的两个机构：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构，新北大公社是受校文革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即使井冈山兵团不承认校文革，校文革仍然掌握着全校党务、行政、人事、财政、住宿、食堂、物资、保卫等等大权。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位一体。这使井冈山兵团在北大的派别斗争中从一开始就注定处于劣势。[1]

北大文革于我印象最深的是 1968 年历时四个月的大武斗。我在网上读到的北大文革史，谈及北大大武斗的不多，只有唐利[2]、张曼平[3]、李竟然[4]、司徒文[5]等人的文章，以及聂元梓的回忆录[6]。我想从我的个人经历

描述我所亲历的武斗事件和我的感受。

北大“文革”大武斗是怎么开始的?

原新北大公社同学（及教职员工，下同）的文章，多把大武斗开始的日期定为 1968 年 3 月 25 日，地派（“北京高校地质学院派”的简称）各校近万人涌进北大反对新北大公社、支持井冈山开始。3 月 22 日，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倒台，聂元梓和校文革十分被动，士气低落。25、26 日，外校人员虽然与新北大公社人员发生冲突，规模并不大，且多为拳脚相向，没有听说几个人受伤，而且北大井冈山人员大多没有参与。在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下令外校人员退出北大后，事情就基本平息，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冲突。3•25 冲突与其后大武斗中的 3•29、4•26、5•2、7•22、7•23 武斗相比，在事件的策划、伤及的人员、对运动的影响上，都是完全不能比拟的。27 日，全校人员大多参加了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北大两大派都去参加了。校内安静，但是气氛十分紧张，有传言说新北大公社要发起进攻，井冈山总部安排各纵队（井冈山兵团的系级单位称为纵队，以各系的编号为纵队编号，如技术物理系编号为第 17 系，井冈山组织就称为 17 纵，加上后勤青年工人组成的“海燕纵队”。我们也自称“井冈山人”或“老井”。）派人前往 28 楼井冈山总部执行保卫任务。28 日晚轮到我们 17 纵，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前往，在 28 楼戒备。

过了午夜，忽然听到外面噪声大起，有同学衣衫不整，冲进楼门说出事了，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大举进攻 31 楼，把化学系 03 纵井冈山派的同学打出来，很多井冈山人受伤，有人跳楼逃跑。总部启动广播喇叭，来自 17 纵的总部委员程汉良在广播中呼吁井冈山人抵抗新北大公社的武装进攻。我们在 28 楼的老井，组织了二三十人，每人拿了一根大约一米长、一厘米粗的钢筋当作武器防身，向 31 楼推进，企图救援受伤的井冈山人，在 31 楼南门附近遭遇了数十名装备精良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公社武斗队看到我们过来了，立刻排列整齐、手持长矛、高呼口号向我们冲锋。在对手优势武力的冲击之下，我们无法抵抗，只能狼狈而逃，退回 28 楼。不仅 31 楼，40 楼也打起来了，住在那里的井冈山“五一纵队”（西语系的井冈山

成员）竟然打败了企图偷袭的红 9 团（新北大公社的系级组织为“战斗团”，东语系的新北大公社组织称为“红 9 团”），俘获大约 30 名新北大公社成员，连红 9 团团长都被俘，“战俘”被押送到 28 楼，关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7]

28 楼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老井，也送来了越来越多的伤员，有些人受了长矛扎伤，有些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印象深刻的是一个陷入昏迷的伤员，他被送来后，放在楼道里的一张桌子上，一直没有苏醒，腰部一片鲜血，看护他的人说他的腰被打断了，不能移动。后来来了救援的卡车，这个伤员连桌子抬上卡车，送到医院去了。天快亮的时侯，我顶不住困乏找了个房间去睡觉，尽管外面两派大喇叭吵翻了天。没有看到聂元梓陪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来到武斗现场，没有看到武斗策划者聂元梓假装事不相干的好人，没有看到聂元梓被刺事件。

井冈山认定 3•29 武斗是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策划的，新北大公社同学是否同意？从一些公社派成员的回忆录看，至少有部分公社派成员认同这一点[5]。既然武斗是聂元梓策划的，武斗发生了又到现场，装着没事人的样子，快意地观赏她的部下造成的后果，这样的人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北大 3•29 武斗之后，聂元梓的朋友、同为“北京高校五大领袖”的清华大学团派头头蒯大富在他的回忆录《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8]中说：“清华武斗之前，北大 3 月 29 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蒯大富对 3•29 武斗的评论揭示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策划、发动武斗的阴谋的目的：迫使中央表态，打垮井冈山兵团。中央表态了，谢富治支持了发动武斗的校文革，谴责了损失惨重的井冈山兵团。但是井冈山没有垮，井冈山人熬过了最初的打击，井冈山人撑住了。

把 3 月 29 日凌晨在 31 楼发生的攻击称为“武斗”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是双方对阵的武斗，而是新北大公社专业武斗队对 31 楼井冈山 03 纵的蓄谋已久的突然袭击。校文革企图以这一招打垮井冈山最强大的一个纵队。新北大公社达到了它的目的：重创 03 纵。当夜井冈山至少一百多人

受伤，很多老井“被俘”。但是这种偷袭也激起了井冈山人同仇敌忾的士气，使北大文革走向大武斗的不归路。我不是 31 楼的住户，化学系 03 纵的唐利著《我的北大文革记忆》[2]和张曼平著《我所经历的 1968 年北大武斗》[3]对当时当事有详细的叙述。当夜对着我们冲锋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从武器、装备、组织到后勤，都占了巨大的优势，一个强势的当权派向一个弱势的在野派发动突然袭击的优势。其后几天，一个老井给我看了他们从公社派那里缴获的一支长矛。那长矛的表面是桔红色的防锈漆，显然是用无缝钢管原材料截取的，长约 1.6 米，比我的身高（1.78 米）略低些，直径 2 厘米多，顶端焊有一段约 30 厘米长 1 厘米粗的钢筋，钢筋顶端用砂轮磨得尖锐锋利无比，闪烁着冷酷无情的钢铁光泽。这是北大两派冲突中从未出现过的武器！我看着这样的长矛，心想他们就用这样的武器往同学身上戳吗？这样的利器刺出，带着钢铁重量的惯性，足以把一个人刺个对穿，并且取其性命！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是当权派，有权、有钱、有物资、有住房、有食堂，擅权卡住教职员工的工资、学生的助学金不发，有权给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成批下发棉军大衣、柳条帽、长矛，后来更以昂贵的不锈钢板材成批切取护胸甲，冷兵器时代的武器他们都有了。井冈山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无奈之下，只能锯下楼内的暖气管做长矛，模仿新北大公社，也在暖气管上焊上钢尖，头戴规格不一、各处收集来的柳条帽，身披材料不同的护胸甲，披挂上阵，面对不时冲击而来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

在 3•29 武斗之前，无论出过什么事，对北大人的生活整体影响不大，3•29 武斗之后，大批师生员工逃离北大。3•29 当天我住的 41 楼附近的小南门被校文革关闭封锁，逃难的人群推倒了校门旁边的一段围墙，越过豁口逃生。我所住的 41 楼挨着武斗现场 40 楼，再住在那里很不安全了，我把我的一些细软送到我的朋友家里，把床上的被褥和洗换衣物扛到 28 楼去了。

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副司令李钟奇来到北大制止武斗，听信的全是一面之词，井冈山被人袭击，反而都是井冈山的不是。这样的调解无以服众，也没人服从。新北大公社想打垮井冈山，而井冈山更想死里逃生。双方的“战俘”倒是都释放了。连被校文革抓去、

残酷刑讯逼供的樊立勤也被 44 楼的新北大公社总部扔了出来，因为樊已经被折磨得奄奄待毙，校文革怕他死在他们的刑讯室里没法交代。详情可见颜品忠《一个北大哲学系普通教师的动乱劫难》[9]。

樊立勤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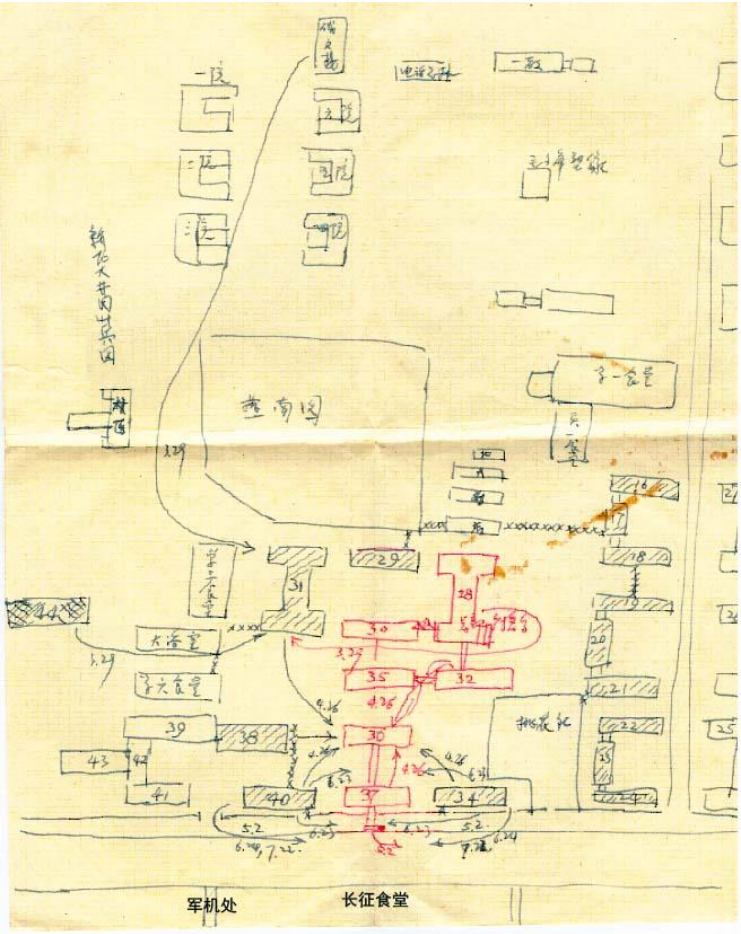
说到樊立勤，樊可是北大文革的名人之一，当时在北大无人不知。樊胆大包天，不但挑头反对聂元梓，而且敢于“炮打”势焰熏天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因为反康生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 1966 年底就有两个小组织“井冈山”（这个组织是“井冈山红卫兵”，不是后来的“井冈山兵团”）和“红联军”支持他。北大大多数人觉得他的观点太极端，自他“炮打康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敢于支持他的人就更少了。1967 年 8 月井冈山兵团成立时，井冈山兵团总部接纳了支持樊立勤的“井”、“红”，但是不接纳樊立勤。可是几乎所有不抱偏见的人都佩服他的胆量和宁死不屈的精神，聂元梓更视他为头号敌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68 年 3 月下旬，校文革突然放风，说现行反革命分子樊立勤外逃，跟着就发出通缉令，实际上他们已经把樊秘密抓捕，在 44 楼刑讯室里私刑拷问逼供了。1960 年代的人们爱提起的国民党罪行之一，就是国民党的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酷刑。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描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数不胜数的拷问酷刑，我们没有亲眼见过，可是在 1968 年 3 月下旬，新北大公社的酷吏们就在刑讯室里以同样骇人听闻的酷刑，强迫樊立勤承认校文革欲加之的“现行反革命”罪名。樊宁死不从，新北大公社的酷吏们竟然以铁钉钉入膝盖、竹签插入指甲等酷刑将樊拷问了两天两夜[9]！4 月初，我去北医三院看一个被新北大公社酷刑逼供打断腿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樊立勤就在隔壁病房。我从窗口看到樊满身通着管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樊被救以后，在北医三院住了很久。1968 年 8 月工宣队进校后，又限制他的行动自由，直到 1969 年 3 月 8341 部队（中央警卫团）进校后，才将樊送去医院治疗。樊的膝盖矫治手术失败，落下了终身残疾。1969 年我和几个同学在北大南边的海淀镇巧遇樊立勤，大家见他终于“出来了”，都上前问长问短。问起他的“刑伤”，他挽起裤管，给大家看他膝盖上的铁钉钉伤。大家都愤怒地痛骂校文革的监狱酷刑

逼供的惨无人道。

校文革的围剿和井冈山的反围剿

这张北大武斗形势图，是我在 1968 年 8 月武斗结束后，手绘寄给我的父母的。因为我的母亲保留了我写给他们的全部信件而得以保存至今，如今是一件难得的“文物”了。地图上北下南，最南端是北大校园南墙，墙外东西向的海淀路，是进出北大学生宿舍区的主要道路。所有武斗割据楼宇，除了井冈山总部的 28 楼（原为越南留学生宿舍楼，越南留学生已经离开）和新北大公社总部的 44 楼（原为北大招待所），都是学生或教职员工的宿舍楼。红色绘的是井冈山占领的楼群，黑色绘并加以斜线的是新北大公社占领的楼群，楼上的数字是楼号。带箭头的线显示双方的进攻与防守，线上的数字是武斗的日期。连续的 xxxxxx 是新北大公社的封锁线，由双层床等家具构成。井冈山在 28 楼与 30 楼之间、32 楼与 35 楼之间架设了天桥（都在四楼），各楼地下开挖了地道，地面各楼之间的道路用双层床联通，以抵挡新北大公社弹弓的袭击。由图可见，井冈山防守的六座楼几乎被新北大



图一 北大武斗形势图

公社占领的楼群完全包围，只剩下 37 楼通向海淀路的一口“气”，没有这口“气”，井冈山就“气数已尽”了。

大武斗开始以后的校文革及新北大公社，日益压缩井冈山的生存空间。井冈山人去食堂吃饭被打，上海淀镇购物被打被抓，在校园里路过被打被抓。4 月 26 日，爆发了 3•29 事件以来的第二次大武斗。这一次，井冈山的群众得到警报，先机进入 36 楼，使得井冈山占领的楼群能够从校园内部的井冈山总部和广播台所在的 28 楼到海淀路边的 37 楼连成一线，打破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分割包围，得以苟延残喘。占领 36 楼是井冈山不得已的选择，为了生存不得不为之，不是老井们要去伤人。

新北大公社同学的回忆录抱怨他们的人被井冈山的弹弓射出的砖块打破了头，在此我愿向被打伤的新北大公社同学道歉，那时我们双方都有点失去人性。但是我希望读者看一看图上的形势，到底是谁在围剿谁？如果井冈山真的要挑起武斗，怎么会摆出这样一副挨打的架势？3•29 井冈山已经在 40 楼打败了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因为没有想到后来的局势而放弃了，后来 40 楼成为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西线指挥部”和“钢一连”的驻地。东边的 34 楼很孤立（再往东的一个院子不属于北大，是一个生产挑花纺织品的小工厂），井冈山要想占领也很容易，这里后来成为新北大公社东线武斗指挥部和生物系红 4 团的驻地。40 楼西端是北大的小南门，34 楼东南的围墙打开了一个豁口，这两个出口是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出击地和封锁线，离井冈山楼群的唯一出口（37 楼前的围墙豁口）都不到一百米，公社武斗队在这两地日夜监视井冈山人的出入，想抓谁就抓谁，抓进去酷刑拷打。

不说别人，仅仅我所在的班的老井，为了在楼间架设双层床躲避新北大公社的弹弓，梁正路被弹弓射出的石块打在胸口，好半天喘不出气来，胸口疼痛多日；陶令煌被石块打在额头正中，一时流血披面，送到北医三院做了缝合。武斗结束后伤疤仍在，好像前额长了第三只眼睛。

我所在的班，井冈山成员有 30 多人，在武斗中有三人被新北大公社抓捕。第一个是郭青苔，郭在 3•29 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攻打 31 楼时路过附近，被公社武斗队拦住，问明是井冈山成员，就抓进新北大公社总部 44 楼，

酷刑拷打，以致打断了腿，昏迷不醒。4 月初双方交换“战俘”时才放出，送到北医三院。我就是在那时跟着总部委员程汉良去慰问他，顺便看到了九死一生的樊立勤。

第二个被抓的是我自己。大约 4 月 10 日，我在海淀镇的废品收购站想买点半导体收音机元件，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强抓到 44 楼，用我的衣服蒙头押到楼上，强迫我承认在海淀镇偷卖新北大公社成员的物资。我被钢管在头上、脚上爆打，打得头破血流、打裂了脚踝骨。放出来后好久不能走路。

第三个被抓的是女生周振琦，是在 5、6 月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抓她关押数日，殴打折磨，放出来后精神恍惚。也许不必深究原因，你是井冈山兵团成员，这就足够了。

如此算来，我所在的班有十分之一的老井被捕过。井冈山全体成员大约有数百人被捕过。

井冈山兵团怎样生存

校文革已经把井冈山兵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控制的保守组织”，保守组织要打垮，反革命集团成员要抓捕。为此，校文革在 3 月 20 日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以高云鹏为总指挥。待到 3•29 之后，新北大公社包围井冈山的形势形成，更在其下成立了武斗西线指挥部（驻 40 楼，以我的同系同级同学宫香政为西线总指挥）和武斗东线指挥部（驻 34 楼，以黄树田为东线总指挥），从两边夹击 37 楼的出口[4]。为了抵御弹弓的袭击，井冈山在 37 楼前架设了宽 5 米、高 4 米、用竹木苇席搭成的大棚，从 37 楼直达海淀路边。大棚日夜有人把守，以防新北大公社攻击。我作为 17 纵成员，驻守 28 楼，有时到 37 楼前来“放风”。闲来无事，井冈山人也会在大棚下用长矛比试，互相切磋武艺。有时比着比着，就看见新北大公社从 40 楼旁的西南门或 34 楼前的豁口拉出队伍、装备整齐、准备向 37 楼前的井冈山寨门出击。每到此时，井冈山值班的前线指挥就会让不相干的人员离开大棚，也拉出队伍来准备防卫。海淀路成了北大武斗的主要战场，自 5•2 武斗后，所有的攻防都发生在海淀路上，如果 37 楼前的寨门被新北大公社攻占，井冈山的气数可就到头了。

北大两派武斗不仅震惊全国上下，而且让外国人也深切关心，西方国家的报刊登出北大武斗的文章和照片，全世界人民都在惊讶，这个中国最高学府到底出了什么事，要用古代的冷兵器拼个你死我活？每逢武斗，海淀镇居民是现场最忠实的观众。尽管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敢于向井冈山的前沿冲锋，用长矛捅进同学的身体，却不敢轻易伤害海淀镇的居民。这使海淀人能够救援对阵中弱势的井冈山人，阻止公社武斗队的长矛刺向受伤倒地的老井。

老井们要想离开被包围的井冈山楼群，就得通过海淀路两边的新北大公社封锁线。最安全的办法是在 37 楼前的大棚下等候，待到 32 路（现在的 332 路）公共汽车从西向东开到马路对面南侧的汽车站时，快速越过马路，冲上 32 路车。在回来时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因为马路北侧的 32 路车站在新北大公社把守的小南门的西边，下了车必须越过小南门才能回到 37 楼前。比较安全的方法是坐到下一站下车，然后往回坐一站，到南侧 32 路站下车，穿过马路就到 37 楼了。32 路车不是总能等到的，如果你要步行通过两边的新北大公社防线，你就得冒被抓进去的危险。有时 37 楼大棚下的人们，眼看着一个井冈山人被抓进去了，但是无能为力，无法救援。多少人就是这样被抓走、被关押、被拷打的。

在校内，数百名教职员工被校文革长期关进诨名为“牛棚”的非法监狱，几十名井冈山人被长期私刑关押。新北大公社不仅在北京抓捕井冈山人，甚至以校文革名义派人到外地以“抓捕现行反革命”为名抓捕井冈山总部委员和重要成员，以公函写信给外地井冈山同学的家人，诬以参加反革命集团控制的保守组织的罪名，以致许多老井的家庭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

校内有武斗，校外也要造舆论帮衬。井冈山没有电台，没有报纸，大喇叭声音也传不远，在北京市内就只有靠大字报了。抄大字报是件费力费时的工作。为了提高效率，老井发明了油印大字报。油印的大字报有八张蜡纸那么大，就是把大字报内容刻在八张蜡纸上。油印的时候，四个人面对面站着，每人手拿两个油印网，网上沾好了刻就的蜡纸。从第一个开始，把第一张网放在全整张的白报纸上，油墨滚子一滚，这八分之一就印好了，

第二张对准了缝，印上去，接着印下一张，直至完成八张蜡纸的油印，这样一整张的油印大字报就完工了。虽然也挺麻烦，比人力抄写到底快多了。一套八张刻好的蜡纸可以印数百张大字报，同样内容的大字报一天功夫就可贴遍全北京城，就像出版了一份报纸。此项“先进技术”一但打出去，立刻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为“刺聂案件”辩诬的过程中，驳得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无言以对。

由于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越来越严密的围困，井冈山人在楼群内也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危险，驻守在楼内的人也越来越少，武斗中后期大概不过三百多人。话说回来，人多也有人多的难处，人多了粮食和蔬菜的供应就更加困难。但是我们不能不坚持下去，井冈山要是垮了，我们就要成为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砧板上任其宰割的鱼肉，全国各地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楼内谁留谁走完全是自由的，没有人强迫。即使是总部委员也是一样。我所知道的在楼内坚持到武斗结束的井冈山总部委员有:侯汉清（勤务组组长)、陈醒迈、谢纪康、靳枫毅、胡纯和等。

图二 武斗结束后的天桥

在两派大喇叭的宣传战中，新北大公社最得意之作，便是广播井冈山人的“下山声明”。校文革以各种手段，威胁恐吓，强迫井冈山人退出“保守组织井冈山兵团”。在整个四个月的武斗中，据公社说，有一千多名老井被迫“下山”。我们井冈山兵团的文艺宣传队“万岁纵”（“‘毛主席万岁’文艺宣传纵队”的简称）的乐队的一位西语系的女生，被以“不予分配”相威胁，被迫“下山”并交出她使用的小提琴。待到武斗结束，所有人的毕业分配实际未受派别影响，她很后悔“下山”。

两派据守的楼群都是四层楼。井冈山楼群的一层门窗都被钉死，有些楼的楼顶是平顶（28、30 楼)，用弹簧床、木床等家具构筑成防御工事，

图三 武斗结束后的28楼楼顶，防御工事已经拆除，还能看到楼顶女墙上堆积的铁床、砖块和墙边的暖气片。

女墙边堆有砖块并架上强力大弹弓。弹弓开始用的是自行车内胎剪成的橡胶带，然后改成汽车内胎。因为弹力仍嫌不足，射程不远，重点防守地点改成乳胶管，弹力大增。两股汽车内胎橡胶带或多股乳胶管中间绑上篮球或排球剪成的球皮，再绑在长板凳的两条板凳腿上，板凳架在桌上，推到窗口，在球皮里放上砖块或卵石，拉长皮筋，就可以瞄准目标射击了。一般老井用的“炮弹”是四分之一块砖，有时也用鹅卵石，那是公社派打过来的。新北大公社用卡车从永定河的河滩拉来鹅卵石作“炮弹”，威力自然比砖块大得多。我们不能在各楼之间走动，要走得经过双层床构筑的通道，而新北大公社成员却可以在井冈山楼上看不到的地方自由行动，这让我们大为不快。有一次我和我班的一个同学，从 28 楼北侧楼顶越过楼顶，向 29 楼西北端外面打球的新北大公社同学“吊”过几颗砖弹，然后趴着墙边看“战果”。我看见公社派同学四散而逃，一个同学瘸着腿跑开，显然是被我们的弹弓打到了，当时很得意，在此我和我的同学都愿向他道歉。

当 28 楼和 30 楼之间的天桥完工时，我和很多同学来到四楼，很惊讶地看到完工的天桥，我与同学们一起，用水龙带拉住天桥，对面的 30 楼同学向 30 楼拉过去，把天桥稳稳地架设在两楼之间的四楼上。我参加过挖地道，把下面挖出的土装在脸盆里，用脸盆吊到地面，堆在一楼的房间里，以免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看到。

我曾在天桥上多次穿行于 28 楼和 30 楼。因为有人很狡猾地贴了伟大领袖像，新北大公社不敢用弹弓打天桥上的行人，害怕犯攻击毛主席像的“罪行”。地道建成后我只进去过一次。6 · 24 北京汽车三场的卡车为井冈山送菜，遭到公社武斗队的冲击，掩护汽车的井冈山人被刺伤。作为外单位人员、汽车三场的司机竟然也被刺成重伤。人家单位告到北京市革委会，

竟然被污蔑为“送派菜”！从此井冈山的后勤就越加困难了。一天夜里，我已经睡下了，将近半夜，17 纵纵队长郑修聪悄悄叫起几个人，说有任务，要穿上棉衣，带上柳条帽。我们跟着他，下了 28 楼的地道，跟着路标走向 37 楼，地道里有电灯照明。到了 37 楼，上了地面，只见楼里灯光暗淡，守楼的人员手持长矛不碰地面，以免出声，人们也低声交谈，一片临战前的紧张状态。我们几个人被告知，今夜有车运粮来，我们不带武器只管卸粮。一会儿听到海淀路上马蹄声嘚嘚，原来是一辆马车。车夫約住驾车的马，打算把车赶进大棚。那匹壮马看到大棚里黑漆漆的一大堆人，绕了一个弯不肯进来。现场指挥临时改变方案，让车夫把车停在大棚门口，我们一帮装卸工冲出去抢运粮袋。不过一分钟的功夫，粮袋都卸下来堆在大棚里面。这时东西两线的新北大公社喇叭咋咋呼呼地叫喊起来，车夫鞭子一甩，马儿发力狂奔，十几个井冈山成员手持长矛跟着跑动护送，一直把马车送过西线 40 楼旁的西南门。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连大门都没来得及开，事情就结束了。

我们住在被封锁的井冈山楼群内，食堂是不能去了，只能自己开伙。28 楼南端一层楼有一个锅炉房，一个浴室。南门外堆着一小堆碎煤，是去年秋天就运来供应浴室锅炉烧热水、用了一冬天剩下的。武斗开始后有时烧水供应大家洗澡，有时用热水蒸馒头供应大家。因为用得节省，这看着不起眼的一小堆煤竟然一直用到武斗结束。井冈山总部没有能力供应全体人员的伙食，吃饭主要得靠各纵队自己开伙。17 纵买菜做饭，主要靠几位女生。买菜要冒被打被抓的风险，还得节约着点吃。夏天大米长了米虫，要搁在平常时期就倒掉了，如今供应紧张怎么舍得倒掉，拿水淘淘照样吃了。我们做饭主要用电炉，北大的水电大权控制在新北大公社手里，碰到新北大公社拉闸断电，就只能吃夹生饭。

我是井冈山兵团的文艺宣传队“万岁纵”的乐队队员，6 月底，总部要“万岁纵”在地质学院组织七一纪念演出以鼓舞士气。我离开了北大，前往地院。地院东方红公社是北大井冈山兵团最忠实的盟友。他们接纳前来投奔的北大井冈山人，老井有数百人住在这里。地院分出一座楼给我们居住，一个食堂让我们自己开伙，“前线”下来的伤员不能长期住在北医三

院的，地院的校医院都予以接纳。这里是北大井冈山离北大最近、最安全的后勤基地。“万岁纵”在这里排练节目，七一在礼堂表演，井冈山的同学们都很兴奋，增加了“长期抗战”的决心。进入 7 月，新北大公社对井冈山的封锁日益严紧，我们得到通知，如非必要，不要回校去。我在地院一直待到 7 · 23 井冈山在海淀路上接高压线的大武斗之后，才回到校内的井冈山楼内。

武斗的意外终结

7 月 27 日夜，我在 28 楼楼顶值班，下午开始从临近的清华大学传来的枪声使我们非常不安。7 月 23 日夜，井冈山成功接通 11 千伏高压电线到井冈山楼群内，打破了校文革对井冈山的供电封锁。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冲击接电现场失败，致使多人受伤，他们肯定不能容忍这样的失败，肯定会制造新的武器装备，肯定会策划新的进攻。清华团派用步枪射杀四一四派人员，新北大公社会不会也步其后尘？井冈山的前途在哪里？井冈山要是被打垮了，我们都得完蛋！

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传来了好消息，毛主席派遣的数万工人在解放军的领导下进入清华制止武斗。前夜我听到的枪声是清华团派在负隅顽抗，而四一四派已经在工人的劝说下缴械投降。一旦 7 · 28 凌晨毛主席召见北京高校五大领袖的消息传出，团派的抵抗立刻土崩瓦解。毛主席在召见五大领袖时警告：“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10]”

甚至到了这种时候、这样场合，聂元梓也不想想她的鸿运就要终结了，竟然还敢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北大井冈山兵团：“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侯汉清）是研究生，父亲 63 年搞投机倒把。……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校文革）没有搞他（指樊立勤），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9]”作为前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革命老干部聂元梓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吗？新北大公社的同学们，你们怎么摊上这样一个领袖？

但是说到底，谁敢跟“伟大领袖”对抗？从 7 月 28 日开始，北京市革委会派出的制止武斗的宣传队每天数万人进出北大，新北大公社对井冈

山的封锁立刻被打破。我们走出楼群，走在四个月不敢走过的校园里，不用担心再被抓捕、再被毒打。“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两派的成员也罢，逍遥派也罢，开始大批返回校园。

到了这个时候，两派都明白，武斗结束了，学生主导运动的局面也结束了。这样的烂摊子，轮不到北大任何一派来收拾，我们都得乖乖地听人吆喝了。

图四 武斗结束后17纵部分成员在37楼前，大门前的大棚已经拆除

8 月 19 日，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开进北大。名义上是“宣传队”，但是，既然《人民日报》社论都说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自然就是工宣队当家了。趁着还没有搬回各系居住的宿舍楼，我悄悄溜回在南京的家，直到 10 月初才应工宣队的通知回到学校。

我们在文革中有底线吗？

我们中国人的文明社会，古称华夏，自来就有一套道德规范，历二千多年而不变，讲的是忠信孝悌礼义廉耻。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讲究以阶级斗争为纲，道德规范有所变化，基本道德也是相差无几的。文革中由于阶级斗争观念的泛滥，我们听信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理论，放弃了一些道德理念，但是做人终归不能没有底线，至少我们不撒谎、不诬陷、不偷盗、不欺诈，至少不能做违法的事，不能杀人、不能伤人、不能殴打、不能非法监禁、不能刑讯逼供。做人要有做人的底线，越过底线，就不是有道德的人，不是有良知的人，就是野蛮人，就要被大多数人唾弃。

井冈山兵团的成员也犯过错误。我们听信了毛主席的诬陷，没有认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以为陆平是“反革命黑帮”，我们参加批斗陆平及北大干部和教师的各次大会，有些干部教师被逼自杀，家破人亡。对于这些事件，我们应该忏悔。

但是我们还是有底线的，具体到我们班的井冈山兵团的成员，我们基本没有做我们认为是错误的事。1965 年底，我们北大学生被派下乡，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如今我的认识是：四清是替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高层权力斗争构筑社会基础，简单地说就是找茬镇压农民。虽说是镇压农民，工作队还是要讲纪律的。在运动中不能搞体罚，工作要努力，做事要公平，像现在的贪腐行贿想也不要想。

在 1966 年八一八以后，当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主的中学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开始在社会上以“破四旧”为名大肆迫害平民百姓、知识分子及其子弟时，我所在的班的一些同学采取了与暴虐的红卫兵截然不同的做法，对抗在海淀镇横行不法的“红卫兵海淀区纠察队”（简称“海纠”）。在海淀镇邮局与一帮中学红卫兵论战大半夜，救了一个红卫兵企图抓走的邮局职工，因而被系里一些“左”同学贴大字报，指责我们“反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即使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没有再对抗海淀镇的红卫兵暴行，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底线的——我们自己绝不参与这样的暴行。

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什么地方越过了底线？

北京大学，自 1898 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起，历经晚清、民国、北洋、国民党与抗战时期，一直是一个文质彬彬、研究学问的最高学府。即使中共执政以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伤害了一些教师和学生，也没有残暴到这种地步，在校园内外以执政机构的名义，抓人、打人、杀人，直至肆无忌惮的地步。

原新北大公社的同学们，如今北大的武斗已经远离我们达 48 年了，你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到底做错了什么，以至于在文革结束后追究文革罪行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至少有 5 名成员被捕入狱、被判徒刑，其中包括校文革主任聂元梓、第一副主任孙蓬一、以及为打死三个学生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新北大公社成员？

聂元梓是个“革命老干部”，12 级高干，参加过延安整风。1960 年靠她的哥哥聂真与北大校长陆平的关系调入北大。1963 年到哲学系任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陆平对她不能说不重用，聂却恩将仇报，以一些不能成立的理由，攻击陆平犯了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由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

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中支持陆平，聂不得不检讨。做检讨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了什么？没打你没骂你没降级没罢官，对也罢不对也罢不值得深仇大恨。可是聂元梓记恨在心，探得党中央内部斗争的风暴已经爆发，挑头签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家可以看看她在大字报最后一段加的是什么：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6]

显而易见，既然陆平要倒大霉了，聂元梓就可以这样落井下石，报北大社教运动之仇了！看看她写的这些令人惊心动魄的词句，陆平就被她聂元梓定性为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这是什么样的蛇蝎心肠？这是什么样的投机心态？聂元梓一夜之间变成全国最著名的革命造反派，而陆平成了“陆平黑帮”的头子。我们做学生的不明底细，你聂元梓可是一清二楚。

其后陆平被关押、被批斗、被审讯、被吊打。1966 年 8.15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斗争陆平，十万人齐声高喊“打倒陆平”，在雨里从下午斗到晚上。你在台上意气风发主持大会，陆平在台下弯腰低头被批斗，你说陆平心里怎么想？

1975 年陆平被“解放”，调到七机部当副部长。这“陆平黑帮”是怎么回事，谁给他说清楚过？谁给我们这些被欺骗的“群众”说清楚过？在陆平的问题上，你聂元梓的良心在哪里？你的底线在哪里？

文革结束后，陆平继续当他的干部，你聂元梓在监狱里坐牢。这是为什么？这是报应！

2001 年北大校友李海文约谈陆平，陆平准备了九个问题，谈了一次就住了医院，从此不能再谈[11]。当我到了老年时，才能体会陆平这下半生

的痛心。如今陆平已成故人，我想对他说一句道歉的话而不可得。陆平同志（这是当年北大人对他的称呼），陆校长，我作为北大的学生，为我对您做过的一切伤害，向您说一句：对不起！（关于陆平执掌北大期间的左倾错误，在此不论。）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里对自己应付的责任常常这样搪塞:“我不知道”，“我管不了”，“我不是新北大公社社员”。这样的话不能免除她的罪行，只能让人不齿。新北大公社的同学们，你们说说，聂元梓这样说话，能够搪塞得过去吗？聂元梓不是你们的领导吗？聂没有领导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吗？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行动没有聂的策划吗？聂没有组织策划指挥北大武斗吗？如果真是这样，谁在领导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谁对武斗负责？谁下令把数百名北大干部教师长期关进“牛棚”，谁下令抓捕井冈山成员，以致几十名井冈山人员长期在新北大公社私刑监狱里痛苦呻吟？谁对三名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私刑打死的学生负领导责任？北大两派武斗场上没有死一个人。被打死的地质学院附中高三学生温家驹（死于 1968 年 4 月 19 日)、无线电系 62 级学生殷文杰（死于 1968 年 4 月 27 日)、地质地理系 61 学生级刘玮（死于 1968 年 7 月 20 日）[2]，都跟武斗现场毫不相干。事件发生后，在组织严密、纪律森严的新北大公社，你聂元梓的部下不可能不向你汇报。你不是瞎子，你不是聋子，全校人都知道的事，我们这些被封锁在井冈山楼群内的井冈山人都知道的事，你聂元梓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你既没有按照党纪国法作任何处理，也没有采取措施控制你的部下不得再犯，使得私刑打死人的事件一再发生，你聂元梓凭什么说你没有责任？

1978 年 4 月 19 日，聂元梓在全校大会上被捕入狱，1983 年 3 月 16 日被判处 17 年徒刑。聂元梓的判决书指控的罪名是:“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6]”多年来聂元梓一直不承认她被指控的罪行，并且企图翻案。在此我说说我个人的看法。

对于聂元梓的刑事责任，除了聂元梓在校外所犯错误和罪行，我更重视的是她在校内所犯的罪行：

诬陷新北大井冈山兵团这个革命群众组织为“反革命集团操纵的保守组织”——诬陷革命群众组织罪；

策划并指挥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挑起武斗围攻井冈山兵团——策划并指挥武斗罪；

在北大、北京市以致全国范围内非法抓捕关押井冈山兵团成员——非法逮捕公民罪；

设立非法私刑监狱（牛棚）监禁北大师生员工——非法监禁公民罪；

在校文革设立的监狱里以残酷私刑拷问折磨井冈山兵团成员——酷刑罪；

在校文革控制的区域纵容残酷的私刑迫害，致使三人死亡——纵容杀人罪。

聂元梓是北大校文革主任，新北大公社是校文革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聂元梓对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所犯错误和罪行负有领导责任。正如她的朋友、清华井冈山兵团团派的头头蒯大富要对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死亡的18 条生命负责一样。虽然法院对她的罪行定性确可商榷，但是判她 17 年刑期并不冤枉。如果聂元梓不忏悔她所犯的罪行，她就没有资格为法院对她罪行的某些错误定性喊冤。

孙蓬一是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忠实追随聂元梓，聂元梓的罪行都有他的一份，他被判 10 年徒刑。1990 年代我在美国洛杉矶的三联书店里，在一本有关清华和北大的文革回忆录里读到孙的消息。他在刑满释放后深自忏悔，向他所在的哲学系的两个井冈山派教师道歉。他做得对，我个人愿意原谅他。可惜的是当时我没有买下这本书，不能用作参考文献。[12]

井冈山人参加大武斗是为了本派人员的生存，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底线：不能打死人，最好不要致人重伤，使其失去战斗力就行了。北大武斗中死亡的三个人，都不是死在两派武斗现场。温家驹在刑讯室里被酷刑致死，事发后我们得知新北大公社的狱卒们使用了骇人听闻的刑具，让守楼的井冈山人心中恐惧颤抖。由于没有书面证据，在此就不谈了。殷文杰被新北

大公社武斗队员用长矛刺死在 44 楼新北大公社总部门前，身上被扎进 39 个血窟窿[13]。刘玮被抓进 40 楼，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轮番殴打致死 [5]。新北大公社成员抓人、打人、以致打死人，不是偶然现象，这显示一些新北大公社成员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做人的底线。我听说，每次新北大公社打死人，都在内部造成愤怒和矛盾，有些成员就此脱离武斗，做逍遥派去了。

工宣队的检讨

1968 年 8 月，以 63 军（4587 部队）为首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接掌北大大权后，搞的是支一派（新北大公社）打一派（井冈山兵团），搞了一千个反革命专案，逼死三十多名师生员工。在北大搞得天怒人怨，连毛主席都坐不住了，1969 年 3 月派了他的御林军 8341 部队（中央警卫团）来收拾局面。北大工宣队主任、63 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不得不在 1969 年 4 月在东操场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宣读报告，以大量篇幅检讨工宣队所犯的错误；对自己支持的校文革作了定性：

“校文革在运动的中、后期站在‘公社’一边，形成了一派掌权。他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实行所谓‘亲我则亲，冷我则冷，打我则打，反我则反’的原则，实际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对立面革命群众组织采取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摧垮的方针，把对立面组织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操纵的保守组织’……校文革在运动中、后期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后来，虽然在组织上联合了，并且在基层成立了有两派群众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但是由于没有纠正原来一派掌权的错误，使两派群众仍然没有消除对立情绪。[1]”

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成员们，你们觉得聂元梓等人判刑坐牢冤枉吗？你们认为新北大公社这样迫害井冈山人是应该的吗？这样做符合做人的道德吗？你们心中有做人的底线吗？像我们中国人一直说的，摸摸自己的良心，想想这些在武斗中发生的事件。你们不觉得刘信的迫不得已的检查讲的是实话，是实事求是的吗？

武斗期间井冈山抓过人吗？

新北大公社成员会问：难道你们井冈山人在武斗中没有抓过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人吗？你们自己不是也应该忏悔道歉吗？

是的，井冈山在武斗中抓过人，除去 3•29 武斗过程中井冈山抓的人（3•29 武斗中井冈山是自卫，没有主动进攻），在以后四个月的大武斗中，据我所知，井冈山一共只抓过两个人。

第一个是戴新民。戴新民文革前是技术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北大社教时著名的左派，文革初期选为校文革委员，中后期支持井冈山兵团。4 月初，有消息传出戴新民是“叛徒”。她要是叛徒，再落到新北大公社手里，井冈山就有麻烦了。17 纵决定把她控制起来，免得校文革把她抓去严刑逼供，弄出对井冈山不利的事来。17 纵纵队长带了几个人去她家，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到了老戴（戴新民很平易近人，全系上下都管她叫老戴）家，要她跟我们走。老戴是个老干部，做过地下工作，想必也知道这一去没有好事。到了井冈山楼群，在 28 楼 17 纵驻地给了老戴一个单间，平时也不怎么管她，只要看见她人在就行，谁也不跟她说话。日子过了一月又一月，老戴没人跟她说话，只能看书，更加无聊烦闷。有一天老戴企图偷偷逃走，被老井们发现。问她为什么要跑，她说北大武斗打成这样，她要去市革委会反映。以后照旧把她控制在楼内，直到武斗结束。如今这事已经过去 48 年，老戴已经过世了，没能当面向她道歉，总觉得是件憾事。参与拘押戴新民是我在文革中做的少有的违法行为之一，如今反思这件事，我个人应该承担道义责任。

第二个是一个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时值 7 月的一天，我正在地质学院住着待命，忽然有人从城里打电话过来，说老井在新街口被公社武斗队打了，要我们赶紧过去支援。我们一行二十多人赤手空拳，分批乘公共汽车前往新街口。下车不远就看到一个老井在马路边收拾东西，见到本派大队人马到了，赶快迎上来诉说刚刚发生的事：他们几个人正在街上贴大字报，一辆公社派的卡车载着带长矛的武斗队赶到，抓住老井就往车上扔，只有他一个人逃脱。周围的市民一看不干了，纷纷前来保护老井，指责公社武斗队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抓人的恶行。武斗队赶快开车落荒而逃，一个武斗队员不慎落单，被市民们抓住，已经送到新街口派出所去了。我们一

行人立刻赶到新街口派出所跟警察要人，警察哪里肯给，我们又不是专政机关，凭什么把人交给我们？可是我们如若不能带人回去，被抓去的人怎么办？井冈山可是有几十人押在新北大公社的“监狱”呐。好言不听，我们也就不客气了，上前架住那人就往外走。几个警察没敢阻拦。回到地质学院，问话的结果，这人是个工人，家里有老有小。果然不过半天，校文革就打电话来要求谈判。新北大公社那边丢了一个人就闹翻了天，那人的老婆哭哭啼啼地找他们的头头要人。我们的头头说放人可以，你们也得把这次抓的几个老井都放了。那边没有讨价还价，立刻同意。双方确定交换地点在五道口，第二天双方人员就交换了。这是井冈山在 3•29 武斗后唯一的一次抓捕新北大公社人员，没有殴打，没有侮辱。严格地说，这次井冈山并没有抓人，我们只是把这个专事抓人的武斗队员带回地质学院，换回了我们被抓去的人员。对于参加这次抓人，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面对强权的欺凌，缺乏公权的保护，我们有权自卫。

新北大公社的同学们，如果你们知道更多的井冈山兵团在大武斗中的违纪、违法、违背良心、违背底线的行为，请你们揭发出来。我们两派的组织不在了，我们不再年轻，但是我们的良心在，我们做人的底线在。如今文革已经远离我们，如果我们不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留下文革的记录，揭示文革的真相，并且传之后代，我们就在文革中白吃了那么多的苦，枉受了那么多的罪了。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清华大学校友陆小宝在他的《我们这代人最后的责任》中说：“文革运动搞得天下大乱，害了这么多人，死了这么多人。我们的一些同学就在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中失去了生命。每想起他们，我们心中都会产生出一种锥心的伤痛。为了死去的他们，为了未来的后代，我们应该利用渐逝的老暮之年，把我们当年那段亲身经历说出来。只要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就会有价值。只有我们说的是真实的，才会有价值。真实的东西，只有我们将它们说出来，才会有价值。当时你属于什么派，是保守还是造反，是老团还是老四，并不重要。史识可以不同，史实只有一个。真实与否，不能任人雕刻；正确与否，听凭后人评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为历史，为后代

留下真实的记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14]”

诚哉斯言！无论是新北大公社还是井冈山兵团的成员，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北大人，都应该为我们的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2016 年 2 月 3 日初稿

2016 年 3 月 18 日二稿

2017 年 9 月 20 日三稿

注释：

1. 《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中发［1970］17 号，1970 年 3 月 15 日。
2. 唐利：《我的北大文革记忆》，载《共识网》，网络版。
3. 张曼平：《我所经历的 1968 年北大武斗》，网络版。
4. 李竟然：《北大文革武斗纪实》，网络版。
5. 司徒文：《亲历者讲述—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文史精华》2009 年第 7 期，网络版。
6. 聂元梓：《聂元梓口述自传》，（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7. 在载于《记忆》152 期的《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2016 年 3 月 18 日文稿中，以上段落中的西语系井冈山组织的名称“五一纵队”比“10 纵”更为常用，“东语系新北大公社红 9 团”误为“西语系新北大公社红 10 团”。本稿中予以更正。
8. 米鹤都：《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的风云人物》，（香港）中国书局，2011。
9. 颜品忠：《一个北大哲学系普通教师的动乱劫难》，颜吾芟的博客，网络版。
10.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华夏文摘》增刊第 458 期，2006 年，网络版。
11. 陆莹：父亲是知识分子，《中华读书报》记者陈洁采写，载《光明网》2008 年 3 月 12 日，网络版。
12. 在载于《记忆》152 期的《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2016 年 3 月 18 日文稿中，以下段落载有“高云鹏在此之前还在陕西汉中北大分校指挥武

斗，真正的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炸药的战争。他参与指挥围攻、爆破汉中运输公司大楼，造成 29 人死亡。他被判刑 10 年是理所当然的。”经查证据不足，本稿中予以撤销。

13. 胡宗式：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华夏文摘》增刊第 957 期，2014 年 9 月，网络版。

14. 陆小宝：《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载《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

北大武斗琐忆

戈辰

1967 年春夏，北京大学形成两大派。一派是拥护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另一派是由各种“战斗队”联合而成，主要包括“团、零、飘、井、红”五个组织，就是“井冈山”、“东方红”、“红旗飘”、“0 派”（以化学系 63 级“0363”学生首创的“北京公社”为核心）、“团派”（从“新北大公社”摆脱出来的“造反团”），总称“井冈山兵团”。据说“公社”拥有“社员”六七千人，“兵团”拥有“战士”五六千人。我所在的中国史班 33 人，两派各有五六个比较“铁杆”的人员，各团结了十个八个比较温和的人员。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两派“革命群众”都不敢收容的、要等待运动后期处理的“问题学生”。到 67 年夏天，两派都努力招兵买马，本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很多教师也都纷纷“入社”或者“上山”了，两派高音喇叭不时播放某某“入社”或某某“上山”的“造反声明”，给对立面造成巨大压力。这时，机遇来了，两派都有人来表示可以收容我。于是我得了一个羡慕了一年的红袖套，成为“红旗飘”的一员。

因为我加入了井冈山，同宿舍其他人都是公社的，开始我还愚蠢地想利用这条件建议两派同学坐下来谈谈，解除误会，很快发现别人视我为“斩监候”，不屑于对话。于是，我和另一个因其父对“三面红旗”有微言在 59 年挨过整而不受待见的同学搬到西边一间空宿舍。不久，又搬进来几位因住在条件较好的研究生宿舍而要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研究生。半年多时间，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从他们的生活方式知道了什么叫“做学问”。而我的某些自以为最最革命的同学，正致力于把“反革命”的帽子加到一些同学头上，用这样的方式，“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67 年下半年，当全国各地两派武斗如火如荼的时候，北京高校“红卫兵”也形成了两大派，即所谓“天派”、“地派”。“天派”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北大“新北大公社”为主，还有清华蒯大富的“团派”；“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和北师大“井冈山公

社”为主，北大井冈山兵团得到地派支持。到 1968 年春，两派对立越来越尖锐。聂元梓指使其爪牙高云鹏担任“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组建武斗队，希望尽快摧垮井冈山。井冈山处境艰难。几个高校成千上万的地派学生到北大游行示威声援井冈山，3 月 25 日，聂元梓把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搬来，劝退了游行队伍。事后，聂元梓称此为“3 · 25 大武斗”，把自己封为“制止武斗”的功臣。

3 月 29 日凌晨，做了充分准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住在 31 斋的井冈山兵团“零派”“03 纵队”的学生发起突然袭击，逐层、逐屋地驱赶殴打井冈山派学生，占领了 31 斋。这是北大长达四个月武斗的开始。

北大井冈山人被赶出 31 斋后，后勤部门井冈山派青年工人“海燕”战斗队武装起来，保卫井冈山，占据了兵团总部所在的 28 斋。公社扬言要把井冈山摧垮，逐楼驱逐井冈山人。一时间，海淀路上、32 路车上尽是拎着大包小包落荒而逃的井冈山人。有亲友的投奔亲友，没有亲友的投奔“战友”——住到地质学院的教室里。我当时不在北京，在北大的表姐、姐夫到我宿舍搬走被褥和两个箱子，剩下一箱书太重，准备第二天搬，没想到当天夜里公社就占领了历史系住的 38 斋。武斗结束后有同学告诉我，在某老师家的书架上见到我买的小说（多人曾传看过），我也在楼道尽头废纸堆检出我的三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没人要）。可惜我的几种线装书一册无存。不过，跟武斗结束后回校看到床上空无一物而精神失常的同学相比，我就算幸运了。历史系有一位公社“勇士”在颐和园昆明湖游泳，被一位上海同学认出他穿的是自己的游泳裤，揪住不放，后来在“勇士”的箱子里搜出多床被面，多件衣物及照相机、手表等等。

当年北大南校门、西南校门以北一带的学生宿舍 16 号到 44 号计二十九座楼。井冈山人经过几次血战，保住了 28、30、32、35、36、37 六座楼。聂元梓“校文革”控制的“新北大公社”把“井冈山兵团”赶出校园彻底摧垮的阴谋未能得逞。公社封锁了学校所有大门，进出严查，发现井冈山人就抓就打。无线电系 62 级的殷文杰据说是个“马丁 · 路德 · 金”，属于井冈山中最温和的成员，路过公社武斗总部 44 楼前，被武斗队员认出，上来就打，刺伤股动脉，血流不止而死。地质地理系 61 级学

生刘玮，在海淀街上被“公社”绑架，抓进楼里，毒打至死。近日见到《聂元梓口述自传》，她竟然这样说：“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不是在武斗中打死的，而是在打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因此这件事不应该算在新北大公社打武斗的账上。”这个“老佛爷”，多么无耻！

37 楼靠海淀路，井冈山推开围墙开了一个门，成为向外的唯一通道。楼与楼之间用学生宿舍的双层床竖着排列起来，形成封闭走廊，防止周围楼上巨型弹弓发射砖头的轰击，保护楼间行人往来。就这么几百人，被“公社”数千人围困封锁，井冈山危在旦夕。

我在大约 6 月初“串”回北京，不敢回校，经人指点来到了地质学院，先随便找一间空教室过夜。第二天早晨，被一阵叫骂声惊醒，说是不许占用这教室，边说边把我的包袱往外扔。我嫌他态度不好，想辩解，不料他开始肢体接触。幸好又来了几个学生，于是把我押解到“总部”办公室审问。我掏出学生证，说明自己无法回校。旁边一个学生哈哈一笑，指着我：“‘新北大公社’的吧！”旁边人跟着哈哈。是啊，井冈山的怎么会不跟战友们住在一起呢？我本想说我是山上的，可是想到自己被人打骂奚落，很给山上人丢脸，不妨让他们认定像我这种窝囊废、可怜虫就是新北大公社的社员吧。

很快找到井冈山的“难民营”住下来。不几天得到通知，有个重要会议。会上，一个头头讲话：“希望多一些人能够回校守楼。站住脚就是胜利！如果被对立面摧垮，运动后期定为反动组织，一个一个地收拾，谁都没有好下场！”“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依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你被打垮了，就没有你讲道理的余地了。”听了这话，我毫不犹豫：回校守楼！

话说北大学生宿舍楼原来都称“斋”，很文雅。本文讲武斗，这时候再称“斋”，咋听也别扭了，以下我就一律叫“楼”。

37 楼南面中间，井冈山人推开围墙，用床板搭成宽高约四米的甬道，通到海淀路边。37 楼东边的 34 楼和西边 40 楼被公社占领，楼上架着弹弓，见着 37 楼进出的人就打。马路对面是 32 路公交车车站，站上经常有

不少等车的市民。经指点，我先混在等车人群中，马路上没车时迅速穿过马路即进入甬道。初次来，掏出驻扎在地院“难民营”的头头签字的“通行证”进入楼内。我被带领到一间宿舍，见地下有一大洞，扶梯而下约三米深有地道向北，到 36 楼上来，再下地道，经 35 楼再下地道到达了 30 楼。有了双层床连成的甬道为什么还要挖地道？因为两边都是公社的楼，为了安全，更为了秘密来往。

30 楼的 4 层走廊东头窗口，正对工字形的 28 楼南端西头 4 层窗户，其间距十几米，井冈山人在这架了一座桥，听说是技术物理系同学设计的。架桥的过程，先是在 28 楼南头东西向走廊内做好梁架，把绳索从空中扔过来，东边推，西边拉，千斤重的桥梁稳稳地架在了两楼之间十多米高的空中。我不得不佩服理工科的同学。深挖洞、高架桥，使井冈山的六座楼连成一体。我就住在 30 楼四层东头朝南的房间，也就是说住在桥头。

两派的高音喇叭没日没夜地对骂，其中经常播放的两首歌令我震撼。

一首是公社广播的，公社给“敬爱的江青同志”的一段讲话谱了曲，由公社合唱团演唱：

北大井冈山，不好不好！（合喊：不好！不好！）
红旗飘里准有坏人！（重复两遍）
你们不斗刘邓陶，不斗陆平彭佩云，
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重复三遍）

最后一句一遍比一遍调子高，我仿佛看见那个妇人张着大口要把我吃掉。她这段话令我不寒而栗的就是第二句：红旗飘里准有坏人！

另一首歌是井冈山广播的，是毛老人家四十年前（1928）的一首词《西江月 · 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这雄壮浑厚的男中音令我豪情满怀，誓与井冈山共存亡。

守楼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防止公社武斗队偷袭。戴上藤帽，穿上棉

袄，上到楼顶，检查一下高音喇叭，看看公社有什么动静。

开门七件事，守楼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吃饭。学生食堂被公社控制，到那里去吃饭，一旦被认出就惨了。海淀镇上有饭馆，天天去吃吃不起，还有被公社绑架的危险，只好自己在楼里做饭。我很快发现了自己的用处：上街买菜。第一，除了本年级同学，很少有人认识我，即便认识，也不知我上了山。第二，我成天锻炼身体，能负重。这里讲一个笑话：文革初有一次在五四运动场开大会批斗翦伯赞，大会快开始我才去。历史系坐在最前边，我挤到前边正要坐，来了一位戴着红袖套的“纠察”，揪住我往后面赶。我说我是历史系的。他问：“你是哪个学校历史系的？”我说：“就是这个学校。”他把我上下打量一圈，说：“你还是到后面去吧。”又开始推。这时三年级考古班的班主任张新生站起来对他说：“他是我们系三年级同学。”至于我能负重，自夸一下：参加学校业余举重比赛，我体重不到 60 公斤，挺举举起 69 公斤，得了第六名。

买菜在海淀菜市场。带着麻袋，跟着历史系井冈山的女管家到了市场，卖菜的认识女管家，价钱低、分量足，很快帮我们装满麻袋，催我们回。事后得知，海淀镇居民大多支持井冈山，镇“革委会”好像也属“地派”。我想起了《毛选》里的文章《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时读毛著，真有体会啊！假设海淀居民配合聂元梓挤兑井冈山，这几座楼能守住吗？

北大武斗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它是原始冷兵器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奇妙结合。

大约是在 7 月中旬，公社准备在半夜偷袭，捣毁井冈山大门甬道，堵死井冈山人的出入口。我们戴上藤帽穿上棉袄集中到 37 楼，到了后半夜，第一梯队在前边打起来了，同时 37 楼的探照灯唰的一下把楼前面照得通明，楼上的弹弓发射出密集的半截砖头。新北大公社拿着消防斧砍向甬道的歹徒和拿着梭镖长矛的护卫队大惊失色狼狈逃窜。得到消息，我们立即脱掉已经热出一身大汗的棉袄，遗憾没有参与战斗。

第二天，哲学系四年级方同学送我几个水蜜桃，说是总部的慰劳品。他指指自己的嘴，肿得像个桃，说“这里挨了一下，吃不成。”

事后公社总结失败教训：一是井冈山人事先得到消息，说明公社潜伏有内奸；二是探照灯太厉害，是造成夜袭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们的决策是：一、清查内奸，二、掐断通向井冈山的所有电源。

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决策同时传到了井冈山总部。

我们后来才知道，由于全校电讯系统都由公社把持，井冈山和外界的通讯全被切断，所以公社仍使用原来的电话通讯系统。井冈山人在 30 楼东南角地下挖了一条地道通往地下的电话电缆接头处，然后连接监听电缆，每天 24 小时专人值班监听记录有关通话。

“校文革”在对井冈山控制的几座楼断水之后，又要断电。没有电，不能照明，做饭麻烦，广播也哑了，问题大了！总部决定从海淀路马路边电线杆上的高压线上直接接电，地派战友立即送来了变压器。电线杆在甬道口东边大约三四米处，迅速爬上去不难，难的是上万伏高压电，必须带电作业，稍有疏忽便会被电击毙或摔死。北大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懂带电作业的人不少，但在晚上、在武斗战场、在没有先进器材的情况下还要迅速完成接线，危险可想而知。

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7 月 22 日晚上正式接电。这次是由理科同学担当短兵相接的战斗，戴上藤帽，穿上棉袄或用剖开的消防水龙带制成的“铠甲”，手执用暖气水管制成的梭镖长矛，集中到 37 楼一层待命。文科同学分别到各个窗口担当弹弓手，我被分配到略靠西边四层一个窗口，居高临下，可俯视从北大西南门出来前来进攻的公社武斗队。“弹药”很充分，是从非承重墙上拆下捣成两半的砖头，堆在顺手的地方。弹弓用汽车轮胎切成条，编成辫子，两头牢牢固定在窗框上。

担任接电的听说是技术物理系的一位同学，还有两个预备队员。我因在西边阻击公社武斗队，无暇东顾看他们如何爬上电杆接线。半夜，海淀路上已无行人，井冈山战士迅速搬出双层床，搭建起东西两道街垒阻挡两边的公社武斗队。接电勇士迅速登梯。公社武斗队从东西两面涌过来。西边的前锋握一杆大概是用跳高撑杆做成的长枪，左右两员猛将持约两米多的长矛，后面跟进数以百计的戈矛枪手，头戴钢盔或藤帽，身穿黄棉袄，呼啸着冲上来。这时候，每个窗口都飞出砖头。由于公社武斗队太密集，

我们可谓“弹无虚发”。到底是学生兵，一挨了砖头就往下撤，旁边两人立即拖着枪或者扔了枪驾着伤者撤。可以说，这半截砖头就打退了三个武斗队员。然而，前锋猛将却是勇敢向前，逼近了床板做成的街垒，令人紧张万分！这时候，奇迹发生了，前锋猛将忽然像喝醉了酒，站立不稳，床板后面井冈山的长矛同时扎了过来，吓得三人连滚带爬往后撤。这一下，公社士气大挫。战斗进入相持阶段。这是怎么回事？楼上的我看得莫名其妙。事后才知道，建立床板街垒的同时，井冈山人在前边路面撒了大约两三米宽一层绿豆。古代“撒豆成兵”的魔法，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最高学府”，曾经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新北大”成为现实。

隔着马路，我所在窗口的正对面是“长征食堂”。公社人搬来几块门板，在食堂东边墙下构筑了一个最前沿临时工事。那里距我窗口约有六七十米，弹弓有点够不着。正巧这时指挥官给我派来一个助手，看样子年龄较大，又比较瘦弱，记得好像是理科的一名研究生，因为强烈要求参战，指挥官就让他来给我递砖头。看到砖头够不着对面，他说我们俩一起拉。于是他抱住我的腰，四条腿一齐用劲，这下飞到了对面墙上。我们就这样越打越准。工事里原有两个人，后来又跑过来一人躲了进去。几分钟后忽见那人戴了头盔跑出来，跑了不到 5 米，嗵的一下直直倒下。工事里冲出一人，架起那人向西跑去。37 楼上发出一阵欢呼。

就在这时，灯忽然亮了，井冈山六座楼一片辉煌，欢呼声响彻夜空，接电成功了！井冈山的广播也响起来了：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聂元梓们不甘失败，听说是汲取了教训，决定焊制“坦克”，生产“燃烧弹”，进一步升级武斗，不踏平井冈山誓不罢休。

就在这一天，中央发布了制止武斗的《7·24 布告》，接连几天，大批工人和市民有组织地围绕着北大游行，高喊口号。27 号，游行队伍进入校园，“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命令两派头头前去开会。28 日凌晨，除了张春桥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汪东兴，中央的全体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首都

高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我一看这阵势，井冈山守楼已经成功，下一步就是讨价还价，实现“大联合”了，于是收拾行装，回家“逍遥”去了。

2011 年 9 月 22 日西岳论坛. 戈辰随笔

关于北大武斗的回忆片段

耿天彭

一、4•26 的 36 楼保卫战

3•29 之后 32 楼中文系所有公社的人都离开了，我们就住进去了。我晚了几天住进的，因为我右耳廓在 3•29 被公社投掷的石头打裂了，耷拉下来，在地院医院缝了八针。4•26 那天早晨我们接到通知进入 36 楼，当时我们班的井冈山的大多数都在。上午我们向 36 楼搬砖头，附近搞建筑，有砖堆。我们用三轮车拉砖头。然后从 36 楼的东北门把砖搬进二楼（东北角接近 28、32 楼，相对安全）。边搬边玩，一点危险感都没有。还拍照来着，我现在还有好几张当时搬砖头的照片……。

砖头搬了一阵，传言新北大公社要来进攻了。我们急忙进 36 楼二楼。首先把二楼许多房间里的双层床拖出来，拉到楼梯上，用绳子把相邻的床的床腿绑住。这样，床连床密密匝匝把个楼梯堵得严严实实。公社人来了，很难把床一个个拖走。我们也是破釜沉舟，绝了自己下楼的路。而在一楼有部分井冈山人防守，更是背水一战，和 36 楼共存亡。

砖头是用来做弹药砸公社的进攻部队的，不记得运了几车，我们就仓促封楼道，开始了 36 楼保卫战。

我觉得那次好像我们没有人统一指挥，全是各自为战。

我一开始就爬上楼顶，我们班的其他人也都不知道在哪里守卫。我在 36 楼东面的屋顶上把水泥瓦揭下来扔向公社“红四团”。“红四团”清一色头戴柳条帽，身穿黄军棉衣，手提橘红色长矛。呈 90 度弧形在距离 36 楼十来米的东南一条弧形线围成散兵线，人挨着人。我把瓦揭下来，然后让瓦带旋转的扔下去，对着散兵线，特别是个别想向 36 楼冒进的公社兵扔。每每直接砸在他们头顶，只见一个个公社武斗队员被砸后马上瘫软下去，被旁边的两个人架走。“红四团”至始至终只能围一个弧线在那儿，没能前进一步。我的左手几个手指因扔水泥瓦的摩擦，都掀了皮。

站在 36 楼屋顶，四面看，好大好大的场面啊！36 楼的四面围积了许多人。东北面主要是井冈山的，在呐喊助威，我每扔下一片瓦砸中一个，就一阵欢呼。后来我下到四楼。从窗户向外看，个别不要命的公社兵试图

从南面宿舍窗户进入，也是全副武装还有两个顶一张桌子来的。

36 楼是女生宿舍，许许多多住在井冈山女同学也加入了保卫战。

我认为必须扔暖气片下去才行。正好，宿舍有一种一米多长、十来斤重铸铁块，很像大型锅炉的炉条。我拿起来砸连接暖气管的管接头，暖气管是四分管，很重的铸件砸一两下，管接头就断了。我叫那些不知名字，不知哪个系的井冈山女同学同我一起把暖气搬到窗台上。

从四楼南面窗户低头向外看，下面一楼窗户外有不少公社兵。我和女同学们把南面的房间的暖气摆上了好多宿舍的窗户。但起初我没有把暖气推下去，否则肯定砸死人。等到没有人的时候推下去一个，从此他们受到震慑。不敢试图爬南面窗户了。

36 楼西半截打得最惨烈。我只在东楼顶溜瓦片，南面搬暖气。事后得知，公社几十个人合抬一根木头电线杆，一二三同时发力，把墙撞开大洞（撞的是二四墙），冲进了一楼。公社武斗队装备统一制式，长矛长而锋利，身上有棉军装，有安全帽。他们不从楼道走，而是用电线杆撞开房间和房间之间的隔墙（二四墙），一楼房间从西到东被公社逐一占领。我们的人且战且退….（0362 赵承易他们在西线一楼防守，他很清楚）。随后我们砸开二楼地板，井冈山的长矛从洞里直接捅到对方的脑袋，再砸更靠西的房间的地板，长矛捅下去…..这样，公社武斗队只得撤出了所有的房间，36 楼遂被井冈山保卫下来。

二、5·2 东西线战事

5·2 那天，我们和海燕打东线，对手是“红四团”。02 纵打西线，对付 40 楼出来的公社武斗队。东线面对我们尤其是海燕的长杆长矛，“红四团”节节败退，退往墙洞。我是东线南端第一人，是压阵脚的。右边是居民住户的山墙。一个公社武斗队员倒退逃跑，一屁股坐在地上。我端住的长矛只要对他的要害一戳，他肯定呜呼。他绝望的看着我，快哭出来了。我只用矛尖在他大腿上轻轻点了两下放他回去了。至今记得他，像一个两广的人，瘦筋筋的。5·2 受伤的全是在 37 楼墙洞的外和双层床工事内。我自己肚子被扎了一枪，不会记错。5·2 我的亲历。我们分为东西两条战线。东线问问化二、化三、化四的，也可以向海燕的庞文禄了解，他们海

燕的在东线的北段，03 纵的在南（长征食堂一侧）。记得海燕的长矛特别长，矛杆是竹竿，轻便，又捅得远，几下子就把“红四团”打退了。

我们快要把“红四团”全部逼回他们的墙洞的时候，回头向西一看：西线井冈山已经溃败，退回 37 楼工事大门。我们 03 纵和海燕马上就要被公社武斗队东西夹击，腹背受敌。我们急忙往回退，还没有全体进入工事，西线的公社武斗队已经冲到我们大门外的过道侧了。当时大部分退回过道里，但几个退得慢的，在进入过道前就遭遇了长矛。过道是用竖起来的床搭成的，床板间有好些间隙。退回过道的被通过这些间隙捅进来的长矛乱扎。受伤的很多，化二王学勤被扎 17 枪，化三徐秉玖被扎 15 枪，化四朱镇华胸部被扎，差点扎到心脏，导致气胸；我班赵承易的脸颊被扎；我的腹部的盔甲被扎了一个洞，矛尖在腹部皮肤上刺出一个小红点。当时的盔甲是用圆号的铜皮制成的，很容易被扎透，后来改用白铁皮的了。

三、6·24 的 37 楼外保卫战

6·24 那一次是有了电话监听之后，监听得悉公社要来偷袭破坏 37 楼外的板床围成的夹道工事。化四的有我、赵承易和魏玉书埋伏在双层床夹道里。楼上组织了很多弹弓。他们果然如期而至，冲到双层床夹道外，拿着长矛就往里捅。据说有人还拿着斧子，要砍我们的工事。夹道的左右床板不密封，长矛从缝隙里就捅进来了。我们身体左右都有长矛捅来，很危险，就放弃了在那里的阻击，赶紧退到楼里。魏玉书退得慢，屁股挨了一扎枪。我和赵承易没事。此时，我们楼上的弹弓齐发，他们发现我们准备充分，就退走了。

四、7•22、7•23 架线

耿天彭与高压线

7•22 我也是在最南面，用撑杆跳的杆子装的矛尖。7•22 没有听说有人受伤。7•22 晚，全部人通过地道集结在 37 楼一层。预先分解了许多“单层床”（把双层拆成两半）。一声令下，每两个人架着一个床冲出去，几十张床迅速从北（37 楼外学校围墙）到南（长征食堂边的围墙）用绳索把床床连接，形成两道木床壁垒。所有相邻的床腿

之间都用绳子缚牢。任何人在长矛阵和弹弓雨下是不可能拉动任何一张床的。我们几十个人在工事后南北一字排开。静等他们的到来。我和赵承易在西线外侧撒了好多斤绿豆和红小豆……此时，架线开始了。第二天我俩去海淀路把豆子扫了好些回来，何少琪为我们熬了绿豆小豆粥。

五、摘喇叭、换扩音机和监听电话

大概 67 年夏天，好像是数力系井冈山战士王建新在浙江温州武斗里被打死，井冈山在哀悼他。这时，校广播台故意播放欢快的音乐。离我们 31 斋最近的喇叭装在 35 楼的天窗口。我和我们班的另外两个人跑到 35 楼，反正很容易的就爬进天花板到了天窗，把喇叭线拽断，把那个 16w 喇叭取走。我妹妹正好就住 35 楼。她的同学认出了我。于是我被新北大广播台点名道姓地说成是暴徒。之后，凶手、暴徒“名声大噪”。确实有一次，化三的华南平（名字记不清，但不是华国藩）在 31 楼南门外和东语系公社的辩论，被那人打了。化三的说“把耿天彭叫下来”。一分钟我就到了，公社兵丁一见我撒腿就跑，我就紧追不舍，一直追到 35～38 楼之间，还追。眼看快到 40 楼了，他回头看到我已经追到了，就哭起来了。我给了他两拳：叫你打人！

井冈山广播台白手起家。也是 67 年，有一个井冈山的说，他们家在房山，大队有一台 950w 的扩音机。他们自己用用，几十瓦就够了。不得已，并联一个几百瓦大灯泡来消耗功率。把这事给狐狸他们说了。井冈山愿意用一台 25w 的去换他们的 950w 的。双方同意。于是广播台找了四五个人，一架三轮车、两辆自行车。我们骑车从 28 楼出发，换着登三轮。夜里两点终于把大功率扩音机拉了回来。井冈山广播台又安装了具有四个磁头的喇叭，长度都有近两米，从此，井冈山广播台的音量得以在宿舍区压制他们的。

换扩音机的事估计是姜承永、胡志远找到我的，骑平板车的都有谁，我忘了。我经常去广播台，认识他们每个人。

我经历了井冈山搞电话监听的前期工作，挖地道找出电话电缆：大概是 68 年 4 月的一天，井冈山广播台的狐狸（生物系 64 级胡志远）来 37 楼找我，想叫我再找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和我一起到 30 楼挖地道，寻电话电

缆搞监听。4•26 之后我们 03 纵队驻守 37 楼。

狐狸说，武斗前天天从 28 和 30 楼之间的路上过来过去。见到过工人把 30 楼东南角（大概距离 30 楼一楼最东南的那个房间两三米的）地面挖开，他看见有电话电缆（工人可能在维修）。

他来找我，是想到了电话监听。请示了总部的胡纯和后决定实施。井冈山的这一绝密行动，总部仅仅胡纯和知道，其他头儿谁都不知道。广播台仅姜承勇、狐狸等几个人知道。

我找了同班的李鹏和我一起去挖。叫赵承易、何少琪给我们留饭。(干这事的几天和李鹏空手离开 37 楼三楼，回来一身土，引起过赵承易的纳闷，那是后话)。

我俩先用大锤捶开 30 楼那个房间的水泥地板，然后挖竖井，再后向东南方向挖地道.....好像挖了两天到三天，洞端靠上出现了电缆，呈东北西南方向。我们叫来狐狸和姜承勇，我和李鹏大功告成，收工回 37 楼，答应保证绝对保密。

几天后，姜承永告诉我，电缆里有电话“百对线”。他们把每一组都接出来，信号用三极管放大电路放大，最大限度地降低监听引起的电话电路电流的损失。还搞了一个配电箱。

过了好些日子，姜承勇对我说电话监听起大作用了。并带我俩去参观。十几组，有指示灯、有录音机插孔。桌子右边有一台录音机，旁边一大摞录音带。监听的同学坐在里面，头戴耳机，根据指示灯闪烁判定电话到来。重要的电话就录下来。

进这个房间很难——30 楼一楼、二楼之间的楼梯完全堵死，任何人进不去一楼。一楼一个的房间的天花板凿开一个洞，架梯子才能进出这个房间。直接从门进不去。它墙上打了一个洞通隔壁房间。我们进去的时候隔壁房间的门口有人值守。

六、挖地道和架天桥

4•26 之后，井冈山形成据守 28、30、32、35、36、37 楼的态势。井冈山人往来这几座楼经常被公社的弹弓轰击，伤者不少。

我就被弹弓打伤过：5 月初的一天我走在 37～36 之间去 28 楼，被

可能是 38 或 40 楼射过来的弹弓落地上后反弹击中了鼻梁。脸肿平了，紫色，好长时间才消掉。

于是井冈山在各楼之间用床连成通道。通道是用双层床竖着排成的。上铺和下铺的床板垂直于地面，形成左右的屏障。但床的上端没有木板，人行其间还是很容易被落下的弹丸击中。所以，顶部铺上一层可以遮挡的遮挡物，只稍有改善。况且，井冈山在各楼之间的活动完全暴露给了公社。

有鉴于此，总部决定在各楼之间开挖地道。35～36 及 36～37 距离均为 35 米。估计五月初，我们开始挖 36～37 地道，凿开北侧的一个房间的地面，挖一个深三四米的竖井，用柳条筐盛土挖出的土都堆在相邻的房间了，遮得一点亮光都没有。所有人都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换着班挖，兴高采烈。

我们 03 纵的向北挖。挖通那一刻我正在最前面挖。开始一个小洞，然后扩大到几十厘米。我们南北两头的人握手欢呼，真高兴。不过对得不很齐，我们的一段往东偏，36 楼挖过来的一段往西偏了一点，加起来偏差不到 1 米。

7•22 架线，28、30、32、35、36 所有楼的队伍都通过这条地道进入我们 37 楼，公社一点都不知道。

天桥的制造设计据说是技术物理系还是数力系的同学搞的，全木质。预先在 28 楼四楼制成。用绳子把天桥的西端拽到 30 楼，搭上四楼走廊的地板。经过力学计算，拉绳子的角度以及使用的拉力，需多少人来拉（尤其是被拉出来越来越接近 30 楼的时候的所需拉力）。安装那天是晚上，几十个人分为四组，28 楼和 30 楼屋顶各一组，两幢楼的四楼楼道各一组（我在 28 楼四楼楼道那一组），每组两排人，每组拽住一根绳子。像拔河一样，绳子头缚在天桥的东西两端。在悄悄的指令下徐徐拉向 30 楼。30 楼的使劲儿拉，28 楼的拉紧绳子慢慢送。指令声音不能大，否则 29 楼会打来弹弓。就这样大概十来分钟就完成了。

我们当时是为生存而战的。那时我认为如果井冈山垮了，我们都会是反革命，所以只能一拼到底。

（樊能廷、张从根据 2017 年 9 月 2 日微信记录整理）

戴柳条帽的日子

汪凯戈

戴柳条帽的那段经历，只是我们对自己当时信念的淡淡坚守，静静付出；遇事共进退，对友情从心底里默默呵护。这是我们这些不谙政治的文弱书生当时之所以留守的内在原由。

3·29 不眠之夜

1968 年早春，新北大公社二度倒谢（富治）失利后十分被动。通常两派的高音喇叭到午夜后平息，而 3 月 28 日这一夜两边的广播却一直吵到第二天凌晨都没有停下来，我们躺在床上一夜都没有睡好，大家猜测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了。29 日早晨，可能是阴天的缘故，天色灰灰暗暗的。我去大饭厅吃早饭，一路上似乎大家都走得很匆忙。路过 31 楼看到有人在楼上窗户上拴了绳子往下爬，不知是因为绳子不结实还是不够长，爬到半道就重重摔落下来，当时谁也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井冈山总部向下传达了情况通报，公社在半夜挑起了武斗，将 31 楼化学系的井冈山派的学生全部赶出了楼。总部从安全考虑，希望留校的井冈山同学集中居住，物理系全部入住 35 楼，这样我们收拾了必要的生活用品搬进了 35 楼。35 楼是女生宿舍楼，原居住的井冈山女生集中到高层居住，男生住在低层。北大开始长达 4 月之久的武斗，大批学生陆续离校。尽管从 1967 年起全国各地均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但清华和北大作为两所著名的高校、文革的发源地、直接在中央文革和“最高司令部”的眼皮底下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仍是难以想象的。在最高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们采用了最原始的方式——长矛和杀戮——来解决两派争端。

武斗的追责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聂元梓回忆录》里[1]，聂元梓将武斗归诸于 3·25 高校地派来北大游行，称为“3·25 大武斗”，完全不提 3·29 事件。作为经历者，“3·25”不过是地派的一次大游行，可能有些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根本算不上大武斗。“3·29”事件是武装的公社武斗队有组织地使用暴力将 31 楼睡眠中的井冈山派的学生全部暴力驱赶出楼，才是北大两派大武斗的起因。这一事实在一些新北大公社成员写的回忆录中也可证实[2，3]。但十分遗憾，至今没有公社的头头出

来揭秘“3·29”的内幕。

“3•29”事件后虽有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钟奇来北大制止武斗，但当年的聂元梓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光环的庇护下，除了给与她光环的那个人外，其他人根本无法阻止她的行动。聂元梓在文革中作为大左派风光了两三年后迅速被抛弃，在毛时代被隔离审查 8 年，在邓时代又被判刑 17 年（实际执行了 10 年)。如果说她的其他罪行都可以归于尊奉最高旨意，那么发起武斗是她无法推委的罪责，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国家财产损失判十几年徒刑一点也不冤枉。蒯大富在庭审中曾反问审判官们，“……您比我大十岁，66 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假如您也一样不知道，您今天起诉我反革命……”，审判长说:“拒绝回答被告的问题”[4]。我很纳闷审判官为什么不对蒯大富挑起清华武斗追责，毕竟有十几条人命呵！对聂和蒯在掌权前的造反行为可以不追责，蒯在没有任何背景支持下的反抗行为也可圈可点，他们的罪行是掌权后在权力欲的支配下自我膨胀目无法纪造成的。聂元梓晚年仍不求反思，文过饰非作风依旧。她参与乌有之乡集会，还在重温当年的左派梦，这恐怕就是当年北大许多师生从支持她到反对她的缘由。

【校友武思敏说：遗憾母校北大的社会基础太特殊，这一点无法与清华相比。】

两派分歧本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民主社会是用法律保护和规范两派争端，以求和平制约，专制社会是用暴力手段解决争端以求统一。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的基因，改朝换代的战争和暴力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主旋律。

我是井冈山兵团的普通成员，既非骨干也非积极份子。井冈山始终没有组织武斗队，如果井冈山组织武斗队，我断然不会参加。一方面是因为体能和勇气方面都不够格，另一方面出于本能厌恶暴力和血腥行为，包括对“阶级敌人”的所谓“革命暴力”行为，当时自知是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影响还没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我搬入 35 楼是为了自身安全的无奈之举，也是捍卫自己在北大的生存权利。父母已于 59 年和 60 年相继病故，大学宿舍就是我的家。原计划当年暑假去大连海运学院大姐家度假，不到万不得已我不希望提前去打扰。再说我们班井冈山派的大多数同

学都没有马上离校。北京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我们以为生活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又最关心的北大，武斗能很快平息，但没有想到竟陷入武斗四个月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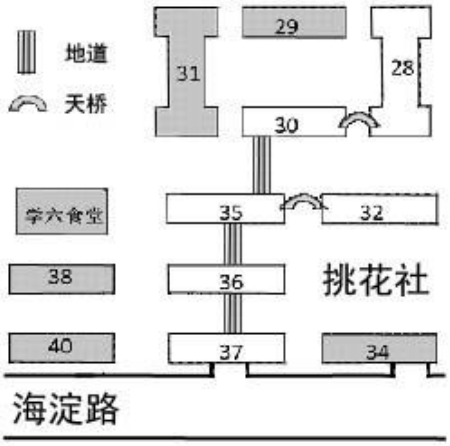


图1. 1968年北大武斗期间形势图
井冈山占据28-30-32-35-36-37楼

3·29 之后，两派和平争吵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从此开始生活在恐惧之中。同学间的观点分歧扩大为敌我矛盾，每个井冈山人对聂元梓发起武斗充满愤怒。虽然有许多学生陆续离校，但留住在 35 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学生仍很多（可能有一百多人），分配有物理系、无线电系和东语系的学生。开始一段时间的状况还很有趣，当时说起来觉得可乐。一方面在校园里自由行动已很不安全，但大家还得去食堂吃饭，到了开饭时间，两派学生鱼贯从楼里出来去食堂吃饭，基本上相安无事，好像属于吃饭休战期。吃完饭后回楼继续守楼，尤其到了晚上就十分紧张。驻楼的男生轮流巡逻值夜，严密防范对方来进攻。但这一过渡期很快就过去了，武斗一旦开始就必定会按其自身的固有轨迹去发展，逐步升级。井冈山的学生在校园里行走已很不安全，吃饭问题只能自己解决，总部 28 楼有一锅炉做主食，供应全体留守人员。各班的女同学去海淀采购副食，在楼里用电炉做菜，解决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4·26 三十六楼攻防战

由于井冈山学生在校园内已不能自由行动，不断向总部反映意见。井冈山总部开始意识到原来占据的几座楼存在严重问题，除 37 楼靠北大南墙外，其余几座楼被分割隔断在校园内，为此，必须占领 36 楼，才能使所有的楼连成片，并以 37 楼作为对外通道（参见图 1）。36 楼是女生楼，当时双方都没有占据，4 月 25 日井冈山进驻 36 楼[5，6]。这时公社才醒悟到 36 楼的重要性，4 月 26 日组织重兵攻夺 36 楼。

在北大一百二十天的武斗期间，4·26 三十六楼攻防战是规模最大、

全方位的一场战斗，使我亲历了过去只有在电影中看到的“战争场面”。虽然没有马蹄声、枪炮声和火药的硝烟，但双方数十架强力弹弓射出在空中飞舞的石块，打在目标上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同时扬起沙尘犹如枪林弹雨和硝烟。尽管我不在战斗的第一线，但一整天都处在精神极度紧张和亢奋之中。双方被飞弹击伤的有不少人，我见过最惨的是驻守 35 楼的 15 纵（无线电系）的同学被击中眼部，后来到北医三院摘除了一只眼球，当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还有一只眼可以看毛选”。

实际上当时井冈山留下的同学是避难者，又是守楼志愿者，很多人没有长矛作武器，也没有柳条帽防护，更没有形成严密的战斗组织，大家完全自发地行动，做自己能做的事。主要是做好本楼的防御工事，用弹弓回击公社的进攻，支持 36 楼前线的保卫战。防御工事用料只能就地取材，宿舍里的双层木床档在所有的窗户上，防御对方射来的石块。在各楼之间用木床搭起安全通道防御流弹，但这些木床板很快都被飞弹打烂，又得换一批。木床架用作弹弓架，有人拿来一些橡胶内胎制作弹弓。为了防止公社来攻楼，暖气管被卸下成了最初级的防御武器——铁棍。暖气片大都卸下来放在高层的窗台上，在行动的同时我却一直在发愣：如果有人来攻楼，我是否会将暖气片推下去。

36 楼那边一度传来不利的消息——公社已攻入一层，正在逐个房间地推进。我们都紧张极了，为防守 36 楼的战友担忧。后来听说他们采取在二楼地板打洞往下灌自来水的方法将公社武斗队赶了出去[6]，成功地保卫了 36 楼，使得井冈山能在学校维持生存下来。夕阳西下时高音喇叭传来毛诗词歌曲《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4 · 26 之后，为了防范公社进攻，守楼者必须武装起来了。总部搞来一些柳条帽、钢筋和铁皮等物资。在卸下的暖气管上装上磨尖的钢筋就成了长矛了，我用的长矛直接将钢筋插入暖气管中没有焊接，如果遭遇重击便会脱落。剪了块铁皮系上绳子做了护胸，身体其他部位护甲因为制作太复杂，均没有做，也就没有了保护。当时井冈山的条件全靠大家自力更生。总部派来几个海燕兵团的年青工人作教练，他们看起来很会打架，比我们这些书呆子强悍多了。武斗队必须建立严格的军事化组织，严格管理、严

明纪律才能有战斗力。井冈山守楼学生属于志愿者性质，很难做到像公社武斗队那样组织严密、严格管理。4·26 以后留守的人数锐减。

从此北大南面的海淀路成为重灾区，公社在马路对面架了弹弓。有人外出坐 32 路公交车回来后绘声绘色地描述说，汽车经过北大武斗区，售票员十分紧张地要求全体乘客趴下防流弹，万一乘客被击中他们无法交待。

关在楼里迎来了第一个“五一节”，班里女同学上街买了肉准备给大家包饺子，回来路上被公社守门的“战士”把肉抢走，这种行为很像电影中的国民党兵。不过有人记得，“五一节”晚餐大家还是吃上了饺子。

挖地道和架天桥

井冈山在这几座楼之间人员活动和运送物资常要遭遇弹弓的攻击，5 月开始在各楼之间挖地道。实际上这些宿舍楼都有地下室，从地下室开挖很方便。如图 1，在 30～35 楼，35～36 楼，36～37 楼之间挖 3 段地道。我们 35 楼负责挖通往相邻两楼的两段，为了加快进度，地道从两端同时开挖，在中间会师。挖地道 24 小时不间断，大家轮班上。因为闷在楼里无所事事，我倒觉得挖地道干活很开心也很有成就感。大家开玩笑说最担心的是两边能否在中部会师，要看设计师的考试成绩，如果平均 70 分，只能 70%重合。毕竟这样简单的工程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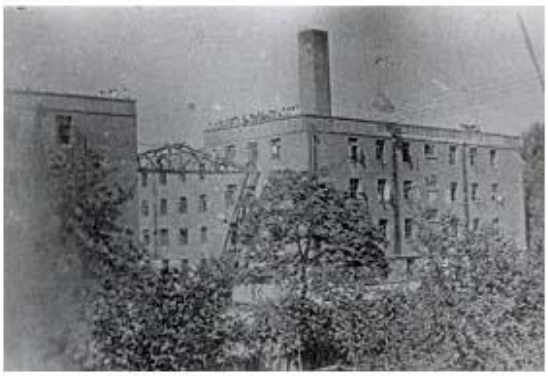


图2. 连接28-30楼天桥搭建成功的情景

图3 连接32-35楼之间的电缆索桥
在经历了4个月的武斗后，井冈山02623坚守35楼的志愿者终于可以从容地在索桥上留影

对北大学子来说不成问题，地道很快顺利完工，这样井冈山各楼人马连接成为整体，大大增强了防御能力。

28～30 楼和 32～35 楼之间通过两座天桥连通。前一座是木结构天桥，设计者有撰文介绍[7]，图 2 为木结构天桥架设成功时的情景。后一座是在若干根电缆上铺设木板的电缆索桥，如图 3。

02623 戴柳条帽的志愿者

本文是回顾我们班同学在北大文革中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和对我们班两位井冈山头头赵书城和倪可达同学悼念，后来他们因身体原因早早地就离开了我们[8]。0262 级井冈山观点的占多数，我们 3 班 30 多同学中井冈山观点的有 20 多人。在参加井冈山之前基本上是属于北京公社（零派）观点的，早期支持聂元梓，随着看到聂元梓的表现差劲转为批评她，后来随零派联合入了井冈山。02 纵虽然人数不少，但在两派斗争中不是井冈山的主力。至武斗中后期，02 纵留守 35 楼人员主体集中在我们班（男生有 10 余人，女生有 4 人）。其实我们班的同学都属于为人低调、性格温和的书生类型，在文革中政治观点理性平和，没有任何激进的理论和出名的大字报，更没有打斗老师和“当权派”的行为。一些爱好音乐的同学参加了井冈山文艺宣传队——万岁纵队。不知为什么我们班成了 02 纵 35 楼的最后坚守者的主力，自然这离不开赵倪两位的带头和模范作用。

在守楼期间我们班发生最惨的一件事是 J 同学被公社抓走后暴打一顿。有一天 J 同学去海淀办事至天黑一直没有见回来，直到半夜他回来了，人被打得完全认不出来了。头部和脸部肿得很大，模样十分恐怖。公社审讯他时将他的头蒙住暴打，由于不知道打击来自何时何方，无法本能反应地躲避，受的伤害更重。审讯他的人中有熟悉情况的同学参与。在整个武斗期间公社方抓去打死井冈山普通群众三人[9]，J 同学总算逃过一死。后来 C 同学陪 J 同学去医院作了检查，休息了若干天后，赵书城送他上火车回家了。J 同学是我们班的大文豪和笔杆子，这次被抓被打经历，想必会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

当我在今天问我们班一位 35 楼自始至终的坚守者，他回答我:“戴柳条帽的那段经历，我想我们这些人，只是对自己当时信念的淡淡坚守，静

静付出；遇事共进退，对友情从心底里默默呵护。这是我们这些不谙政治的文弱书生当时之所以留守的内在原由吧。”

6·24 护菜之战

到了 6 月下旬，35 楼只剩下二十来人了，02 纵 10 多人中我们班有 10 人（男 7 女 3）。为了让守楼的学生有蔬菜吃，总部从外面运一车菜来，这次保卫卸菜安全的任务有 02 纵全体男生参加，我们戴上柳条帽拿着长矛经两段地道进入 37 楼门口。

鸣不平同学在“我所见证的北大 1968 年武斗”一文中描述了这次战斗，在文中说 02 纵防守西线，03 纵防守东线[10]。对这段描述我曾十分困惑，因为我明明是在东线防守，这段经历绝不会记错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回忆，记忆是有可能逐渐恢复的，我想起了当时的细节。当我们鱼贯地从地道上来时，海燕纵队的教练安排东西线防守人数，02 纵安排去守西线。但在数到我之前时说西边人数够了，这样我就与 02 纵的其他人分开了，独自去了东线，确实我周围的人一个都不认识。我们冲上了海淀路在 37 楼的东线，总数大概有二十来人，在二、三十米宽的马路上排成了一字散兵线，防范对方对我运送食物行动的破坏。没过几分钟，公社武斗队就出动了，看来他们一直保持着待命状态，可以随时出动兵力。他们可不是单行线，有三四层以上，身着统一的黄色棉军装和头盔，手持统一制作的长矛，完全像正规军。而井冈山这边都是穿自己的衣服，自制的长矛也长短不一，完全像土八路游击队。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上战场，精神极度紧张，全神贯注正前方那些人的举动。思维已经停止，你根本不可能去想应该如何表现勇敢，一切依赖于对周围变化产生本能的肢体反应。

公社方面没有发起强攻，在短暂的对阵之后，对方的前排人员与我们有零星的长矛相互撞击，但我们的单行散兵线一直保持着。预先说好鸣金收兵，但我根本顾及不到敲锣声，只见周围的人说撤退，散兵线迅速全线溃退。我们不过是一群散兵游勇志愿者，从没有训练过撤退的方法和队形，混乱无可避免。37 楼门口运菜车卸车还没有完成，蔬菜完全是散装的，满地的蔬菜一片狼藉。卡车周边和大门口簇拥着很多人，十分混乱。我退到 37 楼门的东墙侧，觉得有了依靠。这时我看见对方有人冲来，我迎上去驱

赶他，对方后退了。突然我觉得头部遭受重击，估计被对方的弹弓射中头部，最恐怖的是我顿时双眼完全失明，我想起了 15 纵那位被摘除眼球的同学。我当时本能地反应是要马上逃入 37 楼内。我还有方向感，后退摸到了围墙，摸着墙走就能摸到大门口。果然到了大门口我感到被人群拥入 37 楼甬道，但我仍看不见。在甬道内我摘下柳条帽没有摸到头部有血，也没有起大包，只隐隐疼痛。不一会我的视力恢复了，总算是虚惊一场，柳条帽起了极大的保护作用。我后来分析可能是脑部在重击下短时失血引起的失明。按常理应马上到医院作进一步检查防止后遗症，那时候不懂也顾不上。我们班的其他人都完好无损，这次战斗有一些人被长矛扎伤，但都没有造成严重伤害。

总部这次运菜行动有些考虑不周，尤其是送菜的司机被扎伤，不过这次战斗为后来 7 月份的接电保卫战积累了经验[2，6]。

我们应该参加这场武斗吗?

当夏日来临时我必须做出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我曾与 64 级井冈山的 X 同学约好暑期同去大连海运学院，他在海运学院的同学可以借到舢板出海，去海岛玩。X 在 35 楼没有呆几天就回家了，他到了大连，来信催我赶紧过去，这是我向往已久的活动。我该如何选择呢?

我们守楼是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吗? 如果认为聂元梓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这个逻辑没错，我想这是大多数守楼的井冈山同学的精神支撑。武斗氛围营造了过去革命年代两党争斗的艰苦的历史环境，使追求革命理想的年青人身临其境，考验其意志力。在困难的环境下我们曾仰望星空:“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委员，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有你照路程…”。但我们的革命永远需要大救星，没有他的表态北大及清华两校的武斗难以平息。在漫长的等待之中，领悟了他对于个体生命的漠视。他在旁观和思考两校的武斗数月后，又作出了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

井冈山自卫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但两派斗争的是非往往是由上层政治路线斗争的需要决定的，所谓站对了队，就是跟对了人。什么是革命路线，我们有标准吗? 即使有标准，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谁是谁非最终仍

要由最高司令部确认，不然就用枪杆子里出政权、出“真理”。这是后来两派争斗的宿命，北大清华这两个最高学府和文革发源地也难逃此宿命。聂元梓、蒯大富当年之所以反对旧党委和工作组，是因为受到了后者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现在他们刚掌权，居然对不同意见的师生采用武力镇压。为什么会这样？在阶级斗争学说影响下，两派观点的分歧成为谁上台谁下台的权力之争，成为你死我活的武力争斗，这能推动社会进步？我已开始在心中质疑文革的反修防修伟大意义何在，我们不是处在一个“专政下的革命”的悖论之中？这些思考使我现实地面对目前的处境。

7 月初，我告诉赵书城我将离开，他不会挽留任何人，因为大家都是志愿者。我与赵书城第一次大串连时跑了好几个省，我俩最远去了阿坝藏族自治州州府马尔康，要不是冬季快来临，我们就打算翻雪山过草地了。步行串连我们又一块赴韶山和井冈山朝圣。他虽是我们班的井冈山小头目，现在 02 纵守楼的担子全靠他挑了。但离开的决定仍伴随我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留守 35 楼男生只剩 10 多人，每个人都显得举足轻重。我们班还剩有 6 名男生，他们对井冈山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远高于我，我离去，就是不再分担，过去和现在都觉得愧对他们。

来到了大连海滨，蔚蓝的海水、明媚的阳光与和平的环境与我三个月守楼的日子形成鲜明的反差。我与 X 和他的海运学院同学划着舢板去了帽岛，在岛上煮着钓来的鲜鱼吃，但我心中的乌云并未散去，因为我的同学还在楼里生死不明。终于 8 月传来了好消息，工宣队进校解决了两校的武斗，他们终于解放了，每个人都完好无损，我的心理负担也获得了大部解脱。9 月工宣队通知大家

返校复课闹革命，图 4 为部分 35 楼的守楼志愿者（02 纵 08 纵和 15 纵）在返校后的合影。

武斗的策划和挑起者是犯罪，作为个人都不应参与武斗，尤其是武斗的挑起方。在当时政府失职或丧失功能时，井冈山作为群众组织捍卫在学校中生存的权利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离开“文革”的大背景，在这个意义上，井冈山守楼志愿者表现出应尽的责任和献身精神，值得肯定。

从 66.7.25 大辩论到 68.7.28 毛谈话，燕儿被倾巢

68 年 7·28，毛召见高校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和工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和文革的转折点。1966 年 6 月 1 日从四川四清返校的火车上听到了第一张大字报的广播，到后来的张承先工作组进校，经过 6·18 事件，我们曾经将文革理解为又一次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对于文革早期的红卫兵抄家、揪斗“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等行为，当时大多数北大学生内心是反感的，更不会参与。虽然不敢认为是犯罪，至少也是嫌它左派幼稚病。7 月 25～26 日中央首长在东操场开的两场辩论会让大家开了眼，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分歧暴露在公众面前，尽管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将会发生什么事。根据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性，我们已经领会到这次文革与 57 年反右运动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工作组撤走了，基层党团组织完全瘫痪，解放以来首次处在没有基层领导管理、控制的政治环境中，大部分同学都感到心情轻松和思想解放。这并没有引起政治混乱，因为党中央的声音和最高指示通过各种媒体每天都传达下来，实现了思想上的直接统治。

在东操场辩论会后，大家理解到文革的目标是党内走资派，会后以自觉的实际行动来参与。一开始油印小字报把北大辩论会的“福音”散发给全国各高校。不久北大学生率先开始全国大串联，犹如皇城派出的钦差大臣奔赴各地宣传文革，支持和鼓励各地的造反派坚持与资反路线作斗争。

有史以来，老百姓与当地官府管理者的矛盾总是存在的。自“反右”以后，基层官员成为党的化身，使得这些矛盾逐渐积累起来。本来可以通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化解，当此途径不畅通时，后来成为文革中造反的群众基础。造反意味着敌我矛盾和夺权，使得问题激化。自 67 年 1

月夺权风暴后，全国各地陆续形成对立派争抢夺权局面。两派都信奉毛思想，但各取所需。在 7·28 谈话的最后，韩爱晶曾斗胆提出问题:在毛百年之后，如何解决共同信奉毛思想的两派争端，在场的其他中央领导一齐批评韩爱晶出格。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大家心中共同的疑惑。

工军宣队掌管学校权力后,实际上又回到了文革初工作组进校的状态，斗争的矛头转为针对普通群众在文革中的错误言行。两派师生相互揭发批判，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不久传来了毕业分配的消息，大家都很兴奋即将走入工作岗位。但分配方案公布后，完全没有专业背景的彻底的“四个面向”，使所有人都凉了心。燕儿被倾巢，驱赶到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和边远地区，当年考入北大的雄心壮志被无情的现实一扫而光。

从那时开始流行“臭老九”称呼，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批人实际上的政治定位。

我和 Z 同学自愿报名去了新疆，68 年 12 月，在东操场批斗井冈山头头和所谓反动师生的大喇叭口号声中，我们终于要离别未名湖了。班上没走的同学都来送我们去北京站，用六年寒窗书本卖废纸换来钱，在全聚德为我俩饯行。这是我来北京后第一次吃烤鸭，我们将大学的书本知识全部吃进了肚子。我在行李包中带了奖给我的毛选袖珍版、首长讲话和各种文革资料，我当时认为未来的生活已不可能离开这些政治资料。所幸我还带了所有的课堂笔记，实在舍不得丢弃，果然在十年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9 年元旦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招待所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高校分配来疆的学生，派别观点之争早已一扫而光，大家在一起乐融融地共庆新年。

我在边塞渡过了十年青春后，终于在 1978 年重返北大圆了物理梦。

谨以此文悼念“文革”武斗中的蒙难者!

2017.6.29 第一稿，2017.8.1 修改稿，2017.12.10 完稿。

参考资料

[1]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

[2]司徒文“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燕园风云录（一）（2012 年 8 月），p150。

[3]田老兄“恐怖之夜、救人一命——武斗杂忆”，燕园风云录（一）（2012年8月），p164。
[4]田炳信“蒯大富：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中摆渡的人”新华网（2004年8月）。
[5]俞小平“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燕园风云录（四），p78。
[6]唐利“我的北大文革记忆”中国文革研究网-文革口述。
[7]况明星“文革武斗期间北大天桥架设的回忆”，燕园风云录（二），p189。
[8]赵书城:山西忻州人，生于1945年1月。1962.8——1968.12北大物理系学生，文革开始前为62023班长。1968年毕业后分配到山西运城县。1978年考入兰州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段一士先生的博士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兰州大学图书馆馆长。2003年9月3日因突发疾病去世。
倪可达:1962.8～968.12北大物理系学生，1968年毕业后分配到河北衡水农场，1975年患脑膜炎去世。
[9]郑实“北大武斗期间死亡事件真相探究”，燕园风云录（三），p181。
[10]鸣不平“我所见证的北大1968年武斗。”燕园风云录（一），p174。

作者简介:汪凯戈，江苏溧阳人，生于1945年6月。1962.8～1968.12，北大物理系学生。1968年12月分配到新疆工作。1978.9～1981.12北大物理系研究生。1982.1起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任教至退休。

忆北大文革中监听校内电话行动

姜承永

见到有北大井冈山的战友《北大文革监听电话纪实》，回忆当年北大文革经历的事件，令我回想起当年战友和一件件往事。该文回忆井冈山“监听电话”旧事的人并非都是当时自始至终的直接参与人，有的情节不够准确，为了让井冈山战友知道真相，重温当年豪情，也叫那个至今仍在说假话的聂元梓和丧失良知的人知道，当年井冈山广播台记录了她的罪证不容抵赖，聂元梓那十七年班房是她应该偿还的孽账。

一、从北大井冈山兵团接装外线电话说起

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初，还可以用北大校内的电话对外联系，后来发现外线电话很难打出去，还发现重要电话被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方面窃听，井冈山兵团总部决定接装一部井冈山兵团自己的外线电话。我在井冈山兵团内部不是重要人物，但是我最早筹备组建广播台，对井冈山兵团有重要影响，我是研究生，对北大比较熟悉和办事稳重，接装外线电话的事就交由我去办理。

1967 年 8 月某天，我带着井冈山兵团的介绍信之类的文件，具体是什么格式的文件已记不清了，去北京西单电报大楼办接装电话手续。开始一切顺利，当时的各行各业都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我填写完相关表格和交了费用之后，突然听到在电报大楼的一个电话亭中传出“井冈山广播台有个人在电报局…”的打电话声音。循声望去，见一个人在打电话，另一个人焦急地望著我。我下意识想到我可能被“老佛爷”的“佛兵”认出来了。大事不好，走为上计，当时不顾接装电话的手续没办完，拔腿就跑出电报大楼。见到一辆公共汽车开进路边车站，顾不得看是几路车，赶紧冲上公共汽车。车开动后看见那两个“佛兵”无奈地看着我逃去，我乘车走了两站就急匆匆下车，又换了一辆公共汽车乘了三站，再换回反方向公交车，小心返回电报大楼，接着办理接装电话手续。电话局工作人员埋怨我没办完事就走掉，我连连道歉，没敢说明原委，总算办完了接装电话手续。回到北大，我说到电报大楼的惊险遭遇，井冈山兵团总部的人告诉我当天有好几个井冈山的铁杆在校外被公社的人绑架。好险，躲过一劫啊！

接装外线电话发生的事件教训了我，也提醒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头头们，意识到电话和通讯的重要性，也开始想到人身安全保护措施。

二、用监听电话保卫井冈山兵团的缘起、准备与实施

在北大文革进行到井冈山人被严重压迫的日子里，井冈山广播台里在传看一本书，现在依稀记忆是一本蓝绿色封面的 32 开本书，书名中有“谍报”或“谍战”之类字样，是美国前情报局长胡佛写的回忆录。其中有一大段讲述冷战时期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和华沙条约集团的情报战：北约集团在西柏林靠近东柏林的地方修建了一栋大楼，不时有人进出这栋大楼，但是进出的人不多，华沙条约集团并没有注意这栋楼是做什么用。这栋楼修建完成后，华约集团设在东柏林的军事指挥部接连发生多次严重电话泄密事件，华约集团长期严查也没有结果，损失惨重。后来终于破案，原来是北约集团的特工人员在这栋大楼底下挖地道，通过挖地道连接到华约的地下电话电缆，通过监听电话窃取得到华约大量军事情报。在西柏林修建的大楼壳体是为了承载从大楼挖向华约集团军事指挥部地道的泥土。多么高明的情报战例啊！

井冈山广播台里汇集了一群坚定勇敢又聪明的人。看过这本书的人有时议论这件事，这时井冈山各楼之间的地道已经开挖。“我们能不能也挖地道听听老佛爷的电话？”在广播台机务组里议论过。当时广播台里有位技术强为人又稳重的老师——无线电系的杨同立老师，悄悄对我说，监听电话如得手肯定能得到许多有用情报，但是这可是件特别危险的大事。这事如败露，不仅干这事的人可能丧命，还会连累井冈山兵团。我也知道事关重大，但为了井冈山人生存，我还是想拼命干下去。后来我和杨老师经常讨论“如果”监听电话需要怎样做，但从不说到具体实际“行动”。杨老师曾顺便说到并联信号电线用 1 兆欧姆电阻取样不可能被检测出来，杨老师给过我一批 1 兆欧姆的碳膜电阻和 6ц4、6H2（当年电子管用俄文型号）电子管。我对杨老师的“言”和“行”心领神会。

监听聂元梓等人电话的事，表面上按兵不动，实际上悄悄在行动。我通过化学系井冈山派的实验员蔡长龄认识了他的父亲，北大电话班的老蔡师傅，老蔡也是井冈山派观点。我漫不经心地问到北大电话干线的走向，

老蔡师傅一下子紧张起来，劝说我千万不要破坏电话。我说你只要告诉电缆在哪里，我保证不会说出谁讲的，老蔡知道我在管理井冈山广播台，后来跟我约定提示电话电缆走向：有一天，老蔡背着帆布工具袋在 29 斋和 30 斋之间走动，看见我在看他，他就沿着 30 斋东墙根往南走，中间两次在原地跺脚，我当然心领神会了——电缆接头就在他跺脚之处。确切知道北大电话电缆走向在 30 斋旁边，而当时的 30 斋正好在井冈山的辖区之内，又是一座空楼，这样的条件真是和当年西柏林通过地道窃听电话历史大剧太吻合了。可能这也是历史机遇吧。后来 28 斋和 30 斋之间架通了天桥，更是为施工和监听人员的进出，提供了安全保障条件。

在酝酿中的监听电话计划，促使其启动是 1968 年的 3·29 武斗（有关 3·29 武斗已有多人回忆报道）。在 3·29 当夜，我住在 31 斋二楼，听到新北大公社暴徒在寻找我这个井冈山广播台的井冈山铁杆，好在我的战友保护我未落入新北大公社的魔爪，我从二楼跳窗逃出，跑到 28 斋井冈山广播台。得知聂元梓的丑陋表演和那个“李排长”【注：指李钟奇】颠倒黑白的讲话后，我愤怒和绝望，此时想起监听电话的事再也没有什么犹豫了。当天凌晨立即邀集几个人跑到第二教室楼，搜罗一批监听电话还缺的器材——日光灯的镇流器，用作扼流圈，日光灯的起辉器可用作来电话的指示灯。监听电话器材大体备好。

要着手开干了，我怕人多嘴杂泄漏机密，在广播台里也没有表现任何行动，特别是有意回避爱张扬和最热血的广播台机务人员。我找到井冈山 0362 的铁杆耿天彭和李鹏。此前 0362 曾经有四个人同我一起，蹬着三轮车去房山工地拉回一台 750 瓦扩音机器，这几个铁杆经过考验，绝对可靠——扩大广播台的事容我以后慢慢道来。我跟他们分别单独谈话，说广播台要干一件危险的大事，非常危险，需要绝对保密，干完事儿，永远不许说出去，敢不敢干你自己定。耿天彭和李鹏对我很信任，都答应冒死命也跟我干。有敢拼命的人参与，我决定要动手干了。我主动找到井冈山兵团总部头头侯汉清，对他说我们广播台机务太累了，需要找个安静地方休息，要到 30 斋住下去。当时 30 斋没有人住在里面，一楼的所有门窗都已经钉死，而且用土堵上。另外告诉侯：我们还要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井冈山

总部不要过问，只有你侯汉清一个人知道。你也不许告诉井冈山总部的其他任何人，如果以后出什么事，井冈山总部不知情，与总部无关，我姜承永个人负责。侯汉清问我要做的事符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回答说保证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这样开始了井冈山总部确实不知情的监听电话行动。一连几天，李鹏、耿天彭和我挖土不止。在这期间，北大武术队队长孔易人经常来广播台守护，他见我们几个人天天通过天桥去 30 斋，猜到我们一定在干重要的事情。他主动对我说：你们肯定在做重要的事，我不问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心去干，公社打手不超过 20 人来进攻，我保证不会伤到你们一根毫毛。那几天，孔易人就坐在楼梯口，身旁放着一把大号铁锹，保护我们的秘密活动。孔易人是北大武术队队长，练武惯用兵器是大刀，危急时刻用大铁锹权当青龙偃月刀——这就是当年我们的井冈山英雄勇士。2002 年我和孔易人、耿天彭、陈荣富、张曼平相聚在杭州，大家忆起当年的舍命合作，感慨不已。

监听电话第一步，是挖地道找到电话电缆。井冈山广播台的机务两人参与查线，现在准确记得的有莫汝榜，而且莫汝榜在相当长一度时间内坚守监听，另外还有一或二人，不能准确忆起。剖开电缆铁皮铠甲后，用耳机线端连接大头针探查每一对电话线，还从化学系汪勤尉老师那里借来的高级万用表测量电压电流，最终确认挑选出聂元梓、孙蓬一、高云鹏、新北大广播台、北大校文革二组以及频繁与聂、孙等通话的电话线对，共计 20 门电话。为了防止被人察觉而反监听，我们的动作小心谨慎，每查到一个目标电话，一定要等到电话挂断后再仔细接线。焊接引线和绝缘包扎细致活都是我干的。用当年留学生衣柜的抽屉组装接线台，用 1M 欧姆电阻取样接线。用上在此之前已经准备的电子器件，参与探查的几个人还拿出了自己保有的电子零件，组装监听工作台。20 只日光灯起辉器作为来电显示——对应各个电话连接话筒插口，还配备放大、录音接口，最初参与查线的广播台机务人员值班监听，刚开始由我和莫汝榜监听，做书面摘要记录，遇到重要内容用钟声 610 录音机作磁带录音。

1968 年 4 月中旬监听工程启用，我和井冈山广播台机务坚守岗位，监听记录、录音工作，有重要事项由我向侯汉清单独报告，开始时，我对

侯汉清讲，是来自“丛中笑战斗队”的可靠情报。这样工作大约到 1968 年 5 月，因为通过监听电话得知对井冈山兵团有重大危险的重要情报，姜承永认识到事态重大，担心单线联系恐误大事，报告侯汉清，把监听电话转由兵团总部接管。当时我还特别强调，这件事不要在总部里公开，让老侯物色绝对可靠的人，直接对侯本人负责。后来老侯要我向温标和地质地理系的一位陈姓女同学交接了监听工作，不知道温标他俩是否还是跟侯汉清单线联系。其后我还是经常到“电话机房”探视。

三、监听电话斩获多多

监听电话过程中，除了无关紧要的琐事之外，经常收到重要情报，其中至今仍有清晰印象的重要事件略记如下：

1968 年 5 月 2 日中午，监听电话中截获新北大公社内部通话，公社的佛兵要在后半夜 2 点钟偷袭井冈山兵团的 37 斋寨门，当时还记下来佛兵的口令、暗号等联络号令。得知此情报后，我单独找到兵团总部侯汉清报告：当天晚上将有重大事情发生，要他一定秘密安排能守楼的勇士待命，因担心过早透露情报会走漏消息，到晚饭后我再告诉具体情报。晚上大约 8 点钟，我准确说出新北大公社要偷袭 37 斋的具体情报，侯汉清还疑惑情报是否可靠，我说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要保密的重要事，“丛中笑战斗队”的情报绝对可靠。后来安排守寨的 0362、0363 的勇士们，看到“老佛爷”聂元梓的“佛兵”手持消防斧、剪线钳夜里爬向井冈山寨门时，几乎要笑起来，毫不犹疑地狠揍来犯之敌，打得“佛兵”丢盔卸甲大败而逃。

还有一次成功预警武斗的事，大约是在 6 月份，在监听电话里听到公社的武斗队长让人在深夜“十二点叫我起床。”联系这个狂徒以前多次参加武斗的经历，分析聂孙武斗队当夜可能有活动，此情报报告井冈山总部侯汉清后，井冈山兵团做了防御部署。因为前次情报确实破解了公社的武斗计划而获胜，这次见到公社有的活动，井冈山过早行动准备应敌，结果敌对双方都发现对方有所准备，来犯井冈山的公社武斗队只好退兵。丛中笑战斗队的情报使井冈山兵团不战而胜。

据工宣队进校之后传出的消息，新北大公社内部曾以为他们的武斗准备有人泄密，为这事还打残过公社内部反对武斗的“内奸”。

在电话监听中得到过几项严重危险情报，例如：①从新北大公社头头之间的通话中分析，新北大公社已经准备了攻城的云梯和炸药，可能要对井冈山的 28 斋发起攻击；②聂元梓曾向谢富治电话报告，说到，要彻底解决北大的问题，必须解决井冈山的人，谢富治回话说要聂元梓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③新北大公社要抓捕井冈山的重要成员…。得知这类严重危急情报，事关重大，我立即向总部侯汉清报告，其后将监听电话工作交由兵团总部直接处置。

电话监听记录到的事情很多，现在回想有印象的事还有：井冈山 03 纵队运进粮食蔬菜，公社调人冲击，井冈山派人保护；从公社内部通话中得知公社派人到校外抓捕井冈山的人，都及时报告总部设法营救；侦知新北大公社武斗行动参与最多的执行头头有宫香政、王刚、黄元庄等人；井冈山从人大运来变压器时，有人向新北大公社总部报告说井冈山运进来一门大炮。从人大运来 100KVA 变压器是我导演的短剧，可能被“老佛爷”的“佛兵”们误认为“大炮”，吓得不轻。（后事 11 千伏带电作业的壮举，容我下回分解…）

四、监听北大内部电话的余音

北京高校武斗愈演愈烈，终于惊动了发动文革的伟大领袖，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当时我们研究生早有分配方案。只有我这个井冈山铁杆不肯写“下山声明”。他们不但不发给毕业分配报到证书，还一次次要我到化学系文革去谈话，这期间我们“万水千山战斗队”王锦荣、吴卓智、石进超等铁杆同学，多次陪伴、保护我去系文革争理，系文革主任好像是貌似老好人的李志刚。他们每次都把公社打手招来，我都在老同学保护下得以逃脱。后来这些研究生同学到了报到截止日期，只好离校走了，那时还不知道后来聂孙落得的下场，我担心新北大公社将怎样发落我。幸好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化学系系文革主动找我发给报到证，我说我不承认校文革是红色政权，还是工宣队发给我的报到证。拿到报到证立即离京去重庆报到。

在重庆工作期间，听到北大后来派进的 8341 部队纠正了前期工宣队、63 军军宣队的错误，铁杆井冈山们弹冠相庆，当时 0362、0363 有一大批铁杆同学回校聚会。这期间我从当年化学系 65 级一位女同学处得知：关

于北大武斗的事双方争论不休，都说对方挑动武斗。当此之际，井冈山兵团的人贴出一张字数不多的大字报，说要查清北大武斗，到 28 斋某房间，看过记录本和听过磁带录音就什么都明白了（后来得知是温标的写的那张大字报）。该同学还悄悄告诉我，她当年做过一件“大事”，因为从监听电话中得知聂元梓准备武斗升级的前因，她偷运手榴弹进校的严重事件，算作是井冈山兵团的被迫自卫行动，工宣队让她斗私批修，没有过多为难她。好学妹！

当年监听北大内部电话，记录了北大文革历史的一个片段。文革是一场浩劫，没有谁是完全正确的。井冈山人用智慧和勇敢在艰难岁月保卫了井冈山人的生命、人格的尊严，在第一线抗击聂元梓的武力迫害，客观上减轻了她对于各种“革命对象”的压力。看看走上工作岗位的井冈山人，几十年来，李国杰、舒德干等，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做出了多少出类拔萃的贡献，冒死监听北大文革内部电话，值！

微信截屏话武斗
——2016 年 12 月 9 日中午老同学回忆 3•29 事件

陈子明 樊能廷 韩长绵 华国藩 姚建明 张俭 朱开定[2]

2016 年 12 月 9 日中午，03633 班老同学们在“永远的 03633”微信群中聊起北大 1968 年 3 · 29 事件，把午睡给搅了，虽然来言去语、有一搭没一搭，躺着，睡不着了。参加微信聊天的有陈子明、樊能廷、韩长绵、姚建明、朱开定，共计五位同班同学。李国俊没有微信，做了亲历简忆。为了核对情况，笔者与雷祯孝、李乾宽两位同学通了电话，给姚文德同学发了微信。

笔者一想，我们都是北大 3•29 事件的当事人、受害者，把微信聊天的内容留存下来，不就是“存史求真”么？

专门讲述北大 3•29 事件的材料很多，拽文地说，卷帙浩繁[3]。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注重当事人、尤其是第一现场当事人的叙述。署名发表本文的作者，都是第一现场当事人，其中多人签名亲书北大 1968 年 3•29 事件的亲历（见附图）。

---

2 按照汉语拼音顺序排列作者姓名。

3戈辰:《北大文革与文革风云回忆反思》,《燕园风云录·一》, 2012 年, 215 页。

范达人:《毛泽东遗弃文革红人聂元梓内情：发动武斗》,《凤凰视频》, 2013 年 3 月 13 日。

樊能廷:《北大“刺聂”真相》,《昨天》第 62 期, 2015 年。

耿天彭:《关于“3·29”的回忆——1968.3.29 被逼跳楼》,《新浪博客》, 2007 年 3 月 10 日。

顾人虎:《北大武斗》

李竟然:《北大文革武斗纪实（摘自北大百年)》,《人人网》。

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 108 期。

鸣不平:《我所见证的 1968 年北大武斗》,《海归网》, 2007 年 7 月 12 日。

散淡天涯:《北大 329 武斗印象》,《新浪博客》, 2006 年 7 月 18 日。

司徒文:《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文史精华》, 2009 年, 第 7 期。

唐利:《我的北大文革记忆》,《http://www.21ccom.net》, 2012 年 2 月 23 日。

田健行:《恐怖之夜，救人一命——武斗杂忆》,《燕园风云录·一》, 2012 年, 162 页。

俞小平:《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燕园风云录·四》, 2016 年, 78 页。

张曼平:《我所经历的 1968 年北大武斗》。

先看李国俊的亲历简忆：

发生在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的北大武斗，是聶元梓拍板[4]，校文革及其属下“新北大公社”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目的是想摧毁北大“井岗山兵团”。聶元梓-校文革组建的武斗队可以说武装到牙齿，被夜袭的“井岗山兵团”骨干 03 纵队人员在睡梦中惊醒，赤手空拳应付对方的突然袭击。我们的宿舍在一楼，情急之中迅速地把两张床铺移到走廊竖起来抵档长矛，并加上一层棉被，处境十分被动。当时，照明电已被公社武斗队提前切断，我们全力顶住床铺抵挡对方的猛烈进攻。记得我身旁还有一位外系的女同学，不知她什么时候和怎样进 31 斋的，黑暗中看不清她的面孔，真是一位勇敢非凡的女性，酌估我今世是无法知晓她是谁了。公社的人还把石灰包投掷到我们这边，幸亏没打到脸上。我们一直顽强抵抗至快到天亮，最后，我从房间的东面窗户跳出。跳出窗口，公社武斗队的人从楼顶投下很多砖头砸我们，就是置我们于死地。天亮，我们无处安身，后来我年级井岗山兵团的一部分同学住进 37 斋。我们这些人在极其困难险恶的环境下，在楼里坚守了很长时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校后，我们回到 31 斋宿舍，所有的财物被“新北大公社”的人洗劫一空，其中不乏贵重和珍爱的私人衣物。记得宣传队曾叫我们把被洗劫的财物写成书面上报，但上报后却一直没有下文。新北大公社的一部分人不配当中国最高学府的学生，他们是一帮不折不扣的贼匪。我是相信因果报应的，恶有恶报，上天一定会惩罚这些坏事干尽的人，即便本人躲过了惩罚，也会落到他们的后代身上。回想 1968 年的冬天，我是靠穿在身上的一件毛背心度过的，我是班上体格最棒的人，竟然没有冻出病來。69 年冬天，工宣队麻师傅把她爱人的一件油污磨得发亮的棉工作服借给我禦寒，我离校前还给了她，滴水之恩无以为报，此乃终生憾事。记得她曾和我们讲过，“井岗山兵团”0363 中藏龙臥虎。时光在流逝，当年“井岗山兵团”0363 的人没有搞政治的，出不了龙和虎，一部分人出了国，留在国内的不少人成为专家教授。记得我赠樊兄的一首七言律诗中头两句是“悠悠往事脑常浮，卅一楼

4 艾群：《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燕园风云录·四》，2016 年，194 页。

中禦利矛。”就是指的68年3月29日由新北大公社发起的武斗。早在北大百年校庆，03633两派人已共同活动和合影留念，我是前年在韩长绵的劝说后才在贵州与昔日对立面一些人握手言和的。去年又北上，在京见到了在世的“新北大公社”的其他几位。正所谓世上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至于能否“相逢一笑泯恩仇”就另说了。[5]

从李国俊详明的据实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校文革搞武斗早有预谋和部署，不然，新北大公社几百人武斗队的编练，统一的服装黄军棉袄、统一的柳条帽、统一的白毛巾、统一的长矛，一夕之间，如何办齐？他们切断31斋电源，手持长矛，还要在暗夜中用江湖绿林暗器石灰包，来对付赤手空拳的对立派学生，是不折不扣的下流黑道手法！无庸赘言，石灰包也是事先准备好的。

我们看看女同学张俭的亲历简忆：

我们化学系女同学一直住在36斋，68年3月29日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楼道的吵闹声惊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穿好衣服奔向楼外，就听有人说31斋打起来了。赶到31斋楼外，见到班上的井冈山男同学，个个惊魂未定。问他们，都回答不知道怎么就被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赶出来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夜袭占楼暴力行动。自那天起，井冈山的男同学“无家可归”了，直至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割据”局面形成后，井冈山兵团的学生被包围在六栋楼内。我因真正的无家可归，与同命运的同班同学王文芝住进37斋四楼，对门邻居则是生物系毕业班的刘玮同学，虽不相识，见面时他总是友好的打招呼。万万没想到的是，善良、文气的刘玮竟惨死在新北大公社惨无人道的暴徒手下。被困在楼里，男同学外出太危险，于是我和王文芝担负起去海淀街上购买食物的任务，但是也不敢频繁外出，只能选择合适的时间，小心谨慎出行。在3·29那天，建明冒着危险抢救出自己的自行车，在新北大公社武斗队

5 樊能廷补正：说起“藏龙卧虎、出不了龙和虎”，不尽然。红三团红旗李玉娟，女，上吊死在“沈阳干部进修学院”党委书记任上，应该算“卧虎”。离世时享年不足花甲。其丈夫张国光北航毕业，从辽宁省长平移湖北省长，“大老虎”，2004年被判刑十一年。

的又一次进攻中被抢走。直到“大联合”，建明在 34 斋一楼楼道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车子的后“挡泥板”还被油漆涂改了颜色。

聂元梓-校文革对付不同意见，说不服就压，压不住就打。聂派至今动辄以“反潘吴”顾盼自雄，“潘吴”有啥？不都是“有贡献”的“党干部”吗？按照党的一贯行事，“潘吴”经过几十年“审干”，不是仍然“同志”，是在“为党工作”吗？再说，聂元梓-校文革能拿得出任何一纸一物，证明“潘吴”与北大井冈山有“扶植”关系？1982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为潘梓年举行追悼大会，平反昭雪，肯定了他一生的功绩；1983 年 3 月，聂元梓被判 17 年徒刑，两相映照，不是很反讽吗？

按照我们化学系 62 级学长田建行说：潘梓年是个有点像周培源的人物，而且和周培源一样同为无锡人，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后来平反。……反吴传启，这本来是不同阴谋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表现。[6]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关锋的女儿说：出于政治的需要，关锋、林聿时、吴传启也都被妖魔化了。[7]

话兜回来，还是说北大文革武斗。武斗是文斗的趋于入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武斗剿荡是饮鸩止渴，终究不是救世良方。

文革前，北京有五十九所高校，文革中，高校搞武斗，大打出手的不过五、六所。其中北大、清华两家，最负盛名的两校，是打得最凶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文革中谁发动武斗，必然走上邪路、走上穷途末路——武斗是一条不归路。聂元梓-校文革发动武斗，造成北大文革著名的“3•29 事件”，开北京高校武斗和杀人之先河。蒯大富发动武斗、动用热兵器，开枪杀人。聂蒯双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管他们在回忆录中怎样装扮忠狗（实为桀犬），上推下卸，他们的罪责脱不掉、罪行洗不清！

到 1964 年下半年，北大全校共有 8918 名学生，其中女生 2052 人。据统计，到 1966 年 6 月，在校生 8523 人。教职员工 4872 人，研究生

6 田健行：《我为什么没有上山》，《燕园风云录・一》，2012 年，256 页。

7 关成华，《我眼中的父亲关锋和他的友人林聿时、吴传启》，《新浪博客》，2014 年 10 月 20 日。

166 人，留学生 412 人。一万三千多人的这么一个“大家”，谁来当家，都不容易。钱粮大项来自国家、有保障，那就剩下个“治理”的“大政”了。

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国有治国的方略，治家有治家的套路。国家的当家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大的方略错了——不施善政爱民，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接运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七斗八斗，没完没了，愚弄百姓，残民以逞。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推翻陆平校党委领导，聂元梓鸿运当头，被选举为校文革主任，当北大这个家。当家做主了，“牧民”了，怎么理政、怎么“牧民”？这是能不能把北大搞好，也是她自己能不能混好的大课题。

当北大这个家，从资望上说，聂元梓不够这个格儿。万分的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能在文革中保一方平安，就是大功德。呵护师生、作育人才，是一校之长的本分。显然，聂元梓不懂这个道理。她文化浅、水平低，完全依仗金光闪闪“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罩着，还要在毛泽东、中央文革极左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指引下，左上加左，加倍奉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作践人，“立新功”!

聂元梓-校文革不知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把依靠人民群众作为立身之本，而是只念“权经”，唯我独左、唯我独尊，不讲常识、不讲常理。聂元梓有权有钱，麾下“文胆”、“枪杆”完备，只许无权无势而有思想、有嘴巴的知识分子低头做小，不辨良窳，一味地顺从她、跟她跑。誰跟她稍有不同意见，誰就是“政治野心”、“方向路线错误”，甚至当作“敌对势力”、“阶级敌人”对待。她的理政思路，说透了，就是夺权、保权的“权经”，就是“驱众”、“驭奴”。

张承先工作组撤出北大，建立校文革，北大在格局上是一统天下，即便不是真的“万众一心”，起码，聂元梓-校文革的号令还是通行无阻的。

然而，变生肘腋，分歧起于原来跟聂元梓“平起平坐”的“社教左派”战友。1966 年 6 月底，最先站出来用大字报《我们和王茂湘等人的分歧》

公开批评聂元梓的是经济系教员杨勋[8]。1966 年 10 月 8 日，《新北大》刊登杨勋的文章《新北大文化大革命又处于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 8 月 5 日的广播讲话》。1966 年 11 月，杨勋又贴出《别了聂元梓》。1966 年 12 月 20 日，杨勋被聂元梓-校文革派员抓捕，“扭送”公安部门入狱。1967 年 2 月 18 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四版，刊登《把反革命分子杨勋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

从 1966 年 8 月校文革筹备期间，北大出现众多造反红卫兵。10 月份，围绕聂元梓组建北大“党组”问题，原来和聂一起“并肩战斗”的“老左派”内部发生矛盾，并且逐步公开化。与此同时，北大各造反红卫兵也发生分化，逐步形成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红旗兵团”为代表，支持聂元梓-校文革，一派以“井冈山”、“红联军”为代表，反对聂元梓-校文革。两派在 10 月份互相采取了一些打、砸、抄、抓的行动，摩擦日益加剧。

孔繁、杨克明是聂元梓校文革的成员，他们都是北大“社教左派”，杨克明还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起草人。1966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聂元梓、杨克明、张恩慈对“第一张大字报”出笼有贡献，奉命列席全会。

孔繁、杨克明对于聂元梓提出的“上揪下扫”口号有意见分歧，本来，多年的“左派战友”之间，有意见分歧，可以沟通、讨论，求同存异。可是，聂元梓地位变了，容不得不同意见——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1966 年 10 月 31 日，校文革改组以杨克明为主编的《新北大》编辑部，由刘国政、陈影负责。

1967 年 2 月 4 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孔、杨有罪，罪该万死》、《揭穿孔繁的狼子野心》。1967 年 2 月 14 日，《新北大》刊登校文革 2 月 10 日《重要通告》，宣布 2 月 7 日校文革扩大会议改组校文革常委会的决定。《通告》说：孔繁、杨克明“操纵群众，造谣中伤”，“使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处于内外夹攻的困难境地”。“对这样的坏家伙，我们就是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从校文革里清除出去”。聂元梓“为

8 杨勋:《我经历的北大文革/四清试点和文革初期遭遇》,《燕园风云录·一》, 2012 年, 69 页。

首”了，就要党同伐异，搞清洗。清除本是诤友良幕的孔繁、杨克明之外，竟然一次会议上做出决议，一股脑儿地把校文革常委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聂孟民四个人全都赶出校文革。1967 年 3 月 4 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资产阶级两面派杨克明罪责难逃》、《杨克明和反革命分子杨勋一鼻孔出气》。其实，杨克明是哲学系教员，杨勋是经济系教员，两不搭界，四个鼻孔出气。

1967 年 1 月 10 日，《新北大》刊发李清昆在校文革常委会上的发言说：“江青说孔繁、杨克明的活动就是刘邓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同日，《新北大》发表《乘胜追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社论说，要弄清孔、杨“的反动面目，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说“反革命分子杨勋”等和“虎山行”、“井冈山”、“红联军”中的“某些领导人充当了急先锋”。“他们围攻校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谁要坚持反革命，就要对他实行专政”。

“围攻校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怎么个政治逻辑关系？是说“围攻校文革”就等同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吗？“就要对他实行专政”吗？——显然，聂元梓-校文革把自己放到一个很不适当的位置上了。

不仅于此，1967 年 1 月 24 日，文革校刊《新北大》第四版刊登“红旗兵团”文章说：“反新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此为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奉行的“反聂即反动”逻辑之滥觞。这个逻辑出台以后，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一直按照这个“以聂划线”思路行事，对于内部用这个逻辑，对于外部也用这个逻辑。“反聂即反动”语言简练、鲜明，用以指导内政外交——当然，“反聂即反动”，必不可免地贻人口实，惹起内外物议。

现在反过头来研究北大文革历史资料，只要抓住“反聂即反动”这个主线，辨析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一切文革行为，无不豁然开朗、贯通无碍。

上文分析了“反聂即反动”，接着，笔者就此分析一下“反潘吴”。

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对于文革中做过的错事、坏事，一概避而不谈，唯独死死抓住“反潘吴”，推演到“反潘吴”即“反王关戚”、“反

潘吴”即“反江青、反康生、反陈伯达、反中央文革”，“反潘吴”就是一贯正确、无比英明。

潘吴在哪里？在学部。潘吴在学部，干卿何事？说到这个方面，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就会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讲周恩来“布置”他们到处夺权。每到一处，都吃瘪，难得在民族宫夺权顺利，又被“潘吴”劈手夺去，云云。我等普通群众，不明白国家大事，高教部也好、教育部也好、民族宫也好，关你北大屁事呀，你非得去夺权？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拳——我等只听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孙蓬一，急火攻心的 412 煽动性讲话，那毕竟只算一面之词，可是没听过另一方面“潘吴”说你一句呀。你说你如何如何正确、如何如何高明，抬出周恩来吓人。有周恩来手谕吗？没有。都是由你空口一说罢了，有没有，谁知是真是假？再说，周恩来就不犯错误？不见得吧。如果举个例子，他牵头的刘少奇专案算一个，还有，武汉 720 事件也得算一个。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事情，那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了。

所谓“反潘吴”，既没有见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流血牺牲，也没见“潘吴”流血牺牲，冷眼看去，狗咬狗、两嘴毛。有本事，跟“潘吴”当面锣对面鼓去争斗，跟“王关戚”当面锣对面鼓去争斗，跟“康生、江青、陈伯达”当面锣对面鼓去争斗，这些，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呀。在校内，跟我们这些没见过“大世面”、不知内情的普通群众，胡吹海谤那些云里雾里、八竿子够不着的，抖的是哪门子劲儿呐。

引用田建行学长说法，“反潘吴”就是“不同阴谋集团之间争权夺利”。聂孙的“权经”把握得太紧，旁观者瞧着聂孙嚷嚷“反潘吴”，无非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最多是为了争权夺利，拉大旗作虎皮，遮着自己，吓唬别人。

却说北大，靠整人起家的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排斥异己，离心者众，日子混得一天不如一天。支持的人众陆续减少，反对的声浪日渐增高。到 1967 年 8 月 17 日，团零飘井红联合，组成“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拉出 5000 多人的队伍，聂元梓-校文革的江山，呼啦啦垮了半壁。按照汉语拼音字顺排序，细数反对派的名人，哪一个不是聂元梓把他们从校文革

推出去的？——戴新民、郭罗基、侯汉清、孔繁、廖淑明、刘宗义、聂孟民、牛辉林、牛占文、唐景春、徐运朴、杨克明、杨学祺、周培源……。

人心向背，谁也勉强不了。文革是无法躲避的人祸，北大是文革的重灾区，北大 5000 人众反对派的形成却是顺应天理，这里面没有什么曲阐难通的。

到 1968 年，聂孙校文革“反聂即反动”的逻辑不那么灵光了。聂孙焦躁，虚火上升，走上绑架-刑讯-逼供-大规模武斗这条暴力之路、无常之路。被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绑架-刑讯-残害的案例实在太多，邓朴方、樊立勤、陈一咨、郑培蒂、颜品忠、徐运朴、杨勋、杨炳章、温家驹、殷文杰、刘玮……，数以百计，如果开放档案材料，应该可以查到。由于某种原因，“文革研究”被列为禁区，档案、资料、报刊、著述都被冻结封存，会不会有所销毁，殊难料也。

笔者得知，“中央两案专案组”曾经以“聂元梓案”为由，从北大档案馆“借”去一百多个卷宗。等到聂元梓案宣判以后，北大档案馆打报告，要求归还这一百多个档案卷宗，但是至今没有归还，其中秘辛，也许永远解不开了。

1968 年 3 月 28 日晚间，在临湖轩召开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各战斗团团长联席会议，在这个武斗决策会上，聂元梓拍板——“打！你们要打，就打吧！”。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 1 时，校文革武斗总指挥宫香政指挥，校文革属下的新北大公社红九团长矛队，突袭 31 斋化学系学生宿舍，切断电源，在暗夜中，把赤手空拳的“井冈山兵团”学生从睡梦中惊起，殴打、驱赶出楼，受伤者逾百人，引发了北大的大规模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在北大，称为 3•29 事件。宫香政在 2017 年反思文革的文章中承认，新北大公社武斗队 3•29 夺占 31 斋学生宿舍楼之后，他是 31 斋“巩固守备”的负责人。

往下，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力围困着反抗他们的“井冈山兵团”学生据守的 6 座学生宿舍楼，长达 4 个月，企图把“井冈山兵团”彻底打垮、剿灭。1968 年 7 月 27 日，毛泽东指派 8341 部队和 3 万多名工人进入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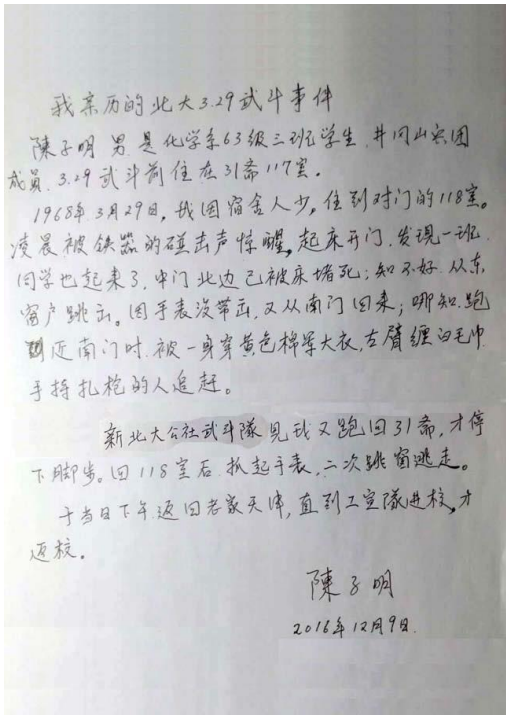
华大学制止武斗。7 月 28 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高校“五大学生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京各高校。

原新北大公社成员田建行说：“3.29 之夜我的奇特经历使我认识了聂元梓之辈的真实面目——武斗蓄谋已久、残暴已极！”[9]

原新北大公社成员司徒文说：聂元梓校文革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势大气粗，对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采取了镇压、排斥的压伐政策，许多都是如今的新北大公社具体实施的，而井冈山兵团的组成人员，正是聂元梓校文革的“受害者”。……聂元梓校文革凭借中央文革的支持，利用新北大公社，对井冈山兵团实行打压。井冈山兵团也不买对方的账，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新北大公社早有预谋，要从 31 楼化学系井冈山的同学开刀。因为这里住着井冈山的主力与骨干 0363(化学系 63 级)，31 楼还是个战略要地。公社的孙蓬一布置这一行动时说：化学系的同学要做出些牺牲！据后来了解，为了避免出现同班同学互相残杀，高云鹏这位武斗总指挥也避了点儿嫌：攻打 31 楼的武斗队人员是从 09 系招募的，怕他们不了解 31 楼的住宿详情。事前在有井冈山同学居住的房间都做好了记号。……3 月 29 日凌晨 1 点整，公社武斗人员全副武装实行突袭，把 31 楼洗劫一空。遇到公社的同学也不亮明身份。只是往外撵。假如是井冈山的，就会被打伤。一些公社的同学不明真相，稀里糊涂往外走。被公社武斗人员撞见，没来得及说明身份，也被扎伤了。[10]

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以为绑架-刑讯-逼供-大规模武斗能吓倒、镇住反对派。然而，这些恶行恰恰暴露他们残暴的反人性本质和“文革”的反人类罪恶。本文亲历者的据实叙述，与田建行、司徒文两位的叙述，若合符节，有力地证明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发动武斗，戕害、洗劫无辜学生的罪行。(本文刊发于《记忆》2017 年 4 月 30 日第 182 期【述往】，题为《1968 年 3•29 北大武斗——48 年后的集体回忆》)。

9田健行：《恐怖之夜，救人一命——武斗杂忆》，《燕园风云录·一》，2012 年，162 页。
10 司徒文：《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文史精华》，2009 年第 7 期。



我亲历的北大3.29武斗事件

陈子明 男，是化学系63级二班学生，井冈山兵团成员。3.29武斗前住在31斋117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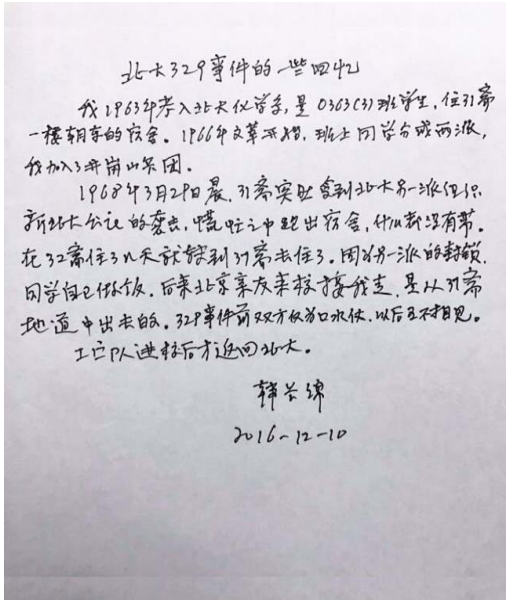
1968年3月29日，我因宿舍人少，住到对门的118室。凌晨被铁器的碰击声惊醒，起床开门，发现一班同学也起来了，中门北边已被床堵死；知不好，从东窗户跳出。因手表没带出，又从南门回来；哪知，跑到近南门时，被一身穿黄色棉军大衣，右臂缠白毛巾手持扎枪的人追赶。

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见我又跑回31斋，才停下脚步。回118室后，抓起手表，二次跳窗逃走。

于当日下午返回若家天津，直到工宣队进校，才返校。

陳子明

2016年12月9日



北大329事件的一些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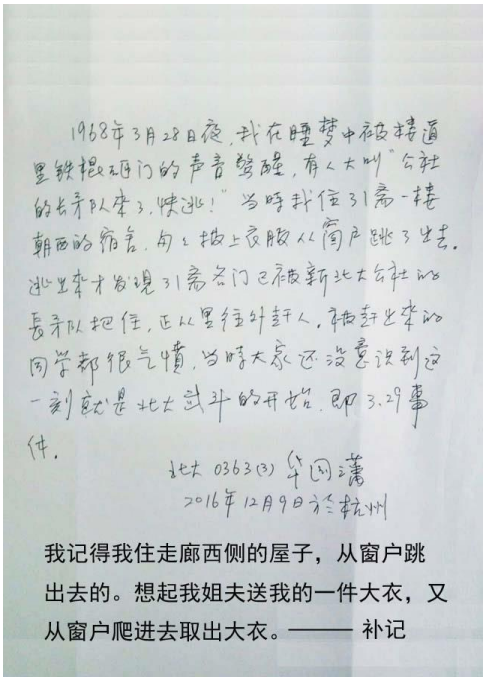
我1963年考入北大化学系，是0363(3)班学生，住31斋一楼朝东的宿舍。1966年文革开始，班上同学分成两派，我加入了井冈山兵团。

1968年3月28日晨，31斋突然来到北大另一派住的新北大公社的袭击，慌忙之中跑出宿舍，什么都没有带。在32斋住了几天就被到37斋去住了。因为另一派的封锁，同学自己做饭。后来北京亲友来探望我走，是从37斋地道中出去的。329事件前双方仅为口水仗，以后互不相见。

工宣队进校后才返回北大。

韩兴沛

2016-12-10



1968年3月28日夜，我在睡梦中被精通里铁棍砸门的声音惊醒，有人大叫"公社的武斗队来了，快逃！"当时我住31斋一楼朝西的宿舍，匆匆披上皮服从窗户跳了出去。逃出来才发现31斋各门已被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把住，正从里往外封人，被封出来的同学都很气愤，当时大家还没意识到这一刻就是北大武斗的开始，即3.29事件。

北大 0363(3) 余国潘

2016年12月9日于杭州

我记得我住走廊西侧的屋子，从窗户跳出去的。想起我姐夫送我的一件大衣，又从窗户爬进去取出大衣。——— 补记

我叫李乾宽，是北京大学03633班学生，住31斋117宿舍。

文化大革命之大串联开始后，我基本上都在四川、贵州搞串联，很少参加北大的运动。但观点倾向反聂元梓的井冈山派。

1968年3月29日我不在北京，而是在贵阳。当我于四月中旬返京回校时，31斋已被新北大公社武装占领。我的宿舍也被他们占领了。经交涉回到我宿舍时，我的个人物品全部被洗劫一空：包括被褥、衣物、书籍及其他。

经交涉，公社的同学只给我弄了一套被褥，其他东西已无法寻找。我只好找到43斋一楼去居住：那里没被武装占领。直到工宣队进校。

李乾宽

2016. 12. 10于贵阳

北大 329 事件亲历

严文凯，男，北京大学化学系 03641 班学生，井冈山兵团成员，北京大学文革武斗前住 31 斋 1 楼最北侧宿舍，宿舍窗户朝北，。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我正在宿舍睡觉，31 斋突然遭到新北大公社长矛队袭击，井冈山兵团成员纷纷被赶出各自宿舍，我只得从窗户跳出逃离 31 斋。

从此北大形成武力对峙，我也住到 28 斋，直到工宣队进校。原宿舍内我的所有物品，包括被褥，衣物，书籍，文具，全部损失一空。

我们班浦家齐同学，上海人，已于 2015 年于上海过世，当时也是井冈山兵团成员，一贯主张文革必须坚持“非暴力”，坚决反对武斗，当日与新北大公社长矛队理论，抗议搬离宿舍，被长矛扎成“气胸”。

严文凯

2017 年 2 月 7 日于北京

我就经历的北京大学3.29事件

姚建明，男，北京大学63级化学系学生，文革期间，井冈山兵团成员。3.29事件时住北京大学31斋121室。

1968年3月29日凌晨，从睡梦中突然听到扩播喇叭喊口号以及金属打斗声。出外看，楼道一片漆黑，但隐约能见到斋长矛的人群互打斗。我于无对策只好奔回此室。

从此武斗之手失信用品全部损失。不久便南下以躲避武斗，直至武斗结束后校。

姚建明

2016年12月9日

北大 329 事件的亲身经历

朱开宪，男，北大化学系03633班的学生，文革时期是北大井冈山兵团成员，68年3月武斗前一直住在北大学生宿舍31斋一楼。

68年3月29日凌晨，我们住的31斋楼遭到新北大公社武斗长矛队突袭，我们在睡梦中被长矛敲击声惊醒，毫无防备。我和同宿舍的井冈山兵团的同学一起跳窗逃出。

从此北大形成武力割据的局面，我无法再回31斋宿舍，后来住37斋学生宿舍楼，直到工宣队进校。

朱开宪

2016年12月9日于仪征

陈子明

@韩长绵 329那夜，我因我宿舍无人(雷向东和李乾宽不在学校)住你宿舍(120还是122，应是122。)，以园形花坛为中心，29斋在北边。当时我第一个从东窗跳出，因忘了带手表又从31斋南门返回，被钢一连的追赶，差点被扎;因我返31斋所以没再追我。进122室己无人，抓手表，二次跳窗。

韩长绵

是东，东校门方向就是窗户的方向。

韩长绵

海淀是南

姚建明

329我们是从南门逃出来的。

陈子明

@韩长绵 当天宿舍有國俊，你。是否有开定记不清了。國凡当天在121吗?

樊能廷

长绵记忆正确，你们宿舍门朝走廊，窗朝东。28、30、31、29斋，各占东南西北，围成四合院式，中心花坛为园形。

樊能廷

园形花坛上有红三团红旗一条标语："谭震林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他们口诛笔伐我，说我故意盖掉前面六个字，构成"恶攻"罪。是不是发生过这样的遮盖，我毫无所知。那也扣上"恶攻"帽子再说。

樊能廷

子明说得对，我与李乾宽、雷祯孝电话核实，他俩不在31斋。等回来以后，都被洗劫一空了。

陈子明

小崽芳在何处?

姚建明

我怎么记得我在121，水房隔壁?

姚建明

往北一看，黑乎乎的，有人拿长矛的黑影，也听见有人从楼上跳下来。

陈子明：@drfan 我刚从家带来的新被子没了。工宣隊进校后，公社来了客人不知何人抱来我的新被给客人盖。载芳看見了，跟我核实后，趁开门之机，当人面给我抱了过床;并大声讲:子明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事后他们没吭声。我也没追究。

韩长绵：从31斋出来后，好像不是马上住到37，好像在女生楼里仃留过，是否住过忘了。

先是进入32斋，几天后，化学系同学不分男女，调换到37斋。

陈子明：我可能记错宿舍号了，如从北向南编号那我住117，韓住118。

陈子明：@ 加州琴票 如你住水房隔壁，不是厕所隔壁;是121室。那能廷应是双号。水房在东，厕所在西，对吗？

陈子明：听到铁管碰楼梯的声响，惊醒后，开门一看，一班人己醒，并敲公社人住室，己空无人。然后我才跳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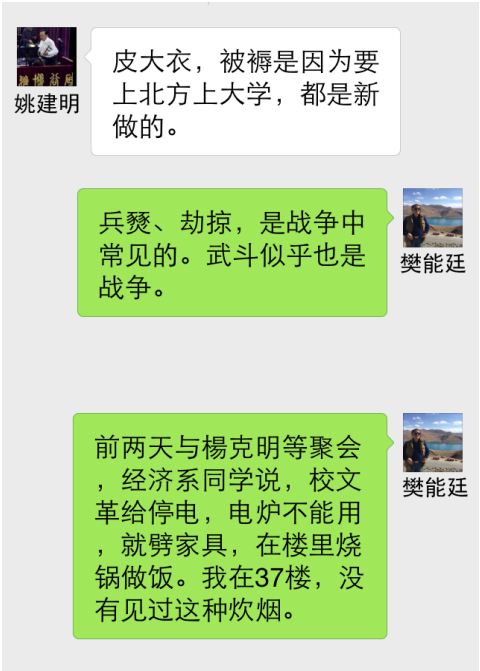
姚建明：水房门朝西，窗朝北，楼梯从南上下来，一下来掉头出南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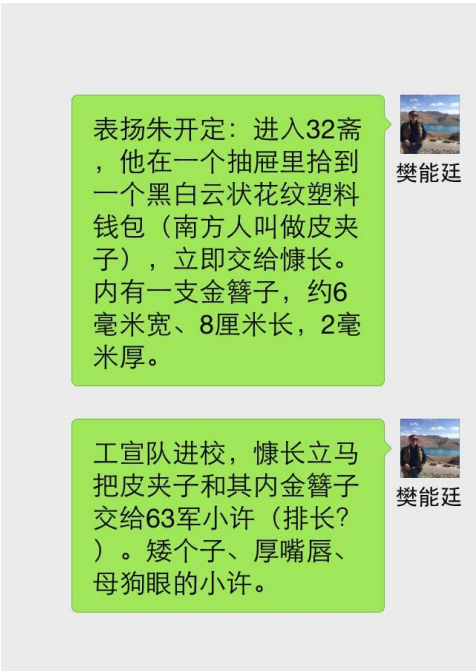
陈子明：@drfan 门朝东西，窗朝北。

陈子明：@博雅琴票 你对过有人住吗？

姚建明：逃出来以后，只回去抢出自行车。我对过应该有人住。记不清谁住了？是不是樊能廷？我好像和韩超琦，121隔壁是水房，所以房间里有半截水泥墙围子，防潮。

姚建明：工宣队进校大联合再回宿舍，什么都没了，只剩下教科书，笔记本，别的皮大衣，被褥，胡琴都丢了，我的胡琴最可惜，是我舅舅送我的一把铁心筒的胡琴，他用49块钱买的，当时40块钱的胡琴是很贵的东西了。


姚建明
皮大衣，被褥是因为要上北方上大学，都是新做的。
兵燹、劫掠，是战争中常见的。武斗似乎也是战争。
樊能廷
前两天与楊克明等聚会，经济系同学说，校文革给停电，电炉不能用，就劈家具，在楼里烧锅做饭。我在37楼，没有见过这种炊烟。
樊能廷


表扬朱开定：进入32斋，他在一个抽屉里拾到一个黑白云状花纹塑料钱包（南方人叫做皮夹子），立即交给慷长。内有一支金簪子，约6毫米宽、8厘米长，2毫米厚。
樊能廷
工宣队进校，慷长立马把皮夹子和其内金簪子交给63军小许（排长?）。矮个子、厚嘴唇、母狗眼的小许。
樊能廷

况明星《文革武斗期间北大天桥的架设》

【载于丛璋、亚达、国真（自印本）《燕园风云录·二》，第189～193页，2013年。】

一、井冈山为什么要架设天桥

在文革1967～1968年期间，北大分成了“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两大派，双方对立严重。大概是68年的3月底，“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偷袭并夺占31楼，驱赶对立派，两派之间出现了暴力冲突。掌权的新北大公社方面控制着学校的绝大部分楼宇和地盘，并拥有全部行政资源和后勤保障设施。而井冈山控制的地方十分狭小，仅仅占领了37楼到30楼一线的学生宿舍、28楼总部及它南面的32楼宿舍，没有任何后勤资源，也没有通向校外的门。为了进出，在37楼面向海淀马路的南面围墙处开了一个大口子作为大门。当时公社方面绝对主动，对井冈山形成了包围之态势，而井冈山比较被动，困处于守势。

在两派割据初期，双方发生过一次大的冲突——争夺36楼。井冈山中午领先进男生占领了36楼，下午公社武斗队组织攻打。由于该楼是井冈山的咽喉，各种物资、人员都要经这里到总部28楼和各纵队，对于井冈山来说，36楼不能失守，必须死保。当时公社的人非常英勇，很快就攻进了一层的几个房间，并在楼外架梯子攻上二楼。井冈山的人也玩命，将二楼的楼板砸了几个大孔，用长矛往下扎，伤了不少公社的同学。另有一些人从三楼和四楼窗口扔下组合暖气片，吓跑了很多进攻的社员（我看到，井冈山怕砸死人，暖气片在窗台上放了几分钟，待梯子上和墙下没人，才推下暖气片）。双方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公社方面撤了。以后，在公共汽车32路的道路上以及35楼后面也先后发生过小的冲突。

最初，为了防止公社的强力弹弓伤人，井冈山楼与楼之间用床架围成人行通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床架也逐渐被弹弓打烂，经常有人被砸伤。这时井冈山楼与楼之间的通路实际上已处于公社的半封锁状态，其中28楼总部的情况最为严峻，它的东面、北面、西北角的楼房均被公社控制，南面进出的地面道路处于对方东面弹弓的有效射程范围内，道路随时都可能被完全封锁，一旦公社攻打28楼总部，28楼势必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井冈山总部召开了一次总部委员和纵队长联席会议，讨论

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设想在 28 楼与 30 楼的四层之间架一座天桥，能同时过 3～4 个人，并决定由 17 纵（技术物理系）负责架设。

二、为什么由我来负责设计

61 级（文革发生前的五年级）的同学基本上学完了大学的课程，基础比较好，天桥的设计原本是由他们负责的。有一天，17 纵 61 级核物理、放化专业的同学在 28 楼讨论架桥的设计方案，其他年级也有一些人参加，我也在旁边凑热闹旁听。大家都没有经验，讨论了好久，感到比较困难。在讨论中有一位同学说，通过解微分方程来计算受力情况。由于我曾自学过结构力学和材料力学，稍微知道一点桥梁知识，67 年回家路过武汉时又看过长江大桥，觉得那位同学讲得不太对，所以在旁边贸然地插了一句："不需要解微分方程，可以用桁架原理解决"。当即，纵队长郑修聪要我介绍桁架原理，我画图简略地介绍了桁架受力的计算方法，并列举了武汉长江大桥和高压电线铁塔运用桁架的例子。

当时大家派性很强，井冈山又面临被"消灭"的危险，所以不管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同学之间都很团结、齐心，只要能解决问题，谁负责设计都可以。我们系是学理科的，多数同学对结构力学不太了解，我讲完了以后，大家误以为我懂架桥，所以一致推举我来负责设计。其实我也不懂，只是从书本上知道一点皮毛，根本没有经验。但当时年青气盛，不知天高地厚，也没想那么多，加之我性格直爽，比较讲义气，觉得自己不能当缩头乌龟，既然大家要我干，信任我，干就干吧。就这样，我当上了 28 楼天桥的"土工程师"。整个架设组主要由我和五年级核物理、放射化学七、八个人组成，其他年级有没有人参加，时隔 45 年，记不清了。

三、桥梁的设计和制作

接受任务后，参考结构力学中桁架的例子以及通常房屋顶的结构，我们很快就设计了一个初步方案。整座桥梁由两个结构完全相同的平行竖立的三角形桁架组成，桥宽 1.2 米，桁架高 2.5 米。经过实地测量，28 楼与 30 楼之间的距离为 15 米左右，就是说，桥在两楼之间的净跨度约为 15 米，制作的木桥桁架总长度应为 18～20 米。为了减轻桥梁本身的重量、便于找寻材料，设想用木头制作。按照这样一个设计思路，我们在 28 楼南

面的两栋尖顶宿舍楼中找到了一种吊天花板的方木风撑，木料干燥、质密，长约 5 米，截面积约为宽 10×高 20 公分。根据书本提供的松木应力强度数据、现有松木截面积大小以及假设 600 公斤的载重量，按桁架原理计算，该松木架桥的安全系数大于 10，符合使用要求。

在制作天桥桁架之前，当时考虑了两个问题：第一、上面的设计是根据书本得到的，能不能安全过人，我们谁也没有经验，需要实测进行过人的安全实验；第二、架桥的环境特殊，桥梁不能象平时那样在地面用机械吊上去，只能在四楼楼道的窗户口和楼顶上人力架桥，也不能在空中组装，由于架桥时可能会出现双方交战，架桥的时间要尽量短促快速。为此，在正式架桥之前，需要在楼道中做好一个完整的桁架桥梁，并且要求其自身的重量越轻越好。

当时的条件非常简陋、原始，所有的工作都要靠手工、人力完成。材料就是上述的松木和街上买来的长螺栓、铁钉，工具只有扳手、锤子、木工用的手摇钻。我记得，预制木桥，首先是加工三角形底边的长横梁，用五根 5 米长的方木首尾相接而成，除去搭接部分，共 20 米长。接成以后两头一抬，自身的重量就使横梁弯得很厉害。

看到这个样子，有的同学担心桥做不成，那时我心里也没有数，但我们还是硬着头皮干。经过三天的努力，做出了一个三角形桁架，这时候，它与单根的长横梁的力学性质完全不同了——站了三个人都没有弯，说明实测与理论是一致的。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信心倍增。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日夜奋战，我们做出了一个完整的桁架桥梁，两端垫起，八个人在上面反复跳动，桥梁安然无恙，实践证明木制的桥梁可以安全过人，达到了预期的设计目的。

我信心满满在 28 楼四楼楼道做木匠活儿，组装桥梁，孔易人学长问我，抽掉这些屋顶方木风撑会影响屋顶安全吗，我说不会的，我们计算过了。随后请来井冈山派的瓦工，打掉了 28 楼和 30 楼面对面的楼道窗户和窗下的短墙，使楼道敞口向外，并用床板预作好了桥面的栈道桥板。准备工作做好后，下一步就是怎样将庞大而沉重的桥梁在两楼之间推送出去、由对方接受的架设过程。

四、天桥的架设过程

为了防止架桥时遭受对方袭击，架桥的那天，井冈山总部调动了所有的在校人员。其中四、五十个人参加 28 楼和 30 楼的架桥，由 17 纵的同学现场组织指挥；两支学生队伍手持长矛在 28 楼楼下附近两个方向上监视对方，以阻击对方从地面进入架桥区域来搞破坏；另一部分人员在各楼严密防守，防止对方趁我架桥时（各楼防守力量薄弱）而突然攻楼。按照总部的布置，架桥时间安排在傍晚时分。

架桥的基本思路是：将木制桁架桥梁从砸掉砖墙、敞口的 28 楼的四楼楼道慢慢地水平推向对面 30 楼的四楼楼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桥梁的西端用三根拨河的大绳和水龙带拉着，两根分别拴在桥梁西端的左、右侧，由 30 楼楼道的人控制。为了使垂直向上的分力大一些，抬高拉绳的支撑点，28 楼楼顶这边的拉绳是嵌在平板车轱辘瓦圈里，充作一个“静滑轮”，车轱辘“静滑轮”架在双层床架上拉抻着大绳。先将桥梁往外拉，待天桥移出大约一半以后，30 楼的人用力向上提着桥梁西端。另一根由 28 楼楼顶的人拉着绕经“静滑轮”的大绳（当时我在 28 楼楼顶），使桥梁不要往下耷拉。而 28 楼四楼楼道的人则用力把桥梁往外推，几股合力使桥梁尽量保持水平状态。

随着桥梁的移出，大绳受力越来越大，床架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当桥梁西端离 30 楼窗豁口不远时，28 楼楼顶的床架有些支撑不住，慢慢地垮下去，并发出格格的声音（事先没想到），天桥也有些失去平衡。这时四、五个同学不顾一切地肩扛着床架的横梁，咬牙坚持着。当时 28 楼的人呼喊 30 楼的人用力提拉，又叫 28 楼楼顶的人用力提拉，现场气氛非常紧张，但并没慌乱。当桥梁西端到达 30 楼时，其端面顶着了 30 楼东墙，桥面比楼道地面低了几十公分，尽管 28 楼楼顶的人拼命地往上提拉，分处两楼的人都很卖力，桥梁就是搁不进楼道。相持了一阵，可能就是所谓“力的奇点”。30 楼那边的

横跨28楼和30楼之间的天桥

人十分焦急，生怕他们坚持不住，天桥坠落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30 楼的同学，协同 28 楼顶的提升力，发一声喊，众人一起用爆发力，克服了“力的奇点”，将桥梁西端提进了 30 楼楼道地板上，这时大家才松了口气。天桥的位置调整好后，17 纵的同学摸黑铺设、钉牢了栈道桥板。至此，架桥工程宣告结束，见插图。

当天晚上，新北大公社 29、31 楼的人虽然也听到了我们这边嘈杂的讲话声、工具敲击声等，但由于我方被断电，没有灯光，他们看不清楚我们在做什么，更没有想到我方在摸黑进行架桥作业。他们只是自己加强了警戒，打了一些零星的弹弓，弹弓射程不够，没有伤到人，因而在这次架桥中，双方没有发生冲突和人员伤害。

天桥三角形桁架的顶端，端正固定着镶框的领袖像，朝着迎敌面，意思好懂的。

【笔者注：一盘散沙、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井冈山”人众，摸着黑，齐心合力架起了“天桥”。孔易人说，架设天桥那晚，胡纯和让他用手电筒在 28 楼这边与 30 楼联络。双方约定“进、退、停”三个动作的手电灯光信号。孔易人还特别关照大家，把水龙带打上一些结，用以防滑。他说，真正是众志成城，只要“有不屈的井冈山人在，这个身处困境的群众组织就亡不了”。老孔在武术队耍大刀无人能及，他在架桥过程中的思虑周至、协调有方，颇为感人。

2018 年 6 月 28 日温标微信说：据我所知，28 楼和 30 楼之间的天桥，所用木料是从其他“起脊”的瓦屋顶楼房顶上拆卸下来的。28、30 楼是平顶，平顶楼房没有木料，拆木料只能是 32、35、36、37 这几座楼。另外，从楼顶拆卸木料是个技术活，哪根木料能拆，哪根木料不能拆，要十分谨慎，不可马虎，搞不好就会造成房倒屋塌，据说请 01 纵数力系力学专业的同学参与了这一行动，拆的都是非承重梁。记得 01 纵纵队长当时是关锦涛，按说他应清楚组织人拆木料造桥这事的一些细节，有知道他下落的可帮忙请他回忆一下当年的情况。】

荒唐的岁月，荒唐的经历

梁正路

我叫梁正路，顺便解释一下，我从小就叫这个名字，父亲给我们五姊妹分别取名为正中、正名、正经、正路、正义，正字辈，都是古书上弄下来的好词儿。之所以要啰嗦这几句，是因为我平生最怕别人误以为这个名字与永红永忠文革学东卫东等一样，是文革时为赶时髦改的。1963 年，我怀着制造原子弹的梦想，进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70 年第一次从北大毕业。其间，我不幸赶上了北京大学历史上最荒唐的岁月，见证了她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丑态。这篇回忆文章先给各位介绍一下北大的武斗，以及本人在武斗中的荒唐经历。

武斗是怎么引起的，罪魁祸首是谁？看过不少文章，众说不一，甚至有人说是毛在天安门楼上对宋彬彬说“要武嘛”引起的，我不敢苟同，时间不对，造反派响应“最高指示”的速度也太慢了。要说他这话引起卞仲耘们和大辛庄地富分子及其后代的惨死倒还差不多。依我看，全国恁大规模的武斗是“文化大革命”顺理成章的必然发展。文革搞了一年多了，“四旧”也破了，“牛鬼蛇神”也横扫了，“走资派”也打倒了，“反动权威”也关进牛棚了，造反派革命小将不好玩了，不知道干什么了。托党的福，吃了几年 34 斤定量的饱饭，身体正棒，荷尔蒙正旺，何况绞肉机的电门还没有关，不找点活来干怎么对得起毛老人家？造反派们发现把自己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就是响应“继续革命”号召的最佳方法，也顺便为自己挣得“正统造反派”的头衔，为将来坐天下作点准备，小将们并不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御用的杀人工具，一把带血的暗器而已，还以为天下以后就是他们的嘞。这种斗争一开始还是文的，不外乎辩论辩论，吵吵架，抢抢话筒，最多动动拳头。造反派互相之间干起来升级的速度是很快的。文革初期也搞过武斗，可那不是对等的，你想别人折腰 90 度别人不敢 80 度，你想用铜头皮带抽别人别人就只有嚎叫的份，哪怕你想挖出别人的肝来炒了吃别人都不反抗。现在可不同了，都是造反派，谁尿谁？人性中的恶早就被“阶级斗争”理论激发起来了，嗜血好斗的两派使用的武器从大刀长矛很快就升级到机枪大炮，多少年轻的生命惨死在这场内战中，无人统计得了，好像也

不让统计，君不见重庆沙坪公园据说是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葬群如今已是铁将军把守，不准参观了。

好了，书归正传，说说北大的武斗吧。1968 年 3 · 29 晚上，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夺取化学系的三十一楼宿舍为起点，北大校园里开始了全面的武斗。各幢学生宿舍楼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井冈山兵团”和“新北大公社”各自占了一些宿舍楼，我所住的四十一楼不久就被“公社”占领了。我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住到我们“兵团”所占领的楼里去，意味着随时要参加保卫该楼的武斗；要么就是给公社写一份“下山声明”，表明自己与“牛头山”断绝关系，就可以回到我原来的宿舍，即四十一楼 418 室。这两种选择皆我所不欲，下山造自己组织的反，我丢不起那个面子，要知道“下山声明”是要在公社的大喇叭里播的，我虽不是“井冈山”的铁杆份子，也算是个忠实成员。另一方面，我也不愿参加武斗，我个子小，瘦弱，七八十斤，自小打架就是我吃亏，包括和女生打。此外，我对当时全国各地的武斗就非常想不通，好多地方尤其是四川，死了很多的人，武斗的双方都说自己“誓死保卫毛主席”，来说明自己武斗目的之高尚。我觉得毛主席非常安全，他老人家活得好着呢，刘少奇这个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也都打倒并踏上了千万只脚，哪儿还需要你去誓死保卫？更何况，你能远远地见到他一眼就是一生最大的幸福，要是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怎么去保卫他？斗得你死我活的两派都天天在对他早请示晚汇报，打得那么血腥为了个啥，值得么？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前面那段文字是我现在对武斗的反思，当时可没想的那么多。

既然两种选择皆我不愿，只有跑，回家。但去北京站一问，四川没有火车，因为武斗导致铁路瘫痪。只好去了清华大学，我嫂子的弟弟在清华念书，他们学校还没有打起来，他们宿舍正好有一个空床。可是好景不长，在清华住了没几天，他们井冈山和 414 也打起来了，打得比北大还热闹，他也准备跑，去找他的中学同学。我就真的走投无路，无家可归了。还是不想回学校，我就不信偌大个北京城容不下一个小小的我，于是我就开始了流浪生活。

我买了一张公交月票，每天的流浪生活大致是这样过的：晚上等到最

后一班火车发车后，一般是 12 点以后至一，两点，在北京站二楼东头的妇幼候车室的椅子上睡一觉，那时节已是北京的仲春，白天不冷，晚上有点够呛，只有妇幼候车室还开着暖气，椅子也比普通候车室软和，可以躺直了睡，但也就四、五个小时，早上赶头班火车的旅客来了，我这个既不妇也不幼的就要起“床”让位。白天我凭月票去坐公交车，凡是我没坐过的路线我都去坐一坐，从起点到终点，兴致好时看看窗外景色，不好时就打打盹儿。坐过哪些路公交车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印象较深的有一路到卢沟桥的，人们都说卢沟桥栏杆上的石狮子没人能够数得清，我就不信，要去数一数。到那儿一试，果然数不清。不是我的数学不好或者没有耐心，关键是你分不清哪些是狮子。大狮子身上有小狮子，有的小狮子身上还有更小的狮子。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侵蚀，有的小狮子还算囫囵，可以算，有的就很难判断，就是石头上的一个突起，在那儿数狮子的其他人甚至为此发生争执，你说算，我说不算，怎么能够数的清！天下的事情尤其是中国的事情其实都是这样，没人能说得清的！

再说每天吃的，我这个吃助学金的，每月就 15 块 5 角钱，还要准备一旦四川通火车了要买票回家，所以可想而知我能吃什么。通常就是馒头或窝头，其实刚出笼的热馒头还是很好吃的，但那要面票才能买，为了节约面票，就只好用粗粮票买窝头吃。菜自然没有，几分钱买一块咸疙瘩用纸包了可以吃几天。是咸疙瘩而不是酱疙瘩，酱疙瘩贵得多。有时实在经不起诱惑，买两个麻酱火烧吃吃就算享受，四川话“打牙祭”了。渴了长安街上有的是为游行群众准备的水龙头。穿的自然就只有那一套衣裤鞋袜，从不换，也没得换。倒是正合我意，在班上我就是以不大爱干净出名的。实在袖口等处脏得自己都看不下去了，用水冲一下，搓一搓，使劲拧干穿上用体温就焐干了。

晚上睡的时间太短，白天老犯困，常找个地方睡睡午觉，从天黑到 12 点时间太长，也得找个地方躺一躺。景山公园和天安门广场是经常去的地方，景山公园当时是不要门票的。中午在煤山脚下崇祯上吊的歪脖树下找一块平坦点的大石头躺下，眼睛一闭，立马进入梦乡，十分舒坦。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南面现在存放毛的遗体的地方，当时是一片树林，里面有很多

长椅子，太阳大的时候在那里睡个午觉也非常惬意。不过我的满头乱发和一身绝对说不上干净的衣服往往引起“邻居”们异样的目光，甚至引起情不自禁捂捂腰包的动作。我看在眼里，心中好笑。

可惜好景不长，这样过了十多二十天后，一天晚上两三点钟，妇幼候车室里来了一群穿着旧军装，戴着旧军帽红袖箍扎着宽皮带的中学生红卫兵，把我们在那里过夜的人全赶到楼下售票大厅里，挨个查询身份，恶狠狠地训话，意思不能在此过夜，赶快走，回去就地干革命。轮到我时，看我戴着北大校徽，我又摸出学生证，饭票等物件，说我是北大学生，来这里接人，他明早乘早班车到京。在那个诚信还不太丧失，没有到处贴着“办证”广告的年代，这些东西还是很管用的。审我的人很和蔼地让我回到了妇幼候车室。我心里那个感激！哪知第二天，这帮人又来了。照样把我们驱赶到售票大厅，问我话的还是昨天那家伙，这下我没法了，只好如实告诉他，北大武斗了，我想回老家，又没有通四川的火车，只好天天在这里等。他不大和蔼地对我说，你这不是办法，回学校去，不想武斗就不参加嘛。

我细想想他说的也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再加之我那时对穿着军装扎着皮带戴着红箍的中学生红卫兵（虽然红箍上未写“联动”字样）有深深的厌恶和畏惧感，文革初期我在北京的街头亲眼见识过他们残忍的暴行。于是第二天到售票处再一次确认没有到四川的火车票卖我就回北大去了，但没有写下山声明换来住进四十一楼，而是直接住进了井冈山兵团总部所在的二十八楼，结束了我在北京的街头流浪，被迫参加了武斗。

打油诗一首为证：

京城流浪一小哥，
歪脖树下梦南柯。
“最高学府”有武斗，
“天府之国”无火车。

此时，北大校园内两派割据的局面已基本形成。其实也不能说割据，“井冈山兵团”就只占领 28、30、32、35、36、37 六幢学生宿舍（那时还没有 33 楼），其余所有地盘都被“新北大公社”占领和控制，井冈山

兵团在 37 楼下面的南墙上刨了一个口子算是通往外界的门，北大其余的五个正式的校门都在公社控制之下。

我们住在 28 楼四楼北头的几个房间，每天基本上没什么事干，晚上轮流到楼顶上值班，白天在宿舍里睡觉。一日三餐学生食堂是去不了的，有兵团的“南泥湾纵队”提供。28 楼南头的半地下室原来是个冬天供暖用的锅炉房，武斗了，这里就变成井冈山兵团的大厨房。来自后勤部门的“兵团战士”在那里给大家煮饭吃。饭菜很简单，馒头窝头是有的，简单的菜也有点，肉是很少有的。在那样的条件下，能这样就很难为“南泥湾纵队”的战士们了。

那时北大的武斗用的是完全的“冷兵器”，比起我们房山周口店的祖先用的武器也先进不了多少，主要就是长矛和弹弓，弹弓可不是小孩用来打鸟玩的那种，确切点说，应该叫做“弹簧投石器”。把一个双人高低床立在那里，用大石头、水泥板、暖气片等固定住了，绑上两束乳胶管，就是医院里输液用的或医生用的听诊器那种管子，一束有一二十根。把一个篮球一破四，作包皮，两头打上孔，把乳胶管束的一头从孔里穿过拴牢，另一头栓在床架上，一副大弹弓就做成了。使用时，把一个鹅蛋大的石头或六分之一匹砖放在包皮里，双手抱定，仰身后退尽量拉长，手一松，石头就飞出去了。使足了劲，石头可飞一百多米远。那时双方都有许多台这样的东西。“新北大公社”是怎么制造的，只有请公社的人来介绍了，他们占着北大的教学仪器厂，制造的投石器应该比我们的这玩意儿先进得多吧。我被这玩意儿打中过一次，要不是有防护，小命在不在都不一定了。当然，我也用这它打过别人。

28 楼和公社所占的 29 楼离的非常近，也就十来米吧。双方都在楼顶边缘上建了防御工事：把双层床和床板顺着 X 轴（也就是人躺的方向）立起来，床板中间只留一条约十厘米宽的缝作观察之用。一天晚上，轮到我和谁值班，我刚走到观察缝处向 29 楼顶观望，一块鹅卵石“嗖”的飞来，钻过观察缝，不偏不倚正打在我的胸口，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可能是呼吸肌痉挛了吧，足有二三十秒完全不能呼吸，就那么憋着，等缓过气来，我才低声叫道“我着了”。同伴赶快把我扶到四楼宿舍，打开铠甲，一看，

还好，只是着弹点处红了一块，摸摸肋骨，不痛，没断。一会儿我就好了，又上楼顶去了。当时我一是佩服，二是庆幸，佩服打中我那个家伙的准头，那么窄的一条缝子，他居然把我打中了，而且是在漆黑的夜里，就算他有夜视装置也是功夫非常了得的。庆幸的是我今天戴了铠甲，这铠甲把快速飞来的石头的巨大动能分散到整个胸腹部了，不然这么近的距离，不定打成啥样呢。这里要介绍一下，头儿给我们每个参加楼顶值班的和长矛队的都配备了一套防护用具，就是一副铠甲和一个头盔，武斗队的还要发一个大家戏称为“护鸡”的东西，我没见过长啥样，顾名思义应该是用金属或皮革这类耐戳的材料做的像内裤一样的物件吧。铠甲是用铝合金板做的，既轻巧又坚硬，据说是用来做飞机蒙皮的，不知哪个本事大的人搞来的。头盔就简陋多了，可不像棒球选手或橄榄球运动员戴的那种，看起来就像厕所里装卫生纸的铁纸篓子一剖为二做成的。平常值班嫌这两样东西麻烦碍事，时戴时不戴的，挨打那天正好戴了铠甲，逃过一劫。这段经历也有打油诗一首为证：

公社健儿技艺高，
百步穿杨准头好，
李广花荣愧不如，
多亏铠甲把命保。

打中别人的一次我记得是和另一个又高又瘦长得像堂吉诃德的同学一起干的。当时 31 楼北头与燕南园南墙之间有一片空地，设了几样运动器材，有单杠，双杠什么的，每天晚饭后，一群公社的社员聚在那里锻炼身体。当时心里很不平衡，我们成天龟缩在楼里阳光都见不到，你们倒是自在。于是技痒，想教训他们一下，也报报我的一弹之仇。从 28 楼到 31 楼，中间隔着长轴方向的 29 楼，距离可不近，足有百把米，需要加大射程。于是我和“堂吉诃德”两个人一起拉弹弓，我在前，双手抱定包皮，包皮里面装着一块拳头大的砖头。他在后抱着我的腰，大家蹬着暖气片尽量往后拉，身体与地面几乎成了零角度，然后一放。放完一看，那群人已作鸟兽散，其中一人是一条腿着地，一跳一跳进的 31 楼。估计是石头落地后弹起来打中了他的脚，若是直接打中，就不会这么松活了。如果此人就是那个打中

我的神射手，这仇就算报了，我俩扯平。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偌大的北大校园，“井冈山兵团”就只占据可怜巴巴的六幢学生宿舍。但这六座楼让井冈壮士们经营得可谓坚不可摧。它们之间用天桥和地道连成一个整体，一旦哪里有事，可以迅速集结优势兵力支援。所以公社可不敢贸然对哪幢楼发动进攻。4·26 他们攻 36 楼是吃了亏的，那时候天桥和地道还没有建起来呢。

井冈山上的能人真不少。没有起重设备，没有脚手架，就凭双手要在两个楼之间搭起一座天桥，其难度可想而知。我亲眼见识了搭建 28 楼和 30 楼之间天桥的过程。人们从楼顶取下木料，制成品字形大梁，用大绳栓上，生拖硬拉，架在了两个楼过道之间，铺上横木和床板，结实的人行天桥就造好了。施工过程中还要提防从 29 楼顶上飞过来的石头砖块。

我没那么大本事，但也有长处就是个子小，能胜任挖地道的工作。我参加过挖掘从 35 楼到 30 楼之间的地道。比起架天桥，挖地道可容易多了：找一处房间，一般是卫生间，作地道入口，先沿竖直方向挖一个直径大约一米，深约二米的竖井，在竖井底部再沿水平方向向前挖掘。我负责掘进，扩宽的工作由其他人来完成，工具就是十字镐和铁铲，都是短把的。运土的家什就是宿舍里取之不尽的搪瓷脸盆，脸盆上打个洞，栓上两根绳子，地上铺两根用床板锯成的木条，脸盆放在木条上可以滑动，装满一盆土，喊一声“拉”！竖井里的人拉动绳子，土就运出去了。倒在吊桶里，地面的人提起吊桶，把土倒在专门腾空出来的房间里。我再把空脸盆拉回我挖土的地方。如此反复循环，地道就一点一点地向前延伸。土很重，一个脸盆经不了好久就用不得了，不是拉豁了，就是底穿了，竖井口上丢满了烂脸盆。洞子里照明有的是，通风就说不上了，一把风扇在洞口对着里面吹就是了，没有对流，风是进不去的。过程说起来就是这么几句话，好像很简单，也不乏一点小浪漫，你要是有机会去干干这活，你就知道是什么滋味了。蜷缩着身子在地下那么狭小的空间里干体力活，那叫一个闷热，那叫一个累！黄豆粒大的汗珠子一直不停往下滴，迷得眼睛都看不见。直想躺在地上干，但挖下的土又要往嘴里耳朵里眼睛里钻，不好受。好在我是干掘进的，挖了一米多长的小洞后我就可以回地面上休息一下，喘口气，

等别人去把小洞扩大。来到地面，含着水龙头喝几口水，吃点东西，然后把手脚腰杆都伸直了，躺在某位女生睡过的床上（35 楼是女生宿舍），天下最舒坦的事莫过于此。时间已过去近 50 年了，今天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还禁不住时不时站起身，把腰伸一伸，把腿脚活动活动，身上还有刚从洞里爬上来时的感觉呢，真的。

武斗结束没多久，我从 35 楼北边走过，发现地道已经塌陷了，我心头十分庆幸，老天保佑，挖的时候没有塌。

武斗中，我和同班的张铁壁住在 28 楼北头四楼一个窗户朝北的房间，下面从西至东依次是燕南园，小卖部平房和北大著名的三角地。铁壁是个多才多艺又闲不住的人，整天无所事事对他来说真是憋得慌。于是我们就在房间里自己洗照片。我也顺便学学这门技艺。

晚上他在窗户上挂一块毯子，灯头上上一个红色的灯泡，依次兑好显影液，定影液，准备一盆清水，就开干了。洗出来的照片质量还不错，好像我们还有一台自制的土放大机，可以放大照片，记得不太清了。

隔三岔五，谁有新的底片，我们就干一回。一天晚上，我两正干得高兴，突然只听得噼里啪啦一阵响，拳头大的鹅卵石从窗户打进来，窗框打断了，窗玻璃打碎了，挂在窗上的毯子也打掉了。幸好有这些东西挡了一下最初的一阵弹雨，不然脑袋可要开花了。我们二人赶紧躲到旁边，第二阵弹雨又打过来了，比第一阵更猛烈，直接飞过打坏的窗户进入房间，打在墙壁上，天花板上，乒乒砰砰一阵山响，灯也打灭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二人躲在角落里，都没有被二次飞溅的石头打中。趁着间隙，我们赶快逃出了房间。这时，第三阵石头雨又来了，还伴着一些人的吼叫声。如果说开头我们完全蒙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为啥公社要集中这么多的弹弓，如此强大的火力打我们这个房间的话，这时总算明白了。他们把我们的房间当作刑讯室了。楼下传来的声音除了他们经常叫的“牛猴们，你们的末日到了！”“踏平牛头山”，“杀牛宰猴”之类，还夹杂着“战友们，好样的！”“战友们，挺住！”之类鼓励的话。

派战中，双方都曾抓过对方的人。公社的大喇叭里早就抗议过在牛头山设在 28 楼的刑讯室里残酷迫害被抓的公社战士。这次他们是把我们的宿

舍当作刑讯室了。引起误会的就是那盏洗照片用的红灯泡吧。窗子又用毯子遮住，这么阴森恐怖，一定是审讯俘虏的地方，电影里凡是审讯人的地方导演总喜欢用红色作背景色制造“红色恐怖”的气氛。他们至少搬来几十台大弹弓，为他们的俘虏战友报仇来了。看来他们的弹弓比我们的先进，装弹发射快，准头也真不赖，有点“精确制导”的意思，难怪打我那次也打得那么准，多亏他们没瞄准我的头啊。

荒唐岁月里的荒唐事真是不少，再说一两件轻松点的吧。

武斗期间，班上的井冈山女生时时来 28 楼看望我们。其他人怎么想我不知道，我是很盼望她们来的。因为“南泥湾纵队”提供的伙食确实单调乏味，她们每次来都会带来一些好吃的。

一天，又来了几个女生，除带来一些卤猪头、排骨、粉肠外，还带来几个大大的猪腰子，还有炒腰花要用的葱，姜，木耳等。我仿佛都闻到了火爆腰花的香气，喉咙里都要伸出手来了。中午，几位女生进入装了电炉的厨房去忙活，我和铁壁到“南泥湾”打饭，回来刚爬上三楼，就闻到楼道里一股浓浓的尿骚臭，心想，坏了，腰花炒坏了。到四楼厨房一看，果然，气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我虽从未炒过腰花，但似乎听人说过，切腰花时要把腰子中间的那片白的东西剔干净，否则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不知是谁切的，白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切掉，热油一爆，尿味就出来了。我这人嘴特馋，还是夹了一块尝，实在臭，连我都无法下咽，只好倒掉。虽然有点小小遗憾，但她们还带来了一些别的东西，大家还是在谈笑中美美吃了一顿午餐。

这些年我在医院核医学科工作，耳闻目濡学到一点解剖学知识。小小的肾脏结构和功能可复杂了，那片白的东西叫肾盂，是集尿系统的终点，与输尿管相连。能吃的部分叫肾小球，是用来过滤血液，滤除有毒物质和代谢产物的细胞。这样，我对火爆腰花的认识就从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啦，前些年我还没有“三高”时，在家庭厨房里经常炒一盘腰花吃，有了在 28 楼的经历，我炒的火爆腰花可好吃了，全家人都夸。正是：

井冈壮士想吃肉，

满楼飘来猪尿臭，

只怪解剖没学好，

肾盂当作肾小球。

一段时间，可能是由于新北大公社的封锁，“南泥湾纵队”能提供的伙食顿顿只有玉米面窝窝头。现在的人讲究营养，经常掺杂着吃点粗粮，街上的玉米面卖得比白面还贵，但顿顿只吃玉米面就不是滋味了。何况那时的棒子面可没有现在的磨得细，总夹杂着一些玉米皮，颗粒粗粗的，吃在嘴里满口钻。老这样下去可不行，井冈壮士们都饿得没力气干革命了。于是头儿们策划了一次抢运白面的集体行动。先派几个人带上粮票和钱到海淀街上的粮点里办好买粮手续，把购好的的白面提出来，堆在粮店门口。包括我在内的运粮队员三三两两悄悄出了“门”，（之所以打个引号，因为那不是门，只不过是 37 楼下面围墙上的一个豁口）来到那粮店附近集结待命。粮店在东西走向的海淀南街上，“海顺居”的斜对门，“稻香村”的隔壁，门口堆着上百袋面粉，很显眼。不一会，井冈山的护卫队跑来了，一个个全副武装，穿着铠甲，戴着头盔，手拿长矛。街上的人可能没见过这个阵仗吧，纷纷退避。这时只听得一声呼哨，有人叫道：“上！”，运粮的同学纷纷冲向粮店，搬起一袋面粉，扛在肩上就开跑。我记得一袋面粉是 45 斤，有力气大的扛了两袋，我只能扛一袋。从粮店到井冈山的“门”大概得有五七百米远吧。一路上都有护卫队员护送，大概 5 米左右一对。我们一路狂奔，也就三五分钟面粉就顺利运回来了。公社一点反应都没有。从此，我们又能吃上香喷喷的白面馒头了。特别是刚运回白面那天的晚饭，我们吃得那叫一个香！

作者简介：梁正路，重庆人，1963 年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退休前为四川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研究员。

下篇

一段不愿回忆的经历

郭青苔口述

我出生于 1940 年 11 月，革命干部家庭出身，高中毕业后作为留苏预备生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俄语，后中苏关系恶化，去不成苏联了，转到北大技术物理系学习。提起大学生活，我有一段不愿意回忆的经历，今天说出来。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在宿舍里听别的同学说校园里发生了武斗，我就跑出来，想去看看情况，到了 31 楼附近，当时天色很黑，路灯下见 31 楼北面冲出来一拨人，胳臂上捆着白毛巾，手里提着长矛，看到了我，大声叫“站住!”，我刚要跑，一支长矛早已向我刺来，刺到屁股上，鲜血直流，我用手捂住了伤口，几个人扑上来把我按住，说“一定是个奸细”，用绳子把我捆起来，又一把抓下我的近视眼镜，摔在地上，用脚一踩！然后用件旧衣服把我头蒙上，说声“跟我们走!”。他们推搡着我大约走了十多分钟，来到不知什么地方的一座楼里，把我交给了一些人审讯。

“叫什么名字？”

“郭某某”

“哪个系的？”

“技术物理系”

“哪个组织的？”

“井冈山 17 纵”

“担任什么职务？”

“普通一兵”

“到 31 楼干什么？”

“就想看看情况。”

“他妈的不老实！打!”

用木棒狠狠地打了我 10 多下。

“老实交代你在井冈山是干什么的!”

“没有干什么，就是一般战士。”

“去查一下他是干什么的!”审讯者下令。

过了 10 多分钟，听到有人说:“查出来了，他是井冈山外联组的。”

“哈！还是条大鱼。说，在外联组的任务是什么？”

我惊奇惊异于他们情报的准确。只好说:“就是到外单位，比如其他高校，看看大字报，收集点消息。”

“为什么参加井冈山？为什么反对聂元梓同志？”

“我认为聂元梓犯了错误，把矛头对着革命群众，方向错了。”

“胡说八道，打!”

又是十几棒，打得我站不住了，跌倒在地上。

“你写个认罪书，宣布下山，我们就放了你。”

我想我有什么罪？就说:“如果聂元梓改正了错误，我们可以原谅她，像以前那样支持她。”

“顽固分子，先把他关起来，饿几天再说。”

几个人把我拖到另一间房子，扔在水泥地上。这个房子气味臊臭难闻，通过蒙眼布边缘的细小缝隙，我看到自己躺在小便池旁边，才知道是个厕所。双手依然被反绑着，眼睛被蒙着，什么都看不清，但能感觉到附近还有别人。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又进来几个人，继续审问，基本还是原来那些话，我索性不再回答。他们又用木棒、皮带打了不知多少下，我仍旧闭口不语。

“这个家伙不老实，给他来点厉害的。”

有人把我的右小腿搁在了厕所的小便池台阶上，用木棒狠狠地砸下来，我惨叫一声，剧烈的疼痛，让我昏厥过去了。

等我醒来时，依然躺在厕所地上，右腿沉重的不能动弹，钻心的疼痛，我想：肯定是腿断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一口水也没有喝，一口饭也没有吃。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丧失了对昼夜和时间的感觉；我想起了远在河南的父母，他们一定不会知道他们的儿子在北大竟然被人关进了厕所，惨遭毒打，几天几夜水米未进；也想起了兄弟姐妹和要好的同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

昏迷中强忍着疼痛，忽然，我又被人架起来，拖了一段距离，来到一间屋子，我被扔在地上趴着，只觉得有人用一把椅子（或凳子）的四条腿将我上半身紧紧卡住，有个人一边大声吼叫着审讯我，一边有人噼啪猛击我的臀部和大腿，我忍不住连连惨叫，我感到臀部和大腿火烧火燎地灼痛，可能被打烂了……我的回答还是那句话："聂元梓如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就这样审讯和殴打交替进行，大约半个多小时，我突然感到自己支持不住了，身子好像散了架，失去知觉，瘫了，眼前出现一片白茫茫云雾，云雾中两三个人影向我慢慢飘过来，由小到大来到跟前，伸出手抓住我的胳膊就走，我突然浑身一颤，惊醒过来！多年后回味当时的感受，我想那就是所谓"灵魂"出窍的"濒死"景象吧？如果当年我没有猛然惊醒，而是跟随云雾中的天使飘走，那么，早在 45 年前，我的魂魄就已飞升天国去了。

大约到了第四或第五天，在昏昏沉沉中，我被几个人拖出了楼房门口，扔在了地上，有人摘下我的眼罩，忽然受到外面光线的刺激，我什么也看不见，双眼紧闭，井冈山的战友把我抬上急救车时，我强睁开一条眼缝，从睫毛后面好像看到了程汉良、罗英铭等同学，正泪流满面地看着我，我神志恍惚，说不出话来，他们送我到了北医三院。后来才知道，是双方交换"俘虏"，才把我放了出来。三院的医生护士立即紧急抢救，给我打针、输液、喂药，慢慢苏醒过来了，经 X 光检查，我右小腿骨折了，筋腱肌肉严重挫伤和粘连，打上了石膏；而臀部和大腿则是大片大片的青紫淤血和溃烂。因为当时高校武斗，伤员很多，10 天后我就出了院，被送到北京地质学院医院继续治疗。

地院医院的条件比较简陋，住了十多个北大的伤员，多数是像我这样的。其中有一位男生，一只眼睛被弹弓射中，眼球摘除了，后来安装了假眼。有很多北大同学在这里照顾伤员。最让我感动的是同班的何法信同学，那些天他始终陪伴着我，给我喂饭，背我上厕所，和我聊天。何法信同学言语不多，但头脑清醒，态度鲜明，是极可信赖的人。那时，常来看望我、照护我的还有程汉良等同学。在养病期间，我认识了一位西语系的李姓女生，在那里精心地照顾伤病员。她皮肤白皙，发涌乌云，明眸皓齿，温柔

耐心，她拿了本托尔斯泰的《复活》给我看，还给我带来可口的甜点，我们很谈得来。身体快好时，我向她表示了好感，她却怆然而泣，说道：文革以来父母挨斗，家庭破碎、前途未卜，不是时候。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井里。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这位李女士身在何方，生活可好？我衷心祝福她——这位曾经细心照顾我的好女子！

在地院医院休养了两、三个月，我能够下地了，搬出了病房，住进了一间大教室，那里住着很多避难的北大学生。一直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我才回到了校园。

前几天咱们技物系 63 级同学晚上聚餐，大家举杯，相互问候祝福，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叫道："郭青苔！"，我扭头一看，哦！这不正是核物班那个有名的北大公社的"武斗总指挥"吗？叫宫某某，我们虽然认识，可从来没说过话！直觉告诉我他很可能直接参与了对我的刑讯。我笑着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啊！"他立即答道："是啊！这都是他老人家的过错！"听到这话，我想，他能这样认识也算不错了。

（张从记录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

一件棉衣的故事

张从

冬季到了，望着街上人们身上的色彩斑斓、式样繁多的冬衣，我忽然想起了四十多年前自己的一件棉衣。

上个世纪 60 年代，一件棉衣对一个刚考入北大的学子，绝对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财富”。那时，人们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一个人有一件像样的棉衣就很不错了。记得很多南方同学来北京时根本就没有棉衣，靠着学校发的补助，才第一次穿上了棉衣。

我的父母靠着微薄的薪金供养着我们兄弟姐妹 6 人——两个大学生、两个中学生和两个小学生，日子自然是很拮据的。1963 年的冬天到来时，我原来上中学时的棉衣已经小得不能再穿了。那时要添置一件新棉衣，不是像现在这样到商场买回来就行了——因为不仅需要一笔钱，而且还要凑够一丈多布票和一斤多棉花票，而那时每人一年只发十几尺布票和几两棉花票，这就意味着要把几个人的票证供应量拿出来，才能凑够一个人的棉衣。勤俭的母亲筹备了多时，才把做棉衣用的面料（蓝色卡其布），里子（白布）和棉花凑齐，利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一针一线地给我做了一件里外三新的棉衣。到了 11 月份，我穿上了这件棉衣，身上和心里自然是很暖和的。靠着这件棉衣，连续过 5 个冬天。

1968 年的 3 月，春寒料峭。“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北京的空气仍然紧张得令人窒息。3 月 28 日夜间，我正在宿舍睡觉，突然被同学刘立民叫醒，他说：“出事了”，之后带着我们几个同学匆匆赶到 28 楼前，只见十多个身上只穿着背心短裤的男同学慌慌张张地从 31 楼方向跑过来，我们问他们怎么回事？一个同学气喘吁吁地说：“新北大公社的人拿着铁棒、长矛，把我们都赶出来了。他们一间宿舍、一间宿舍地清理，只要是‘井冈山’的人，全都往外赶，连衣服都不让穿。”我看到说话的同学冻得直哆嗦，就毫不犹豫地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穿在他的身上，那个同学只说了声谢谢，就连忙跑进了 28 楼。

从此，北大的两派武斗开始了。为了躲避武斗，我到了“四清”结识的北京水利电力学院同学的宿舍借宿。武斗期间，也曾想回北大看看，后

来听说“公社”的人在到处抓“井冈山”的人，打死了几个，打伤的更多。我们班男同学先后有郭青苔、俞小平被抓去，遭到毒打，郭青苔被打断了腿，养了很长时间才痊愈。聂元梓的打手就连女同学也不放过，我班的女生周振琦被公社抓去，同样遭到毒打。还有陶令煌同学，路过学校，被公社武斗队的强力弹弓射出的石块击中额头，脑门上缝了十多针。得到这些消息，我也就不敢回去了，直到 7 月 28 日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武斗停止了，才回到学校。

1968 年的冬季到了，寒风刮来，我身上只穿一件绒衣，已经感到了寒意。可是我的棉衣已经没有了，再向母亲提出，实在张不开口。正在我为难的时候，从化学系的同学传来消息，说他们那里发现一件棉衣，口袋里一张纸条写着我的名字，打听到我是技术物理系的——因为我们和化学系基础课在一起上，有人听说过我的名字——让我去 31 楼某房间领取。于是，我到了 31 楼那个宿舍，取回了我的棉衣。

1969 年 11 月，随着林彪一号令的下达，我又穿上这件棉衣，去了陕西汉中 653 分校。直到参加工作以后，才用自己的工资买了新的棉衣。

最近，看到了聂元梓在香港出版的口述自传《聂元梓回忆录》，内中竟然颠倒黑白地说北大的武斗不是她和新北大公社挑起的，而是“地派”挑起的，她反倒成了制止武斗的英雄，不禁哑然失笑。她可以欺骗没有经过北大“文革”的、不了解北大“文革”历史的人，可是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北大“文革”的历史见证人，她的谎言确实太小儿科了。了解和熟悉北大“文革”情况的人，应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驳斥聂元梓的谎言，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谨以一首小诗结束这篇短文：

噩梦依稀咒孽源，燕园四十二年前。
腥风卷起武斗旗，血雨染红女皇冠。
为争自由多壮志，敢靠民主写新篇。
闲看今日未名水，悠悠往事俱如烟。(写于 2010 年冬)

北大文革“刺聂”真相

樊能廷

【载于网刊《昨天》2015 年 12 月 30 日第 62 期[史林一叶]。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下》，第 351 页，时代文献出版社，2018.】

1998 年，时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出版。该书记载了，1968 年 3 月 28 日，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高云鹏等策划，新北大公社“战斗团团长会议”上，聂元梓决定，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 31 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

一、樊能廷《3·29 亲历经过》

我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一两点钟，用扎枪、柳条帽、黄色军棉袄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甲坚兵利，蓄势猝发，切断北大 31 斋化学系男生宿舍楼的电源，向睡梦中的“井冈山兵团”03 纵队的学生发起武装突袭，在这幢南北近七十米、南北两横二十五米、呈工字型的四层楼内（31 斋具有东、南、北三个双扇对开的楼门），逐屋、逐层地驱赶属于“井冈山兵团”一派的学生。

我是北大“井冈山兵团”03 纵队“慨而慷战斗队”成员，住 31 斋南北走廊南头、西侧 119 房间。【樊注：从 1963 年 9 月中旬，因河北发大水、津沪铁路被洪水淹断而迟延新生报到两星期，到 1968 年 3·29 事件发生，一直住这个房间。】当下受到大惊动，急忙穿上棉衣，开房门，向南，想出南门。谁知道，南门被竖立的木板床挡着。幽暗的光线下，从板床及并立板床之间的空隙，恍惚看见壁立的板床外边有扎枪晃动。

见势不妙，我循 31 斋一层南横楼走廊，跑向厕所和盥洗室，两处都是门朝走廊、窗朝北。厕所窗户打不开。我跑到隔壁的盥洗室，蹬着长长的水泥池子，拉开窗扇。窗台离外面的土地地面一米多高，登上窗台，噌一下子就跳到外面的土地上。

接着，绕过南横楼西面，向东往 28 斋跑。由西向东过 31 斋南门，南面山墙外边，已经有几个人聚集在那里了，都赤手空拳的，不是“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人，我与他们汇集在一起，大家都无比地凄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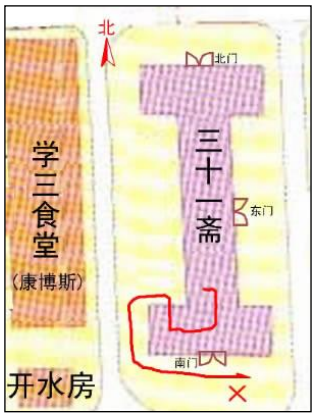
北大化学系住 31 斋二楼、三楼的“井冈山兵团”一派 0362 的男生，实在无法从楼道跑出去的人，有十七人是跳楼出去的。跳楼出逃的学生，有几个受了摔伤，手腕骨折、肋骨受损…

此时“井冈山兵团”一派，没有武斗队组织，上上下下没有武斗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根本无法抵御“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这种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有组织的武装突袭。手无寸铁而分散的井冈山派学生只能匆忙逃命，穿着单衣逃命者比比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春寒犹料峭，北京的早春是非常寒冷的，他们损失了全部衣物、书籍、生活用品和财产，在寒夜中茫然挨冻，容身无地，怎能不对这种屠戮和施暴恨得咬牙切齿?

天亮的时候，衣着单薄逃出 31 斋的学生都在寒风中耸肩缩颈，瑟瑟股栗。按照当年节令和气温，正常人，百分之百都穿棉衣、棉猴乃至毛裤、绒裤。移时，传来“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安排意见，让大家进入 32 斋。在露天寒冷得不得了的学生们，一窝蜂进入 32 斋的楼房，各自找房间暖和暖和。大家找工具，打扫和整理房间，以便安身。

过了不大功夫，有人在 32 斋楼道里喊，“老佛爷露面了，在 31 斋”。“老佛爷”是“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派对于聂元梓的共同称呼。于是，一些人跑向 31 斋，我也放下手中正在干的活儿，夹杂其中，往西北跑向 31 斋。当时我在 32 斋的某屋整理双层木床，刚巧手中有一把改锥——是一把长不过二十厘米的红漆木把一字刃的中号改锥，劳动工具。

跑到 31 斋南门东边空地，看到两三层激忿填膺的人群团团围着聂元梓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将军，悲愤填膺地申述、说理、讨公道。这些学生，既有 31 斋逃出来的，也有夜间从其他楼被“新大大公社”武斗队暴力驱赶出来的。有人在推搡聂元梓，还有人在聂元梓和李将军背后，隔着人群，举着一尺长左右的直径六分自来水管子，比比划划。



我从东面跑近人群。我到那儿的时候，李将军在左，聂元梓在右，二人并肩而立于人群包围中心（樊注：见地图×号位置。现在 31 楼南门外边电话亭的位置）。李将

军不戴眼镜，穿棉军装，不扎武装带，外表没携枪，聂元梓戴白框眼镜，穿蓝色棉大衣；将军用右手揽着聂元梓的右肩，两人紧紧地挨着，都面朝东，将军右胸贴着聂的左肩。随侍的军人，紧挨着他们。再外边，是团团围着他们的人群。

看到聂元梓，我不由满腔愤恨，举起改锥，隔着两、三层的人，要打她。我中等个头，1 米 73，其实，就算我再高点儿，身高过人、臂长过人，加上改锥，隔着两、三层的人，也够不着聂元梓。

【笔者注：王复兴《关于聂元梓遇刺》，载于《回顾暴风雨年代》，第 147 页，美国南方出版社，2018.说：凶手是谁呢？笔者于 2017 年 1 月在北京采访了二位现场目击者校友。2017 年 1 月 15 日，原哲学系 65 级学生孙厚才在北京对我说：3 月 29 日那天凌晨，武斗后的校园一片狼藉。这时李钟奇和聂元梓来到 32 楼前，许多人围在聂元梓、李钟奇四周，其中有孙厚才。这时他看见一同学情绪十分激动，口里说着什么冲到聂身后，举起一个凶器（好像是小刀），对着聂的头刺下，鲜血流出来了。李司令双手把聂抱住加以保护，嘴里大声斥责行凶的学生。孙厚才说："我站在李和聂旁边，看得很清，印象也很深。"2017 年 1 月 26 日，在国际政治系校友丁广举、孙兰芝举办的北大校友聚会的宴会上，历史系 65 级校友徐森对大家讲，"文化大革命很残酷，人性被扭曲得很严重，有人变得非常暴力。1968 年 3 月 29 日那天上午李钟奇来北大制止武斗，聂元梓陪李走到 32 楼前，我站在聂元梓侧后。亲眼看见一个人，也站在聂后面，手拿一根细长的罗纹钢筋，一米多长，头很尖，冲着聂的头砸下去。好狠！聂的头、脸流了很多血，倒在李钟奇的怀里。"笔者不禁要笑出声来：孙厚才、徐森两位忽悠得太厉害，只顾胡说，连笔者的小文《北大文革刺聂真相》也没看过，该文中准确无误地叙述了"刺聂"事件的准确地点，精度在 1 米之内。孙厚才、徐森两位口径一致，把"刺聂"现场由 31 斋南门外（撰文时的电话亭）这个准确位置，信口开河，说成"32 楼前"。这二位口径不一致的还有：孙厚才说的"冲到聂身后，举起一个凶器（好像是小刀），对着聂的头刺下，鲜血流出来了"和徐森说的"站在聂后面，手拿一根细长的罗纹钢筋，一米多长，头很尖，冲着聂的头砸下去。好狠！聂的头、脸流了很多血，倒在李

钟奇的怀里。”这二位对聂元梓的感情很充沛，语言也煽情，可惜对于事件的叙述，情节差别很大。王复兴的引用，破绽百出，自己打自己嘴巴。32楼最西北的顶点与发生3·29事件的31楼东南顶点，相距140米。况且，“32楼前”是很模糊的说法，32楼是一座四层的“筒子楼”，有东南西北四个面，“32楼前”究竟是哪个方位、哪个地理位置？作为“证言”，罗掘这二位的叙述都不合格，而且五十年来从未披露，显然是现编的，不足采信。王复兴还说“当时樊举起了改锥要打聂，却被人拦下，没能贴近击中。樊本人确认：确有准凶器；樊承认有动机，有行动；樊没能得逞，不能算是凶手，只能说是企图伤人。”樊能廷要向王复兴辩驳一下：“却被人拦下”是你王复兴编出来的，樊原文没有，根本没有“却被人拦下”的情节。樊说了“确有准凶器”吗？没有！是你王复兴定性为“准凶器”的。樊说“是一把长不过二十厘米的红漆木把一字刃的中号改锥，劳动工具”。王复兴说“樊没能得逞，不能算是凶手，只能说是企图伤人。”樊说的是“要打她”、“够不着”，没说“企图伤人”。王复兴你既然强加于人，就不必笔下留情，满可以直截了当说樊能廷“杀人未遂”、“不逞之徒”，应该“伏法受诛”，反正“诛心”嘛，聂派“文革”论心定罪惯用手法今天重演嘛。】【笔者注：关于3·29“刺聂”，97岁老人聂元梓新著《我在文革漩涡中》，替她捉刀者太忙，仍然坚持“当我们走到井冈山占的那座楼时，迎面过来井冈山的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犯了孙厚才、徐森同样的毛病——“井冈山占的那座楼”是哪座楼呀？聂元梓老太太：明明是你指使手下发动武斗夺占了31斋，殴打、伤害、驱赶了井冈山几百名赤手空拳的学生，受伤者逾百，激起巨大义愤。你聂元梓佯装不知情，妆模作样来“视察现场”。时至今日，你谎话还是编不圆满——现场就在31斋！写历史，史实要真实、准确，李钟奇和你，究竟是在哪里“遇刺”的？信口说说，有人给你印成书，也不容易，但那只是故事而已，当不得真的。历史事实不能随便你改！话说回来，即便当时有井冈山人想“扑杀此獠”，杀了聂元梓这个负罪于国家、负罪于民族、负罪于人民、负罪于北大的罪人，那也是为国锄奸、为民除害。众所周知，1967年12月，“井冈山”的头头侯汉清在校园里走路，被“新北大公社”一伙人围殴，打得不轻。傅华等人到25楼侯汉清住处去看望他，

款款深深，动员他搬搬家，侯汉清才搬到了 28 楼。同是 1967 年 12 月，“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暴戾恣睢，抄了燕南园 56 号周培源先生的家，抢走大量书画文物和贵重财物，还打了周夫人王蒂澂和女儿周如苹——概因周培源在“井冈山”当过一个星期“总勤务员”。为什么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打别人都打得，打几百人打得，打侯汉清打得，打周培源打得，别人打聂元梓就打不得？众生平等在哪里？关于“刺聂”，王复兴到现在还在逐臭不舍，拿着聂元梓当根儿葱，《关于聂元梓遇刺》文章中组织的材料，全是不符合事实的伪证，王复兴“蜘蛛漫织罗”可以休矣！联想到，早在 1967 年 12 月初，聂元梓就猖狂地放话说“打吧，打死几个也不要紧，顶多中央批评我几句。”政治狂热使人失去常识范围的判断能力——1967 年 12 月 8 日晚间，聂元梓的得力打手“新北大公社红 17 团”团长宫香政率领数十名暴徒冲进中关村印刷厂，毒打正在印刷《毛主席诗词集注》的井冈山群众，把毛主席诗词肆意地践踏和撕毁。1967 年 12 月份发生这一系列“新北大公社”施暴事件，根子都在聂元梓的身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聂元梓率新北大，一方面是掌握生杀大权，另一方面是失去人性，两者相辅相成，“交互辉映”。】

恰在此时，李将军大喊了一声什么，人群就迅速地分散开了。我在这个现场总共不到一分钟，没听见李将军喊的是什么，也随着人群一哄而散，跑回暂栖身的 32 斋去了。

后来听说，李将军喊叫的是“有刺客”，或者“抓刺客”，而且李将军的喊声似乎是应我手中改锥的举起，脱口而出的。

二、李钟奇臆断臆说 造就“惊天刺聂案”

无论是履行职务或曰执行任务，李钟奇将军在 1968 年 3 月 29 日早晨，在北京大学 31 斋南面山墙外空地上，和聂元梓并肩站立，亲兵簇拥，保护、支持了聂元梓。围着他的众多受害男女学生泣诉惨案真相、指控聂元梓，他好像一句没听进耳朵，真是公道难明。

李将军身材不算高大，1968 年，他正值壮年，和我们这些刚刚二十岁出头的文弱学生相比，他是很壮硕的。他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抵挡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保护聂元梓，应该是绰绰有余，何况他还带着

随侍的军人？【笔者注：有资料称，聂元梓带着贴身保镖、历史系学生丁建华等人。】

另一方面，夜间一两点钟，在危急情况下，我被迫从 31 斋 119 室寝室，循一层的南横楼西北盥洗室跳窗逃生，跑了出来，仅以身免。虽说穿上棉衣了，连食堂用餐的饭票都没有拿出来。到 32 斋用工具改锥和同学一起干活儿，哪来什么匕首？和同学一起闻讯跑向 31 斋，又何曾要刺杀聂元梓？

从时间点来分析，天亮以后聂元梓出现在 31 斋南门东南侧“戎马之地”上。她跟李将军在一起，也就是上午七点钟左右。按照正常的生活节律，是刚刚起床不久，还没到上班时间。这时候，李钟奇将军，已经从北京卫戍区来到北大，和聂元梓一起出现在 31 斋南门外假模假式“视察武斗现场”。这是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配合！

我从 32 斋去 31 斋，由东向西跑向人群。聂元梓、李将军面朝东，和我刚好对面。后来别人告诉我说，李将军指认，刺客是一个穿著黄棉袄、带着黑白边眼镜儿的年轻人。我没有“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那种黄棉袄，倒是穿一件当时空军军官的旧军装上衣，单衣，罩在学生蓝的棉衣外面。黑白边眼镜儿，那时叫做秀郎架。由于是面对面，李将军眼尖，指认得很真确，说是“穿黄军装、带黑白边眼镜”，确是我当时的穿戴。

聂元梓后脑勺受到皮伤，猜想是当时站在聂元梓、李将军背后的哪位仁兄给了聂一家伙。想想，单单 31 斋被武力驱赶出楼的就一二百男生呐。北大其他的学生宿舍楼，在那个夜间，也有大量井冈山学生群众被“新北大公社”武力驱赶出楼。这些人都是义愤填膺，满腔怒火的。如果是我从背后扎的、刺的，我在他们背后，李将军不可能看背后指认穿戴那么准确。

李将军说“拿黑把匕首刺伤了聂元梓”，大谬！哪有匕首？是李将军“无中生有”！相信，在场任何人都没有匕首，莫非李将军有？

【笔者注：2018 年 5 月 6 日 120 周年校庆聚会，法律系 64 级校友张希清说到：关于“刺聂”的事儿，我当时是“井冈山”保卫组的，调查这个事儿，是参加写《简报》的。因为上边儿要求，过一两天就要报一次这个事儿。调查的结果，那一天，在 31 楼的南边儿，很多人围着聂元梓他们。有一个

人拿着一个木头棒子往里捅，捅到了聂元梓。另外一个呐，就是樊能廷，拿着个改锥，去打聂元梓，没有打到聂元梓，碰到一个卫戍区战士的手臂上。那么就查清了这个基本事实，把这个事实呐，写成《简报》，送到北京市。据说还送给了江青。后来呐，就不再追查了。我们去查，到了校医院，校医院给那个战士包扎了。（我们）找到了那个战士，战士说，有个人拿着改锥，不是匕首。这样，把“黑柄匕首”解除了。棍棒是谁捅的，没有查到。】

但是李钟奇将军误把改锥认作匕首，一惊一乍，大喊“有刺客”，他臆断臆说，说是有人用黑把匕首刺杀聂元梓。李将军完全无中生有弄出一个“惊天刺聂案”，北大 3·29 事件的性质大逆转，不啻给 3·29 乱局平添了十倍的乱，对于北大形势造成的恶劣影响，简直无法估量。

【笔者注：2018 年 5 月 6 日，在校庆聚会上，物理系 62 级校友李国杰回忆道：当天白天“刺杀”完以后呐，晚上，“井冈山必须交出凶手及后台”嘛，咱们的广播台就哑了。哑了，放了一晚上《大海航行靠舵手》，什么都不能播。晚上李钟奇来传达，谢富治好像没有来。（插话：他没进来就走了。）我知道，在哲学楼，老侯（指侯汉清）带着几个人到那里边去了，我跟他一起去的。两边，聂元梓也来了。聂元梓呐，说话什么，没有影响。头上缠了好多纱布，就是证明她受伤了。我们也没办法呀，就把当时 31 楼被刺伤、打伤那些人的血衣，一大抱、一大堆，拿来往北京市一送。你看，谁是“凶手”，该抓谁的“后台”？那时候，好像有理没法说，就弄成“你打我，我打你”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变成拿着大刀长矛。聂派大规模打人、杀人，两派斗争性质变了。没地方讲理，就在长矛的红布条上写着“真理在此”。3·29 是个转折。有一段时间挺难受的。后来怎么就交给海淀派出所处理这个事了，那就降级了，降到“民事纠纷”了。3·29，我们沉默了一天，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想到，应该转守为攻。我们抓到了她（指聂元梓）策划武斗的证据，抓着这个做文章。这样来冲淡它。】

百度百科《李钟奇》说“3 月 29 日，李钟奇去北京大学制止武斗，实际上是表达了对聂元梓的支持。”信夫！

1967 年，借北京卫戍区“批斗会”之机，出手殴打年长十五岁的古

稀老帅彭德怀，李钟奇十足表现一个灭伦的伧夫。

对我个人来说，则是：李钟奇臆断臆说，樊能廷半世蒙冤。拜李钟奇将军赐，樊能廷背“黑把匕首刺聂”历史黑锅，久矣。十年后去北大，同学还呼我“黑把匕首”。

三、谢富治《谢副总理四点指示》

3·29 当夜，国务院副总理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组织两派代表开会，批评两派之间发生的武斗行为。谢富治说：“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笔者注：实际上，谢富治对于聂元梓、拥聂武装的行为，大容忍、特容忍，偏袒一方。另一方面，瞪着眼睛逼井冈山兵团吃 3·29 这个大大的哑巴亏。】

会上，谢富治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说：“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二、井冈山等组织立即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四、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兵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

这就是北大文革史上著名的“谢副总理四点指示”，简称“四点指示”。

四、北京大学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作为

3·29 北大“井冈山兵团”受到谢富治责难，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对于“四点指示”如获至宝、胜似薛蟠得了宝蟾，喧嚣百日、火上浇油，加紧对“井冈山兵团”疯狂围剿，必欲灭之而后快。

当天，校文革发出《通缉令》，铺天盖地散发，“抓捕凶杀犯”。

“新北大公社”在全国“抓捕反革命凶杀犯”，“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组织专业缉捕组，随时准备武力抓人。樊能廷老家南京市中山南路 404 号，自家的楼房，红砖墙上被石灰浆刷上“捉拿反革命凶杀犯樊能廷”大标语，落款“北京大学校文革”。南京天青街（当时叫中山南路）街头混混居民小组长袁少芳，人称疤拉眼儿，三天两头上门问我母亲：“你儿子回来没有，回来要及时报告噢！”我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家庭主妇，被搅扰得没办法，

只好投杼逾墙，自己上北京，投奔北京海淀区“洋灰桥”空军学院工作的女儿家住着。那时候，空军学院院长刘震上将已经靠边站，被上级专案组弄走，肋骨被打断两根。空军学院呼风唤雨、正在得势的白云教育长一伙子的专案组，已经把驾轰炸机起义到延安投奔革命的标杆人物刘善本少将活活打死。该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是三天两头上门“关切”，一是询问我母亲“儿子来过没有”，二是关切“老人家什么时候走”。老太太低眉无语、含辱忍垢、揪心等待。一直到秋天，终于见到完整无缺、安然无恙的儿子，母子二人步话谈心走进颐和园。在石舫巧遇带着相机的熟人，留影记念。以后，毛泽东指示解散部分军事院校，空军学院解散，得势的一派分配到上海空四军，我姐姐、姐夫受我“刺聂案”影响，被发配到兰州空军，从“正团”到“副营”，降三级使用。

1968 年 6 月 14 日，北京大学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184～185 期合刊，第四版刊登通栏标题为《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的文章和评论《㊥为什么要死保樊能廷？》【笔者注：㊥是当时聂派对井冈山兵团的轻蔑写法】，署名都是“红三团红旗”。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假仁假义自称“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来刺我是受了蒙骗。”以上所述种种事实，难道也是聂元梓所说的“从未进行过追究”吗？何况她在 7·28 召见会上向毛泽东直接诬告“有人刺杀我”。

五、聂元梓御前诬告

从网络披露材料《韩爱晶：7·28 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录》看，在 1968 年 7 月 28 日这个御前会议上，聂元梓说话机会不多。但是，有限的发言机会，只要她开口，多半是诬陷他人。兹引用有关内容，看她在御前血口喷人，咬农科院、咬地质学院、咬“有人刺杀”、咬侯汉清及至乃父、咬北大“井冈山兵团”、咬樊立勤、咬彭珮云、咬王力、关锋、戚本禹。真的技艺娴熟，片刻之间，咬了个一溜够！其为人，可见一斑：

聂元梓：“是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聂元梓：“有人刺杀我。”

毛泽东："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没有。"

聂元梓："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

聂元梓："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聂元梓："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江青："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泽东："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泽东："侯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是研究生，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最坏的，不是大组织，几个组织联起来背后有黑后台的，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泽东："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王、关、戚插了一手。"

*　　*　　*

"天风相送轻飘去，却笑蜘蛛漫织罗"。毛泽东逖听遐视，圣聪听断，谬巧的聂元梓、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不知道，"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红卫兵该退场了，他们"五大学生领袖"自己谢幕退场的时间也到了。

六、余波之一——李国俊《五绝一首》

北京大学03633班同窗、3·29同遭31斋劫难、四个月同守37斋的战友李国俊，在1968年，赋诗道：

烟酒寻常事，白下吊膀徒。

错揩聂妇血，一举入名流。

这首调侃诗说：抽烟喝酒是樊的嗜好，所以“烟酒寻常事”。樊是南京人，白下是南京的古代地名，白下、建业、秣陵、金陵、建康、应天，这些都是南京的古代地名。樊是一个歪肩膀的人，左肩膀明显的比右肩膀高，称为“吊膀”，所以“白下吊膀徒”。1968 年聂元梓已经是一个四十六七岁的中年妇女，称“聂妇”，不为不恭，所以“错揩聂妇血”。“一举入名流”，说的是，樊能廷把改锥这么一举，丑名远扬于北大了。

妙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揩…血”两个字，我不同意，这说我的改锥见聂元梓的血了。我确实没碰着聂妇，改锥上没有血。3·29 早晨，我离开那个“刺聂”现场，立即回 32 斋继续用手中的改锥干活儿，根本没看见上面有任何血迹。

后来不止一位作者的文字，写到北大文革 3·29 事件暨“刺聂案”，说“黑把匕首”、“黑把改锥”、说刺聂见血，活灵活现的，其实谁也没有看见。甚至，我怀疑，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见“刺聂”、见“见血”。

真实的情况是，聂元梓那天，头皮的左后部靠上位置，破了小拇指甲那么大一点儿皮儿，根本没有她在回忆录中说的“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那么瘆人兮兮、那样“白发三千丈”的夸张。2014 年 5 月，聂元梓耄耋健在（网络上见到昔“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与她合影），高寿九十三周岁矣，至今仍然无人拜识她的伤疤和所谓血衣——如果真有的话。

七、余波之二——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

2001 年，我在外地出差，有人向我询问搜索引擎“谷歌网”搜索的用法，而且提议以我姓名为关键词。一演示，把我吓一跳：我文革中有关 3·29 武斗和“刺聂”的事情，被人搞到网络上挂着呢。那就是作者“理胜”【笔者注：沈尹默的后人】《忆北大文革旧事》。文中“刺聂”的时间、地点，惜有误。

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份写北大文革史实的非官方材料，也是第一次知道自

己的大名出现在互联网上。“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正确地指出：“北大3·29 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从此以后，各大学武斗迅速升级，清华、北外、京工、人大等校都出现了以武力把对立派赶出校区的现象。武斗杀人，北大又一次走在北京高校的前面。”【详见理胜《一个校外人员见证的北大武斗》载于2018年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上册》，第257～262页。】

八、余波之三——樊能廷《网友留言》

2006年，我在北大官方网站上见到一个关于3·29事件和“刺聂”的材料，允许网友留言，当下我写了一小段留言。不想，以后很长时间都还保留在该网页上，还被多处引用。现在的网络上，这段文字镶嵌在“百度文库”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文前，我的《网友留言》附丽了理胜的原文。

来源：网友留言

来源日期：2006-2-20

本站发布时间：2006-2-20　8：19：12

阅读量：1956次

原文：武斗的后台是谁?

文革中首都各高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始于北大，北大有组织的武斗始于1968年3月29日凌晨。1968年3月29日凌晨，用扎枪、柳条帽、黄色军棉袄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首领为聂元梓的密友高云鹏），切断31斋男生宿舍的电源，向睡梦中的井冈山兵团一派的学生发起武装突袭，在这幢南北长条的四层楼内，由北向南，逐屋、逐层地驱赶对立派学生。当时，井冈山兵团一派没有武斗队组织、没有武斗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根本无法抵御这种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有组织的突袭。手无寸铁而分散的井冈山派学生只能匆忙逃命，穿著单衣逃命者比比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的冬天是非常冷的，他们损失了全部衣物、书籍、生活用品和财产，在寒夜中茫然的挨冻，怎能不对这种屠杀和施暴恨得咬牙切齿？化学系住二楼、三楼的人，实在来不及从楼道跑出去的人，有五六个是从窗户跳出去的。天亮的时候，逃出31斋的学生都在寒风中瑟瑟。

有趣的是，住 31 斋的“新北大公社”一派学生，居然没有一位糊里糊涂的出逃，大都在热被窝中安卧（当然，拿着补助、执行这次突袭任务的人不在此列）。清华大学的学生组织领袖一看，北大聂元梓一派发动武斗，大占便宜，并且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对于发动武斗的聂元梓和拥聂武装，根本不追究责任。清华大学的武斗局面，随之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如果说高云鹏为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是前台，则聂元梓就是后台。如果说聂元梓是前台，则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就是后台。【笔者注：近年与“新北大公社”校友交流，得知孙蓬一力主攻打 31 斋，“新北大公社红三团”头头许华堂在作战会议上是孙蓬一主张的唯一反对者。住在 31 斋的少数“新北大公社”成员确实不知道本组织发动的夺楼武斗行动，因而也有跳窗逃命的。直到此时笔者才品出孙蓬一“化学系的同学要做出些牺牲”，话里藏阄，并非泛指两派同学，孙蓬一亦有苦衷，要牺牲一部分“自己人”了，又不能明言。】

这个“网友留言”准确地叙述了北大 3·29 事件。其实“北大 3·29 大武斗”根本不是什么武斗，而是拥聂武装力量有预谋地对于无辜的分散的和平群众的非人道的大规模屠戮和施暴，地地道道。如果非要把这种情形说成“武斗”，亚赛把当年日寇发动的 9·18 事件，说成是“战斗”。【有人把 3·29 事件说成是“冒失鬼”孙蓬一的冒失，不对！】

“北大 3·29 事件”中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打伤、砸伤、刺伤的，轻重不一，数逾百人；公私财产毁坏、损失无算。

文革中，在北大，策划、实施这样一个空前规模的军事行动，是高云鹏和聂元梓共同策划部署的。这一夜她一定激动、兴奋、焦灼。“网友留言”指她为 3·29 事件的后台，一点儿也不冤枉她。怎奈聂元梓、卢平、高云鹏、“新北大公社红九团”、“钢一连”、“铁锤兵团”，这一伙敢做不敢当的好汉，至今遮瞒，不肯公开事件的事实真相。

聂元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受到康生乃至毛泽东的支持，尽人皆知。康生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我的“网友留言”指聂元梓的后台是中央文革，有任何一点讹错吗？在文革中，中央文革是中共实施文革的主力，是

党内外文革力量的总后台，尽人皆知、无容置疑。

谢富治在文革中，听命于毛，积极卖力推动文革，迫害、伤害、得罪上层政治一大批人。这些人，或者说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文革后反过手来，得势了，对于谢富治进行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把他骨灰请出八宝山。上层领导之间的这种政治斗争，生情死怨，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就不得而知了。“网友留言”言及 3·29 事件的历史问责，必然涉及谢富治，如此而已。

从组织系统上说，当时谢富治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聂元梓是副主任，他们是同僚。从《聂元梓回忆录》洋洋自得的叙述看，聂经常利用谢富治、牵着谢富治的鼻子走，把谢富治玩弄于股掌之上。实际上，3·29 当晚，谢富治就发表了著名的“四点指示”。“四点指示”的具体内容，根本不追问事实真相，一味偏袒聂元梓，即便谢富治事前不知道 3·29 事件，事后可是鼎力庇护和支持聂元梓的。“网友留言”指谢富治是聂元梓搞 3·29 事件的后台，一点儿也不冤枉他。就算他活到现在，还身居高位、权倾天下，账还是要这么算。“网友留言”直指谢富治，不是给他扣屎盆子、鼓破乱人捶，这恰恰就叫作历史问责。韩国“岁月号”沉船，数百学生罹难，总理引咎辞职，叫作道义担当。

聂元梓一派单方面制造的北京大学 3·29 事件，是北京高校大规模武斗的始作俑者，清华大学学生领袖有样学样、步聂元梓后尘，旬日之后，在 1968 年 4 月份发动武斗，并且迅速地由冷兵器升级到使用真枪实弹、爆炸品。到 7 月 28 日为止，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造成近二十条男女人命血案…

对于这段《网友留言》，到现在为止，我樊能廷不想作任何更正，不愿意让“和谐”淹没掉正义和良知。它描述的，就是历史真实。没有真相的社会是一个极其可怕的社会。没有真实和真相，一切都假，世态堪忧。

余波之四——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

早就听说聂元梓在境外出版了回忆录，为她自己文革期间的丑恶言行百般粉饰，还称 3·29 樊能廷用匕首刺杀她。国内买不到这本书。

2007 年春，我偕同妻子王文芝去台湾旅行，来回路过香港。回程路过香港的时候，在香港国际机场书店寻找这本书，店堂的书架上没有，问

店员，店员很热心地跑到库里翻找，居然找到了这本书。我陋见，这本书恐怕是聂元梓毕生最重大的鸿篇巨制了，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版权，书号 ISBN 988-97608-6-X；定价 125 港币买到手，带回北京。

对于《聂元梓回忆录》，薄亚达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书评，《专制政客的翻供状——评聂元梓回忆录》。【载于 2018 年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下册》，第 212～223 页。】无论我想说点儿什么，也说不到薄亚达先生那么周全、透辟。

我樊能廷只用四句话，回应聂元梓这本厚达 500 页好自矜夸的《聂元梓回忆录》:

惯于扯谎当真话，无中生有每自夸；

顿顿静河任你笑，回忆录把视听遮。

【笔者注：文革期间，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聂元梓充风雅，觍颜说她读书，说到读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她说出来，却是“赫鲁晓夫 顿顿的静河”，引起全场不分派别、不分少长、忍俊不禁的哄堂大笑。】

《聂元梓回忆录》涉及到北大 3·29 事件以及“匕首刺聂案”的笔墨不多，第 269～274 页。她说:“在制止武斗中我也曾受了伤，流了血。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包，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刺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了，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伤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请’谢富治。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来刺我是受了蒙骗。”

关于北大 3·29 事件和“刺聂”的各种说法中，《聂元梓回忆录》的说法最离谱，时至 21 世纪，她还在施展几十年前的惯技，企图诳语遮天。

聂元梓出版《聂元梓回忆录》，是在服了十七年刑之后，她还摆着一副当年的臭架子，俨然是凌驾于“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之上的公

正的领导。明明是她和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三位一体，部署拥聂武装力量，3·29 凌晨突袭，对于井冈山赤手空拳的无辜学生青年，进行非人道的屠戮、戕害和施暴；她却说成“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来李钟奇，帮助我制止武斗”。

聂元梓书中所述种种违背事实的话，凿空指鹿，全都是经不住事实一驳的谎言。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①聂元梓和李钟奇有军人随侍，不是两个人；【笔者注：有资料称聂带着贴身保镖丁建华等人。】②文革前 28 斋是留学生宿舍，井冈山总部根本没有单独占据它，只是在 28 斋有总部办公室和广播台几间屋子；3·29 事件发生的时候，整体 28 斋还是不分派别、大家混用的宿舍楼；3·29 事件发生后，“海燕战斗队”青年工人队伍，快犊轻车，驱赶“井冈山兵团”以外的杂人，“井冈山兵团”从此独占 28 斋整个一幢楼房；③本文已说明，所谓“匕首刺聂案”，发生在 31 斋南门外东侧空地上（现在的电话亭），离 31 斋南门十米，离着 28 斋，间隔着东西长七十米的 30 斋和两条各 15 米宽的马路（含草地）；如果聂指认 31 斋是“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那么，聂元梓和李钟奇到这里的时候，拥聂武装已经夜袭完胜，31 斋化学系“井冈山”成员已经受伤挂彩、逃之夭夭，“新北大公社”武装齐备的得胜之兵已占领着这座楼；校文革武斗总指挥高云鹏得意地大喊：“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④我实在不知道聂书中说“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说的是什么时间点。我樊能廷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两三层的人群团团围着聂元梓和李钟奇将军，激愤地申述、讨公道。有人在推搡、围攻聂元梓；⑤聂说“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刺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这个情节，绝对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实际上，没有匕首、没有扎着、没有刺着、没有碰着，没有头顶受伤、没有血顺着脸往下流。聂元梓只是被器械从背后轻击，后脑勺碰破小拇手指甲那么大一点表皮而已。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这三位一体，何时、凭啥，勾兑一齣“樊能廷用黑把匕首刺杀聂元梓”剧本，更加无从得知。知情人至今缄口不言也！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自我标榜“从未进行过追究”。平心而论，1968

年 3 月 29 日晚间“谢副总理四点指示”并没有点名“樊能廷”。反倒是三十七年后，2005 年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第 270 页，点了“樊能廷”的名，指名道姓进行诬陷。这就是伪善的聂元梓“从未进行过追究”吗？青竹蛇儿口，黄蜂尾后针，一旦操话语，便把谎言吟。《聂元梓回忆录》是不折不扣的欺天罔人、欺世惑众。

不难想见，如果不是 7·28 毛泽东连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严词喝令停止武斗，然后军宣队迅捷进驻北大，如果“井冈山兵团”垮了，我樊能廷一旦落到聂元梓手中，恐怕难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了。

十、结语

文革中，1968 年北大“3·29 事件”和“刺聂案”，是两件紧紧关联的事件，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没有前因，就不会有后果，提起“匕首刺聂”，就不能不说起 3·29 事件。

现在，我用亲历史实给各种说法以澄清、驳正：“3·29”是拥聂武装单方面屠戮无辜，“刺聂”根本不存在，“黑把匕首刺杀聂元梓”是乌龙！解开这个云山雾罩的“乌龙案”，还历史以真实！

若问，为什么不早一点把它说出来？我也要问，“文革”的事儿，什么地方让说？更与谁人说？叙述历史真实，在这个土地上，也不容易。中国历朝历代，很多的事情搞不清，就因为是不能记录真实、说出真相。谁说真话、披露真相谁倒霉，甚至于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历史上有名的齐太史、董狐笔，在强大的天朝专政下，早已不可能再现。现在，也许不至于因为说真话被杀头了，牢狱的风险还是大大的有——谎言已是国家的支柱产业。

“刺聂”事件的发生，到眼下，已经四十多年了，我只是在 2013 年仲秋，做过一次当众的讲述和驳正。在场的有十八位听众，那是北京大学 03633 班庆祝入学 50 周年的同学聚会活动，有人提问起来，我就本本源源地实话实说一遍。此外就没有任何别的场合和机会讲述这个事情了。大家都各自忙着过自己的日子，谁愿意管别人的闲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也就这么接近半个世纪地保留在自己的心底。

不在现场的人，误传消息，因为他们没有准确目击亲见，是可以谅解的，从而说法各异，与事实相去或远。事实真相只有一个，而流传的说法，

甚至见诸文字的，却形形色色、差错舛误。我亲身经历这个事儿，是当事人；我的事，我想自己有责任说明真相，还事情的本来面目，帮助误写、误传的人们澄清、驳正。

四十余年如一梦，亦幻亦真多半生。31 斋陈迹犹在，原来是男生宿舍，现在改为女生宿舍楼，男宾谢绝入内，往事无凭吊处了。

我所见证的“刺杀”聂元梓事件

蔡华江

【载于丛璋、亚达、国真主编《燕园风云录三》，第 17 页。亦载于 2018 年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上册》，第 363～364 页。】

我叫蔡华江，四川人，1964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三个月后发现患有风湿心脏病转入经济系学习。文革中曾被聂元梓污蔑为“刺杀”聂元梓的“凶手”之一。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 5 点左右，我还在熟睡，朦胧中听到井冈山广播说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抢占了 31 楼，把井冈山的人全部赶出来了。我急忙起床，抓起一件衣服披上，就从 37 楼往 31 楼跑去。当时天刚蒙蒙亮。我从 31 楼的南门跨进一楼，只见楼道里一片狼藉，到处是水，还有衣服物、书籍和其他物品乱七八糟的摔在楼道里，有的浸泡在水中。一楼很多宿舍的门敞开着，空无一人，里面也是乱七八糟，情景和楼道差不多。于是我断定井冈山广播里说的是真的，肯定是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把井冈山的人给赶出 31 楼了。不由得怒火中烧：聂元梓太坏了，太狠心了，他们用武力镇压井冈山了…。我迅疾原路退出 31 楼。刚出南门，看到院子里站了很多人，南门偏东一点的地方有一群人围着聂元梓，有的高声质问，有的怒骂，还有的挥舞拳头，似乎还有个同学抓住了她的头发，聂元梓的头龟缩着前倾。这时，我急忙冲上去，手臂从那些保护她的人的腋下伸进去，抓住了她的后脖子，刚抓住就被保护她的人给推开了。当我还想再去抓她时，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保护她的人最初只注意了从上面伸过来的拳头，没有注意下面会有人钻空挡去抓她。当我抓了一下她的后脖子后，他们开始上、下同时防范，簇拥着聂元梓往东走去。因为我是听到广播匆忙出门，衣服穿得少，感觉身上很冷，就马上离开现场回到了 37 楼自己住的宿舍。同宿舍的人都醒了，我同他们述说了刚才看到的情况和我抓了聂元梓后脖子的事情。

当天下午，新北大公社的广播里传出了“揪出刺杀聂元梓的凶手×××、蔡华江、×××”的嚎叫。我知道大事不好，在当天傍晚由同班几位同学保护，趁着暮色逃离了北京大学，开始了躲藏的流浪生活。我最初躲

在北京矿业学院中学同学的宿舍，足不出户。三天后同学说有人来侦察了，好像是要来抓你。不得已，我又在北京石油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几个中学同学的保护下离开北京，逃到天津大学中学同学处。天津大学是天大“8·13”掌权，我同学正好是“8·13”的，我有了一些安全感。大概在天津大学住了十来天，井冈山派人来接我，说是李钟奇要井冈山交出刺杀聂元梓的凶手，兵团总部叫我回去说明情况，于是我就和来接我的同学一起回到了北京，从海淀小胡同直插 37 楼南面围墙新开的豁口回到了 37 楼。从此，我住 37 楼，只能在当时井冈山占领的 37、36、35、32、30、28 几个楼里活动，一直到军宣传、工宣队进校才敢自由活动。

我感谢井冈山人，特别是井冈山总部的头头们，他们顶住了种种压力，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把聂元梓点名的所谓的刺杀聂元梓的“凶手”交出去，井冈山人保住了据守的为数不多的几栋楼房，保住了我的安全，使我没有被聂元梓们抓去。否则，我的命早没了。殷文杰、刘玮、温家驹的惨死，樊立勤、邓朴方致残的惨剧就是我的下场。

回顾“3·29”事件，我认为“3·29”发生的不是两派的武斗，而是聂元梓一方有组织、有预谋策划的一起用武力抢占 31 楼，镇压井冈山人的恶性事件，根本不存在有谁同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对打的“武斗”。住在 31 楼里的井冈山人没有任何武器，对聂元梓的武力施暴毫无防备，都被赶出了自己的宿舍，逃命而去。所以我认为应该给“3·29”事件正名：“3·29”事件的实质是聂元梓用武力驱赶和镇压不同意见的群众，以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行动。真正的武斗是在此之后，井冈山的书生们吸取了此次教训，才开始武力自保。自此，北大文革才开始进入了武斗时期。

所谓刺杀聂元梓的“凶手”也是没有的。“3·29”早晨，吃了哑巴亏的部分井冈山群众看到聂元梓立即蜂拥而上，涌上去发泄愤怒，完全在情理之中，根本不是聂元梓所说的有组织、有阴谋地要“刺杀”她。对于聂元梓点名的“刺杀”她的三名“凶手”，其余两位我根本就不认识。当时打她、抓她的何止一两个人。但都是赤手空拳，没有任何利器。我抓了一下她的后脖子，完全是出于义愤，脑子里除了愤怒还是愤怒，想殴打或刺杀她的念头一丝都没有闪过。

聂元梓捏造“刺杀”一说，完全是一种政治流氓手段，以此来掩盖她使用武力镇压井冈山人的罪行。处理“3·29”事件，最最应该追究、应该抓的是制造这起事件的台前幕后指挥者。聂元梓捏造“刺杀”事件，叫嚣抓“凶手”，还把“揪出刺杀聂元梓的凶手×××、蔡华江、×××!”大标语贴到了北京的街头，贼喊捉贼，企图混造黑白，掩盖她用武力镇压不同意见的群众的罪行。

幸运的是，武斗结束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并没有追究我的“刺杀”聂元梓的“罪行”，也没有在我的档案里装进这方面的材料。1970年春天，我得以顺利毕业分配，到了四川以后，还从事了多年公安保卫工作。

谁是杀害殷文杰的元凶——评胡宗式博客

史正

1968 年春夏，3 月 29 日至 7 月 28 日，是北大历史上最血腥，最恐怖的日子。以聂元梓为首的当权派校文革，指使其下属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妄图以武力镇压反聂的群众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发动了 3·29 武斗，从此拉开了北大四个月武斗的序幕。武斗期间，数百名师生不同程度受伤，无线电系殷文杰、地质地理系刘玮、北京地质学院附中温家驹三个青年学生，惨遭新北大公社杀害。其残忍，其惨酷，令人发指。虽然时隔四十余年，淋漓的鲜血已凝成黑褐的血痕，但人命关天，死去的冤魂常在我们耳际呼号，不彻底调查真相，从法律和道义上惩处债主，这些冤魂便永远无法安宁!

新北大公社核心人物，参与刺杀殷文杰并处理后事全过程的胡宗式，如今年逾古稀，在殷文杰冤魂的呼号面前，定然也不得安宁。他一生都无法逃避殷文杰冤魂的追讨，他更担心在他百年之后，人们将他与殷文杰之死的罪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写入万劫不复的历史。因此，在他的个人博客之中贴出了名之谓《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死事件》一文。

此文披露了殷文杰被刺 39 枪的细节，披露了两个凶手的名字——新北大公社钢一连杨恭谦、高玉堂，披露了刺杀的部分过程与后事处理的一些过程，较之原先聂元梓与新北大公社的知情人有意躲闪和回避殷文杰之死，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十分有限，明眼人不难看出文章的本意不是在反省忏悔，而是怀有两个目的：一是替自己洗刷开脱，他无罪而且有功。二是替聂元梓洗刷开脱，聂没有“指使和策划问题”，仅仅是“领导责任”。

胡宗式在文章的开头，便有意掩饰历史真相，即聂元梓掌控的新北大公社，经过精心策划，于 1968 年 3 月 29 日，打响了北大武斗的第一枪，攻占了 31 楼，刺伤并撵走了楼内的许多井冈山派成员，一些人被逼跳楼受伤。他们试图效仿上海工总司镇压上柴联司的行动，行使武力摧垮对立的群众团体，以实现北大的一统天下。自此，北大大乱，人心惶惶，动荡不安，矛盾激化，血泪交加。井冈山组织为了活命，为了自保，也自制长矛，据楼自卫。1968 年 4 月 26 日主动占据了咽喉要道 36 楼，将 28、30、

32、35、36、37 楼连成了一片，从而为自己获得了一个出口通道——维持了自己的一线生机。新北大公社则包围了这 6 座楼，占据了校园的绝大部分楼舍与广大的空间，对井冈山同学构成了莫大的生命威胁，一攻一守，截然分明。显然，新北大公社处于强势，井冈山兵团处于弱势，36 楼被井冈山占领，只给自己争得一线生机，并未对公社构成威胁，未能改变公社包围井冈山的强弱悬殊局面。面对这种巨大的强弱反差，井冈山大部分成员，迫于人身安全的威胁，纷纷逃离北大。殷文杰是个井冈山内极为普通的同学，他虽然认同井冈山观点，是井冈山一个普通班内战斗队“过大江”的成员，但从不参与井冈山的活动，更不参加武斗。他以己之良善之心，对新北大公社未有丝毫提防，路经公社防区，办理有关事项，准备离校返家，未料遭到公社人员如此凶残的杀害。那么，即使回到胡宗式所言的“武斗环境”，殷文杰又何罪之有？杀人者又理在哪里？只能说明，公社中的一些人，在派性的蛊惑下已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而不是其它。聂孙们早在“4·26”之前就已经开始杀人。他们驻第二体育馆的武斗连就打死了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温家驹死后，孙蓬一一面布置所谓调查，一面扬言：“你们不要怕，有校文革顶着。”（《北京大学大事记》下册 670 页）他们依仗炙手可热的大红伞聂元梓，狂热鼓动“反聂即反动”的政治逻辑，顺聂者昌，逆聂者亡，对反聂的群众组织视如寇仇，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推行了血腥镇压的方针路线，蓄意鼓动“国共两党之争”的政治仇恨，致使某些公社成员忘乎所以，无所顾忌，才使无辜的殷文杰成了他们的矛下之鬼。胡氏文章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意模糊北大当时的政治、武斗形势，企图把殷文杰之死推导给井冈山兵团为自卫而占据 36 楼。时隔四十年后，胡的派性立场仍然十分顽固，并开设博客，四处宣扬当时的派性观点，为聂元梓鸣冤叫屈，这在北大公社的成员中的确是绝无仅有的。

今天的胡宗式，尚且如此坚持顽固的派性立场，那么当时的胡宗式的派性便可想而知了。因而，胡在文章中谓自己冒着枪尖出面拦阻杀人凶手，就实在难以让人置信。胡是公社的核心人物，聂元梓的心腹，掌管校内外的动态情报，与校内外天派组织有着密切的交往。正如他自己在文章中所述，他是“现场一般人能认识的人”。那么，既然是公社这样显赫的人物，

果真出面拦阻，岂有阻拦不住之理？！一声“他是‘过大江’”的吆喝，凶手们便兽性勃起，举起长矛杀将过来，而公社要人胡宗式“非常愤怒”并自谓“出面进行拦阻”，却不起任何作用，这在逻辑上能讲得通吗？胡宗式能够自圆其说吗？当时井冈山的广播台和后来的工军宣队专案组曾认定胡宗式是杀人凶手，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大概，殷文杰的阴魂始终在纠缠着他，他始终不能为此释然于心，想辩白，想洗刷，谁知，他越洗越黑，越辩白越让人怀疑。殷文杰血淋淋的 39 个枪眼，难道仅仅是胡宗式抛出来的钢一连的杨恭谦、高玉堂两人所为吗？要知道，这是在杀人，在杀一个活人，不是剁白菜，即使是剁白菜，39 个眼也得剁一阵功夫。何以“救人”的胡宗式便如此无所作为呢？工军宣传队专案组，不仅调查了胡宗式、调查了杨恭谦、高玉堂，而且还调查了参与其中的一个女同学，身在现场的胡宗式，替公社执笔撰写杀人报告的胡宗式，为何对这个女同学的恶行隐而不报呢？

之后，胡宗式们对殷文杰的所谓“抢救”亦让人怀疑。即便如胡所说，殷文杰此时尚有一口气，那么北大附近的中关村、海淀，有许多医院，胡为什么舍近求远，不送附近医院，却要远送五棵松附近的七机部 721 医院。胡谓“当时 721 的医院是七机部的‘九一五’掌权，和新北大公社的关系很好。”关系好又如何，是否想联手舞弊，想隐瞒些什么，干些什么勾当？显然，他们把殷文杰送 721 的医院，主旨不是抢救他的性命，而是妄图掩饰自身的罪恶。胡宗式行文躲躲闪闪，却是不打自招罢了！

聂元梓对刺杀殷文杰持什么态度？她只是在调查报告上面批示“认真调查。严肃处理”。这不是敷衍塞责的官样文章又是什么？不是“认真调查”了吗，抓住两个凶手了吗？那么作何处理呢，一句空话，不作任何处理。所谓公社团长会上许多人反对，正中了聂元梓的下怀。聂是北大武斗之帅，是殷文杰之死的根源所在，杀人凶手只是其麾下打手而已！让她自己惩治自己的打手，岂非自残手足，她能做得到吗？

胡宗式也不得不承认：“文革中杀害三名无辜青年，是我所在的组织‘新北大公社’最丑陋的一面。”但他却不进行自我反省，追寻杀人者和准杀人者的个人责任与思想根源，却将这一问题大而化之，推而广之：“在北大、

北京，乃至全国，发生那么多迫害人、打死人事件，这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共产党教育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各种问题，分歧就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就是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把自己的同事、同学当作敌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宣传的层面上，根本没有民主、法制、人权的概念。殷文杰事件也是新北大公社领导和群众没有法制和人权概念的例证。”

固然，“文革”恶果，是共产党一贯推行的极左路线所致。只是，党内自始至终存在着正确思想与健康力量，与民主、法制、人权、人性相一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良心道义相一致。同样，社会中的横暴恶行，人性之中的恶则是极左思潮的社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派性”，是社会中两种思想道德倾向错综复杂的反映，是党内两种思想倾向斗争在社会上的反映。时过境迁，尘埃落定，民主与专制，善与恶，兽性与人性已逐渐明朗。“文革”是非，不能统统以“派性”一词了结，个中杀人罪恶，尤其是杀害手无寸铁者的暴行，不能不谴责，不能不追究！

即使在如此汹涌的“文革”大潮中，杀人者毕竟是极少数，人性的良知存在广大群众的心中，人命不是草芥，不可随意杀戳。在人命问题上，个人与个人所在的组织，必须负起责任，不能一味推卸给共产党的错误路线，推给党的整体，更不能以“没有法制和人权概念”轻描淡写。

聂元梓在北大“文革”中干了许多坏事，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上推下卸，上推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下推新北大公社，就是不反省个人的责任。“讲义气”的胡宗式也套用了聂的做法，只是略有变化而已。他上推共产党，而下卸两个杀人凶手，并以此开脱他所忠诚的聂老佛爷与他本人的罪过，想以此掩耳盗铃，模糊历史的真相，这能做得到吗？殷文杰的阴魂能答应吗？殷文杰的亲属与同学能答应吗？

胡宗式同学，请你放下包袱，丢弃幻想，诚恳老实地回顾与反思殷文杰之死这桩历史公案吧！否则，只能愈描愈黑，自食孽果！

北大武斗期间死亡事件真相探究
——对胡宗式提出几点质疑

郑实

1968 年的春季到夏季，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发生了 100 天左右的武斗。和清华不同的是，北大在武斗中使用的基本都是冷兵器，即铁棍、长矛和弹弓，所以虽然受伤的人不少，但在武斗现场并没有死亡一个人。而清华武斗中，使用了自制的枪炮、手榴弹和土坦克等，武斗双方和工宣队死亡了 10 多个人。

但是，在武斗期间，北大校园里出现了 3 例骇人听闻的死亡事件。

根据王学珍等人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这三例死亡事件如下：

4 月 19 日，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试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孙蓬一（注：北大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第 787 页)

4 月 27 日，无线电系 62 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径“校文革武斗指挥部”44 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时年 24 岁。（第 787 页）

7 月 20 日，地质地理系 61 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 40 楼，并于当日被武斗队打死。时年 24 岁。(第 789 页)

这三起死亡事件都不是发生在武斗现场，这三个死亡者也都没有参加武斗，为什么会被活活打死？打死他们的究竟是什么人？由于当时掌权的校文革的包庇和隐瞒，北大的师生们并不清楚。

1968 年 8 月 19 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对以上三起事件开始进行调查。1969 年 9 月北大成立革委会和 1971 年 5 月成立校党委后，又继续进行了调查。

1972 年 9 月 2 日，校党委常委会议决定对“文革”中打死温家驹、刘玮、殷文杰的几名凶手的处理意见（经校党委、校革委会扩大会同意上

报)：

李喜才（打死温家驹的主凶)，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

秦克俭，属敌我矛盾，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开除其党籍。

李铁良（打死刘玮的凶手)，性质和处理同秦克俭，开除其团籍。

杨恭谦（刺死殷文杰的主凶)，不再重新处理。

黄××，已查实是贪污分子，参加策划武斗，定为坏分子，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开除其党籍。(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 843 页)

这个决定把犯有刑事罪行的杀人凶手当作政治问题处理，仅给予戴上帽子（或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开除党籍团籍的处理，显然是太轻了，这也是当时法制不健全的表现。对凶手杨恭谦，因已经毕业分配，竟然不再重新处理，更令人不可理解。

1973 年 5 月 19 日，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家属参加的“批斗杀人犯大会”，当场宣布对文化革命中打死温家驹等三名学生的四名杀人凶手的处理决定：秦克俭，开除党籍，建议公安机关逮捕法办；李才喜，建议公安机关逮捕法办；李铁良，开除团籍，建议公安机关逮捕法办。以上三凶手由公安机关当场宣布了逮捕令，逮捕归案（这三人处理，北京市委 3 月份已经批准)。

令人不解的是：会上宣布“孙××，因态度较好，从轻处理，送劳动教养。另外，刺死殷文杰的主要凶手杨恭谦，分配前处理较轻，决定将我校对以上四人的处理结果告杨现在所在单位，由他们根据政策处理。”(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 855 页》。

1973 年，文革时期在校的老五届学生早已毕业离校，所以也都不知道这一情况。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 1978 年 4 月 1 日，北京市委批准将聂元梓、孙蓬一及打人凶手贺彦生隔离审查。4 月 5 日，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关于对贺彦生进行刑事拘留审查的请示报告》。4 月 6 日，校党委常委开会，提出

运动的五条政策界限，其中（一）对于追随林彪、四人帮参与聂、孙反党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和打人致死致残的凶手及幕后策划者、指挥者、组织者，这是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要严肃处理。（同上，933 页）

1978 年 11 月 8 日，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关于法办杀人凶手杨恭谦的请示报告》（杨恭谦是“文革”中杀害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的主凶）。（同上，944 页）

12 月 1 日，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关于法办杀人凶手舒会文的请示报告》（舒会文是“文革”中打死刘玮的主犯之一）。（同上，945 页）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是：参与这三起杀人事件的凶手有：秦克俭、李才喜、李铁良、杨恭谦和舒会文，其中李喜才是打死温家驹的主凶，杨恭谦是刺杀殷文杰的主要凶手，李铁良、舒会文是打死刘玮的主要凶手，凶手秦克俭的具体罪行不详，贺彦生的具体罪行也不清楚。后来他们被判处多少年徒刑也不清楚。至于纪事中提到的孙××和黄××，在三起案件中的作用，更是语焉不详。

关于北大武斗中死人的事件，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里说：“在北大的武斗中，没有打死人。地质地理系学生刘伟（注：应为刘炜）不是在武斗中被打死的，而是在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是冤枉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殷文杰的死也是冤枉的。三•二九校内武斗的第二天，他路过四十四楼，有人喊“他是井冈山过大江的！”被两个公社战士刺死。当时在场的公社办公室副主任胡宗式曾奋力去阻止那两个战士未能制止。死人的问题，我没有指使，从法律的角度，我没有责任。”（聂元梓回忆录，第 271 页）

聂元梓关于刘炜被打死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是完全错误的，刘炜就是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打死的；关于殷文杰之死，她说错了时间，也极力开脱自己的责任，其中提到了胡宗式曾经制止但未能奏效。

2014 年 5 月 31 日的《记忆》杂志 114 期上刊登了胡宗式的《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使我们对殷文杰的死亡事件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作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处理者之一的胡宗式的回忆，披露了 1968 年 4 月 27 日殷文杰被刺死的现场情况，使读者了解到了一些

当时的真实情况：殷文杰本人并没有参加武斗，只是路过 44 楼，被新北大武斗队的骨干“钢一连”的成员截住，他企图逃跑，却被杨恭谦和高玉堂用长矛追杀，身上刺了 39 个伤口，后被胡宗式等人送到 721 医院，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胡宗式等人还参加了事后处理。胡宗式作为当时的见证人，写出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实，使读者了解了当时情况下无辜学子被刺死的血腥事实，加深了对北大文革历史的了解和对文革残酷性的认识，比起长期以来聂元梓否认自己的罪行，对北大文革中的死亡事件推脱责任，无疑有一定的进步。

但是读了胡宗式的文章后，感到该文虽然披露了一些事实，但还有些问题说的不够清楚，认识也不够深刻，使读者又产生了一些疑问，在这里提出与胡宗式和关心此事的北大校友共同探究：

一、刺死殷文杰的凶手究竟有几个？他们是谁？

在胡宗式的文章里指名道姓地指出：刺死殷文杰的凶手是新北大公社钢一连的杨恭谦和高玉堂，当时胡宗式手抓住枪尖并用肚子挡住了一个凶手，那么刺杀殷文杰的主要凶手应该是另一个人。在 721 医院出具的诊断书上写着殷文杰的身体上有 39 处伤口，难道都是那一个人刺的吗？一个人在短时间里能够刺杀 39 枪吗？人们有理由怀疑，一定还有别的凶手共同参与，那其他凶手又是谁呢？更为诡异的是在《北京大学纪事》中的记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高玉堂的名字，只有杨恭谦的名字，他毕业时被顺利地分配，直到 10 年多后的 1978 年 11 月 8 日，校党委才向北京市委报送了《关于法办杀人凶手杨恭谦的请示报告》。那么高玉堂是否是刺杀殷文杰的凶手？他是否长期逍遥法外？还有谁参与了刺杀殷文杰？这些事实胡文并没写清楚。

二、为什么不对殷文杰及时抢救？为什么舍近求远，把殷文杰送到 721 医院？

在殷文杰被刺成重伤后，作为当时学校权力机构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没有进行及时抢救，反而做出了一些不合常理的行为。本来，北大的指定医院是北医三院，距离比较近，医疗力量也很强，凡是北大师生得了重病或受了重伤，都是送往北医三院的，例如在此之前被新北大公社打成重

伤奄奄一息的樊立勤，就是被送到北医三院，被抢救过来的。可是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黄元庄却让当时在现场的胡宗式等人，舍近求远，把殷文杰送到距离很远、技术力量也不如北医三院的 721 医院，这是否是有意延误和企图隐瞒公社的罪行，以致造成殷文杰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为什么欺骗死者家属，匆匆将死者遗体火化？为什么不告诉死者家属真相？

中国人有个老传统，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是在殷文杰死亡后，新北大公社却欺骗死者家属，不等死者家属来京，见上死者最后一面，就焚尸灭迹。28 日新北大公社把遗体拉回北大，29 日就匆匆送到火葬场，30 日他们就借口火葬场“五一节”前不给保留遗体，急急忙忙地把殷文杰的遗体火化了。这种违反常理的行为又是为了什么，是否害怕死者家属看到殷文杰身上的 39 处伤口，有意隐瞒凶手的凶残罪行？

胡宗式文中说：“死者的哥哥殷文豪和他的表妹，5 月中旬来校。他们先到井冈山兵团驻地给我打电话，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我请他们从西校门进来，在办公楼的一间房子，我和黄元庄接待了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从派性出发，采用一些诡辩的方法来对待家属提的问题。殷文豪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说：“你有你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又问：“是不是武斗中死的？”我说：“是在武斗的环境中死的。”家属追问凶手，我说正在追查中。家属来之前，我问黄元庄如何处理。黄说，多给家属一些钱。但是在和家属谈话的过程中，他们只是提抓凶手，不提赔偿问题，我也不好提此问题，家属只是拿出车票要求给报销。”由此可见，新北大公社的某些人在殷文杰死后依然欺骗死者家属，不告知殷文杰的死亡真相。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可怜的死者家属也无处伸冤。

四、事后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总部的表现，谁是杀害殷文杰的罪魁祸首？

胡宗式文章中说：“事后新北大公社总部责成我、黄元庄、陶威信（教员，哪个系的不记得了）组成一个调查组来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我和黄元庄到“钢一连”（44 楼 2 楼），把两个凶手找来。他们知道闯了大祸，很是懊悔。在 44 楼 2 楼找了一间屋子，和他们谈话，我让他们写过程和检查，

材料写好后交给我。当时在刺杀现场的两个人也写了材料（具体是谁，不记得了）。这些材料都作为附件，放在调查报告的档案袋中，留在公社总部，并一直留在学校。调查报告的草稿是我写的，经魏杞文修改后我又重抄了一遍，聂元梓在上面批示“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我在聂元梓家里（佟府丙 8 号，在第二体育馆附近）说到抓凶手的问题，聂元梓同意抓。不久，在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和战斗团长的会议上（地点在临湖轩），聂元梓说：“关于殷文杰死亡一事，调查完毕了，大家看怎么处理。”只有一个团长说应该交出凶手，大多数人反对交出凶手。有的说：“我们不干了！让你们这些老爷去打吧！”等等。这样吵吵了一阵，没有结论就转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

由此可见，聂元梓批示的“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根本就是一句空话，对凶手采取了完全包庇的做法。新北大公社的大多数头头更是丧失人性，无法无天。

在文革中，聂元梓依靠“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资本，篡夺了北大的领导权，成为校文革主任。她在北大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残酷打击迫害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其组织的专业武斗队伍，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凶狠残暴，随意抓人打人，草菅人命，以致发生了打死三条人命的事件。这三起事件不是孤立偶然的，是聂元梓和校文革执行极左路线和政策的恶果，在这个问题上，聂元梓和校文革难逃其罪责。胡文说聂元梓只有“领导责任”，太轻描淡写了吧？

平心而论，刺死殷文杰的凶手也不是天生的心狠手毒的恶人，他们只是受到文革极左路线毒害，受到聂元梓极左政策影响，丧失了理性和人性，把不同意见的同学当成阶级敌人，以为自己的行为是革命的表现，而实施了犯罪行为。他们是凶手，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也是古稀之年了，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彻底忏悔，也应该认识到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顺便提一下，在北京大学纪事 843 页中提到的贪污分子黄××，就是胡宗式文章中说的参与殷文杰事件处理的新北大公社的总部委员黄元庄。这个黄元庄文革前是个食堂的炊事员，文革中担任聂元梓的保镖有功，被

聂元梓封为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经常在校园里动手打人，武斗中担任副总指挥。文革后期（1975 年 8 月）被查出在监督改造期间盗窃公物和乱搞男女关系，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北京大学纪事》第 899 页)。这样一个品德恶劣、人格低下的坏分子却被聂元梓信任，主持了殷文杰死亡的事后处理，如果能够处理好那才是怪事!

清华大学校友唐金鹤女士，耗费三年时间，写出一部《倒下的英才》（2009 年，科华图书出版公司)，详细地记录了清华武斗期间死亡人员的姓名、时间、地点和具体细节，并绘制出《清华大学百日武斗期间遇难和重伤人员位置示意图》；而北京大学武斗期间死亡人数比清华少的多，但死亡事件的真相却至今没有得到比较详细的披露，这对于北大文革历史的研究，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希望知情的校友能够勇敢地说出自己了解的真实情况。

胡宗式近年来在网上发布了不少回忆北大文革历史的博客，对北大文革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但是由于他没有完全从文革派性思维中走出来，往往自觉或会不自觉地为聂元梓等人辩护，为自己当时所在的派别组织辩护。希望他真正地走出文革，认真反思，客观公正地写出当时的事实，做一个文革历史的见证人，而不要成为某些历史罪人的辩护士。

参考资料：

1.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3. 胡宗式,《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 原载于网刊《记忆》杂志 114期，2014年。
4. 唐金鹤,《倒下的英才》, 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

附录:文革中殷文杰被刺身亡事件

胡宗式

殷文杰是北大无线电系 62 级学生，北大井冈山兵团 15 纵“过大江战斗队”的成员，1968 年 4 月 27 日遇刺身亡。他的死完全是无辜的，是不幸的。

从 1968 年 3 月 29 日开始，北大校内的两派开始武斗，双方抢占一些重要的楼盘，以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在 4 月 24 日前，井冈山兵团已经占领了 28、30、32、35、37 楼。35、36 楼是女生宿舍，36 楼在 35 楼和 37 楼之间。如果占领了 36 楼，井冈山兵团就可以把占领区连成一片，因此 36 楼的战略位置很重要。4 月 25 日，井冈山兵团采取突然袭击，把楼内新北大公社的人赶出去。4 月 26 日，新北大公社组织力量想夺回 36 楼。井冈山兵团把通往 2 层的楼梯用家具堵死，死守二层。由于井冈山方面居高临下，占据主动。新北大公社的人虽然进入了一层，但没有办法攻上二层。这次武斗，新北大公社吃了大亏，许多人受伤，气氛很是压抑。

27 日上午 10 点左右，殷文杰从他住的 42 楼出来（当时一些楼仍然是两派混住）从南向北走，当他经过新北大公社总部所在的 44 楼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他是'过大江'的！"。（"过大江战斗队"是对立派比较有名的战斗队。）新北大公社钢一连的杨恭谦和高玉堂（当时我不认识他们，名字是后来知道的），此时正拿着长矛在 44 楼门口，听到喊声，他们便拿着长矛跑上去拦住殷文杰，殷文杰转身向后跑。这时一人（可能是杨恭谦）上来用长矛刺殷文杰，接着另一人也上去刺。当时我与同组的章铎（生物系三年级女学生）正和人大"三红"动态组的盛学韫（人大的女教员）在附近谈话，距离事发地约 20 余米。当时 44 楼附近的人不多，我眼睛的余光看到殷文杰走过来，被拦住。见刺了第一枪后，我立刻跑过去进行拦阻。我一边用手抓住枪尖（枪尖对着我的肚子），一边喊："不要！"我抓住了一个人的枪尖，但另一个人又刺，我又去抓他的枪尖。我和在场的章铎等人对此行径都非常愤怒，真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会那样疯狂。殷文杰身上被刺了许多枪后倒在地上，这时凶手停止了刺杀并喊了一声："滚蛋"。殷文杰挣扎着爬起来，奔到 44 楼北面小树林里又倒下。此时我见他口吐白沫，呼吸困难。校医院离 44 楼很近，校医很快赶来了，给殷文杰打了一针强心针。随后众人把殷文杰抬上汽车（130 型）。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黄元庄让我护送殷文杰到七机部 721 医院（五棵松附近）抢救。我怕汽车颠簸，就坐在车厢底板上，把殷文杰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一路上抱着殷的头。汽车走海淀直达五棵松的路，此路车少，又是最近距离。当时 721

医院是七机部的“915”掌权，和新北大公社的关系很好。

到了 721 医院，大夫一看瞳孔，立即抢救，先是按胸做人工呼吸，后作了开胸的心脏按摩。医生的技术很高，三刀就露出心脏。我在旁边看着，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盼望医生把殷文杰抢救过来。听到医生说“不行了”，我眼前一黑差点晕倒，护士把我扶到外边，让我坐在长椅子上。人刚送来时，我没有告诉医院殷文杰是对立面的，说是新北大公社的人。护士说：“这么凶残，把人扎成这样。”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下午，我再去医院，对上午没有告诉殷文杰身份一事，向院方表示歉意。他们说：“医院有救死扶伤的义务，不计较他是哪一派的。七机部当时也面临武斗形势，尸体放在这里不安全，万一叫对立面知道不好办。你们尽快把尸体领回去。”我取回诊断书（上面写着 39 处伤口）。晚上我们把尸体拉回来，放在员工食堂后面的小屋里，第二天找了一些冰放在里面。

在新北大公社总部附近的马路上，黄元庄、我、保卫组的谢甲林商量给死者家属发电报的事情。谢说：“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家里一见死亡的电报，就会出个好歹，所以发电报不要说死。”28 日上午发出电报，说是重伤（具体办的人是谁，记不得了）。原以为家属两天能来，黄元庄说：“家里来人在这里哭得死去活来，不好办。还是到火葬场去哭，然后火化。”

29 日一大早，我、曹广志和后勤的蔡师傅送尸体到东郊火葬场。我们来得很早，比他们上班时间早一个多小时。在等待时，我翻看了前一天的火化记录，有 60 多人，正常死亡的约一半，非正常死亡的有车祸和自杀。我选了一个最贵的骨灰盒（200 多元），从学校拿来一套新棉衣准备给殷文杰穿，好遮住他身上的血衣。曹广志见了死人非常害怕，不敢靠近，我让他到外面去，蔡师傅和我给殷文杰穿上衣服。停尸房里有个一小间，停放着两个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房里有冰。我们和火葬场管理员说好把殷的尸体先停在那里，等家属明天来。我们没有交冰钱，火葬场也没有要。30 日中午，家属没有来。火葬场几次打电话催问，要火化。我打电话给上海殷文杰的家属，一是请他们来，二是尸体火化。起初家属（殷文杰的姐姐）不同意火化。我说“五一节”火葬场要清理，不给保留尸体了，你们要尸体没有什么用。后来家属同意了。我随即通知火葬场，火化尸体。大约过

了 2 个小时左右，他姐夫来电话又说不同意火化。我告诉他已经通知火葬场火化了。

井冈山方面很快得到殷文杰死亡的信息，他们不能确定凶手是谁，便把矛头对准我，因为我可能是现场一般人能认识的人。他们在广播中说："反革命小丑、杀人凶手胡宗式"。至此以后，为防意外，我一般不再外出。

事后新北大公社总部责成我、黄元庄、陶威信（教员，哪个系的不记得了）组成一个调查组来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我和黄元庄到"钢一连"（44 楼 2 楼），把两个凶手找来。他们知道闯了大祸，很是懊悔。在 44 楼 2 楼找了一间屋子，和他们谈话，我让他们写过程和检查，材料写好后交给我。当时在刺杀现场的两个人也写了材料（具体是谁，不记得了）。这些材料都作为附件，放在调查报告的档案袋中，留在公社总部，并一直留在学校。调查报告的草稿是我写的，经魏杞文修改后我又重抄了一遍，聂元梓在上面批示"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我在聂元梓家里（佟府丙 8 号，在第二体育馆附近）说到抓凶手的问题，聂元梓同意抓。不久，在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和战斗团长的会议上（地点在临湖轩），聂元梓说："关于殷文杰死亡一事，调查完毕了，大家看怎么处理。"只有一个团长说应该交出凶手，大多数人反对交出凶手。有的说："我们不干了！让你们这些老爷去打吧！"等等。这样吵吵了一阵，没有结论就转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

死者的哥哥殷文豪和他的表妹，5 月中旬来校，他们先到井冈山兵团驻地，从那里给我打电话，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我请他们从西校门进来，在办公楼的一间房子，我和黄元庄接待了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从派性出发，采用一些诡辩的方法来对待家属提的问题。殷文杰的哥哥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说："你有你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又问："是不是武斗中死的？"我说："是在武斗的环境中死的。"家属追问凶手，我说正在追查中。家属来之前，我问黄元庄如何处理。黄说，多给家属一些钱。但是在和家属谈话的过程中，他们只是提抓凶手，不提赔偿问题，我也不好提此问题，家属只是拿出车票要求给报销。

我在处理殷文杰事件中，也想为凶手减轻一些罪责。我和凶手谈话时，

高玉堂说："我们叫他站住，他转身就跑。"我说："你就说喊了一声站住。"这句话是否写在调查报告之中已不记得了。

1971 年清查 5·16 时，军、工宣队把我押回学校审查。专案组以殷文杰事件为突破口对我施加压力。在审查时，我写的关于殷文杰事件的材料中，有两个细节和军、工宣队掌握的不一致：一是在 4 月 30 日我给上海打电话，与家属通话，说火化的事。由于火葬场多次来电话，说五一节前尸体要火化。我对家属说："明天是五一节，火葬场不给保存尸体，你们要尸体没有什么用。"他姐姐同意了火化，而后来他姐夫又不同意火化。他姐夫给工宣队的证明中否定了家属曾同意火化。军、工宣队说我说的是假话；第二，是军、工宣队说送 721 医院前人已死，校医院的大夫给工宣队开的证明是这样的。可是同一大夫当时给我的证明是心跳微弱，当场还打了强心针，我是亲眼见的。在当时我也没有认为人已死。军、工宣队说人已死了，你们送医院是做样子。他们以这两件事为由，说我不老实、顽固，根本不许我在会场上讲话。我一开口，他们就说："你还狡辩！"并强迫我承认我是杀人凶手。我说："我是救人的！"专案组的李秀蕊（女，教员）说："你是救人的？救人的，人怎么死了？"他们还要我承认聂元梓是杀人凶手，让我交待聂元梓、孙蓬一是如何指使的。专案组副组长庄逢源（教员）说："杀人凶手难道就要亲手杀人吗？蒋介石亲手杀人吗？他是不是凶手？"我当然不能说蒋介石不是凶手。他们说："包庇杀人凶手的就是凶手。"最后他们宣布："你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这个问题算揭发，不算交待。别的问题你自己想想吧。"

搞殷文杰死亡问题，就是要在精神上打垮我，要我承认聂元梓、孙蓬一是幕后指使者。想在精神上打垮我之后，进一步要我承认我是"5。16"反革命集团的骨干，这是把我押回学校的根本目的。我坚持我是救人的，聂元梓有领导责任，但没有策划、指使问题。

文革中杀害三名无辜青年，是我所在的组织"新北大公社"最丑陋的一面。杀害殷文杰的凶手，在 1971 年左右受到处理。对于杀人凶手，理应追究其责任。追究杀人凶手是个法律问题。我们在总结这些事件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更应反思的是：在北大、在北京、乃至全国，发

生那么多迫害人、打死人事件，这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共产党教育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各种问题，分歧就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就是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把自己的同事、同学当作敌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宣传的层面上，根本没有民主、法制、人权的概念。殷文杰事件也是新北大公社的领导和群众没有法制和人权概念的例证。

（原载网刊《记忆》114 期）

“人道的用刑”与三个学生的遭遇

樊能廷

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在文革中对于“黑帮”、“牛鬼蛇神”、“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滥施酷刑，在北京的高校中“首屈一指”。

1968 年 4 月 19 日，“新北大公社第二体育馆武斗连”把地院附中学生温家驹从图书馆绑架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家驹死后，北大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

1968 年 4 月 27 日，无线电系 62 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44 斋附近，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截住，用长矛“乱枪刺死”，时年 24 岁。医院出具的报告，注明“有 39 处伤口”。

1968 年 7 月 20 日，北大地质地理系毕业生刘玮从天津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大街上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绑架到 40 斋“西线指挥部”，当天下午被毒打致死，时年 24 岁。施刑过程中，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副总指挥黄元庄电话指示逞凶行刑的棍徒：“用冷水给他（指刘玮）泼醒，给他喂一点儿西瓜。”

三条正在华年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三个无辜的青年，就这样在酷刑中消失了。

遭受酷刑而侥幸不死的例子，有陈一谘、樊立勤和杨绍明三个学生的案例。

一、七死八活陈一谘

陈一谘 1940 年 7 月 20 日生于成都。乃父是水利工程师，在汉中工作。陈一谘出生半年后，为节省家用，母亲带他从成都到汉中，和父亲住到一起。从四岁开始，母亲对他进行了严格的童蒙教育，把他送进了私塾。1946 年，他 6 岁，父亲、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弟弟前往北平。读小学到 1949 年底，随母亲转回原籍陕西三原。陈一谘 1953 年考入北京 22 中学，初中；1956 年考入北京 66 中学，高中；1959 年 6 月，行将高中毕业，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一谘 1959 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学系。他 1962 年申请转系，经批

准，又服从组织安排，“为党做些工作”，转入中文系一年级（1962 级）。按照 1959 年入学物理学系，本应该转入中文系四年级的。

1965 年秋冬，好学深思的陈一谘，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根据自己参加农村“社教”的感受和认识，写出三万字的《给党和政府工作提的一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书》)，亲手交给时任北大社教工作组组长的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对于陈一谘陈述布达的意见，上级没有任何回应反响。

1966 年文革发生，陆平校党委、张承先工作组、聂元梓校文革，你方唱罢我登场，群众造反组织、各色红卫兵山头林立。陈一谘没加入任何群众组织。

1966 年 10 月上旬陈一谘外出大串联后回北大，发现学校聂元梓“红色政权”当政以来的独霸局面被打破，一些学生成立了反聂的“井冈山”、“红联军”，各种看法的大字报贴满燕园，他在校内溜跶、观望了几天，又出去串联了一个月。再回北大时，“北航红旗”的几个人找到陈一谘，要把他“社教运动”中写的《意见书》印发传播。他说:“现在大家都很狂热，这个东西如果传得太广，一旦到了江青手里，我就没命了!”这样，劝阻了“北航红旗”的人。

中文系冯隆、郭庆山和张自修等几个有正义感的同学把陈一谘写的《意见书》油印出来，以便为他伸张。恰在这时，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写了批评林彪鼓吹“顶峰论”、“绝对化”的大字报，冯隆立即写大字报支持，大字报还没贴出，被陈一谘劝阻。他悄悄地对冯隆说:“从林彪大谈政变到现在权势熏天，毛不支持，他怎麽敢？千万不能往枪口上撞!”其实，当林彪“政变经”的讲话传出后，很多人都对林彪讲话有看法、有微词议论。

见北京各个大学两派围绕“工作组”和“资反路线”争论正酣，陈一谘就又外出串联了。这一回，他和几个同学去了大连，先到造出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的大连造船厂，又到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的大连机车车辆厂。看到，这两个大工厂一闹文革，生产几乎陷于停顿。他们不追深论，觉得这一类大型工厂的生产搞乱了，对国家损失太大，决定发电报向周总理汇报。函电交驰，很快得到回音，说是 2 月 25 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和工人代表。陈一谘他们兴冲冲回到北

京，住在铁道部招待所，整理和准备给周总理的汇报材料。

1967 年 2 月 24 日下午，陈一谘千不该万不该，给同学高运安打了个电话。两小时以后，同班同学、南通人氏黄介山带着高运安等五六个人，突然来铁道部招待所找他。黄介山皮里阳秋，骗他说："系里辩论吕乃巖的问题，请你发言。"要陈一谘立即回校。陈一谘说："大连的事关系国计民生，明天给周总理汇报完，我马上回校。黄介山继续骗他说："晚上全系开会，就等你了。会开完你就回来。"陈一谘看看高运安，高运安似乎很惶遽，话里藏阄，含含糊糊地说："你就回校一趟吧。"

不承想，陈一谘听信黄介山此番谎言，从此落入网罗，坠入阿鼻地狱。随同黄介山、高运安等人刚一走进南校门，不由分说，陈一谘就被两手倒架了起来，中文系的人布列在甬路两边，呼号动地："坚决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一谘!"、"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一谘!"、"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陈一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你一拳、我一脚，不住气地殴打陈一谘，只要稍一挣扎，胳膊就被拧得更紧。路上围观的人众也跟着喊口号。陈一谘被押上了 32 斋中文系男生宿舍。楼梯两边站满了人，一边喊口号，一边打他。进入楼道以后，两边的拳掌像冰雹般砸了下来，拳脚交加，把陈一谘从楼梯这头打到那头，从那头又打到这头，直打了三个来回，打得他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失去知觉，瘫倒在地。这是陈一谘第一次被打死过去。

直到第二天下午，从不省人事中醒来，陈一谘全身疼痛，动弹不得。他强烈抗议遭受到的这种法西斯暴行，要求见聂元梓，并宣布绝食。

绝食的第二天，中文系领导华秀珠来看他，华秀珠态度和蔼近人，她曾经是上海纱厂的女童工，陈一谘感谢她的好语如珠。但是，陈一谘坚决表示："聂元梓不来不复食"。绝食第三天下午，"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之一、校文革办公室主任夏剑豸来了，他说："聂元梓同志很关心你，担心你身体出问题，特别委托我来看你。不要绝食了，有话慢慢讲。"陈一谘有声无气地说："黄介山这种做法完全违背《十六条》，要允许申辩、允许看大字报、允许读报纸。"夏剑豸都答应了，还让人端来一碗米汤，看着陈一谘喝完才走。

陈一谘又躺了两天，勉强下床。他走出楼外，看见黄介山、任喜贵署名的大字报，题目是“死鬼陈一谘又活了!”陈一谘心里咯噔一下：他们怎麽会变得如此没有人性呢？岂不知，聂元梓校文革借批“反中央文革”和“二月逆流”之机，把“井冈山”、“红联军”打成了“反动组织”，又在反对她的师生中大抓“反革命”，搞得北大到处在抓人、斗人，学校呈现出一片森严恐怖的局面。

文革初期乘势而起的这个黄介山，借机北大“红色恐怖”之势，把反对校文革聂元梓、系文革吕乃巖的冯隆等五个人打成了“222 反革命集团”。凭借着把自己同班同学打成“反革命分子”的赫赫之功，黄介山当上了刚成立的“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政委。黄介山从铁道部招待所诓骗陈一谘回校前，冯隆等人支持高运安揭发系文革主任吕乃巖的一些问题，高运安已被打成“反革命嫌疑分子”，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天，陈一谘被押着上厕所，看见冯隆被剃光了头在扫厕所，冯隆神态坦然，眼神的表露毫无惧色。

1967 年 3 月初，“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政委黄介山连续两次组织人马批斗陈一谘，仍是驾着“喷气式”，边喊口号，同时连踢带打，让陈一谘揭发冯隆“反江青”、“反林彪”的罪行。陈一谘明瞭，冯隆去年 7 月、11 月先后写过不同意江青、林彪言论的大字报，都没有贴出，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揭发冯隆的人很可能恐懾于政治压力，那麽，冯隆若承认了，肯定已经斗得很惨。在大环境不实事求是的情况下，如果陈一谘说出冯隆写过林彪、江青大字报的真相，等于是落井下石，冯隆岂不真的成了“反革命”？陈一谘一口咬定没这个事，任凭拷打，也不松口。

陈一谘的“顽固”使黄介山气急败坏，指挥“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抄掳了陈一谘所有的东西，用以凑集把他打成反革命的材料。不徒费力，黄介山等人从他的日记、读书笔记和来往信件中，先后摘录并印发了三批《反革命分子陈一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三月上旬，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和中文系文革、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把陈一谘“开除党籍和学籍”的声明。

1967 年 3 月 17 日下午，陈一谘被八个人从 32 斋押到第二教室楼，脖子上挂了一个沉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一谘”的牌子，两个彪形大汉

反剪他的双臂，让他“坐飞机”，连踢带打把他押入了 102 教室。大教室坐满了中文系师生，由任喜贵带领着高喊：“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一谘”、“谁反对聂元梓就打倒谁!”、“陈一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各种打倒他的口号。

黄介山主持会议，杀气腾腾地讲了几句上纲上限的话，走过来揪住陈一谘的头发让他“认罪”，他刚说了一句“我没罪!”就遭到一阵狠心辣手的毒打。接着，新北大公社的骨干轮番揭发他“恶毒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江青同志”、“恶毒攻击活学活用”、“恶毒攻击反右派”、“恶毒攻击反右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聂元梓和新北大红色政权”的罪行，说几句就打一顿，头发一缕一缕揪下来，汗水和血水染湿了地面。

刚开始，陈一谘还能有些反抗，高喊着：“党员向党中央反映意见何罪之有!”、“你们实行法西斯专政!”、“聂元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思想一定会照亮新北大!”。但十六个人分四组轮换，不断地把陈一谘倒架双臂、压弯上身、揪住头发、仰头向上，还不断殴打、脚踢，四个小时的酷刑折磨，使他渐渐失去了知觉。恍惚中，凶悍的马西沙大喝一声，把陈一谘右臂给拧断了，任喜贵又把他左肋肋骨踢断。陈一谘瘫倒在地上，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这是陈一谘第二次被打死过去。

昏死中他被几条大汉架出会场，倒拖着拉到 32 斋，扔到了宿舍的床上。陈一谘依稀中感到自己还有一丝游息，只要停止呼吸就可以死去。活着是那么艰难，死却非常容易。人一死也就一了百了，可是又怎麽能就这么死去呢！在大家的心目中，在战场上牺牲是个英雄，在刑场上就义是个烈士，自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算个什么？何况还要背上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太不甘心了，不能死。

混沌中，似乎听到楼下高喊：“沈达力畏罪自杀，罪该万死!”的口号，陈一谘心中吃了一惊。再细听，果然是知心女友沈达力自杀了！他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动弹不得，泪水从眼角不由自主流了出来，不觉又昏迷过去。陈一谘再次醒来，脑子里不断闪动着古人受苦受难不屈不挠的画面，忍着浑身剧痛驰想，上天让人类降生了，上天让人类受苦了，上天让人类死去

了，这就是历史。但我陈一谘不能死，不能枉作游魂，有一口气就要坚强地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含污忍垢也要活着，活下来才能给沈达力、给自己洗刷清白，活下来才能最终伸张正义，活下来才有实现报国夙愿的机会。朦胧中陈一谘想起 1960 年在广州，父亲教给他的“龟息功”和“不终之药”，舌上放一粒米顶在上颚，吸气到丹田循环运行而不呼出，这样七日水米不沾仍可维持生命。他试着做，做着做着，就又昏迷过去了。

这样，陈一谘在床上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时，看见同屋的高运安、朱殿庆、刘镇伟、张崇巖都眼睛红红的看着他。刘镇伟说：“我们都以为你活不过来了！”张崇巖端过一碗粥说：“喝点吧！”朱殿庆愤愤地痛骂了一句：“真他妈的法西斯！”流下了热泪。陈一谘想上厕所，高运安赶忙把他扶起来，全身疼痛得无以忍受，拧断的右臂肿胀、不能动，左肋也奇疼无比。他的脚刚一踩到地上，又疼得缩了回去。才知道，把陈一谘从第二教室楼批斗会现场拖回宿舍的时候，脚趾头和鞋袜都磨破了，血肉、泥土和鞋袜粘在了一起，疼痛钻心。高运安扶着陈一谘，一步一挪，到了厕所，尿出的都是红黑色的血尿。后来医生告诉陈一谘，是右肾被踢坏了。回到房间，陈一谘左手按着左肋，往床上一躺，又是钻心的痛，医生检查说是左肋被踢断了四根肋骨。

正应了泰戈尔所说：“人一旦变成兽，一定比兽更凶残”的箴言。多年以后，几个老同学说起“3·17”批斗陈一谘的场景，不期而同，说那是他们参加过的“北大最残酷的批斗会”。2006 年，陈一谘的胳膊和腿脚突然先后不能动了，中国科学院顾问郭德纯医生给他诊治时说：“你四十年前，身上留下了十几处断伤和瘀伤，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跡！”。

二、死去活来樊立勤

樊立勤，北大生物系遗传专业 1963 级学生。白净的容长脸儿，细高挑的个头儿，身高约一米七六，体重一百二十斤。外表一看，就是一副“鸡肋不足以安尊拳”的尪弱身子骨。在北大见他第一面，到现在，总是梳一个“领袖头”的髮型。老家世世代代在密云县城里开一家中药铺。樊立勤说起话来，您呀您的，偶尔还说“他”字儿——这就是从小养成的规矩。

樊立勤的家里处世之道是不偏不倚，无党无派。既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组织，亦不加入任何道门、教派会党。从满清到民国，到共产党，谁当权都服从谁领导，谁当领导给谁完粮纳税。这种家庭也有所恨，也有所怕：最恨的是外国入侵、军阀混战；最怕的是动刀动兵、打仗流血；而解放后最怕的，就是共产党搞运动。他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这么一个家庭里长大的。

樊立勤是北大最早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之一，不是“闻风而动”，是凭着感觉，自发的、与生俱来的“不待上命而行”。

1966 年 7 月 25、26 日，中央文革在北大东操场主持两次全校万人“辩论会”，樊立勤两次发言，大段背诵“语录”、有理有据，反工作组态度鲜明，得一时之专美。

樊立勤 1966 年底开始反对聂元梓，把康生视为聂的“后台”，参与十六所高校“炮打康生”的活动。“炮打康生”和“反对聂元梓”，这两件事，当时在北大，无疑都是“老虎头上捉虱子”，惹得聂元梓三尸暴跳、七窍生烟，所以，樊立勤立即被“红色权力机构”校文革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

樊立勤一进黑牢

1968 年 3 月 27 日，恰巧赶上北京发生了公布“杨余傅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在东郊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午 10 时许，聂元梓、孙蓬一指派爪牙在校园里突然强行绑架，抓走了樊立勤。他被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关进黑牢，受到两天两夜丧天害理的酷刑逼供，致使终身残疾。

樊立勤《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中写道：

他们逼我承认破坏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反对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我拒绝了他们的这些指控和诬陷。他们连续对我施以酷刑。他们除了把我蒙上眼睛进行拷打之外，还有钳子把我的一双手食指夹断，把手指甲钉入签子，他们打断了我的胳膊和左腿，又往我右腿的膝盖钉入了钉子。在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神志不清之时，又往我身上泼冷水给浇醒，浇醒之后再问。他们打我打累了，

就压在我的身上，把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

他们是用麻袋把我先蒙住、盖住拉到刑讯室的。到了那里，拉下麻袋，然后给我头上蒙了两层手巾，挡住眼睛，在手巾外又绕了一二十圈绳子，他们把我从楼梯上往下踢、往下踹时，因为我的右胳膊、右腿均已打断骨头，左膝盖被钉子钉碎，站不起来了，他们就一层一层往下踢，这时身上已经没有麻袋了。

我被酷刑折磨了几天几夜，他们得不到他们预想的目的，我被打得落下了终身残废——“左膝强直”，一辈子不能打弯。

《燕园风云录·四》196 页，艾群《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说，艾群亲自查到聂元梓在公安部门的“讯问笔录”中记载，1968 年 3 月 28 日夜，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各战斗团头目在临湖轩会议，会议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武力解决，聂元梓明确回答:“打，你们要打，就打吧!”

于兹，聂元梓亲自拍板，1968 年 3 月 29 凌晨 1 时，在北大发起武斗，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夜袭攻占 31 斋化学系男生宿舍，妄图以武力击垮反对她的井冈山兵团广大师生，武力解决反对派，武力统一北大。3·29 事件，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攻占 31 斋，井冈山兵团吃了大亏，校文革—新北大公社表面得利，但是干这种事不占理，不但“武统”梦灭，还要担责任——开衅不义，开北京高校大规模武斗之先河，自己把自己放到了历史的被告席上。以后的北大局面，就是聂元梓收拾不了的，她就剩下乖乖等着别人收拾她这一条路了。

樊立勤说，其实他自己是北大 3·29 唯一“捡便宜”的人，不然他死定了，公社把他扔出楼外的时候，他已经是口吐白沫、行将毕命，跟死了一个样儿。

新北大公社把樊立勤打到行将毕命，不想担这个人命干系，在 3·29 这天，把他从 43 斋的黑牢里弄出来，扔到女澡堂门口。当樊立勤经抢救，从昏迷中醒来时，医生告诉他，“我们以为你没救了，因为抢救时，已经量不到血压，摸不到脉搏，瞳孔已经散光，竟还活过来了；真悬呐；是奇迹。”

樊立勤这个“反革命集团”，是聂元梓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伙同

樊立勤所在班级的学生干部一手制造出来的。校文革成立了专案组，主要由生物系、技术物理系、地球系、哲学系、数力系、西语系的人员组成。专案组的组长为陈乃斌（数力系）、副组长为赵恩普（生物系），成员有宴懋洵（地球系）等人。赵恩普、李棉生、高占民三人与樊立勤同班，是最早的组织者。其中打人最凶的是陈乃斌、赵恩普、宴懋洵。

樊立勤同班同学赵恩普既是这个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又是物理大楼监狱的主要监管人，他与宴懋洵是直接动手抓人、打人的。

樊立勤第一次被抓、被拷打致残，就是赵恩普带人干的，关押和拷打的黑牢地点就是大家口头称呼的“白公馆”——文革前的招待所。

樊立勤二进黑牢

军宣队进校，这个专案组又递送材料，由军训队决定，第二次把樊立勤抓起来，关在物理大楼。所以 1968 年的国庆节，樊立勤是在物理大楼黑牢的地板上度过的，这次又是赵恩普带人把樊立勤抓走的，后来许多同学向军宣队抗议，军宣队才不得不再次释放樊立勤。

文化大革命中，樊立勤是北大学生中“头号要犯”，他自认命当如此；孤独一人，无依无靠，既无后台，也无背景，又与当局大逆其道。

赵恩普这些整人的人，搞“阶级斗争”、整人，就是他们的专长、安身立命之所。他们时时处处寻机整人。同是赵恩普这一批人，对樊立勤下手，一进黑牢、二进黑牢，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得逞，问题的根本在于体制。

新北大公社成员田建行说：出了 31 楼（笔者说明：1968 年 3·29 凌晨，新北大公社武装齐备的武斗队，偷袭夜阑人静的 31 斋，驱逐了对立派学生，攻占了 31 斋宿舍楼），往哪里跑？

我钻向学六食堂和浴室间的过道。“站住！长矛！”一声断喝。一群身穿黄棉袄、手持长矛的武斗队抓住了我。接着铁棍、扎枪也上来了。我的头被铁棍打破流血，身上也挨了几扎枪，所幸不重。有 4·11 经验，我以为又是“地院东方红一小撮暴徒”来了。“你是哪里的？”“我是北大的！”言外之意：你们是干什么的！来了个看样子是个头头的：“我们是公社的，别怕！”我还是不信，一言不发。估计他们也想到如果我是井冈山的该往东边 28 楼方向跑：“大概打错了人，送 43 楼治伤。”我摸出身上带的学生证，

里面夹着一张“二期学习班”的证件。“是自己人!”于是他下令赶快将我送往 43 楼。在此之前我还未“有幸”进过这里。43 楼早已有所准备，“野战医院”、大夫、设备一应俱全。我是这次大武斗公社方面第一个伤员，又是被“自己人”误伤的，所以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笔者说明：下文田建行说樊立勤被新北大公社囚禁在 43 斋，应该不会记忆错误。樊立勤自己说是 44 斋，那是公社总部所在地。而樊立勤被绑架，黑布套头、布囊其口，早早被毒打得不知东南西北，差点儿断了气。所以，樊立勤的囚禁地，应该是新北大公社清醒的田建行同学指称的 43 斋靠谱。）

处置完伤情，我该休息一下了，可是又怎能睡得着呢？此时天已微亮，北大校园乱成一团。两派的大喇叭死命嚎叫。于是我出了病房在 43 斋内到处看看。我走到一间屋前，只见屋门敞开，窗户上蒙着黑布，里面亮着个蓝灯泡，地上躺着个被打得昏迷不醒的人。这时过来个人，告诉我这是樊立勤。一句话就够了。怪不得井冈山前几天嚷道樊立勤被公社绑架了，果然如此，不知为什么我这时竟想到父母惨遭毒打时的情景……正在此时只听得楼下一阵人声和棍棒声。“打死樊立勤!”有人狂吼。我见事不好，随手抓起楼道里放着预备武斗用的一根粗约 4cm、长约两米的铁管，往小黑屋门前一堵。一群人冲了上来，被我手持铁管挡住。有人说：公社的×××被井冈山抓住打得快死了。打死樊立勤为×××报仇!（自己的人还没死就要打死对方的人“报仇”，什么逻辑!）我说：“樊立勤就真是反革命，该枪毙，也要由法院判。不能随便打死人。”他们想硬冲又有所顾忌：一则与这几位相比，我可算身高体壮、棍粗力大，二则能进到这里肯定是公社的“自己人”。再加上包了一头纱布，肯定刚从“战场”下来的，像个亡命徒。他们也不敢乱来。谁知道我是被公社武斗队打伤的“逃兵”！双方僵持了几分钟。这时来了一个头头说：“不能打死樊立勤，要和井冈山交换俘虏。”（只有战争才会产生俘虏，两派争斗是战争？）那伙人这才罢休。我看没事了，也就扔掉铁棍走开。这件事我“保密”30 年。当时樊立勤反江青、聂元梓，“罪大恶极”，救了他也该罪大恶极，我当然不敢声张。后来又去和谁说！要问我当时怎么想的？樊立勤是北京人，又比我低一级，称之为师弟亦不

为过。一个并无背景的普通学生敢和“大人物”唱对台戏，尽管见解不尽相同，也让我佩服。我不能让我父母遭到的惨祸在我眼前重演。这也是他的缘分，如果我不想出跳楼逃跑的馊主意，如果我不让公社武斗队抓到打伤，如果我不在 43 楼内到处看看，如果不是恰好有那么一根铁管凑手，如果我的动作稍有迟缓放过哪怕一个人到身后，他必死于乱棍之下。我干了一件一辈子不后悔的事。30 年来想到当年闹派性之事我时时感到内疚，但有此经历我的心理也得到一些平衡。5 月 2 日晚我和邱守鹏提到此事说：田某当年对井冈山的朋友们多有得罪，但有这件事也可将功折罪了。我已年过半百，但如此使粗动武就这么一次。“该出手时就出手”！后来双方交换“俘虏”之后井冈山的大喇叭讲樊立勤如何英勇不屈，造反精神如何强，听了后我偷着乐：你们可不知道公社中有人暗中相救呢！3·29 之夜我的奇特经历使我认识了聂元梓之辈的真实面目：武斗蓄谋已久、残暴已极！

三、带医生殴打杨绍明

文革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对于“黑帮”、“牛鬼蛇神”、“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施行酷刑的技法，也是“与时俱进”。1968 年春天，郝斌听到杨绍明叙述的遭遇，据实而陈，写在书中，令人三叹！——打手对“人犯”用刑的时候，带着医生！——“带头的一个工人，上来三句、五句问过，劈头就打。楊紹明单衣单裤，毫无遮挡，自行车链条抡到头上，打出了口子，血流下来，糊住了眼睛，他倒下了。带头的人示意暂停，打手们坐下抽烟休息，大夫不慌不忙上来翻开眼皮看看，缝了七针，然后告诉带头的：“不碍事！”于是又是一顿打——原来这是革命的分工：你只管打，我保他不死，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就是要给楊小二一个打而不死！”

“文化大革命”第一轮炮火的打击对象，是“彭、罗、陆、杨”，杨是杨尚昆，而杨绍明是杨尚昆的儿子。杨尚昆倒下了，儿子杨绍明自然也要倒下，就是这么个“逻辑”。杨绍明贴出《揭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的资产阶级贵族生活》，想当然地被认为是“为其狗父浓施粉黛”、“翻案”，何况大字报还“恶毒攻击聂元梓”！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满怀“阶级仇恨”，所以，杨绍

明被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打手们毒打，带着医生去打！此所谓——人道的用刑。

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

舒声　郑实

邓朴方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62级学生，文革时不幸坠楼受伤，导致终身残疾，这一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情节如何，谁应承担这一事件的责任，却有许多说法，所以成了一件谜案。本文对此事件做了一些初步的考证，希望为研究文革历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线索，并请方家指正。

首先，请看 1982 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书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刑事判决书中的有关部分：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82）京检分审字第212号中说：

1968年4月至7月，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借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忠、韩琴英、姜鹣鹣、俞芷倩、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其中邓朴方被绑架到校后，被蒙住头，遭到铝棍、电缆线鞭多次毒打，日夜连续突击审讯，强迫其交代其父邓小平和卓琳是如何反对江青的。邓朴方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8月9日、14日，聂元梓控制的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了报告和绝密《简报》，进一步诬陷“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

被告人聂元梓的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受害人的陈述，证明完全属实。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2）中刑字第21436号中说：

1968年4月至7月，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借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忠、韩琴英、姜鹣鹣、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致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8月9日、14日，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报告和绝密《简报》，诬陷“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这两份法律文件中都把邓朴方受伤致残的时间定位为 1968 年 4 月至 7 月，而这一事件发生是因为聂元梓和校文革把邓朴方等人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绑架了邓朴方，严刑拷打而造成的。

再请看由前党委书记王学珍领衔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对这一事件是如何记载的：

1968 年 5 月底校文革编造了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给江青。

在此期间，由专案组负责人派人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三个多月，逼他们交代“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给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邓朴方被逼坠楼，高位截瘫，终身致残。（《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2008 年第 2 版》，788 页。）

这部可以认为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史的书把校文革编造《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给江青的时间提前到 1968 年 5 月底，关押邓朴方和邓楠的时间是三个多月，因为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逼坠楼致残。

2008 年，邓朴方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华社北京 2008 年 3 月 13 日公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邓朴方简历：

邓朴方，男，汉族，1944 年 4 月生，四川广安人，1965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 年 9 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1962～1968 年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习，1968 年 5 月受迫害致残。

这份简历把邓朴方致残的时间定为 1968 年 5 月，原因只有三个字“受迫害”。

以上都是官方公布的文件资料。

以下我们来看看聂元梓是怎么说的。

聂元梓在 2005 年在香港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1968 年 5 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我的“罪过”又增加了一条。这其中，有误会，有讹传。如上所述，我曾经在一些学生、教师给邓小平贴大字报上签名犯了错误。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

邓朴方在北大，是学生们把他关起来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北大干部子弟成堆，关于他们的事特别难处理，我就是希望他们都走开，都从北大校园里走掉才好呢，省的出麻烦，根本不会下指示把邓朴方关押起来。

毛毛说邓朴方是 8 月末的一天摔伤的，不对。若是这样，那就是工、军宣队进校后的事了，与我无关。工、军宣队是 8 月 19 日进校。这是校文革已交权，我开始被批判。邓朴方摔伤大约是工、军宣队进校前一个星期左右发生的。那一天，两个自称是邓朴方他们班的女学生老找我，说是邓朴方摔坏了。他们把邓朴方抓起来，想让他揭发邓小平，没有想到邓朴方从楼上逃跑，摔伤了。我问摔得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只是说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我就说，赶快找他妹妹邓楠来照顾。当时。我还不知道邓楠也被班里的同学关起来了。让她去看护，让医院好好给他治疗。这两个女学生，我当时不认识，我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公正地说出历史的真相。（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485～486 页。）

聂元梓在这段话里说了两个时间，先说：“1968 年 5 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后面又说：“邓朴方摔伤大约是工、军宣队进校前一个星期左右发生的。”而工、军宣队是 8 月 19 日进校的，也就是 8 月 12 日前后发生的，而且她还把当时两个个女生找她，她和她们说了哪些话都记得很清楚，根据这些细节，后面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可信的。

至于聂元梓说她没有迫害邓朴方的动机，则是不符合事实的。聂元梓在文革中对邓小平同志一直十分仇视，早在 1966 年 11 月 8 日，她就领衔贴出了攻击邓小平同志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上署名的都是干部教师，没有一个学生，且大量印刷，发往全国，影响十分恶劣。《北京大学纪事》中记载：1966 年 11 月 8 日，本月初，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开始商量起草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今日，由孙蓬一修改、定稿，聂元梓、孙蓬一等 11 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767页）。1967年1月20日，在聂元梓和校文革控制的校刊《新北大》上第四版，刊登了“看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的文章；1967年2月2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了“刘少奇、邓小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和“邓小平从黑窝里挖出来示众”的文章；1967年4月18日《新北大》第六版刊登了“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的文章。聂元梓等人对邓朴方的迫害从1967年初就开始了，1967年2月7日《新北大》第一版“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一文中，就点了邓朴方的名。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第二版公布“砸烂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的第二号公告”中把邓朴方的同班同学张景元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该报同期刊登“打倒井冈山中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反革命分子”张景元的文章中说：“该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与邓小平的狗崽子邓朴方结成死党，顽固地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疯狂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鼓动老保翻天，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容忍的是，他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可见，聂元梓等人是企图通过打倒张景元，把张景元和邓朴方联系起来，进一步和邓小平联系起来，向江青请功，同时又借此摧垮反对她们的“北大井冈山兵团”。

到了2009～2010年，聂元梓的说法又变了，在韩三洲的《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90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一文中聂元梓辩解说：

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并无关联，我能不翻案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注意，时间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队进校十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也已经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可笑的是，对我的判决书认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

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这里，硬把邓朴方跳楼一案的发生时间，几近提前了五个月，这真是罔顾事实的违心之论啊。（韩三洲，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90 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中国选举与治理 2011-02-08）

聂元梓又把邓朴方受害的时间推到了工、军宣队进后校的 8 月末，把责任推到了宣传队的头上，说成和自己无关了。这与她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是为了给自己开脱责任。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工人、解放宣传队是在 8 月 19 日进入北大的，8 月 20 日晚 8 点至凌晨零点 30 分，宣传队负责人召开两派代表谈判会，打成了第一号协议（一）上交武器，拆除武斗工事；（二）对宣传队不应耍两面三刀；（三）宣传队接管全校广播台；（四）解决释放被抓人员问题；（五）互相停止攻击。8 月 22 日，在宣传队领导下，北大两派达成《关于释放被抓人员协议》，协议规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特、反”、“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仍由双方看管，“涉及重大案件者”由宣传队审查处理。8 月 23 日，“新北大公社”将 23 名被抓人员移交“井冈山兵团”。（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第 791 页）但这些人员中并没有邓朴方。

为了进一步搞清这一事件的真相，笔者和一些北大校友做了一些调查。

经原北大地球物理系王桂琴老师的介绍，原地球物理系教师、文革后调到南京大学的彭秋和教授（在北大文革中被校、系文革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抓捕关押，打成重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和中级法院判决书中提到他的名字）和笔者取得了联系，在他发来的文章中写到：

“聂元梓趁着迫害“《东方红》反革命集团”的机会抓捕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当时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生），对他残酷迫害（他也同样被布蒙着眼睛的情形下，被铁棍子毒打），并于 1968 年 8 月 16 日下午 1:00～2:00 间被迫跳楼。邓朴方跳楼前一周都一直是同我关在一个小房间内（整日被布蒙着眼睛）。”（彭秋和：不堪回首忆当年——我的文革遭遇）

笔者在信里问彭老师：“这个时间您记得准确吗？”他回答说：“我当时是强迫自己记下这个日子和时间的”。彭老师是个天文学家，对时间和数字的记忆力很强，这个记忆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笔者近日通过微信采访了当年被聂元梓和校文革绑架、关押，并动用残酷的刑具进行迫害致残的生物系 63 级樊立勤，他受伤后曾经和邓朴方在同一个医院（积水潭医院）治疗，时间是在 1969 年 5～6 月份，病房在对面，他可以进入朴方的病房谈话。

樊立勤说：朴方受伤是在 7 月 28 日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之后，这个时间一定是七月底八月初之间,就只是这个范围之内(2017 年 11 月 8 日微信谈话)。

樊立勤对北京市检察院起诉书和中级法院判决书中聂元梓制造的“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中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提出异议，说自己才是被聂元梓迫害的首要人物。

数力系 65 级郑斯宁校友介绍说，2017 年 10 月下旬在他们大连北大校友的一个微信群，有校友回忆与残联领导邓朴方一起到美国参加国际会议的经过，也有校友谈及当年护理邓朴方的往事。有 64 级校友回忆：“邓朴方跳楼后在北医三院住院，我护理过他三天。他也后悔跳楼。”关于护理安排，说：“新北大公社让各系轮流去护理。”关于护理时间：“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就是他跳楼后，工宣队进校前。”他还回忆“当时他（邓朴方）说旁边如果有人拉我一把，我就不会跳楼了。”郑斯宁认为这段回忆可信，即事件时发生在工宣队进校之前。

此外据邓朴方同班的北大技术物理系 62 级部分同学（两派都有）共同回忆：邓朴方是在 7 月 28 日坠楼受伤的，有的同学 7 月 29 日去医院看望了邓朴方。

综合分析以上官方文件、《聂元梓回忆录》、《新北大》校刊、彭秋和老师、樊立勤和一些校友的回忆等，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邓朴方是在 1968 年 4～5 月份被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及其下属组织“新北大公社”派人绑架抓到北大关押的，受到审讯和严刑逼供，被逼交代他们需要的所谓材料，以便把邓小平和北大运动联系起来，为江青等人打倒邓小平提供依据，同时也把井冈山与邓小平联系起来，以便彻底摧垮井冈山；

二、邓朴方受伤致残的时间是在发生在宣传队进校之前的 1968 年 7 月底至 8 月 19 日之间，当时北大掌权者是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

三、造成邓朴方受伤致残的责任者是聂元梓、校文革和抓捕、审讯、殴

打他的《新北大公社》的某些成员。

本文对邓朴方受伤致残事件做了一些初步考证，这一事件的细节还有待当事者和知情人进一步披露，为文革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

浅谈北大武斗所用器具给学校造成的财产损失
——《北京大学纪事》正误与补充

樊能廷

【原标题为《长矛、弹弓、天桥、地道》(刊发于2016年11月30日《记忆》第175期，2016年12月20日华夏文摘增刊第1060期转载。)】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以下简称《纪事》) 是文革后，北大官方动用大力气、大资源，由荣休的校党委书记王学珍、副书记王效挺领衔，花了十年工夫，编纂的北大一百年“官方修史”，很精心、很讲究。笔者节选1966年6月～1968年9月这部分，4万2千7百字，书上几乎一个错误标点都没有。仅见“宫香政”错为“宫政香”，是唯一的文字错误。另外，把昔时的32路汽车记为现在的332路；把宿舍多少号“斋”记为现在的多少号“楼”，则是口语中随着时间推移的递变，不算舛误。

笔者从《纪事》100年的篇章中，节选1966年6月～1968年9月这部分（文革主要阶段）资料，它道出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供研究者使用。对于自己工作的文字要求是，“不增一字，不减一字，不易一字，不错一字”，可能已经做到了。笔者不把指误、阐发，作为节选秉文的任务。比如，该书讲聂元梓去上海“串连、造反”前的事情，真实情况是王力派王广宇从阮铭家把聂元梓接到花园路中央文革记者站住宿。但是《纪事》成书的时候，这些史料还没披露出来，《纪事》记述有误，可以谅解。【笔者注：王广宇《也谈聂元梓“被中央文革软禁”和去上海串联》载于2018年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上册》，第304～314页。】

如今，笔者读到该书1980年3月19日的记述，引起不少回忆和思考：

“按照1月30日市委纪委筹备组的要求，我校整理了一份《关于聂元梓、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房屋建筑的罪行》材料上报。其中说，1967年3月开始，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使学校房屋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以28楼“井冈山”总部为中心的周围17、19、20、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楼房破坏十分严重。17、20、34、37、40楼的楼顶瓦面全部被打碎。17、20、28、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的门窗玻璃、门窗扇全被打碎。28、30、35、36、37五栋楼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

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这些楼内家具设备（其中 28 楼是留学生用的家具设备）都被砸毁。聂元梓、孙蓬一为了大规模的武斗还损坏了在“五四”运动场的 20 万红机砖，并且挖了地道（从 37 楼-36 楼-35 楼-30 楼全部从地下 2 米深处挖成宽 1 米，高 1.7 米的地道），使楼房建筑基础受到损害。为了搭天桥，把 35、36 楼的屋架风撑也给拆除了。他们还从建筑材料中用了 4 吨 1／2 英寸镀锌管做了长矛。1966 年我校有双层木床 5300 张，到 1970 年只剩下 2300 张，损失 3000 张。估计损坏四屉桌 600 张，留学生用大衣柜 200 个，椅子 270 把，书架 250 个，大二屉桌 240 个。还损失毛巾 500 条，棉衣 600 件。”【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 年 4 月第二版，969 页。注：1967 年 3 月有误，应为 1968 年 3 月。】

这一段文字，对于北大武斗的房产部门物质损失，做了数量的统计，本文拟对此相关情况进行一些补充与纠正。

一、长矛、铁棒

长矛是锐器，铁管制成，锋刃是“麻花钢”（建材“螺纹钢”）磨削、焊接在杆上。矛杆约 1 米 6，锋刃约 0.3 米。校文革掌权两年多，有金属材料库，有工厂、有工人，这两种材料他们都有，制造了大批的长矛。1968 年 3 月 39 日凌晨 1 点，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突袭两派混住的 31 斋学生宿舍，公社武斗队所持的“兵器”就是长矛。《纪事》所述“镀锌”二字不确。3•29 现场看到的和缴获的长矛，是管壁涂有桔红色防锈漆的铁管制成的。工宣队进校后，新北大公社上缴武器，930 支长矛，涂有桔红色防锈漆，还上缴 200 根铁棒。《纪事》所述“1／2 英寸”完全正确，这种管径（因为 1 英寸是 8 分），口语中称为“四分管”。居民家用水管、暖气管多为“四分管”或“六分管”。“四分管”内径 15 毫米、外径 21.3 毫米，重量 1.25 公斤／米。4 吨“四分管”总长度 3200 米，不计算锯缝和“料头子”的损失，可以制造 2000 支长矛。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和“监管人员”，既用长矛，也用铁棒，那么，耗用的钢管，数量大体上与《纪事》所记述，能碰得上。以上说的是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方面的长矛。

新北大公社拥有大批长矛、铁棒，不是用来锻炼身体的，而是用作弹压、残害“阶级敌人”的：“老佛爷”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可以扩

大到任何不同意见者的头上——长矛、铁棒，一方面用来对付“井冈山兵团”；另一方面也用来对付“黑帮”、“牛鬼蛇神”等“专政对象”。郝斌《河水何曾洗是非》124 页原文：“读过语录以后，监管学生或给我们派活儿，或宣布事项，有时候也会喊出某人给一顿拳脚。晚点名，才是我们人人都提心吊胆的一场，长达四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每次都要喊几个人站出队列，轻则训斥辱骂，什么叫师道，什么叫人格，那就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重则是拳脚之外另加棍棒。有一阵子，武斗用的长矛也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一个个低头弯腰，但见长矛在眼前晃动，不敢抬头去看拿着这种‘傢伙’的人。我们已经是毫无抵抗力的一群，有几条木棒足以震慑，还犯得着用这种东西来对付我们吗？倒是另一种短兵器，让我们更怕：那是一米左右的自来水管，一头磨尖，可作为利器；另一头套有胶套，便于手握，也可作为钝器。商鸿逵先生有一次‘语录’背得不利索，越背越乱，又分辩了两句，就被这个‘傢伙’当头一下。当时我和商先生各站队伍的一端，隔有七、八米远，‘噹’的一声，能听出那是铁管敲在脑壳上发出来的声响。”【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1 月，124 页。】《河水何曾洗是非》128 页原文：“这个时候正值酷暑，劳动量大增，新‘规矩’不断。我们被告知，熄灯之后、起床之前，监管人员要巡逻查夜。凡起夜上厕所的，见到监管巡逻者，要先行立定，再喊：‘报告——我是反革命分子×××，要去厕所。’得到准许，才能移步前行。否则——监管学生把手里的长矛高高举起——‘老子的这个家伙是不吃素的！’”【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1 月，128 页。】

后人须知，“老佛爷”是北大拥聂反聂两派对于聂元梓的共同称呼，“红太阳”在公开场合，口头上也“亦庄亦谐”，称呼聂元梓为“老佛爷”。

据笔者所知，“井冈山兵团”方面，在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 1 点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偷袭 31 斋学生宿舍的时候，一支长矛也没有；赤手空拳、无法自卫，上百人被刺伤、打伤、跳楼摔伤。31 斋逃亡的学生和其他宿舍楼被驱赶的学生，进入 32 斋和 37 斋，有样学样，开始制作长矛。材料从哪儿来？就是停止供暖的暖气管——用手工钢锯截断暖气管，也焊上锋刃，制成长矛。《纪事》记述“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就是指的这个。

1968 年 3 月 29 日之前，“井冈山兵团”没有独占的楼宇，28 斋是空闲的越南留学生宿舍楼，“井冈山兵团总部”占用 4 间屋子、广播台占用 4 间屋子，整幢楼是不分派别、混合居住的。3 月 29 日中午，“井冈山兵团”海燕战斗队的青年工人，清理住户，把不相干的人“礼送”出楼。于是，“井冈山兵团”独占了一座楼。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一台电焊机，安放在 28 斋楼内，开始焊接、制作长矛，“焊工小作坊”一时供不应求。制造出第一支长矛的时候，大家高兴莫名，好像生命安全有了保障了。

关于 3·29 事件，俞小平说：“对着我们冲锋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从武器、装备、组织到后勤，都占了巨大的优势，一个强势的当权派向一个弱势的在野派发动突然袭击的优势。其后几天，一个老井给我看了他们从公社派那里缴获的一支长矛。那长矛外面是橙红色涂层，显然是用无缝钢管原材料截取的，长约 1.6 米，直径约 2 厘米多，顶端焊有一段约 25 厘米长 1 厘米多粗的钢筋，钢筋顶端用砂轮磨得尖锐锋利无比，闪烁着冷酷无情的钢铁光泽。”…“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当权派，有权、有钱、有物资、有住房、有食堂，卡住部分教职员工的工资、学生的助学金不发，给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成建制地发放棉军衣、柳条帽、长矛，后来更以昂贵的金属板材成批切取护胸甲，冷兵器时代的武器他们都有了。井冈山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无奈之下，只能锯下楼内的暖气管做长矛，模仿新北大公社，也在暖气管上焊上钢尖，头戴规格不一、各处收集来的柳条帽，身披材料不同的护胸甲，披挂上阵，面对不时冲击而来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俞小平《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载于 2018 年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上册》，第 276～296 页。】

却说长矛的嬗变，源自实战。武术行里讲究“一寸长、一分强，一寸短、一分险”。临阵长矛对刺，还真是谁手中的兵器长，谁感觉安全、放心落胆。“井冈山兵团”本来就没有“制式”长矛的供应，自由散漫，各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制作长矛，上阵的时候七长八短，被笑作“丐帮”。笔者见过的长矛，有不足 2 米长的，有 2 米半长的；还有干脆使用（玻璃钢）撑杆跳器械或使用长竹竿的。

近日看到原新北大公社成员王复兴在海外出版的《抢救记忆》记述，“3

月 20 日左右的一天傍晚，晚饭后我从大饭厅往南校门由北向南的路上散步，突然听到身后有紧凑的脚步声，回头一望，有两个手拿长矛、戴柳条帽的人在后面 10 米远正加紧脚步追我，似乎认识我。我感到不妙，撒腿就跑。两人立马紧跑追我，我突然感到后背如针刺一般被刺了一下，赶紧左拐跑进 27 楼，那两个人这才停止追逐。我跑到黄虹坚宿舍，述说了刚刚发生的惊险一幕，在她那儿躲了半个小时。而后跑回 38 楼宿舍，王渊涛、陈双基正好在，我脱下外套、秋衣，让他们看我后背怎么了。他们告诉我，在我后背脊椎（后胸）的正中部位，有个小红点，皮肤被刺破了一点点。”【王复兴：《抢救记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6 年 9 月，144 页。】

1968 年 3 月 20 号，校文革成立了武斗指挥部，新北大公社有“第二期学习班”编练的专业武斗队（钢一连最著名）、有长矛和柳条帽。彼时，“井冈山兵团”一支长矛也没有，一顶柳条帽也没有——不言自明，新北大公社“鸽派”王复兴受到“有个小红点”惊吓，如果不是编造的虚妄故事，那，绝非手无寸铁的“井冈山”学生所为。联想到 3·29 事件，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发动武斗，突袭夜阑人静的 31 斋，他们的第一个伤员，竟然是被“自己人”铁棒打破脑袋、长矛刺伤后背的化学系 62 级（赤手空拳）学生田建行！说起来，够讽刺的。

“老佛爷”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发动武斗，实在是饮鸩止渴、作法自毙。

二、弹弓、砮石

北大“武装割据”时期，“井冈山兵团”占据学生宿舍毗邻的 28、30、32、35、36、37 六座楼，被新北大公社占据的楼群团团围困。处于包围圈的内线，这六座楼房屋建筑的门窗、屋瓦、墙面以及遮挡门窗的家具损坏，都是外线包围者、公社武斗队大弹弓轰击的。

《纪事》说“11 栋的门窗玻璃、门窗扇全被打碎”不确，以偏为“全”了。实际情况是，这 11 座楼的相互“迎敌面”的绝大部分门窗被打碎。《纪事》说“28、30、35、36、37 五栋楼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不确。少数的暖气片组被拆除，搬运到高处，当作守楼的“礌石”，在 4·26 实战中应用过。那一天，新北大公社武装齐备的武斗队，把 36 斋围困得水泄不通，在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校文革武斗总指挥高云鹏两位哲学系“师尊”

亲临现场指挥下，发起仰攻夺楼。守楼的井冈山学生，曾经从高处推下三两组暖气片，没有伤着人。每一组暖气片“礌石”落地，声响和卷起的烟尘之震撼，吓得成群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四散而逃。孙蓬一、高云鹏不得不鸣金退兵。插图为暖气片作“礌石”。

暖气片作“礌石”

双方都有大弹弓。占据楼宇多的一方，射击口多，自然而然，弹弓就多。大弹弓的皮筋，是自行车内胎，或者是乳胶管（各四股、共为八股），一个壮汉气力不足以开满弓。皮兜是排球壳子剪开、制成。消耗品弹丸，是卵石或者破碎的红砖。

红砖双方都有，而卵石是新北大公社独家秘器。井冈山兵团被团团围困在六座楼里面，人员进出不得，没有卵石的来源。“校文革”有车队，公然一卡车、一卡车地从郊区河滩往学校运卵石。卡车司机如今还健在，不难问到当初装运卵石的情况。

还有损招——全校几百名“黑帮”、“牛鬼蛇神”都在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管制、残害之下——可以强迫“黑帮”、“牛鬼蛇神”为他们装运卵石，或者直接强迫“黑帮”、“牛鬼蛇神”往学校肩背力扛卵石。郝斌《河水何曾洗是非》126 页原文：“‘牛棚’里的监管人员可以随意处置任何一个人，这是一种常规；可某个监管学生常常格外眷顾某个‘黑帮’，又成另一种‘常规’。这个聂玉海，可以说是周一良的对头冤家——‘单向的’对头冤家。一九六八年夏天，关在太平庄的‘牛鬼蛇神’一个一个被拉回北大，单独批斗，监管学生把这叫做‘单兵教练’。周一良先生是早早被拉回去的一个。押解他的，就是这个聂某人。出了太平庄，就是那段河滩路。聂玉海捡起鹅卵石，装进周先生的背包，一块又一块，直到装满，让周先生背到北大。当时校内分成两派，武斗正酣，这些石头放到用自行车内胎做成的强力弹弓上，正好做子弹。从太平庄到北大，走路、坐车近三个小时，步行的路程大约十公里。五十五岁的周先生背着这包石头不堪其苦，聂玉海则以此为乐。”【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大

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1 月，126 页。】

大弹弓的威力，煞是了得：笔者知道“井冈山兵团”这边被弹弓打掉牙齿的、打开头颅的、打瞎眼睛、打断胳膊腿的，不下 10 人。技术物理系 63 级学生陶令煌，前额打破，缝十了针，一辈子留下大疤，像是三只眼。化学系 62 级学生张曼平，几乎打掉半数牙齿，才二十多岁，不得不装上满口假牙。透窗射入 28 斋的卵石，在水泥地板上弹起，打断了青年工人小李的胫骨（北京土话叫“迎面骨”），在北医三院住了四十天以后才伤愈，平复如故。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武斗终非长久之计。1968 年 8 月 19 日，工军宣队进校，双方上缴武斗工具，“井冈山兵团”上缴了 8 副大弹弓（即使想藏也无处可藏）。而新北大公社在武斗四个月期间，动用 20 万红砖加上若干卡车的卵石，用大弹弓射击过数十吨弹丸、砮石，“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打烂井冈山楼房屋建筑那么多门窗、屋顶、墙面、双层床的“砦栅”及至家具，最后，象征性的一副弹弓也没上缴。

三、地道、天桥

前面说到，“井冈山兵团”六座楼偏居一隅，被新北大公社团团围住。“割据时期”开初，“井冈山兵团”楼和楼之间通道，用学生宿舍的上下双层木板床，在地面上竖立起来，用粗铁丝绞连，作为防御弹弓轰击的“砦栅”。但还是不安全，又向通道上面加设顶子——当然，也是木板床。不想，没几天，对方的大弹弓就把“砦栅”轰炸得千疮百孔、七零八落，甚至床腿都打断！前面提到的陶令煌，就是在通道“砦栅”里被砮石击中前额，成为三只眼的“二郎神”。抵御大弹弓的狂轰滥炸，“砦栅”也不够安全。

路还是要走呀，怎么办？就有“现代愚公”想出挖地道的主意。看电影“地道战”或参观“焦庄户地道”可能觉得挺有趣、神得很。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地道在地面以下，它是固定的，不能移动，完全是防御型设施，权宜之计。聂元梓、孙蓬一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研制的土坦克车，才是进攻型的。【笔者注：见本书 55 页《聂元梓讲用》。】

《北京大学纪事》说聂元梓、孙蓬一挖了地道，不对。太平天国“天京”被围，“长毛”城防坚固，曾国荃挖地道，地道作业加上巨量炸药，轰塌城墙，攻进“天京”，纵兵烧杀奸淫大掠。1968 年 3·29 事件，新北大公社夜袭攻

占 31 斋，古今一体，也是纵兵大掠。31 斋是男生宿舍楼，算是聂孙心目中的战略要冲，必欲夺之而后快。井冈山男生都逃命去了，攻占 31 斋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勇士们尽情劫掠，不负此夜力战之劳。

聂元梓、孙蓬一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尽占武力优势，士气旺盛，大力实施“武统燕园天下”，聂孙怎么会挖地道呢？本为权宜之计的地道，是“井冈山”挖的，《纪事》记述为聂元梓、孙蓬一挖地道，张冠李戴了。

马灯

“井冈山兵团”挖地道，纯属迫不得已——地面通道“砦栅”不能保障行人安全，只好转入地下。何况，挖地道是一桩苦活儿，笔者略有体会。挖地道是轮班作业，地下的原始黄土层，细细的，不含砂砾，潮而不粘，刨挖并不很费劲。每个人干不了很大工夫，因为没有换气通风，地下十分憋闷湿热。刚开始施工，曾经带着马灯（一种煤油灯）下去照明，一个是它不够亮，另一个是地道长了以后，马灯就不爱着了。改为临时拉线电灯。37～36 斋地道将近挖通的时候，笔者当班掘进。技术物理系 62 级女生傅华下来“视察”，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就是缺空气的缘故。她走不大工夫，笔者清楚地听见对面刨土的声音，心想，再坚持一会儿，多挖几铁锨…。忽然，通了，碗口大一个洞，迎面的凉风呼呼地冲过来，痛快透了——可以大口地呼吸清凉的空气了。这是第一条地道挖通的情形。

《北京大学纪事》说的几条地道，都是“井冈山兵团”割据区的楼与楼之间交通孔道。《北京大学纪事》说的地道尺寸规制符合实际。记得我们化学系 62 级同学耿天彭有诗句“地道行军戈相拨”，就是说地道里两个人对面行走，要“相拨”一下。见到有网络文字说，“井冈山兵团”地道里边没有照明设施，靠蜡烛照亮儿，非也。有临时拉线照明，是最简陋的白炽灯泡，地道里，摸黑是走不了路的。临时拉电线，则可能来自《北京大学纪事》所说的“灯光设备均被拆除”。《北京大学纪事》的“均”字用得不当，“均”被拆除，莫非这几座楼里的“井冈山”学生一直摸黑过了 120 个暗夜？实际上，每当校文革不时地给“井冈山”停电，这几座楼里的人，不得不“烛光晚会”。不停电的时候，还是有电灯照明、电炉“炊事”的。

地道的最后命运，是自行坍塌。挖地道的时候，没有加设坑木支撑，只

是用铁锹把地道顶部剷成半圆形的拱券。地下土壤本来就有潮气，工宣队进校，季节入秋，阑风伏雨，雨水频仍，首先是 32 斋至 35 斋之间的地道，自行塌方，地面凹陷 1 米多。好在地下除了照明线和灯泡，别的什么也没有，塌方没有造成任何人身事故。

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困境的“井冈山兵团”，在 28 斋和 30 斋之间，架设了“过楼天桥”，在当年，大概算得上北京的“首创”。笔者推想，28 斋和 30 斋之间的沥青路面走汽车、承重，不敢挖地道从地下穿过沥青路，怕塌陷，故而架设天桥代替地道。

28 斋和 31 斋外形一样，两座楼好像是一张图纸下来的，都是南北 70 余米的主体，两端各加 30 余米的短横。天桥是从 28 斋的工字型楼南短横的西端面，接到东西走向、一字型 30 斋的东端面，悬空担在两楼 4 层的水泥地面上。至于天桥的建设，笔者住在 37 斋，竟然一无所知，而且从来没有走过一次天桥。后来笔者步测，28 斋南横楼西墙，到 30 斋东墙，22 步。就是说，天桥空中跨度 15 米有零，离开地面的高度将近 10 米。天桥建成，笔者以小诗记之：

阅墙怎忍刀兵见，何故空中徒杠桥。
逼我途穷临绝境，胸膺尚有路条条。

俞小平说：“我曾在天桥上多次穿行于 28 楼和 30 楼。有人很狡猾地（在天桥护栏上）贴了伟大领袖像，新北大公社不敢用弹弓打天桥上的行人，害怕犯下攻击毛主席像的“罪行”。【俞小平：《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丛璋等人主编《燕园风云录·四》，第 86 页，2016 年 8 月。】

近年，笔者见到同学发表这张图片和建造天桥的详明经过，不由感叹。架设天桥用的木料，的的确确是来自《北京大学纪事》所说房屋建筑“35、36 楼的屋架风撑”。

四、棉衣、毛巾

《北京大学纪事》说“损失毛巾 500 条，棉衣 600 件。”

这个账简单明了，直接算在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头上就是。3·29 事件中，笔者和众多“井冈山”学生目睹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着装——黄色军棉袄、左臂扎白毛巾。120 昼夜的武斗期间（3 月 29 日到 7 月 28 日），新北大

公社武斗队的“制式”黄色军棉袄没变。1968 年底，“清理阶级队伍”紧锣密鼓进行，笔者被“隔离审查”，被押解、拎着马扎，到学三食堂，“参加”过一次化学系批斗“反革命分子”齐菊生的全系大会。阵阵轰雷般的口号声中，凶残地扭齐菊生胳膊、揪齐菊生头发、踢他膝弯迫其下跪、跳起来打他脑袋的同班同学蒋其宝、倪永康，还穿着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制式”黄色军棉袄。

1968 年还是“票证供应”年代，北京居民每人每年发给十六尺（或十七尺）布票，搭上棉花票，可以购买或者制作一件棉衣。新北大公社成员参加武斗队，马上得到“里外三新”的黄色军棉袄，不无小补，至于是不是被旁人讥讽为“黄马褂”，那就顾不得了。

本文引用的《北京大学纪事》中这段文字，只记述了北大武斗中房产部门的物质损失。更大的损失还有无辜受难者——殷文杰、温家驹、刘玮的生命，还有数百名受伤者，以及留存两派群众心灵的创伤。时间过了半个世纪，这些创伤还没有抚平。武斗的发动者对这些事实，仍在“揹着牛头不认赃”，甚至制造种种歪理谎言，遮瞒真相，企图把武斗责任推到他人头上，原因何在？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和反思。

北大文革中的抓捕行为

舒声

文革期间，法制被抛到一边，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各个单位的临时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革委会，甚至一些造反派组织，都可以随意抓人捕人，或送进监狱，或私设公堂，关押拷问，大搞逼供信，甚至将被抓捕的人员逼死、致残……。

北京大学在这方面就十分典型。现将笔者所知情况略述如下：

北大文革中抓捕行为，主要发生在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掌权时期。

北大校文革及其下属的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实施的抓捕行为，从时间上来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66 年 12 月到 1968 年 3 月 27 日，即武斗发生前；第二阶段，从 1968 年 3 月 27 日到 1968 年 7 月 28 日，即武斗期间。从抓捕方式上，也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抓人后送入监狱关押，第二种是私设监狱，自己关押，进行殴打和刑讯逼供。第一种方式主要发生在第一阶段，第二种方式主要发生在第二阶段。

一、第一阶段的抓捕行为

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成立后紧跟中央文革，提出了“上揪下扫”的口号，上揪“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下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基础，排斥打击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孔繁、杨克明等）和群众，11 月份，聂元梓亲自带着一批人马跑到上海去煽风点火，揪斗常溪萍（北大社教时期工作队副队长）。到了 12 月份，北大部分群众成立了“井冈山”、“红联军”、“虎山行”等组织，给校文革、中央文革贴出了大字报，反对中央文革和聂元梓的极左做法，1967 年校内出现了更多群众组织，并于 8 月 17 日联合组成了反对派组织“井冈山兵团”。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从 66 年 12 月份开始下狠手，先后抓捕了以下人员：

1、杨勋、杨炳章

杨勋是北大经济系教师，山东人，烈士子女，在社教时也是“左派”，校文革成立后对聂元梓有意见，贴过多次大字报，据她回忆：12 月 20 日，在大饭厅批斗《虎山行》（成员为北大数力系和医科大学预备班 6 个学生，曾贴出质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时，收到了一张要为《虎山行》辩护的纸条，是她

的弟弟杨炳章写的，于是当场把杨炳章当成反对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当晚关在学生宿舍，第二天送到了北京第一监狱。12 月 22 日，杨勋刚从外地串联回来，住在人民大学红三楼的宿舍里，次日凌晨三四点钟，被聂元梓、王茂湘（经济系教师、校文革常委）指派的红旗兵团宋文（经济系 5 年级学生）带领的一帮学生抓走，汽车在城里转来转去，最后送到右安门内的半步桥监狱——北京市第一监狱。1967 年秋天，她又被转移到北京第二监狱——功德林，1968 年 11 月，被送到北苑原“北京市青少年罪犯管教所”参加学习班，直到 1969 年 1 月 31 日，才被糊里糊涂地释放回到北大。(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一版)

杨炳章 1963 年考入军事外语学院，1964 年退学在北大旁听。他回忆说自己 1966 年 12 月被捕后，关进了半步桥的第一监狱，一个人住单间，隔壁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斜对门是陆定一的儿子陆德。1968 年底，审讯员让他给江青写了一封道歉信，内容是“江青阿姨，我错了，说过很多不尊重你的话，在这里向你赔礼道歉了”，之后被释放，回到山东寿光老家当中学教师。他比姐姐早出狱两个月。(杨炳章：我在北大的文革经历，《燕园沉思录》上册，时代文献出版社，216～221)。

2、老“井红”和“虎山行”的魏秀芬、杨作森

所谓老“井红”，是指 1966 年底成立的“北大井冈山红卫兵”（也称清华大学井冈山北大支队）和“红色造反联军”，“虎山行”则是一个 6 人组成的战斗队。魏秀芬是地球物理系学生，女，老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之一，曾因“沾污了领袖像”和参与了砸《新北大》校刊行动，于 1967 年 1 月 24 日被捕，6 月 3 日释放。杨作森，数力系 65 级学生，是“红联军”的常委，“虎山行”成员，写过质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散布过怀疑林彪的言论，参与了砸《新北大》校刊行动，被逮捕后释放，实行“群众专政”，多次被批斗，身体受到王刚等打手严重残害，毕业后不久去世。

3、乔兼武

东语系 64 级学生乔兼武，1966 年 8 月曾贴出大字报《造三个大反》，建议停止党团组织和行政机关的活动，成立“革命委员会”，受到批判；12 月份他又贴出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对林彪的“顶峰轮”提出怀疑，

并支持老井红，被校文革送交专政机关。

4、何维凌、胡定国

何维凌、胡定国都是技术物理系 62 级学生，1967 年 10 月赴上海，组织“三人小组”，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和张春桥，10 月 17 日回京，与王彦等组织《共产青年学会》(吸收了一些北大、清华学生参加)，10 月 24 日在大饭厅东墙贴出《共产青年学会宣言》，对林彪的“顶峰论”提出质疑，11 月 9 日被逮捕，曾在功德林监狱关押。何维凌 1978 年后参加编写《走向未来》丛书和经济体制改革活动，1991 年在墨西哥车祸身亡，有遗作《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香港大风出版社)。

5、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

戈华是山东人，1957～1963 年任河北大学党委书记，1963 年调入北大，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1966 年 6 月工作组进校后成为工作组领导小组组员。聂元梓的校文革成立后，没有表态支持聂元梓，有时和原北大的干部们一起碰头，对聂元梓的做法表示不满。1967 年 9 月初，聂元梓属下的新北大公社抄了戈华的家，戈华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迫害，在昌平沙河亲戚家住了 1 个月零两天。10 月 5 日，公社总部发出揪斗戈华的声明，10 月 7 日，校文革控制的《新北大》校刊发表社论《打倒戈华》和新北大公社七一战斗队等 11 个单位的文章《彻底清算三反分子戈华的反革命罪行——三反分子戈华的罪恶事实之一》。戈华于 10 月 8 日前往山西，后又回到山东邹平县明集区郭吕村老家。新北大公社于 10 月 11 日展开了抓捕戈华的行动，10 月 19 日，赶到昌平沙河进行调查，在校文革保卫组（二组）的协助下，分兵几路，控制了戈华可能藏身的几个点，10 月 20 日派人赶往山东邹平县追捕戈华。戈华又连夜逃往北京昌平南口。12 月 3 日，新北大公终于在南口将戈华抓捕。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费尽心机，花费如此大的力量抓捕戈华，是为了把戈华打成井冈山兵团的黑高参，从而搞垮井冈山兵团。

6、其他人员

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还抓捕了以下教师和学生，送交专政机关关押或送回原籍劳改。

谢世扬，经济系学生，“红旗飘”成员，被抓罪名是组织以推翻无产阶级

司令部为宗旨的反革命集团，书写反动文章。

胡根礽，历史系学生，“红旗飘”成员，被抓罪名是攻击毛主席，吹捧赫鲁晓夫，校文革保卫组整理了他的材料，1967 年 10 月 1 日被捕。

王海，西语系学生，被抓罪名是散布反革命谣言，污蔑中央首长，1967 年 11 月 4 日被捕。

王培英，俄语系 63 级学生，被抓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侮辱领袖像，被捕后释放交群众专政。

苏士文，原地球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新北大公社说他是与美、日、苏修大特务王光美有密切关系的被中央点名逮捕的大特务。

余水荣，数学力学系 65 级学生，老井红成员，被抓罪名是写反动日记，攻击谩骂伟大领袖、林彪和中央文革，吹捧刘少奇。

臧希文，化学系员工，被抓罪名是“出身汉奸、大地主家庭，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攻击伟大领袖，反动透顶”。

王晓秋，历史系教员，被抓罪名是 1967 年以纪念“一二·九运动”为名，张贴反革命大字报，在伟大领袖名字上涂抹，逃跑后被抓捕。

赵长占，技术物理系 64 级学生，被抓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江青，给同学写了三封反革命信件，被拘留 50 天后释放，由群众专政。

刘立炎，原西语系学生，休学在家，文革期间回学校要求复学，被抓罪名是十二月黑风中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女友写反动信件，被检举后捉拿归案，押送原籍劳动改造。

（以上名单和资料来自 1968 年 5 月 23 日《新北大》第四版）

二、第二阶段的抓捕行为

进入 1968 年，北大两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校文革为了把反对力量镇压下去，摧垮井冈山兵团，采取了规模更大的抓捕行动，这一时期的抓捕行为，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抓捕，主要针对井冈山的骨干分子，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第二种是肆意性的，见到井冈山兵团的人就抓，抓进去残酷地审讯、殴打，甚至致死。

（一）有计划进行的抓捕

1.樊立勤

樊立勤是生物系 63 级学生，1966 年 12 月开始反对聂元梓，把康生视为聂元梓的后台，是反聂最坚决的人物之一。1967 年 5 月 17 日他发起成立了“新北大东方红公社”，后参加了井冈山兵团，聂元梓对他恨之入骨。1968 年 3 月 27 日上午 10 点左右，聂元梓校文革派人在校园里突然强行绑架了樊立勤，把他关进私设的“黑牢”（44 楼内），受到两天两夜的酷刑折磨，致使终身残废。

樊立勤在《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写道：

“他们除了把我蒙上眼睛进行拷打，还用钳子把我的一双手食指夹断，把手指甲钉入签子，他们打断了我的胳膊和右腿，又往我左腿的膝盖钉入了钉子。在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神志不清时，又往我身上泼冷水给浇醒，浇醒之后再问。他们打我打累了，就压在我的身上，把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我被酷刑折磨了几天几夜，他们得不到他们预想目的，我被打得落下了终身残废。”

3 月 29 日下午，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打手们看到樊立勤已经奄奄一息，把他扔到了女浴室的附近，被井冈山人员发现，送医院抢救，捡回了一条命。

2.邓朴方

邓朴方是技术物理系 62 级学生，1968 年 5 月北大校文革和技术物理“系文革”派人把他从家中抓到北大，先后关押在第二体育馆地下室、技术物理系实验室和物理大楼，进行殴打逼供。1968 年 7 月 28 日，邓朴方从物理大楼坠下，脊椎受伤，高位截瘫，成为终身残疾。（详见舒声、郑实：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燕园沉思录》，下册，408～413，时代文献出版社，2018 年出版）。

3.徐运朴、牛泰升、王忠林、王明德等“红旗飘”骨干分子

徐运朴是俄语系研究生，曾任校文革常委、副主任，后加入“红旗飘”，牛泰升、王忠林、王明德都是法律系学生，原“红旗飘”的成员，与牛辉林关系密切。1968 年 3 月 29 日北大武斗开始后，他们先后离校回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制定了一个抓捕名单，有组织有计划地派人到外地抓捕这些井冈山的骨干分子。1968 年 5 月 9 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了“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5 月 23 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新北大公

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二号公告》，7 月 5 日第四版刊登消息：批斗井冈山现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徐运朴、牛泰升、王明德被揪出示众；7 月 17 日，《新北大》第二版，公布了徐运朴的《认罪书》，简明新闻中说：反动小集团重要成员牛泰升、王忠林、王明德写了交代材料，徐运朴写了认罪书。

这些成员被抓捕后都遭到了审讯逼供和殴打，徐运朴被殴打导致腿部骨折，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文革后不久病故。

4.韩琴英（何青）、彭秋和等“东方红”骨干分子

以樊立勤为首的“东方红公社”的成员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反对校文革最坚定的分子，受到校文革的深恨，专门成立了“东方红专案组”。

韩琴英（何青），女，是哲学系 61 级学生，“东方红公社”成员，1968 年武斗发生后，由于已经结婚怀孕，回到山东老家休息，被校文革派人抓回北大关押，韩的丈夫对抓她的人说“她已经怀孕，不要打她”，但毫无人性的打手们依然不放过她，以致被殴打后流产。

地球物理系教师彭秋和也是“东方红公社”成员，曾于 1967 年春天，花费了三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写出长达 88 页的大字报《斩断佛爷遮天手，敢翻孔杨沉冤案》，为孔繁、杨克明翻案，经“东方红公社”成员集体讨论，署名“北大东方红论坛”张贴，在校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68 年 3 月 29 日北大武斗后，彭秋和躲到清华大学姐姐家避难。5 月下旬，地球物理系文革通知天体物理专业全体教师（不分两派）共同开会，讨论 1968 年底在新疆中苏边境附近的“日全食”观测。彭秋和不知是计，5 月 29 日上午 8 点多从清华西南门走出，被埋伏在那里的公社武斗队成员用铁棍猛击头部打晕，抓到 44 楼进行毒打，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交代东方红的反动罪行，不承认就用铁棍和皮鞭抽打，连续毒打了 13 天。后来他又被转移到物理大楼，曾和邓朴方关在一起，邓也被归并为“东方红”专案，被蒙着眼睛用铁棍毒打。（见彭秋和：不堪回首忆当年——我的文革遭遇，《燕园沉思录》上册，207～216，时代文献出版社，2018 出版。）

5.诱捕俎栋林等人

1968 年 6 月，新北大公社“钢一连”（武斗骨干组织）在济南抓住牛泰

升后，又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以牛泰升的名义给井冈山总部发电报，说自己于某月某日下午在丰台站下车，请总部派人来接。井冈山总部安排技术物理系肖正贵带队，国际政治系施裕壬、东语系钱某某、技术物理系马国勋和俎栋林 5 人到丰台火车站接人，被埋伏在那里的“钢一连”30 多人包围，只有肖正贵只身逃脱，其余 4 人全部被抓。马国勋因与“钢一连”沈某是同班同学，沈某说了好话，因此只挨了一鞋底的打就被释放；钱某某被迫写了一些胡言乱语认罪，登在《新北大》上后被放出；施裕壬一直被关押到工宣队进校才被释放。俎栋林被关押三天三夜，每天提审三四次，一次一小时左右，蒙住头，用铁棍打臀部和双腿，俎栋林坚持不“认罪”，绝食抗议，公社怕出了人命不好交代，第四天中午由“红 17 团”团长许某某来，揭开蒙在头上的衣服，把他放了出去。回到 28 楼宿舍，脱下裤子来看，腰部以下全部皮下出血，呈青黑色。(俎栋林口述，笔者记录)

武斗期间，校文革、新北大公社还派出大量人员到全国各地抓捕井冈山“骨干分子”。哲学系 61 级赵习文对笔者说，他的家乡在河南农村，“新北大公社”派人到他老家，大队支部书记说“赵习文是好人”，不许他们抓人；他们还派人到魏秀芬老家抓人，魏的亲戚是派出所长，制止他们抓人，并及时告诉魏转移。

（二）肆意性的抓捕

6.抓捕温家驹殴打致死

1968 年 4 月 19 日，“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试验楼，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孙蓬一（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

7.抓捕刘玮，殴打致死

1968 年 7 月 20 日，地质地理系 61 级学生，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 40 楼，并于当天下午被武斗队打死。(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

8.郭青苔被抓，殴打骨折

技术物理系 63 级学生郭青苔，1940 年出生，原为留苏预备生，后分配到北大技术物理系学习。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听说 31 楼发生武斗，来到附近想看看情况，被公社武斗队抓捕，蒙住眼睛，关押在一间男厕所里，进行审讯毒打，把右腿架在便池上，用木棒砸下，造成骨折，几天后放出，在医院救治数月，方才痊愈。（见郭青苔：一段不愿回忆的经历，《燕园沉思录》上册，365～368 页。）

9.俞小平和周某某

技术物理系 63 级学生俞小平，井冈山一般成员，1968 年大约 4 月 10 日，在海淀镇废品收购站想买点半导体收音机原件，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绑架到 44 楼，用衣服蒙头押到楼上，强迫承认在海淀镇偷卖“新北大公社”成员的物资，被钢管在头上、脚上暴打，打得头破血流，打裂了脚踝骨，放出来后，好久不能走路。

他的同班女同学周某某，在 1968 年 5～6 月间，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去，关押数日，殴打折磨，放出后精神恍惚。（见俞小平：做人的底线，《燕园沉思录》上册 282～283 页。）

10、王解南无缘无故被打被抓，导致早逝

技术物理系 65 级学生王解南，干部子弟，共产党员，文革中并无派性，也未参加武斗，但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十分关心，爱写日记的习惯驱使他想记录武斗时发生的一些现象，他经过武斗的发生地点 31 楼时想看个究竟。当他靠近楼门时，还没有看清楚里面都有些什么，头上就重重地挨了占楼者一棒子，当时他晕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还被公社武斗队的人抓到楼里，关起来蒙住眼睛又打了一顿。1970 年毕业后王解南被分配到河北昌黎县气象站，正要施展抱负努力工作时，发现视神经和脑萎缩，回到南京治病，没有多久就去世了。他的同班同学叶科泰回忆说“这么好的一位同学，一位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热血青年，正要为祖国做贡献的时候，就这样轻易第离开了我们。这一棒子给王解南留下了祸根，也许这一棒子就是造成他脑萎缩的主要原因。这一棒子究竟是谁打的，凶手究竟是谁？王解南自己也不知道，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去查。”（叶科泰：《一张老照片勾起的回忆》，载于《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523～530，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

11.周国平也曾被抓捕

哲学系 62 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作家、尼采研究专家的周国平在他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中记述：

我们上街都从 37 斋（学校南院墙）这个缺口进出，不过仍需小心，因为外面的街面受到“新北大公社”弹弓的火力封锁。更有一层危险，便是他们用望远镜监视着这块街面，发现有人从缺口走出，无论是向西还是向东，都会经过他们所控制的某一个校门，他们就会冲出来抓人。

我对打派仗的态度十分淡漠，几近于中立，便自信他们会对我手下留情。因此，有一回，我确实要进城办事，就大大方方地从缺口走出，朝东面的汽车站走去。然而，在靠近车站时，忽然有一个人骑自行车挡住了我的路，接着一伙人冲过来把我抓住了。他们脱下了我的外衣，蒙在我的脸上，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我能感觉出是一个房间，有些人在我旁边说话，其中有几个女生。开始审讯了，问我地道在哪里之类，我嘲笑说，你们能攻占，自然就知道了，何必要问。当然，招来的是一顿狠打，把我颠来倒去，拳打脚踢。审讯时间倒不长，我被带到一个地方，除下蒙在脸上的衣服，我发现眼前站着几个我班的对立派同学，其中有李主庆，李是调干学生，比我年长许多，一向像兄长般对我友好。他说要跟我聊聊，我回答说，我不想以俘虏的身份聊，要聊以后再聊，话音刚落，那两个押我来的外系学生怒不可遏，举手就要揍我，被李劝阻了。李依然对我很友好，带着沉默的我穿过校园，把我送出了校门。

12、化学系两学生被抓受虐待，3•29 井冈山 23 人被抓

3•29 事件中，31 斋井冈山学生被“新北大公社”长矛队野蛮突袭，夺门而逃，或跳窗、跳楼而逃，保得全身的，都算幸运。化学系 65 级学生刘文建不走运，他赤手空拳跑出 31 斋后，跑错了方向，跑到西边校医院附近，误入龙潭虎穴，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拿获，打得头破血流，关押在“黑牢”。后来双方交换俘虏，才被放了出来。

03631 班蔡小海，一向与本派“井冈山”观点不甚相合，反对派斗，自诩公允，非要向“新北大公社”长矛队问个究竟，被“新北大公社”捉了去，蒙住双眼，捆上双臂，棒打一顿，头部也挨了一拳，这才放掉。蔡小海挨了打，却说不清在何处挨了打。

（见樊能廷编著《北大文革简史》，823 页，时代文献出版社，2018.）

据地球物理系王书仁同学统计，3•29 那天，31 楼和 29 楼井冈山学生共有 23 人被抓。（见本书王书仁：地球物理系部分校友忆武斗）

以上所述只是笔者所了解到的部分情况，还有更多的情况是笔者不知道的，希望知情者能够补充更多的真实情况。但仅从这些情况也可以看出，文革中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校文革是多么无法无天，残暴凶狠，任意残害反对自己的干部、教师和学生。时至今日，聂元梓对这些罪行并不认账，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抵赖，说什么邓朴方被抓她不知道，还把邓朴方受伤的责任推到工宣队身上，说打死刘玮的人不都是公社的等等（见《聂元梓回忆录》）。但是，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的事实。文革中屈死的冤魂和活着的受害者是不会放过害人者的，历史将把害人者的名字牢牢钉在耻辱柱上。

悼王解南同学

叶科泰

王解南是我们熟悉的同班同学，他为人正派，待人诚恳，团结同学，乐于助人。他热爱学习、学习优秀，更是一位热爱祖国大好山河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小，他名字的由来好象与南下或南京解放有关，但他却是我们班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大学我们虽然同在 112 班，但英语学习却是快、慢班分开学习的。王解南初中高中都学习英文，所以大学英语学习分在快班。我初中学英语，但高中学的却是俄语。因此，为便以把基础打扎实，不让自己负担过重，大学英语学习选择了慢班，重新从 ABC 学起。王解南在快班学习，他的英文确实比我们好得多。见他课文读得流畅、又早接触带技术性的大块文章，当时好让我羡慕。

右一为王解南（摄于653）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北大发生了武斗，我们半夜里被吵醒。29 日早校园宿舍区一片狼藉，背着被包，提着箱包的学生纷纷逃离校园，中关村车站挤满了逃难的北大学生，那场面真令人心酸。好端端的校园，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武斗虽然没有直接在我们的宿舍楼发生，但当时的气氛已经警告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校园。就在当天，我也拖着箱子、背着被包象难民一样离开了 41 楼，躲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我高中同学张威灵那里住了好一段时间，后来跑回广东老家。再后来老家清理阶级队伍，把所有没有户口的人员与地富反坏右一起遣送出去。我们从学校回来的学生，因户口不在家乡，也在遣送之列。刚好此时也听说工宣队进校了，正要求我们回校复课闹革命，这时才回到学校。

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我们又再次从北京奔波到汉中六五三分校，直到 70 年 3 月毕业分配。我与六五三不少同学一起分配到湖南，与从北京直接分配来的 200 多位北大、清华的学生汇合在一起，来到洞庭湖的西湖 0646 部队农场劳动锻炼，近二年时间，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自称的“西湖联大”。而

王解南被分配在河北昌黎田上庄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插队，条件自然比我们艰苦。后来，再分配时他被分在昌黎县气象站，中学时他就是天文爱好者，所以感到工作还算顺心，准备施展抱负。那时长途电话是昂贵的，唯一的信息沟通就是鸿雁传书。一天我收到他的来信，说他眼睛视力减退，视物模糊有重影，一根铅笔看起来好像两根。医院检查视神经萎缩，字要写好大才清楚，一页纸写不了几个字，以后就会少写信了。信中他说到，原因很可能是 68 年武斗时，他挨的那一棒子引发的。我写信安慰他，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会很快好起来的。后来他回南京治病，曾要王起帮联系北京的医院。再后来，没有多久是他妹妹还是弟弟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走了。这么好的一位同学，一位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热血青年，正要为祖国做出贡献的时候，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我想，要不是文革中不明不白地挨了那一棒子，他绝不会这样轻易地离开我们。王解南并没有什么派性，他也绝不会去参加武斗。但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十分关心，也许爱写日记的习惯驱使他想记录武斗发生时的一些现象，他经过发生武斗最厉害的宿舍楼想探个究竟，当他靠近楼门，还没有等他看清楚里边都有些什么，头上就重重的挨了一棒子。当时他晕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还被公社武斗队的人抓到楼里关了起来蒙住眼睛又打了一顿。王解南挨打这件事我是在武斗结束回到学校后才略知一二的，当时没有细问。文革这一棒子，给王解南埋下了祸根，也许这一棒子就是造成他脑萎缩的主要原因。这一棒子究竟是谁打的，凶手究竟是谁？王解南自己也不清楚。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去查，估计也难于查清。我们痛恨下狠心毒手的家伙，那家伙理应受到法律惩处。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风雨未名湖》一书叶科泰《一张老照片勾起的回忆》。）

在地院避难的那些日子里

张从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北大爆发了大规模武斗，校文革支持下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有组织、有预谋地驱赶了 31 号楼的井冈山学生。4 月 26 日，爆发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武斗，公社武斗队组织数百人攻打 36 楼，井冈山拼命防守抵抗，双方在对抗中，都有很多人受伤，我亲眼看到有些人头破血流退出武斗现场。学校里的气氛愈来愈紧张，我不愿参加武斗，也不愿见到同窗操戈的状况，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逃离学校。

到哪里去呢？忽然想起，在 1965 年 11 月～1966 年 6 月初的农村社教时，同一个工作队的北京水利水电学院的王建中同学和我关系不错，他们学校位于花园村，相对平静。于是收拾了一下东西，乘公交车来到水院，找到王建中，他在文革前是学校学生会主席，人缘很好，热情地接待了我，把我安排到学生宿舍，并帮我买了饭票，在他们学校生活了一个月左右。在水院期间，每天吃饭、睡觉、聊天，甚是无聊，心里也惦记着北大，不知校内同学们情况到底如何？一天溜回北大，只见校门戒备森严，有持长矛的武斗队员把守，听得校内广播，双方互相攻击。不敢久留，赶紧回到水院。

后来听说北大有不少学生住在地质学院，我们班的郭青苔同学也在地院校医院养伤。于是就离开了水院，来到了地院。先在校医院找到了郭青苔，他在 3·29 被公社武斗队抓起来，严刑拷打，腿部骨折，后被交换俘虏，放了出来，住在地院校医院养伤。这个校医院很小，条件也很简陋。郭青苔由于多日关在屋里，营养也跟不上，皮肤苍白，身体消瘦，他向我讲述了受伤的经过（见本书郭青苔口述：一段不愿回忆的往事）。和他同一间病房的还有一位无线电系的同学，在 28 楼房间里，被飞进来的强力弹弓射出的石头击中眼睛，手术摘去了眼球，成了独眼，要等待安一只假眼。我很替他难过，但他的精神似乎还比较乐观。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不知这位同学后来分配到什么地方，现在何处？

当时地院住了上百名北大井冈山的同学，成为北大校外的一个避难地。负责人是化学系的教师郭正谊和 0363 的学生雷祯孝。郭老师当年 30 多岁，门牙有两颗已经脱落，他把我安排到一间很大的教室里，用四张课桌，铺上带来的凉席，晚上睡觉，虽然蚊子很多，也就顾不得了。过了几天，郭青苔身体好了

一些，能够走路了，也来到这间教室，和我住在一起。

说起郭正谊老师，北京人，从小热爱科学，1951 年考入清华化学系，1952 年转入北大，毕业后留校，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写了不少科普作品，80 年代初从北大调到中国科普研究所任副所长，成了专业的科普工作者。他坚持反对伪科学，揭露邪教和“气功大师”们的真面目，受到邪教信徒们的仇视。我的印象他是个很有正义感、态度和蔼、而且能力很强的老师。文革后我再没有见过郭老师，遗憾的是 2012 年郭老师已经去世，享年 79 岁。

图1 郭正谊老师

再说雷祯孝，也非等闲之辈，他和我是同届同学，四川人，在同一大教室上基础化学课。1967 年起，他以“小人物”为名，在校内贴出多张大字报，批评聂元梓，在北大很有影响。毕业后在贵州工作，1979 年首创“人才学”，在国内影响很大，后被刘道玉请到武汉大学任教。近年来又研究推广“电影课”教学，影响依然不小。去年他从深圳来京，我们几位同学一起聚会，同忆当年往事，不胜感慨。雷祯孝也曾提议在地院的避难过同学一起回忆一下当年的日子，并拟定了提纲，可惜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不全，至今没有人写出来这段生活。本文算作抛砖引玉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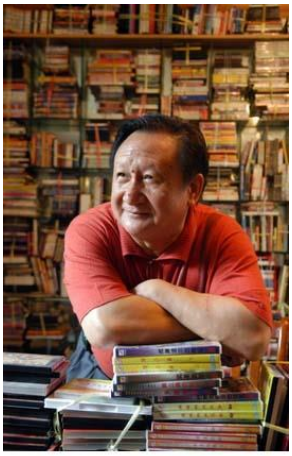


图2 雷祯孝近照

那时在地院，郭老师主要负责后勤组织工作，雷祯孝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周围有很多同学协助，工作开展很有成效。例如安排了一些伤员在地院养伤，安排众多无家可归的同学避难，与兄弟院校联络，为校内守楼的同学送去粮食、蔬菜等。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曾找了附近农民的一辆马车，给北大井冈山的同学送去粮食、蔬菜和葡萄酒；还有一个运输场用汽车送去了粮食、蔬菜，却被毫无人性的聂派武斗队拦住，还打伤了司机。该场工人通过工代会告到了市革委会，却被谢富治批为“送派菜”，真是岂有此理！连清华的同学都看不过去了，写了文章批评谢富治，说自古未闻菜还有派性，真是草菅人命！可见当时

谢富治偏袒聂元梓多么厉害，可聂元梓并不买账，时常和谢富治勾心斗角。

大约在七一前，井冈山“万岁纵队”部分成员也来到了地院，排练节目，准备演出，记得有个舞蹈节目叫“非洲怒火”，表演非洲黑人反抗外来敌人入侵的事迹，其中有黑人用弓箭射下了敌人飞机的场景，需要制作几把弓，这个任务派到了我和其他几个同学的头上，我们找来了竹片，用蜡烛点火，把竹片慢慢烤弯，再用麻绳在两头拴上，成为弓形。竹片很难烤，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了任务，舞蹈队的同学拿到了弓，很高兴地表扬了我们。现在看来，用弓箭射下飞机完全是天方夜谭，但当时这么宣传也没有人敢于提出异议。

雷祯孝主要负责编写、印刷传单，对外宣传，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那时主要的印刷设备就是油印机，由会刻钢板的同学把要宣传的内容刻写到蜡纸上，在油印机上印刷出来。为了加强效果，我们发明了油印的大字报，有八张蜡纸那么大，就是把大字报内容刻在八张蜡纸上。油印的时候，四个人面对面站着，每人手拿两个油印网，网上沾好了刻就的蜡纸。从第一个开始，把第一张网放在全整张的白报纸上，油墨滚子一滚，这八分之一就印好了，第二张对好了缝，印上去，接着印下一张，直至完成八张蜡纸的油印，这样一整张的油印大字报就完工了。虽然也挺麻烦，比人力抄写到底快多了。一套八张刻好的蜡纸可以印数百份大字报，同样内容的大字报一天功夫就可贴遍全北京城，就像出版了一份报纸。我们组成几个小分队，携带传单到市内主要的大街路口，贴到墙上。一次在城里（新街口附近）贴传单时，遇到了公社的武斗队，他们不仅在光天化日下撕毁我们传单，还野蛮殴打井冈山的同学，激起了众怒，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井冈山的同学抓住了一个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公社武斗队员，把他带到地院，关了起来。

逃回去的公社武斗队发现少了一个人，报告了公社总部，这个人是个工人，他的家属找公社总部要人，公社总部只好提出和井冈山交换“俘虏”。大约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在清华东面的铁路两边，双方互换了“俘虏”，被释放的同学飞快地跑到铁路对面自己组织的一方。我在现场远远地观看了当时的这个情况，想到在和平的年代，在首都北京的最高学府，竟然出现了“交换战俘”的事件，真是可笑而又可悲！

北大和清华的武斗越演越烈，毛泽东经过一段观察和等待后，终于不能容忍了，7 月 27 日，指示 8341 部队的谢静宜等，组织 3 万工人宣传队员进入清华，宣传“7 · 3”、“7 · 24”通告，制止武斗，不料却被蒯大富率领的清华井冈山团派打死、打伤了许多工人（据说参加武斗的还有住在清华的广西、贵州造反派成员）。伟大领袖震怒了，说造反派：“真的反了！”于 7 月 28 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所谓的“五大造反派领袖”，批评了蒯大富和聂元梓，要求他们停止武斗。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先进入了清华，北大的武斗也基本停止了，虽然两派还在各自的阵地上对峙，大喇叭里也在互相攻击，但没有再发生过武力冲突。我惦念着在 28 楼守楼的同班同学，通过 37 楼地道进入校内，地下、天上，辗转到 28 楼看望同学，也吃过女同学们做的饭，还站在 28 楼楼顶上，和张铁壁、陶令煌同学照了一张相。

图3 张从 张铁壁 陶令煌
1968年8月在28楼顶上

当时，在 28 楼和 30 楼之间架起了一座天桥，我曾通过这座天桥，从 28 楼走到了 30 楼四楼的尽西头的房间。那里设了一个井冈山的小广播站，名曰“黄洋界广播站”，由一位精瘦的男同学负责，他拉我帮助他写了几篇稿件，内容无非是宣传“7 · 28”讲话，批判聂元梓等人制造武斗等，用词比较尖锐。四十多年后，我们在北京再次见面，我才记起他的名字叫白玉林，是数学力学系 1965 级的学生。

1968 年 8 月 19 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正式进入北大，历时 120 天的武斗终于停止了，我也回到了 41 楼的宿舍，结束了外出避难的日子。

武斗期间井冈山部分学生在地院的活动情况，也是北大文革一个重要的历史片段，但由于本人当时只是一个避难的普通学生，对领导层面的情况不清楚，呆的时间也比较短（大约 2 个月），本文记述得肯定不全面，希望其他了解情况的同学能够补充更多的内容，使这段历史更加丰富。

试析北大武斗的背景内因兼驳聂元梓的谎言

舒声

最近，看到了几篇回忆北大文革期间武斗的文章，分别是原来两派的亲历者所写，对武斗的全过程有比较翔实的记叙，应该说比较贴近真实。特别是化学系 62 级和历史系 63 级原新北大公社的两位校友，打破了派性的束缚，用亲身经历揭示了武斗的真相和过程的残酷性，更为难能可贵。但是，这些文章大多只是从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出发，记述了武斗的过程，对武斗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尚缺乏深入的分析。至于聂元梓回忆录中过于北大武斗的描述，则充满了谎言。本人作为北大文革亲历者之一，试图分析一下北大武斗产生的背景和内因，并对聂元梓回忆录中的谎言加以驳斥，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一、北大武斗产生的背景

北大武斗正式开始于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新北大公社组织部分人员驱赶 31 楼化学系宿舍井冈山一派的学生。当时，文化革命已经进行了接近两年（从聂元梓 1966 年 5 月 25 日大字报算起），而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全国即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极度混乱之中，武斗造成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局面是在 1967 年“全面夺权”前后形成的。早在 1966 年年底，重庆、上海等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组织之间发生武斗的现象。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开始仅限于拳脚，后来逐渐升级为棍棒、大刀长矛，到 1967 年夏季，武斗恶性发展，全国普遍出现了使用枪支进行武斗的局面。许多群众组织为了进行武斗，竟然公开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库。武斗严重的地方，在武斗中使用了大炮、坦克等重武器。

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分别发布了制止打砸抢歪风的“六•六通令”和制止大规模武斗的“七三布告”，但打砸抢和武斗歪风遏止不住。就在这时，江青发表了公开鼓吹武斗的讲话。1967 年 7 月 22 日，江青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时说：“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有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第二天，“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上公开发表。同年 9 月 5 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时又大讲“文攻武卫”。更为严重的是中央办公厅于 9 月 9 日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的“九•五讲话”，于是各地纷纷成立五花八门的所谓“文攻武卫”组织。这些组织以“文攻武卫”为指示和口号，大肆进行派系武斗和打砸抢活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破坏交通设施，抢夺部队武器装备的恶性事件，全国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

北大作为文化革命的发源地，从 1966 年 7 月底开始，就派出了大量人员到全国各地建立联络站，和当地造反派一起参加夺权斗争，目睹了大量的武斗现象，有些人甚至参加了当地的武斗（例如高云鹏等介入了陕西汉中的武斗和重大爆炸案），江青的讲话和各地武斗的现实，必然对北大产生深刻的影响，包括人们精神和心理上的影响和对武斗方式的学习和准备。

1968 年的北京也很不平静，虽然 1967 年 4 月，北京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谢富治任主任，聂元梓当上了副主任，但北京市许多单位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高校还形成了所谓的“天派”、“地派”两大派别。聂元梓在许多问题上与谢有分歧，认为谢支持“地派”压“天派”，压她。从 1967 年 4 月开始，就发生了其干将孙蓬一多次炮打谢富治的事件。1968 年 3 月 24 日，又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所谓“杨余傅事件”，形势更加吊诡。中央内部的矛盾斗争扑朔迷离，其中多少也牵扯到聂元梓（林彪讲话中提到聂的名字，说她与杨成武有关系）。聂摸不清中央对她的态度，认为谢富治支持的地派要到北大来行动，打压她，草木皆兵，如临大敌，为了有所准备，成立了由高云鹏为头头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开始做武斗的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因此，北大发生的武斗，受到当时全国和北京市形势的影响，与聂元梓及其周边人物对社会形势的估计有密切关系，是她们应对当时文革形势的本能反映。

二、北大武斗发生的内因

自从张承先工作组撤离后，北大成立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聂得到了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亲笔给“新北大”题词，聂还在高层人物的授意下去上海串联（据聂回忆录的说法是李讷给她传达了领袖的指示，但李讷后来不肯作证），冲击上海市委，整倒了社教时的仇人常溪萍，又领头张贴反对邓小平的“第二张大字报”，报了她在社教后

期挨整的一箭之仇，一时春风得意。1966 年 12 月，北大出现了“虎山行”等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聂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镇压下去；还有少数反对老聂的个人，如杨勋、杨炳章等，聂通过中央文革由卫戍区把他们逮捕。1967 年春，最高领袖提出“斗私批修”，要求造反派整风，老聂也不得不响应所谓“整风”。但她没有料到，许多群众包括原来她的战友和校文革的同事（如周培源、孔繁、杨克明、郭罗基、侯汉清等）都给她提出了不少意见。一贯狂妄自大、文过饰非、喜欢奉承、听不得不同意见的老聂怎么能够接受？她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不同意见者打击报复，使很多群众对老聂越来越失望，陆续成立了一些反对老聂的群众组织。由于老聂的狂妄与颟顸，有时连中央文革领导人的话也不放在眼里，这引起了中央文革的不满。1967 年 6 月 5 日，陈伯达在讲话中批评了聂，聂的反对派认为是对自己一方的支持，原来分散的几大群众组织（北京公社、革造总部、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等）联合起来，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并得到了 100 多名干部的公开表态支持，队伍越来越壮大，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反聂派与拥护聂的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经常辩论甚至摩擦，矛盾越来越激烈，两派人员的派性也越来越强。“井冈山”对聂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对她的统治形成了威胁，聂当然不能容忍这个在北大校园里出现的反对派，采取各种办法要将“井冈山”削弱直到消灭而后快。聂派漫骂、压制、拉拢、收买、抄家、抓人等，但都收效不大，最后的方式只能是武斗了，采用暴力的方式将井冈山的人员打散、赶走、镇压，确实是聂所能想到的“最佳”方法了。她和她的手下为消灭“井冈山”，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组织队伍，先下手为强，占领井冈山力量比较集中的 31 楼，打响了武斗的第一枪。所以，北大武斗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其内因是两派矛盾的激化，是聂元梓及其支持者为了消灭反对派维护自己统治而采取的极端措施。

三、揭穿聂元梓关于武斗的几个谎言

聂元梓在口授的《回忆录》中竭力否认自己挑起和制造武斗的事实，反而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受害者和制止武斗的英雄，她在回忆录中关于北大武斗有许多谎言，这里只择几条给予驳斥。

1、所谓“武斗是北京地派挑起的”

聂在回忆录中多次强调北大武斗是“地派”挑起的，说在 3 月 25 日地

派就出动上万人员来北大支持井冈山，搞武斗，并点名有 7 所院校的人员参加了北大的武斗。文革中北大是个开放的校园，又是一个活动中心，全国各地来串联的人很多，北京天派、地派都有很多人来北大看大字报。武斗前几天，北大校园中有地派的外校人员出现，不足为奇，由于聂在北京高校中的名声已经很臭，支持北大井冈山的外校人员很多也是事实，但聂说北大的武斗有地派的外校人员参加，却毫无根据。其实，北京当时虽然分为天、地两派，但同一派的人只是在观点上接近，并没有出现一个学校派人到另一个学校参加武斗的情况，只有蒯大富和聂元梓两个超级狂人在那里胡闹。据韩爱晶回忆，1968 年 5 月，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会时，绝大多数成员都明确反对北京市的武斗，并要求革委会常委所在的单位首先要停止武斗，还派了韩爱晶、王大宾等到清华和北大调查和调解（以上内容有记录可查）。可是聂元梓和蒯大富此时头脑已经发昏，非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或让对方投降、解散，否则不肯罢手，因此武斗也没有被制止。在关于文革的其他人的回忆中，也从来没有发现其他外校人员介入和参加北大武斗的证据。所以，聂关于地派介入和挑起北大武斗的说法纯属谎言，是嫁祸于人，为自己开脱罪责。

2、“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没有关系，新北大公社的行为和聂元梓没有关系”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还多次说，校文革是选举出来的领导北大文革的机构，新北大公社是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的行为和校文革没有关系，和自己也没有关系，武斗是两派群众自己打的，自己也管不了。这更是掩耳盗铃的说法。凡是经历过北大文革的人都知道，自从北大分裂为两派后，校文革中反对聂的成员不是被她开除，就是自动退出，校文革完全成为聂一派的工具，新北大公社是拥护校文革的群众组织，校文革是支持新北大公社打击井冈山的“派文革”，校文革的常委和新北大公社的头头经常一起召开联席会议，校文革布置的事情公社立即执行，它们二者的关系是二位一体的。何况聂的胳臂上还经常带着新北大公社的红袖章，而且还以新北大公社红卫兵代表的身份成为了首都红代会的一把手呢！这些难道聂都忘记了吗？如果聂连这些事实都否认，那不仅原来井冈山的师生们不答应，连原来新北大公社的师生们也不会答应的。他们会说：“原来我们在文革中支持你，你反而要和我们划清界限，把你干的坏事都推到我们身上，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这也太不够意思了。”聂元梓把武

斗的责任推给两派群众，为自己开脱，用心何等险恶！

3、“北大武斗没有打死人，刘玮是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

聂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北大的武斗中，是没有打死人的。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不是在武斗中打死的，而是在打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因此这件事不应该算在新北大公社打武斗的账上。”

这纯属睁眼说瞎话。众所周知，新北大公社在武斗期间打死三个人：1、温家驹，19 岁，地质学院附中学生，1968 年 4 月 19 日，在图书馆翻阅期刊时被新北大公社抓住，带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审讯，毒打致死。2、殷文杰，无线电系 62 级，20 岁，1968 年 4 月 27 日，路过 44 楼，被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员们追上用长矛刺穿股动脉，流血过多而死。3、刘玮，24 岁，《北京大学纪事》上记载：“1968 年 7 月 20 日，地质地理系 61 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 40 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打死。”聂元梓说打死刘玮的是混乱的群众，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有什么根据？刘玮只是个普通学生，与他人无冤无仇，除了新北大公社的打手，谁会对刘玮下毒手？聂为了为自己开脱罪责，已经丧失了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了。

至于在武斗中被打伤，以及被聂元梓一派抓去殴打受伤、致残的教师、干部和学生，数量就更多了。笔者就亲眼见过一个武斗中被石头击中眼睛，后来不得不手术摘除、安装假眼的同学，笔者同班一位同学被新北大公社抓去殴打，腿部骨折，治疗休养了几个月才痊愈。生物系学生樊立勤被抓去后遭到类似“白公馆”、“渣滓洞”一样的刑讯，几乎丧命，技术物理系学生邓朴方被抓去后被逼供，跳楼致残。实例不胜枚举，聂元梓轻描淡写地说北大武斗没有打死人，企图降低北大武斗的残酷性，以减轻自己的罪行，只能是枉费心机。

4、“对刺伤她的学生没有追究”

聂的回忆录中说：“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到井冈山总部去。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我被

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扎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伤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请”谢富治。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以为我是个大坏蛋，而来扎我，是受了蒙骗。他的后台就是谢富治。”

首先，樊能廷手拿的不是匕首，而是一只电工改锥，他当时并没有碰到聂元梓，也根本没有什么后台；其次，在这件事情发生后，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立即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又是广播，又是发通令、发传单，“勒令”井冈山交出“凶手”，还派人四处搜查，企图抓捕樊能廷；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也要求“井冈山”交出樊能廷。试想，像生物系学生樊立勤只是口头上反对聂元梓，还被新北大公社抓去刑讯，铁钉钉入膝盖，成为终身残废，樊能廷如果被抓去，结果会是怎样？幸亏他及时逃脱，井冈山把他保护起来，才幸免于难。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对樊能廷从未进行追究，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对此，只能送她两个字：虚伪。

文革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武斗则是文革中最残酷的形式，也是某些人人性中最野蛮、最丑陋部分的大暴露。聂元梓作为那个时期的风云人物和北大的实际掌权者，对北大的武斗和造成的人员死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她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惩罚。但相对于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她只是个被利用的工具，只有承认罪行，认真反思，总结历史的教训，才是应有的态度；如果还保留着文革时期的思维方式，继续文过饰非，欺骗世人，为自己辩解甚至企图翻案，只能说明她致死不悟，更加可悲。

（本文写于 2012 年，原载于自印本《燕园风云录》第一集）

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
——重读《聂元梓回忆录》

艾群

值此文革发生 50 周年之际，重读《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出版，以下简称《回忆录》)。聂元梓早年参加革命，文革中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造反派标志性人物，文革后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耄耋之年痛定思痛，回首往事，兼以反省与忏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剖析北大文革的模本。然而作者囿于自身局限以及选择性叙述，有利的使用加法，不利的使用减法，致使诸多事实模糊不清。兹择其大端一抒己见，就教于聂元梓及方家。

一、第一张大字报引爆全国造反，天下大乱

1970 年 12 月 18 日，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了，1965 年 1 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至少自 1965 年 1 月始，毛泽东就围绕着搞掉刘少奇这一目标，策动了一系列的部署和举措：对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连续作出严厉的批示；1965 年 11 月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起全国范围的大批判；1966 年 2 月由江青出面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诬蔑从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被文艺黑线统治和专政；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亲笔在通知中加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尽管紧锣密鼓，环环相逼，充其量只是口诛笔伐，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国家机器照常运行，工农商学兵该干嘛还干嘛，距离搞掉刘少奇这一目标相去甚远。当此之时，第一张大字报问世了，它开创了任意炮轰党政领导的先例。毛泽东抓住这个契机，下令全国广播，于是大批判升级为全国造反，文化革命升级为武化革命，揪斗党政领导的造反运动席卷全国。这时毛泽东满意地宣称“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接着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实现了“搞掉刘少奇”这一既定目标；与此同时开启了陷各族人民于水火的十年动乱。《回忆录》竭力轻描淡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历史作用。

对于第一张大字报的问世过程，《回忆录》称：聂元梓等人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派驻北大调查组负责人曹轶欧（康生夫人），“我们就汇报说，听了《五·一六通知》领会其精神，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曹轶欧也没有问我们要写什么内容，就说《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此后聂元梓等七人写作并于5月25日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回忆录》以“关于大字报的辩白”为题专门写了一个章节的内容，说明写大字报纯粹是自发行为，没有任何上层人物的授意和指使，从而与中央文革撇清关系。

但是这不是事情的全部。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的文章《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披露，康生派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要“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曹轶欧要陈守一“领头和聂元梓等共同来搞”，被陈严词拒绝，她问陈：“聂元梓怎么样？你（对聂）印象如何？”陈讲了看法后，曹轶欧说：“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你可以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搞。”该文指出，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是曹轶欧授意张恩慈串联聂元梓等人写出的。

由此可见，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属于康生、曹轶欧整个阴谋的一部分。

二、失忆了某些重要情节

1967年9月1日江青当众夸奖聂元梓：“聂元梓在文化革命开始立了两大功：第一，她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第二，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

《回忆录》第十二章《“除隐患”始末》写道：1967年春天，“我自己不便直接出面，就让孙蓬一找几个可靠的人，选择了赵建文等，在北大成立了‘除隐患战斗队’，专门搞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材料，追查他们的后台。”《回忆录》叙述除隐患战斗队围绕“专门搞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一工作中心做了大量调查，不料追来追去追到康生头上，无奈只好放弃。本来“除隐患”积极

执行四人帮的“揪叛徒”阴谋，《回忆录》却将其置换成反四人帮的壮举，编排得太离奇了吧？这与江青所说“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不符，与聂元梓本人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也不相符。

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1967 年 4 月 14 日，在一次大型集会上，聂元梓找到到康生说：“我们组织了一个‘第二战斗队’也就是‘除隐患战斗队’，专搞揪叛徒的斗争。”聂元梓汇报说，前一段揪叛徒的调查工作遇到困难，进展迟缓，请康老给予指示。康生掏出笔来，当场写下一张字条：“新北大的一个革命组织要揪叛徒，望有关方面给看必要的材料。康生”返校后聂元梓把康生的手谕复印出来，挑选精兵强将组成揪叛徒兵团，把“揪叛徒”的组织工作和活动方案写成报告，呈交康生。与此同时，聂元梓以康生手谕为据，写信给谢富治要求提供帮助。谢富治见信后，派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接见揪叛徒兵团的负责人，准许他们到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查阅机密档案。揪叛徒兵团划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持有一份康生手谕复印件，分散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活动。经过一段调查，在聂元梓的授意下，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为叛徒，从而加剧了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迫害。

失忆重要情节的例子还有关于 1966 年赴上海造反。《回忆录》第十章“上海串联真相”一口咬定“毛主席要我去上海”，并详细记述：1966 年 11 月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两次来北大，单独向聂元梓传达毛泽东要聂元梓赴上海造反的指示精神，聂元梓遵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带队赴上海向上海市委造反。《回忆录》也指出，在文革结束聂元梓受审时，李讷拒绝为此向法庭作证。《回忆录》特别强调，赴上海造反与江青没有半点关系。但是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江青确实给了聂元梓指示，指示聂元梓带队去上海造反。

再例如《回忆录》标榜自己反对武斗、制止武斗，指责一些学校学生参与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挑起武斗。此处又一次明显失忆，据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1968 年 3 月 28 日夜，即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前夜，聂元梓在临湖轩向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头目下达指令：

“打，你们要打，就打吧！”

从而发起 3 月 29 日大规模武斗。

另有其他事件中失忆重要情节，不再一一例举。

三、关于北大两派武斗

校文革是北京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掌握着全校的行政权、人事权、财务权，聂元梓是校文革第一把手，大权在握；新北大公社是官办群众组织，效忠于聂元梓；二者合而为一，两块牌子一个实体，组织严密实力雄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则由几个大小不同的反聂派组织和大批散兵游勇联合而成，号称七千人，大多数态度上是反聂派，行动上是逍遥派，真正参加活动的不过一二千人；没有财务来源，活动经费全靠募捐。二者力量悬殊，明眼人都清楚，动起武来，后者之于前者不堪一击，如果说井冈山兵团挑起武斗，那无异他们自己于找死。

关于北大两派武斗，《回忆录》的描述是：1968 年 3 月 25 日下午，北京七所大学的一万名学生来到北大发动武斗，聂元梓强拉谢富治来到北大，谢富治通过广播讲话要求七所学校的学生撤离北大，从而制止了一场大规模武斗。但是，“井冈山在外校学生的支持下，准备发动武斗，蠢蠢欲动……3 月 29 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

《回忆录》回避了这一事实；3 月 28 日夜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几名主要头目来临湖轩找到聂元梓，强烈要求集中优势兵力武力解决，聂元梓明确回答：“打，你们要打，就打吧!”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武斗进攻令。须知，此前聂元梓所称北大武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武斗。其时所称武斗有着两个不同的含义：文革初期所说武斗，指的是对批斗对象实施拳打脚踢等暴力手段，相应的口号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包括两派群众发生肢体冲突，充其量只能算作打架斗殴。真正的武斗，准确说应该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成规模的武装冲突，相应的口号是“文攻武卫”。1968 年 3 月 20 日，新北大公社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北京大学真正意义上的武斗（成规模的武装冲突），是 3 月 28 日夜聂元梓在临湖轩一声令下之后，由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于 3 月 29 日凌晨发起的。

遵照聂元梓的武斗指令，3 月 29 日凌晨新北大公社向 31 楼发起武装进攻。31 楼住着井冈山兵团的的骨干力量 0363（化学系 63 级）支队。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布置武斗任务时说：化学系（新北大公社）的同学要做出些牺牲。为避免同班两派同学互相残杀，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总指挥高云鹏调集 09 系武斗人员攻打 31 楼，怕他们不了解 31 楼两派住宿情况，事先在有井冈

山兵团居住的宿舍都做了记号。29 日凌晨 1 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武斗人员统一头戴柳条帽，身穿军棉袄，手持扎枪，发起突袭，驱赶井冈山兵团同学，武力占领 31 楼。他们遇到同一派的同学也不亮明身份，住在这里的新北大公社同学有的被误伤，以为打伤他们的是井冈山兵团，从而大喊“井冈山发起武斗!”此时新北大公社的高音喇叭持续广播:“井冈山兵团悍然挑起武斗!”颠倒是非恃强占领舆论制高点。

天亮之后，聂元梓叫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一同视察武斗现场，遭遇愤怒至极的井冈山兵团同学围观抗议。《回忆录》说:“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刺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

这段描述太夸张了！其实樊能廷拿的不是匕首而是一把普通的中号螺丝刀（改锥），而且距离聂元梓很远，未触及聂元梓身体任何部位，没有伤及聂元梓，更没有“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这样夸张的桥段。

当晚，谢富治赶到北大宣读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要求井冈山兵团立即交出“刺杀聂元梓的凶手”。与此同时校文革发出捉拿凶手的《通缉令》。4 月 4 日李钟奇来北大限令井冈山兵团三天交出“刺伤聂元梓的凶手”。4 月 26 日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乘胜追击，发动大规模武斗，全面围剿井冈山兵团；后者则全线溃败，最后退守在 28、30、32、35、36、37 等六栋楼中。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对这五栋楼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在四周楼顶架设大型弹弓居高临下火力封锁。此刻，在武斗中惨败的井冈山兵团已濒临绝境。其间，新北大公社武斗人员无端打死并未参加武斗的三名学生温家驹、殷文杰和刘炜。

北大武斗外溢效应迅速蔓延，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最高当局无奈,于 7 月 28 日凌晨由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大造反派领袖，当面训诫严厉批评，并派大批工人、军队进驻各校，北京武斗方得平息。

令我们这一代痛心疾首的文革已渐行渐远成为历史，当年互相对立的两派群众早该相逢一笑泯恩仇，共同反思过去，共同面对未来。据悉后来聂元梓对这部《回忆录》也不甚满意，那么我们期待聂元梓在安享晚年之余，庶几留下一些更为真实的回忆。

作者简介：艾群，男，北京人。1963 年至 1968 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公安工作，历任公安部人民公安报社副总编辑、公安部群众出版社总编辑，2005 年退休。高级记者，一级警监。主要著作：《凤凰餐厅的怪客》《京都预审官》《使用化名的女人》《笔走龙蛇》《沈崇事件真相》《首都师大附中百年史话》以及戏曲《瓜园客》《血溅佛堂》（合著），电视剧《京都预审员》等。

答宫香政同学质疑

艾群

校友转来宫香政同学网文《文革中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兼与俞小平、陈子明、林爻、艾群先生商榷》(载《记忆》182 期)，宫香政文中对我所写《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提出质疑，我的答复如下。

第一个问题，即宫香政所说“如此重要”的问题。其网文称：

艾群在《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中的如下资料：“据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3 月 28 日夜，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几名主要头目来临湖轩找到聂元梓，强烈要求集中优势兵力武力解决，聂元梓明确回答：‘打，你们要打，就打吧’，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武斗进攻令。”……我在《燕园风云录》(四）中，读到了艾群的这篇文章……请问艾群，“聂元梓在司法机关询问笔录”是何年何月何日、什么情况下的笔录？该“笔录”多大的真实性？是不是逼、供、信的产物？你引用的是询问者的话？还是聂元梓回答的话？聂元梓本人有签字吗？如此重要的证据，如果你有复制件或全文抄录件，请你将其公布出来，让读者来分析判断，而不是用片言只语，以讹传讹。当时我是总指挥之一，校文革和公社的一帮头头们到临湖轩去找聂元梓、要求武力解决问题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的回答是——

宫香政所指的上述内容，我采访并公开发表于 1986 年。按照司法机关的规定，采访聂元梓反革命案卷宗这类内容，须事先向司法机关主管部门（下称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说明采访内容、采访目的等。获批后，主管部门还要当面告知：(1）哪些内容可以查阅，哪些内容不可以查阅。(2）卷宗不可以拍照，不可以复印；如有抄录，其内容须经审阅允许。(3）使用卷宗内容，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或者引用大意，均须主管部门批准。(4）稿件写成之后，须经主管部门审阅批准之后方可拿出发表。此外，在阅卷室内贴有阅卷规定，还张贴着“不得拍照，不得复印”的大字告示。

我的采访和写稿，完全按照司法机关规定程序完成。稿件经司法机关批准后，交付刊物，审稿过程遵循新闻出版署的规定，于 1986 年公开发表。程序上的缜密合规，确保了内容的客观真实。

文章面世后，多家报刊转载、转摘和引用，另有多种图书收录。尔来 30 余年，从没听到有人质疑。其间聂元梓本人也看过我写的载有相关内容的文章，对这段内容没有提出质疑。

宫香政所看到的《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一文，是 30 年后于 2016 年应校友之邀而写，其中使用了 1986 年采访并发表的内容。宫香政质疑的内容，即为 1986 年采访并发表的内容，也就是按照司法机关规定、按照新闻出版署规定采访并公开发表的内容。

宫香政问："当时我是总指挥之一，校文革和公社的一帮头头们到临湖轩去找聂元梓、要求武力解决问题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的回答是，因为你没有必须知道的资格。聂元梓是校文革主任，是全校的最高领导人；你只是担任某个群众组织的临时职务——武斗总指挥，而且还是"之一"。校文革主任做什么事，有必要一件件告知你这个"之一"吗？《聂元梓回忆录》40 万言，对你这个"之一"未着一字，可见你在她心目中是什么地位。她作决策，没必要告知你这个"之一"。

宫香政说："在给聂元梓的刑事判决书中，根本没有和武斗相关的内容。"

我的回答是，判决书中没有的内容，不等于事实上没有发生，也不等于卷宗中没有记载。判决书 3 千余字，聂元梓反革命案卷宗十几万字，必须囊括吗？能够囊括吗？事实上，聂元梓反革命案卷宗和《聂元梓回忆录》对聂元梓指挥武斗均有翔实的记载，只是人民法院根据判决书的需要，没有一一列举而已。再者，聂元梓因写"第一张大字报"而名扬天下，成为"文革"标志性人物。但是，这件事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按照你的逻辑，写第一张大字报这件事判决书中没有，事实上也就不存在，这逻辑能成立吗？

宫香政问："是不是逼、供、信的产物？"

我的回答是，在聂元梓反革命案庭审过程中，聂元梓及其辩护律师没有说遭受逼供信；《聂元梓回忆录》没有说遭受逼供信；聂元梓刑满释放后，于 2003 年分别写申诉信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两封申诉信均没有说遭受逼供信。试想，但分遭受了逼供信，就聂元梓那性格脾气，早就闹得沸反盈天了，还轮得到你宫香政 30 年后置喙？

宫香政网文无意间透露出一个底牌：拼将无视事实，也要否认那个内容，

为此不惜使出“遭受逼供信”的杀手锏，指鹿为马，硬说是“逼供信的产物”。

其实，宫香政的一连串问号，属于“无端质疑”，根本无需回答。我只是考虑你我是同期同学，不妨沟通几句。正常的议事规则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谁质疑，谁举证。也就是说，你宫香政质疑，应该由你宫香政拿出聂元梓反革命案卷宗中没有那个内容的证据，应该由你宫香政拿出那个内容是“逼供信产物”的证据。

此外，宫香政同学解疑还有一个便捷途径：请君就此问题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你我对簿公堂，人民法院肯定能够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第二个问题，即宫香政所说“连小孩都知道”“应该有这个常识”的问题。其网文称：

艾群在文中还说，公社一方给井冈山“断电、断水、断粮、断炊”此话不实，断电是有的，为了不让井冈山的大喇叭叫唤；断粮、断炊没有，北大的大饭厅对两派一直开放，号称数千人的井冈山若断粮、断炊得饿死多少口子？断水更没有，连小孩都知道人离开水活不了三天，我想艾群同学应该有这个常识……

我的回答是——

聂元梓和校文革武斗思维的本身，就处处违背“连小孩都知道”的“常识”。3·29 武斗之后，32 楼的同学给我家中打电话，告诉我学校发生武斗，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给井冈山“断电、断水、断粮、断炊”要求我尽快给他们送食品。这位同学告诉我，井冈山退守在 32 楼等几座楼中，这几座楼的东、北、西三面已被校文革和公社的武斗人员封锁，井冈山兵团只有西南校门可以出入。根据这位同学的要求，我买了食品，通过西南校门进校，送食品到 32 楼。我在 32 楼目睹的情况正如这位同学所说，是“断电、断水、断粮、断炊”。

断电，宫香政承认说“是有的”。那么断粮、断炊、断水，又是怎样呢？我亲眼目睹，也“是有的”。

断粮、断炊，也“是有的”。我目睹的情况是，井冈山兵团退守的 32 楼等几座楼之东、北、西三面已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武斗人员封锁，他们还在楼上架设巨型弹弓对井冈山 32 楼等楼进行制空封锁。宫香政说“北大的大饭厅对两派一直开放，号称数千人的井冈山若断粮、断炊得饿死多少口子？”真

是骑驴不知赶脚苦，如此罔顾事实。井冈山兵团守楼人员根本无法身冒矛矢之险，通过封锁线去大饭厅就餐。此外，守楼人员曾经用电炉自己做饭，但是断电之后，自然也就断炊了。

断水，事实上也“是有的”。饮水，必须去锅炉房打开水，去锅炉房的道路被封锁，因此不能打开水，这是断了饮水。使用水，当时我目睹 32 楼水房和厕所都没有水，便池被堵塞（守楼同学称，一段时间后水房、厕所来了水）。

我问守楼同学食物和饮水怎么解决，他们说一是从海淀镇购买，二是井冈山兵团同学大部分疏散到地院等兄弟院校，那里的同学送来食物和饮水。至于断电，后来井冈山兵团组织了一次夜间突击接线，把校外的电源引进楼内，解决了用电问题。

值此，我再次强调本人于 1986 年采访并公开发表的那段内容：

据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讯问笔录显示，3 月 28 日夜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几名主要头目来临湖轩找到聂元梓，强烈要求集中优势兵力武力解决，聂元梓明确回答：“打，你们要打，就打吧！”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武斗进攻令。

上述内容的采访和公开发表，符合司法机关规定要求，符合新闻出版署的规定要求。程序上的缜密合规，确保内容的客观真实。1986 年采访并公开发表以来，30 余年没有质疑反馈。而今宫香政同学提出质疑，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请宫香政同学拿出聂元梓反革命案卷宗中没有这个内容的证据，请宫香政同学拿出这个内容是“逼供信产物”的证据。

注：我的原文是“司法机关讯问笔录”，并非宫香政引文中说的“司法机关询问笔录”。

跋：　记录历史，还原真相

张 从

北大 120 年校庆前夕，部分校友在一起聚会，有两位校友得知笔者近年来从事北大文革历史研究，便建议道："应该把北大文革中的武斗专门写一本书，这段历史太重要了"。

校友的建议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

确实，发生在 1968 年 3 月 29 日到 7 月 28 日的大规模武斗，在北大文革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它表现出了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校文革"，为了镇压不同意见群众而采取的极端凶残的手段和某些"文革"极端分子丧失人性的丑恶面目，在北京乃至全国高校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是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同时，这场武斗也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文革"决策和部署，从此对知识分子造反派失去信任，改由军队和工人占领上层建筑，影响了以后长达 8 年的"文革"进程。所以说北大（和清华）的武斗改变了"文革"的历史，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句话是毫不夸张的。

聂元梓由第一张大字报起家，成为为"文革"中第一造反派领袖，曾经头顶光环，不可一世，为所欲为，干了许多坏事，但她最重要的坏事就是发动北大"武斗"，镇压北大群众，也因此而走向反面，被最高领导者抛弃，1968 年 8 月 19 日工宣队进校后她就失去了权力，1978 年后更失去了自由，1984 年被判处 17 年徒刑。北大武斗，也成为她人生中从大红大紫走向失败的滑铁卢。

具有五四传统，崇尚科学民主的北大师生，是不会让聂元梓这样一个品德低下、专横跋扈、倒行逆施的野心家来统治北大这个煌煌上庠的，他们曾用大字报、串联会等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反对聂元梓的专制统治，但他们过于善良，没有料到聂元梓及其帮凶们竟然如此凶残地发动了武斗，抓捕了大量的群众，采用丧失人性的手段拷打、刑讯逼供，乃至打死三人，致残多人。为了生存，"井冈山兵团"的学生们不得不困守在六座学生宿舍楼，采取各种方式求生，抵抗住了聂元梓手下的武斗队伍多次进攻和断水、断粮、断电等手段的戕害，守住了这六座楼，坚持到武斗结束。应该说，北大武斗，不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而是北大当时的统治者与部分群众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

争。井冈山兵团的反围剿斗争，是具有正义性的。

风烛残年的聂元梓自称“人还在，心不死”，近年来在香港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和《我在文革漩涡中》中，极力为自己辩解、洗脱，抵赖她在“文革”中的罪行，尤其是发动武斗、镇压群众的恶行，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和反“王关戚”的英雄。也有几个她的追随者，或著书出版，或在网刊发文，为其辩护、吹捧，企图蒙蔽不明真相的读者。因此，驳斥聂元梓及其追随者的谎言，还原历史的真相，是非常必要的。

本书的作者都是北大文革的亲历者，既有原“井冈山兵团”的成员，也有原“新北大公社”的成员，还有一位外校的朋友（理胜）。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作者用亲身的经历记述了北大武斗的发生到结束的全过程，记述了聂派武斗队如何凶残地将“井冈山”学生赶出 31 楼和 29 楼，如何灭绝人性地封锁校园，抓捕、殴打井冈山学生，而井冈山学生又如何在艰难困苦中求生，架天桥、挖地道、接高压线、监听电话、购买粮食蔬菜等具体情况，唐利、司徒文、张曼平、俞小平、顾仁虎、耿天彭、汪凯戈、田建行、戈辰、况明星、姜承永、梁正路和地球物理系、化学系部分同学的记述都十分客观真实。下篇主要记述了在武斗期间发生的校内有关事件，包括聂派武斗队打死三人，大量抓捕干部、教师、学生并私设监狱，关押、刑讯被抓捕者，导致邓朴方和樊立勤致残的情况，披露了所谓的“刺杀聂元梓”案件的真相以及聂元梓亲自下令挑起武斗的事实。通过这些记述，读者可以大致了解北大武斗的全貌和由武斗引起的其他有关事件。

“文革”结束后，囿于彼时中央精神“宜粗不宜细”，北大“文革”武斗首恶分子聂元梓、孙蓬一、李清昆、高云鹏、黄元庄、宫香政等人，分别受到刑事处分和行政处分，但是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彻底揭露，更没有彻底清算。

最近，笔者在访问哲学系一位年过八旬的老教师时，他说：“聂元梓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权后迫害、镇压群众，包括干部、教师和学生，研究北大“文革”历史，就要抓住这个最大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这位老教师说的很对，我们应该以此为重点，继续搞好北大“文革”历史的研究。

揭露事实真相是必要的，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分析研究，提高对“文革”本质的认识，本书在这些方面尚有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有关“文革”资料难以查找，当年年轻学生已经成为年过古稀的老者，仅凭作者的记忆，本书中的一些记述难免在时间、地点和细节方面出现缺漏和差错，还请知情者给予补充和指正。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校友的支持，有些专题还在微信群里进行过讨论，给了编者很大帮助。在此，向给予本书关心、鼓励和支持的校友致以诚挚的感谢。